

下

短缺经济学

Economics of Shortage

(匈) 亚诺什·科尔内

经济科学出版社

短缺经济学

下 卷

〔匈〕亚诺什·科尔内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JÁ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 NEW YORK · OXFORD

1980

短缺经济学

下卷

〔匈〕亚诺什·科尔内 著

高鸿业 校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11印张 278500字

1986年6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四次印刷

印数：71001—76000册

ISBN 7-5058-0372-7/F · 307 定价：5.20元

第一、二、八、十五章 张晓光 译
第三、四、五、二十二章、数学附录 李振宁 译
第六、七、十三、十四章 黄卫平 译
第九、十六、十七章 潘佐红 译
第十、十一、二十、二十一章 斯 平 译
第十二、十八、十九章 戴国庆 译

封面设计：石 峰

责任编辑：范新宇

版式设计：代小卫

责任校对：李可钦

目 录

(下 卷)

第二篇 价格存在条件下的调节	1
导 言	1
第十三章 企业：预算约束和利润	2
13·1 引 言	2
13·2 资金平衡表和预算约束：会计关系	2
13·3 硬预算约束：纯粹状态	4
13·4 近乎于硬的预算约束	7
13·5 软预算约束	9
13·6 基本事件和一般行为	13
13·7 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观察	15
13·8 企业财务收入再分配的原因和结果	18
13·9 相反趋势	21
13·10 微观理论中预算约束的地位	24
第十四章 企业：对价格的反应	27
14·1 引 言	27
14·2 收入效应	29
14·3 替代效应：瞬时初始需求	32
14·4 替代效应：强制替代与短期调节	37
14·5 假说和经验检验的可能性	41
14·6 产出的瞬时和短期调节	43
14·7 不对称性：投入和产出方面的价格反应	46
14·8 价格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产出	49
14·9 价格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投入	52

14·10 相对价格和短缺	55
14·11 迂回：非营利机构	56
第十五章 企业间的价格形成	58
15·1 引言	58
15·2 易于或难于管理的价格	60
15·3 管理价格、虚假管理价格和契约价格	63
15·4 价格水平的度量	66
15·5 助长与抵消价格漂浮的力量：企业兴趣的作用	68
15·6 短缺和成本增加的影响	72
15·7 国家对企业间价格的干预	76
15·8 论价格理论的背景	79
第十六章 工资	82
16·1 引言	82
16·2 短期工资政策的决定	86
16·3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劳动总供求的影响	94
16·4 相对工资对劳动分配的影响	102
16·5 工资紧张和工资漂浮	106
16·6 工资漂浮的推动力量和抵制力量之间的妥协	112
第十七章 物品和服务在家庭之间的分配	117
17·1 引言	117
17·2 免费分配、名义价格和有效价格	118
17·3 充分满足水平	120
17·4 分配方式	123
17·5 拍卖	124
17·6 配给	127
17·7 排队	132
17·8 思想实验：用纯粹拍卖方式分配的条件	133
17·9 组合方式	138
17·10 各种方式的相对范围：一般相互关系	143
17·11 各种方式的相对范围：历史的趋势	145
第十八章 家庭：消费者行为	151

18· 1	引言	151
18· 2	过程的开始：解决平行分配方式的两难问题	153
18· 3	过程的继续：相对价格的影响	157
18· 4	过程的货币反映：强制支出或未支出的货币	160
18· 5	家庭储蓄的动机	164
18· 6	买者态度	169
18· 7	消费品部门的短缺指标	172
18· 8	消费品价格和短缺强度：初步探讨	177
18· 9	消费品部门的一般状况	183
18· 10	评克洛尔一巴罗一格罗斯曼学派	186
第十九章 消费品价格和消费品部门的短缺		190
19· 1	引言	190
19· 2	一个说明性的例子	192
19· 3	其他部门的虹吸效应	195
19· 4	中央宏观消费计划初探	197
19· 5	再论中央宏观消费计划	204
19· 6	几个一般结论	206
19· 7	各类产品之间短缺强度的差别：历史的出发点	208
19· 8	房租和住房短缺	213
19· 9	不受管理的消费品价格	221
第二十章 货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223
20· 1	引言	223
20· 2	企业的短期资金来源	226
20· 3	投资资金来源	229
20· 4	储蓄和投资	235
20· 5	国家预算的盈余或赤字	238
20· 6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争论的回声	240
第二十一章 宏观相互关系：吸纳模型		244
21· 1	引言	244
21· 2	第二蓄水池和水龙头	245
21· 3	第一蓄水池和抽水	249

21·4	漏洞和塞子	251
21·5	流入量和闸门	253
21·6	吸纳模型：初步探讨	254
21·7	非总量的探讨	256
21·8	抽吸动力	258
21·9	短缺的分配	264
21·10	吸纳和通货膨胀	268
第二十二章 父爱主义的程度		272
22·1	引言	272
22·2	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地位	273
22·3	倾向与反倾向	276
22·4	父爱主义和预算约束的软化	279
22·5	最后的几点意见：有意识行动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281
附录		283
数学附录A：在市场上排队(合著者：J·W·韦布尔)		283
A·1	引言	283
A·2	市场结构	284
A·3	采购程序	285
A·4	买者态度	288
A·5	买者的状态变量	289
A·6	供给率和实际接待流量	290
A·7	排队	291
A·8	对模型的概述：外生参数和函数	292
A·9	对模型的概述：动态关系	293
A·10	市场的正常状态：存在和唯一性	294
A·11	市场的正常状态：稳定性	296
A·12	对正常状态的解释	298
A·13	函数和参数的变化	299
A·14	对供给率的依赖性	301
A·15	对价格的依赖性	302
A·16	对排队倾向和强制替代倾向的依赖性	303

A·17 关于命题的证明	305
A·18 计算机模拟说明	305
数学附录 B：强制替代、存货和摩擦之间的相互关系 (合著者：A·西蒙诺维茨)	308
B·1 卖者的预测误差	308
B·2 买者的动摇不定	311
译名对照表	315
参考文献	320
术语对照表	333

第二篇 价格存在条件下的调节

导 言

本书第一篇略去了利润、价格、工资以及货币的作用，把它们引进分析是本篇的任务。由于对它们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尚存疑义，所以，我们不把本篇题目称为“通过价格来调节”，而只是称为“价格存在条件下的调节”。

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探讨企业，在某几处也简单地谈及了非营利机构。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的主题是家庭部门。居于二者之间的第十六章，考察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付给家庭部门的工资。

本书最后三章涉及了所有的部门。第二十章讨论货币，第二十一章探讨宏观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最后，第二十二章分析几种制度背景方面的问题。

第十三章 企业：预算约束和利润

13·1 引言

在本书第一篇中，我们几次谈到过预算约束在决定企业行为中的作用。第二篇将以详尽考察企业的预算约束和利润为起始点，因为从这里得出的结论也要作为我们论述价格、工资和财务的基础。

在第13·2—13·6节中，我们将不把我们的定义和思想延伸到任何一个历史的、具体化了的体制中去，也不研究企业所有权的问题。这些分析工具的展开将在13·7—13·9节中用来描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形式。

最后，本章的末节将探讨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的一些问题。

13·2 资金平衡表和预算约束：会计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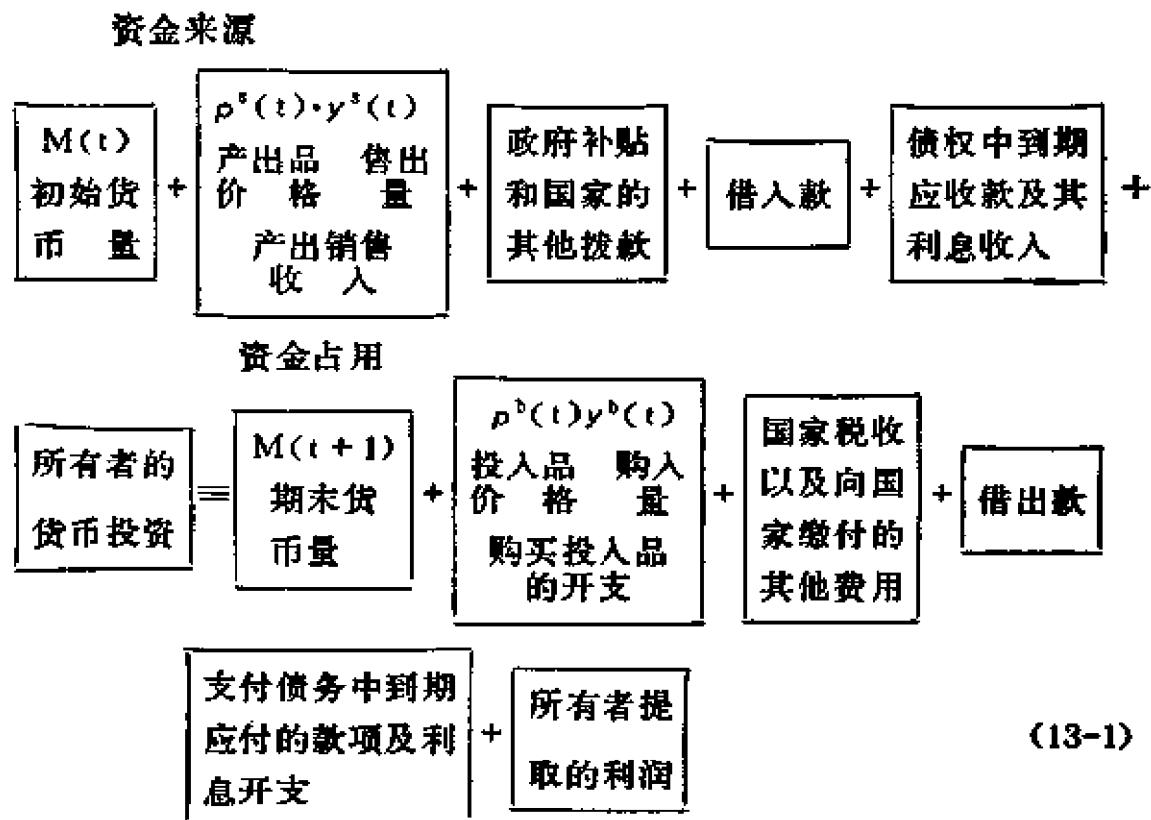
前面的公式(2-3)概括了预算约束的含义，我们现在虽然不打算花费太多的笔墨来谈货币和财务制度，但也要较为全面和细致地来讨论一下预算约束。

我们暂且假定，企业只有唯一的资金平衡表和唯一的预算约束。货币并没有贴上“标签”，即一只“钱匣子”只能用来支付工资，而另一只只能用来支付投资费用，等等。货币一旦归企业所有，就可以派任何用场。

因此，我们不去区分企业与投资有关的开支和用于当前生产

的开支。投资和当前生产都要求不断地用货币来购买投入品。

公式(13-1)表示的是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例如一天)的资金平衡表^①。



公式(13-1)是很清楚的，其中只有两项需要解释一下。一个¹是 M ，货币量。它大致与货币理论中的范畴 M_1 一样：它是企业可以直接、迅速支配的货币量，而不管它是以现金形式还是以即时可提取的银行存款形式存在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的存量没有列入表中，因在有关的信贷业务中计算的只是存量的变化(即流量)。

由于我们暂且先不讨论所有权的问题，因此谁能够在企业内进行投资，以及投资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获取利润的可能性也都是尚待解决的问题。在所有者是国家的情况下，“资金来源”一方

① 表中的绝大部分项目是用文字形式来说明的，只有那些以后将要涉及到的变量，我们才用符号来表示它们。

中的两个科目(“政府补贴”和“所有者的货币投资”)实际上是一回事。

公式(13-1)是事后的会计恒等式。它根据定义而永远成立。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总是具备偿债能力。但是, 如果它未支付已经收到的货物的货款——虽然有着与卖者签订的合同——事实上企业已经在贷款了。由于“借入款”科目, 不仅包括贷款者自愿借予的款项, 而且也包括因违反支付协议而造成的信用赊欠, 所以资金平衡表的恒等仍然成立。

由于公式(13-1)中每个变量都是非负的, 所以下面的不等式成立。

$$\boxed{\begin{array}{c} \text{：期间的} \\ \text{总支出} \end{array}} \leq \boxed{\begin{array}{c} M(t) \\ \text{初始货币量} \end{array}} + \boxed{\begin{array}{c} \text{：期间的} \\ \text{总收入} \end{array}} \quad (13-2)$$

为避免重复, 我们将不准备详尽地探讨不等式中的收入和支出项目; 在公式(13-1)中可以找到对它们的解释。(13-2)是企业总量预算约束。形容词“总量”表示企业的总收入对于企业的总支出的约束。^②因为它是一个恒等式中推导出来的, 很明显, 这种一般形式上的预算约束总是成立的。

13·3 硬预算约束: 纯粹状态

在什么条件下, 不等式(13-2), 所表示的不仅仅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能成立的财务关系, 而且是实际限制着企业行为和行动自由的约束呢? 为此, 不等式中的变量绝不能任意假设为非负值。它们的定义不仅为实际领域中的可行性约束所限制, 而且也要为控制领域中的内部规律、它的制度上的安排以及微观组织的行为

^② 无论何时, 我们在没有限制条件下使用“预算约束”一词时, 它总表示总量约束。如果我们想在较窄的范围内谈约束的话(例如投资的预算约束或工资的支出约束), 我们将会予以特别说明的。

规则所限定。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制度上的安排。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硬预算约束的纯粹状态。我们将指出五个只要能得到满足，就可以保证预算约束硬度的条件。我们先提出一个理论上的说明：事实上，五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永远难以得到完全的满足的。这将在以下各节中加以解释。

这五个条件合在一起足以保证完全的硬约束。我们并不是说唯独这一组条件才能对硬度给予保证，但这五个条件却为我们进一步的推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便于下面的比较，我们将各条件的序数上加上字母H(Hard硬)。

条件1-H。外生价格。投入品购买价格的向量， ρ^b ，以及产品销售价格的向量， ρ^s ，对企业来说是给定的。企业是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订者。从这个观点来看，谁决定价格是无所谓的，单个的买者或卖者左右不了一个被分解成为无数细小部分的市场过程；比我们的企业更强大的一个卖者决定了买价；或者一个更强大的买者决定了卖价；或许就是国家机构在决定着买价、卖价。它可以是任何人，关键是我们的企业影响不了价格。

条件2-H。税收制度是硬的。这并不是指税额很高，而是指要严格地遵守下列原则：

- (1) 税则的制订(法令、条文)不能为我们的企业所左右，它们对于企业是外部给定的；
- (2) 税收制度与各种可客观观察和度量的标准相联系；
- (3) 企业不能得到任何个别、例外的税收减免；
- (4) 税额按规定条款无条件地征收。

条件3-H。不存在无偿的国家拨款。国家不给予任何拨款作日常开支，也不进行无偿捐赠式的投资。

条件4-H。不存在信贷。全部投入品的购买， $\rho^b \cdot y^b$ ，必须用现金支付。企业间的信贷，不能通过与卖者协商或违约欠付、采用把货放者身分强加在卖者身上来得到，同时也不能从其他来源获取信用贷款。

条件 5-H。不存在外部的货币投资资金。我们的论证不涉及企业的创建，即不涉及企业初始货币投资资金是怎样形成的问题。我们只考虑现存的企业。条件 5 表明：所有者可以从企业提取利润，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他们就不能再把这个利润投资到企业中去了。

条件 4-H 和 条件 5-H，只有在严格静态经济的抽象状态下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

条件 1-H 到 5-H 建立了对于企业资金平衡表(13-1)中描述的变量的事前行为约束。如果这些约束被严格地遵守了，概括了它们的后果的(13-2)将会实际地限制企业进行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预算约束将成为事前的硬行为约束。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五个条件的含义。

预算约束的硬度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我们仍然要在排序的数字上加上字母 H)。

后果(1-H)：生存。企业的生存只取决于销售收入和投入成本。如果在短时间内后者大于前者，企业能够利用其货币存量 M 来弥补亏损，也可以放弃提取利润。但是，如果它已经完全放弃了提取利润，并且耗尽了货币存量，而亏损仍未消除，就只得减少开支了。较少的投入导致较少的产出，收入也随之减少。最后，企业将丧失其偿债能力走向破产。硬预算约束是一种经济的强制形式，销售收入和投入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后果(2-H)：增长。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增长，都需要投资，而它们取决于相同的因素。购买企业扩展所必需的补充投入品的资金来源，只能从企业内部积累中产生。

后果(3-H)：对价格的适应。由于价格是外部给定的，企业必须去适应它。调节必须主要是通过实际行为来进行，首先是提高或降低其生产水平，或者是改变其投入产出构成。这些变化是生产厂家内部的事情，因此与价格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购

买改变生产所必需的投入品 Y^b ，和出售由于改变生产而得到的产出品 Y^s ，却又间接地使它们与价格联系得更紧密了。

企业在调节中可以得助于两个内部的财务变量：它可以动用其货币存量 M 以及减少或暂缓提取利润。但是，货币存量可能会耗尽，利润提取只能减少到零。企业不能依靠外部资金来源经营。所以，企业最终没有其他的办法而只能通过实际行为来进行调节。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就不仅仅是那种在控制其实际行为时，愿意就遵守不愿意就不遵守的“信号”了。企业必须遵守它，否则企业就不能扩大或发展，甚至还可能走向破产。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完全忽略价格的特点。“最优”或“非最优”，“均衡”或“非均衡”的价格——它们从硬预算约束的角度来看，都是一样的。这里重要的是价格不取决于企业，以及在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只能去适应价格。

后果(4-H)：不确定性。企业不能把自己的风险转嫁出去。它承受着外部环境和企业自己行为的后果。由于价格是外生的，它们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好运，但也可能给企业带来灾难。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都是企业本身的运气好坏，如果交了坏运，没人来帮助它摆脱，但若是交了好运也没人来分一杯羹。

后果(5-H)：企业需求。上面所列举的各种后果，意味着企业对于投入品的需求是有限的。它紧紧地依赖于投入品的购买价格 p^b ，以及企业当前和预期的收入 $p^s \cdot y^s$ 。

13·4 近乎于硬的预算约束

在每个现实的经济体制中，都存在一些可以使预算约束偏离上述完全硬的纯粹状态的现象，我们将在本章后面部分对这些现象作详尽的分析，但在这里我们想谈一谈其中的一些现象。

(1) 作为生产集中的结果，巨型企业诞生了，它们权势的标

志之一就是，并不满足于充当价格接受者的角色，而是积极地参与着价格的制订。

(2) 随着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扩展，它对企业财务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作用也加强了。

(3) 自从企业存在以来，也就有信贷制度的存在。企业不仅能在现金形式上互相支付，债权-债务关系在它们中间也发展起来，企业还可以从银行系统得到信贷。

(4) 在既定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的约束下，货币持有者能够用货币进行投资，投到新企业的创建或现存企业的扩大中去。

上面列举的现象包含着预算约束软化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程度却要取决于每种体制的特征。我们将在下面考察，在什么条件下，预算约束能够不管上述的各种现象而至少近乎是硬的。(在条件的序数后面的字母 AH 表示“近乎于硬的”)。术语“近乎于硬的”表明，虽然约束不象理论的纯粹状态下那样硬，它却是近乎于硬的，这点将由它的后果来表示。一个预算约束只要能产生上节 (1-H)——(5-H) 的后果，那它就是近乎硬的。我们仍将满足于提供一组充分条件，也可能存在着能够产生后果 (1-H)——(5-H) 的其他条件。

条件 1-AH：在狭小的范围内制订价格。一些企业对于某些投入品和产品是价格制订者。然而，它们在决定价格时，受到其贸易伙伴的反抗，以及总需求的最终约束。

条件 2-AH 和 3-AH：不存在国家的再分配。纯粹状态的条件 2-H 和 3-H 必须完全成立。国家既不能采用征收差额税的方法，也不能采用其他揩企业油水的手段对企业的财务收入进行再分配，也不能采用补贴或其他拨款来这样做。

条件 4-AH：硬条件信贷。这并不是指贷款者要收取高利息，而是指一些特定的原则——“正统”而又“保守”的原则——在发放信贷时要起作用。

贷款者(银行等)只是在企业能够完全担保以其销售收人偿还

贷款时，才会发放。也就是说，贷款是一种“预付”。

如果企业已经取得了贷款，它就必须履行贷款协议中的每一条款：分期付款中到期应付的部分必须如期归还，并且按合同支付利息。贷款协议是用严格的法律来执行的。

买者不能在没有初步协商的情况下，采用不及时交付到货的货款的方法，来迫使卖方提供信贷。

条件 5-A H：硬条件的外部资金投资。企业内部资金来源可以用所有者的货币投资来补充。但是，这种资金只能用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企业的扩展，并且必须从增长的收入中偿还，不能用外部资金来源来克服短期财务困难。

我们不希望重复，但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上节的讨论，就能使读者们相信：那里列举的后果 (1-H)——(5-H) 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产生。但必须补充的是，它们不能得到象在纯粹理论状态下那样严格的保证。条件2—3并没有改变，国家进行再分配的可能性仍然被排除了。但即使如此，条件 1、4 和 5 也会带来困难。它们所涉及的现象并不能作出简单的“是或否”的回答。例如，我们就不能肯定，贷款是根据硬条件还是软条件发放的。可能存在着许多中间层次。对于价格制订或价格接受以及外部资金条件的硬或软，情况也是这样。

居间的情况将在13·6节中讨论，这里我们要舍象掉它们而来讨论另一种极端的情况：软预算约束。

13·5 软预算约束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说预算约束已经完全变软了，即它不在事前约束企业选择的自由了呢？我们要重温一下上节讨论过的 5 个条件。（这次我们要在序数的后面加上字母 S）。虽然通常总是一些条件在同时起作用，但事实上，单独一个条件，或者甚至单独的一部分，就足以使约束软化了。

条件 1-S：价格制订。大多数企业不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制订者。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价格并不是外生的。

理论上讲，市场双方都能是这种情况：投入品价格如此，产品价格也如此。但在实践中，通常却是后者软化了预算约束。企业能把增加的成本强加在买者身上。这可能是因为就自由协商价格来说，卖者总比买者更加强有力一些（例如，一个大的独家卖者面对着许多分散的买者，或者存在着长期的短缺，因此这个卖者可以左右价格）。或者是，虽然形式上价格是由价格管理部门制订的，但企业却对价格部门的决定有很大的影响力。

持续不断地把所有成本都强加在买者身上最终是可能的，这是因为货币形态的总需求并不能被严格地限制住，而却多少被动地适应了上升的成本水平。

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再回过头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的一些方面。

条件 2-S：税收制度是软的。下面是对它的一些特点的说明：

- (1) 企业可以影响税收条例的制订；
- (2) 作为单独优惠，企业能够得到税收的减免和缓征；
- (3) 赋税的征收并不严格。

条件 3-S：国家的无偿拨款。企业可能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得到这些拨款。

- (1) 没有偿还义务的投资拨款；
- (2) 给予不断的长期补贴以弥补长期亏损或在较长时期内鼓励某种活动。
- (3) 特殊安排的临时性补贴以抵消偶然的亏损或鼓励某种特殊的活动。

条件 4-S：信贷制度是软的。它不信奉“正统”和“保守”的原则。

即使企业不能完全保证具有以其销售收入如期归还贷款的能

力，也仍然可以得到它。贷款不再是严格的“预付”，它的发放不再和预期的生产及销售紧密相联了。

允许企业不履行在信贷协议中写明的偿还义务。不仅如此，作为投入品购买者的企业，被允许在事先没有和卖者谈妥的情况下就任意推迟付款。

条件 5-S：软条件的外部资金投资，就国家所有制的企业而言，这一条是无法与条件 3-S（国家无偿的拨款）相区分的。这种现象在私人企业中也可以观察到：所有者们用自己的资金向企业投资——不是为了使之发展或扩大，而是为帮助它摆脱财务的困境^③。

我们现在可以把软预算约束的伴随现象及其直接后果与硬预算约束的相应情况作一下对比。

后果(1-S)：生存。企业的生存并不仅仅取决于销售收入是否总能补偿它购买投入品的成本。即便后者总是超过前者，也可以用税收减免、国家补贴、软贷款等来抵销。生产收入和成本之差并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后果(2-S)：增长。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扩展，并不仅仅依赖于它是否能从内部资金积累中（不管是它的货币存量，即从前利润的结存，还是晚些时候必须要用收入偿还的硬投资贷款）为投资筹措到资金来源。为发展和扩大企业所需要购入补充投入品的资金，可能会由国家以无偿拨款或软投资贷款的形式来提供。

后果(3-S)：对价格的适应。由于存在以上两个原因，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用不着去适应价格。

预算约束由于上述条件 1-S 已经软化了，企业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制订者。例如，我们假定企业可以影响价格；那它就无需过多地去注意投入品的相对价格。不管它们变化多大，企

③ 例如，一个处在困境中的家庭企业，所有者为图以他们的个人财产为代价使之再运转起来，这当然要受其财产数量的限制。

业将能够调整自己产品的售价以弥补成本的增加。

即使这个因素不起作用，企业是价格接受者，它们也仍然不必通过改变投入-产出构成来被迫适应价格。即使由于忽视价格而尝到了亏损的苦头时，也可以由税收减免、国家补贴、推迟偿还贷款以及在软条件下得到额外的贷款等等来补偿。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取决于价格，那末，企业对价格，高兴时就注意一下，不高兴时就可以不理会它。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仍然可以生存甚至得到扩展。

企业在实际行为中可能会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即适当地变动其投入-产出构成。这就改变了投入品的实际购买量 (y^b) 和实际销售量 (y^s)，并因此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但是，企业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作出反应。它可以试图影响价格 p^b 和 p^s ，以及各个财务变量(税收，国家补贴、贷款条件，等等)。

在第一种情况下，企业是在实际领域中作出反应。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在控制领域中作出反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它是在工厂中进行活动。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在部里、税务部门、或银行的办公室中进行活动。在第一种情况下，反应的主要内容是生产，调整投入和产出的构成以适应形势；在第二种情况下，主要内容则是要求、抱怨、和讨价还价——换言之，试图操纵那些靠他们可以获取免税、补贴、软贷款等的人。

预算约束的软化并不排除第一种反应，但也不保证实行它。而同时，约束的软化为第二种反应提供了广泛，甚至是诱人的活动场所。

后果(4-S)：不确定性。企业不是自己承担风险，而是与国家分摊。如果情况发展有利，企业也不能得到增加的利润，这些利润可能会被抽走；但是如果企业运气不好，或自己不能很好地适应情况，它也能把后果转嫁于人，比如用提价来转嫁给买者及贷款者，而最主要的是转嫁给国家。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预算约束受到两种不确定性的损害。一种

是对每个企业都存在的不确定性(在硬预算约束下也存在): 价格和市场是不确定的。另外, 不确定性也因持续不断地对企业财务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产生。企业不能准确地预见国家将从它那里拿走多少, 或将给予它多少。

后果(5-S): 企业需求。由于上述后果, 企业对于投入品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这既不取决于投入品的购买价格 p^b , 也不取决于企业当前和预期收入 $p^e \cdot y^e$ 。企业预期自己迟早可以负担投入品的成本; 如果产品销售不敷使用时, 它将从外部资金的来源中弥补成本。

总之, 软预算约束不能在实际领域即生产和交换的活动中约束企业。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相反——不能作为有效的行为约束, 而只是作为一种财务关系而存在。

13·6 基本事件和一般行为

前几节中, 我们考察了硬化或软化企业预算约束的因素。这些因素通过成千上万的基本事件在亚微观层次上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客观发生的事件被企业的决策者主观感受到。决策者不仅受其经验的影响, 而且也受自己对其他企业观察的影响。最后, 所有这些经验形成了预期。预算约束的软与硬反映着企业经理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他越是预计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能取决于生产成本和销售收人, 他就越重视预算约束, 因此预算约束会更硬些。他愈是预计事情不是这样, 他就愈不把预算约束当成一回事, 约束也就会变得更软些。

因此, 如前所述, 约束的取值不一定就是在这两个值中二者取一, 或者是软, 或者是硬。由于两个原因, 还存在着中间层次。首先, 某决策者自己可能就预期着一个中间值。其次, 在同一体制下, 不同决策者的预期可能是不同的, 有些人预期较硬的预算约束, 而其余的人则预期较软的预算约束。

但是，存在着造成一致和极端预期的趋势，如果一个给人以软预算约束印象的事件频繁发生，其频率超过某一临界值时，一种认为约束是软的“民意”就会形成。

预算约束的硬度是可观察和可度量的。由于它是一组很复杂的现象，我们不可能用单一的基数指标来描述它。而只能用一些指标对它进行序数的度量。我们用 β_i 来表示预算约束硬度指标的向量。按照本书使用符号的惯例， $\beta_i = 0$ 应该表示与完全硬度的预算约束相应的，第 i 项指标所描述的现象状态。约束愈软，则指标的正值愈大。

一些指标可能是以主观观察作为基础的：企业经理们对于影响他们财务状况的因素，以及财务状况在决定他们选择活动中的作用的预期，能够通过采访而得到。虽然这种采访的方法不那么可靠，但由于它能为判断情况提供重要线索，所以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能从约束的硬与软的后果中推断出预算约束的硬度来（见上节列出的(1)一(5)）。我们将考虑客观上易于观察和定量的三种现象：

企业收入的国家再分配。这可以用许多种指标来描述。在各种名目下，从企业抽走的资金与在各种名目下拨给它的资金数量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抽走和拨给企业资金这种国家干预的频率是多少？提前宣布的和未经宣布的干预之间的比率有多大，等等。

财务状况和企业的生存。企业短期和长期亏损与企业的生存间的关系是什么？企业破产和财务整顿的频率有多大？破产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分布如何？

财务状况和企业的扩展。在企业内部，收支实际盈亏和投资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与第一段所提到的，对财务收入的国家再分配的观察和度量有部分的重叠。

上面提到的三组现象中的任何一个单独事件，我们或多或少

都能给予确定的描述。但是，把经济看成一个整体，它们就成为随机事件了。在度量中我们必须致力于进行统计上的描述，勾画出它们概率分布的特性来。

通过更长期的观察，就可以确定在既定社会环境下该体制内企业预算约束的正常硬度。

13·7 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观察

本章至此，我们已经在抽象的层次上讨论了预算约束。我们希望详尽说明分析的工具（概念、因果关系、观察和度量的原则，等等），以考察历史上出现过的特定体制。现在我们就运用这样的分析工具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首先，我们要谈一谈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度。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尽管如此，回顾一个长的时期，共同的趋势还是明显的。

正常的预算约束硬度似乎已趋向于软化，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在十九世纪接近于抽象的极端，即接近于 $\beta=0$ 的状态，但约束完全硬的这种绝对的情形可能从来也不曾存在过。硬税收信贷制度的标志是：破产就是真正的破产，垮掉的企业没有任何人来解救，而是被更成功的竞争者无情地毁灭掉。接收者把破产业主的个人所有变卖一空，以及欠债者被关进监狱。除了少数例外（铁路、航运、保险、少数从事殖民地贸易的大公司），企业都不大，价格实际上主要是由自发的市场过程确定的，因而对企业来讲是外生给定的。

从古典资本主义的初始时期以来，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预算约束的硬度从极端的 $\beta=0$ 点移开了。尽管这些变化已为人熟知，我们仍应简要地回顾一下。

经济日益变得高度集中，巨型公司正在形成之中，它们不再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订者。从预算约束软化的观点

着，这是基本的要素之一。资本主义大公司能够不通过改变其投入——产出构成，而是通过把产品价格调整为实际成本加预期涨价来对投入品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由于它制订价格的力量，它几乎可以“自动地”保证其生存，保证它的永恒的存在。

历史的经验使社会的注意力转向就业，不仅直接蒙受失业苦难的工人而且资本家和其他社会阶层也注意这个问题，由于破产总要对就业产生影响，所以它就不单单是资本所有者的问题了，倒闭了的工厂的工人是要被遣散的。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已经表明，这里还存在着乘数和加速器的作用，每次倒闭都减少着总量需求，因此它也威胁着其他地方的就业。这不仅把企业所有者卷了进去，工会也被牵涉了进去，几乎整个社会都对国家施加压力以解救受到威胁的企业。给予他们免税、补贴以及由政府担保的贷款。救援行动有时采取国有化的形式。

保护主义的国家干预在很多领域中增长着。如果国内企业无论在进口或出口替代中都是软弱的，国家就要保护这些在国际竞争中的落伍者。出于各种社会的政治原因，国家对于不盈利的产品和服务给予补贴。

企业的成长不仅仅取决于它在自发市场上的成功，也要靠它自己的实力，靠它能够对其经营伙伴施加的压力和与银行的联系。最后，它对国家决策、税收、补贴以及政府订货的影响程度也是重要的。

信贷的原则被软化，在凯恩斯主义者的心目中，它们偏离了“保守”和“正统”的原则。预算赤字被认为是可以允许的，在一些特定条件下甚至是需要的。这又产生出一种“透支经济”^④来，即：货币被创造出来以增加需求。

④ 见希克斯(1974a, b)，例如，如果一个帐户的所有者用支票进行支付，而他的帐户中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个支票的话。在银行术语中就是“透支”。

我们再说一遍，上面描述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⑤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⑥这里我们按单一标准把它们汇集起来：我们希望指出，所有这些过程都对资本主义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起着作用。今天的资本主义企业不仅仅是通过实际活动来对环境作出反应的。企业规模愈大，愈有权势，则我们的观察愈适用。企业可以通过其他许多途径来影响自己的生存：从制订价格到对当局进行“疏通”活动。

至于资本主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度，是提不出带有普遍性的命题的。在每一个国家中，预算约束的正常硬度是各不相同的，它取决于集中的程度、国家的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的社会因素。在一个国家内部，正常的预算约束硬度也是有差别的；对于强大的和弱小的企业，它是不同的。在有的领域中，可以说预算约束仍然是“近乎于硬”的，而在其他领域中，它就不很硬，或者是“相当软”的了。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不存在预算完全变软和企业生存可以自动得到保障的情况。

本书的任务并不是要较详尽地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状况。我们把问题分析到如此的程度主要是为了避免把对比弄歪曲了。我们可以进行抽象理论的比较，从而对“纯粹硬”和“纯粹软”的预算作出解释。我们也可以把一个实际体制与另一个实际体制作比

⑤ 资本集中的历史重要性是由马克思首次强调的 (1867—1894a, b)，后来它又在希法亭 (1910)、列宁 (1917)、卢森堡 (1913) 的思想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论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可参见 P·埃尔德什 (1966, 1971, 1976) 的著作。

⑥ 大企业在制订价格中的作用，第一次是在不完全竞争的文献中得到强调的，它的起点是罗宾逊 (1933)、张伯伦 (1933) 的著作。尼凯多 (1975a, 1975b) 借助于现代数学模型对垄断竞争进行了描述。加尔布雷思 (1967, 1970, 1973) 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公司和国家关系的著作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追求充分就业而采取积极的政府经济政策的渊源始自凯恩斯 (1936a, b)，赞同或反对凯恩斯的文献是很多的。在这里必须特别提一下新自由学派：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他们仍然留恋着古典自由市场时期，并尖锐地指出了软化的预算约束在若干方面的问题。例如，见弗里德曼、哈耶克以及其他，等等 (1974)，弗里德曼 (1977a)，哈耶克 (1944)。

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可为经验观察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与社会主义企业同样可为经验观察到的行为作一下比较。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我们主要的假说如下：

- (1)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
- (2) 1968年匈牙利那样的局部分散化的改革，使企业预算约束的正常硬度有所变动——但只是很小一点偏移，约束基本上依然是相当软的。

这些假说需要有全面的经验验证。本书中的观察并不足以提供这样的验证。当然，本章的后面部分的叙述中，某些证据似乎是有利于证实假说(2)的。

我不探讨假说(1)，但是我们有关假说(2)的考察也将间接地证实假说(1)。⑦

13·8 企业财务收入再分配的原因和结果

在评价匈牙利经济管理改革后的情况时，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对企业财务收入的再分配上。⑧首先，我们讨论与当前生产相联系的财务状况，然后再讨论投资。

我们把销售收人减去投入品开支、到期债务及利息后的剩余称为毛利。这部分须用来交付税款和其他上缴国库的款项，它被用来增加企业的货币存量M，在M中增加用于企业投资的自筹资金的部分；而且，在结余中还要支付我们所说的公式(13-1)中的“利润提取”，即付给工人的利润分成，以及对各种社会基金所作

⑦ 一个基于逻辑原则、更有道理的间接结论是：如果我们同意改革后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相当软的，那么改革前传统的企业的预算约束则必然更软。

⑧ 波兰尼(1944, 1976)认为再分配体制是社会经济活动组织的基本形式，在他的术语中，这是与市场相对立的。

在改革后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市场和国家进行的再分配并存，并且交织在一起。

的捐赠，等等。⑨

在各种名目下从每个企业抽取走了一部分毛利，又在各种其他的名目下把它们给予了其他的企业。再分配是由各种不同的机构（税务局、海关、价格机构、其他财政机构以及工业和外贸管理部门，等等）通过各种货币流动的渠道来进行的。因此，就有可能在某种名目下，某一机构从某企业抽走了货币，而在另一名目下，由第二个机构又把货币给予了这个企业（企业缴纳了税款，却得到了外贸补贴）。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在各种名目下，通过一切渠道被再分配的毛利，在全部毛利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至少要超过一半。⑩

在这种再分配中，信贷系统起着重要作用。即便在改革后，银行业仍然保持着高度的集中，在这里提到银行只是为了更全面起见，我们将在第二十章中对它做比较详细的探讨。⑪

再分配可以通过数以千计重要性大小不一的措施，通过偶然的局部行为以及在较大范围内长期有效的规章制度来进行。每一项措施都可以用某一特别理由证明是正当的。但是，在各种直接理由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更普遍的动机。⑫ 我们只选出这些动机中的三个来谈一下。

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寻求稳定性，它是指每个企业甚至是每个工作岗位的“稳定化”。那些不能盈利或盈利不多的活动必须得到帮助。⑬ 这种努力的后果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在相当大程

⑨ 我不使用那些在匈牙利经济生活中经常发生变化的术语，我采用的是本章所定义过的术语。

⑩ 70年代有大量论及此题目的经验性的文献问世。论述给予企业的财务补贴以及它们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参见戴阿克（1972a, 1972b）（后一著作中包含着大量罕见而又有价值的资料）巴乌尔（1975a, 1978）萨博（1977）和温采（1971）。

⑪ 论信贷体系，见陶洛什（1976，第47页到第48页，第181页到182页）。

⑫ 在开始改革十年之前，作者的文章“利润分成是正确的吗？”（科尔内1958）在刚刚采用利润分成不久，就已经提醒人们对这个问题要予以注意了。

度上减少了不安全性，对于企业倒闭的焦虑消失了，不管是经理还是工人都无需担心破产了。不仅就业有了保障，就连在哪里上班都有了保证。国家的作用就象一个万能的保险公司，它几乎全部补偿了每一项亏损，即便偶尔也需要进行一下讨价还价。在另一方面，这样多的保障使企业日益衰落，再也无需为生存而奋斗了。

另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希望收入平均化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工资决定原则。社会主义分配的传统的、基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和“同工同酬”。这些基本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有在工作表现上，即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上存在着差别时，收入上的差别才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与工作无关的运气好坏，外部条件发展的有利或不利所造成的一切差别都是不正当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跌价了，为什么工厂的工人就该倒霉呢？因此，如果给工厂造成麻烦的问题不是由企业的管理人员或工人的错误造成的，这个企业就必须得到补偿。“客观”困难的负担不能由企业自己来承受，而应与全社会共同分担。这种想法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发生这种情况，企业有权要求得到补贴，要求国家在价格的支持或调整中央决定的价格。如果必须给予一个地方这些好处，则资源就必须从另一个地方抽取。但这还不是减少较高收入的唯一理由，收入平均化的目标总是暗含着要没收额外的收入。

⑬ 这个思想可以由下面两段引文来说明：

“间接支持的形式也很多，在不少领域中（部门、子部门、企业）国家对于某些活动给予免税，或减少资产和工资方面的税金。此外，还给予退税补贴，并给予偿还贷款和利息方面的优惠条件。虽然在1968年和1970年之间，免税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但从那时起，免税和补贴又不断地增加了。这些优惠待遇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持那些本身盈利不多的各项活动。”摘自财政部长福卢韦吉的著作，见福卢韦吉，（1977，第119页）。

“对于一般信贷原则的例外（优惠待遇、利息调整等等）——对长、短期贷款都是如此——主要是在企业暂时或长期不能满足正常经费需求，或是在它们希望摆脱过去无效活动所造成的后果时做出的。”见陶格什（1975a, b）。

追求收入平均化的结果是矛盾的，这与追求稳定性的结果是一样的。一方面它满足了许多人的公平感，另一方面它却削弱了利润、价格和成本的刺激作用。

最后，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个动机：加强实行再分配部门的重要性和其社会作用。在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就要在经济上依赖于市场。另一方面，软预算约束和大规模对企业财务收入的再分配，加强了企业对再分配部门的行政上的依赖。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如第三章所指出的那样，对计划的讨价还价发生于中央部门和企业之间。现在取代它的是再分配的讨价还价，企业与部门进行讨价还价是为了使后者从企业抽取的资金更少些而给予的更多些。

我们接下来讨论与投资相关联的再分配，这里，我们碰到了在考察当前生产的财务方面的问题时所遇到的类似现象。

企业用自己的储蓄来支付投资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资金是由中央信贷和国家投资提供的。完全使用企业储蓄支付的投资项目的比重相当小，就是当企业用自有资金作为其财力来源之一时，它也仍然需要贷款或中央的补贴来作为补充的资金来源。

所有这些使得中央计划和财政部门在再分配投资资金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部门和亚部门的层次上，在部门或亚部门的盈利性和其投资份额或投资增长率之间似乎存在着正相关。^⑩但在企业的层次上进行非总量分类的分析中，则仅有某种很小的正相关。

13·9 相反趋势

在向软化预算约束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趋势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

^⑩ 见陶洛什(1976, 第259—270页)。

这些趋势部分地由中央部门的活动表现出来，在许多种类不同的决策中（给予信贷、制订外贸计划、作出投资决策）盈利性是要被考虑的，如果不是主要的，至少也是次要的标准。作为改革的结果，利润标准的重要性提高了。

抵消预算约束软化的趋势也由企业行为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对独立性的追求。请求并不怎么舒服；补贴、国家价格支持、投资的资助需要“疏通”才能得到；为得到资金而进行的讨价还价和斗争，常使经理人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感到从谁那里得到资助就要受谁的支配。就这一点而言，企业代表人物们的行为是不同的，一些人对这种“依附者——庇护人”的关系很坦然，另一些人却觉得相当难受。后者宁愿受预算的约束，也不愿意超出它。换言之，他们受预算约束的影响要更大些。^⑬

与利润相关联的物质刺激也是抑制预算约束软化的力量之一。例如，经理人员的奖金；作为补助职工工资之用的利润分成；企业福利基金数量，可能都要取决于利润，在这方面起作用的物质刺激受到重视的程度，改革前要比改革后小得多。

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对于那些长期亏损的企业进行彻底调查和所谓的“调整”改组。经理人员可能会被解职而任命一些新人。对持续和严重的亏损的认识，肯定会产生硬化预算约束的影响。^⑭

⑬ 不同部门企业的行为差别很大，在中央经济政策中享有优先权的部门，很容易得到补贴和好处。而处在不起眼的部门的企业，则感到预算约束是比较硬的，因此可能就更愿意节约成本开支。

⑭ 这样的改组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我们上节讲的，企业有保障生存的安全感是有疑问的。回顾13·6节所述，事件的重要性和发生的频率要达到临界值才能改变舆论。我的印象是匈牙利尚未达到这一临界值。长期亏损并没有使实际的威胁感加大，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不能使企业预算约束的正常硬度有较大提高的原因。

只作一项比较可能就足以证实我的印象了，我从美国周刊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中摘录了一段：“缓慢的经济增长、来自国外的竞争和日元的高速增值三者的结合，证明对许多企业是致命的……去年，有创记录的18000家企业破产了，……过渡可能是痛苦的。”纳戈尔斯基（1978），在匈牙利几乎没有任何企业到了可被称为是真正“破产”的境地。

抵消趋势的存在使我们可以把第二个假说阐述如下：改革使预算约束稍许硬了一些。

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讲几句。这将给那些熟知改革文献的人们以这种印象：我们接触到了那些在改革文献中充分讨论过的问题。但在这一点上，改革的争论焦点是“利润刺激”，而本书的主题则是“预算约束的软化”，如果这只是术语上的区别，那就不得不提了。否则，本书就可能会因为不必要地变换术语而招致批评。

但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用语的变换，而是论证的逻辑不同，以及在解释性因素重要性的排序上的不同。企业的所有者、经理人员和工人对增加利润感兴趣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决定他们的行为，当利润刺激与硬预算结合在一起时，努力就被导入了实际活动的轨道。当利润刺激与软预算约束结合在一起时，它至少给控制财务变量、提高价格、追逐国家拨款留下了同样的余地。

影响社会主义企业情况的关键问题不在企业经理人员是否能从利润中分享到相当于他基本工资0%、10%、或50%的个人份额。按照什么方案在职工中进行利润分红以及福利基金或利润税与利润是怎样挂钩的，也不是决定性的。这些都重要，但却并非是最重要的。^⑩在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对于利润不能毫不关心，这点甚至在他个人能从利润中分享的部分为零时也是如此，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的论点已经包括了被改革文献称为“利润刺激”的情况，但只是作为抵消软化的趋势之一被放在最后。我们并不是仅仅在寻求术语的变更，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事实上：在理论和实际的经济政策中，主要问题都不是刺激的实际形式，而是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规律，以及与这些现象相关的企业与国家的关系。

^⑩ 改革的前一年，迪特(1967)的文章中曾强调指出了这一点，文章的论证集中于企业的生存，“如果企业不盈利，那末，它存在的理由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13·10 微观理论中预算约束的地位

在分析预算约束时，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些与一般微观理论基础有关的问题。^⑨下述的假说，被作为公理，即经济活动当事人有预算约束（按照我们的术语，他的预算约束是硬的）。我们已运用这一公理指出：这一理论并不注重约束是否存在，也不管它是否作为一个经验而影响着决策者。让我们引用一下克洛尔的有关论述。^⑩他认为预算约束不是一个财务恒等式，而是合乎理性的进行计划的先决条件，“……没有一个经办人在有意识地计划购买任何商品时却不同时考虑购买资金的来源，不管这些资金是来自利润所得还是来自销售其他商品……。”“它（即预算约束的存在）确实可以被认为是经济科学的基本常规，在一切相应的方面与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样的物理学的基本思想相类似……除非我们以此为前提，否则我们就绝不会有解释个别决策过程的基础”。

克洛尔过分悲观地感到，如果我们认为预算约束的存在不是

^⑨ 对预算约束进行最初的理论探索是斯拉茨基（1915）对家庭行为的古典式的研究。它的现代形式是由希克斯（1939a, b），萨缪尔森（1945），首先建立的，后来它在阿罗-迪布罗（1954）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又与一般均衡论结合在一起，佩塔金（1965）的著作又把货币引进了一般均衡论的模型。阿罗-哈恩（1971）提供了关于一般均衡论的极精彩的概述，介绍性的说明见萨缪尔森（1948a, b），亨德森-匡特（1958），马林沃德（1972）。

^⑩ 在下面的引文中，克洛尔（1965）用“萨伊原理”作为预算约束存在的同义语，由于我们要避免围绕着“萨伊原理”、“萨伊定律”产生的历史和术语的混乱，我们把它们从这段引文中删去了。这里我们不管这个定律从逻辑和经验角度看是否正确。我们只想指出围绕着这一表述，已经形成了一个迷宫。鲍莫尔（1977）用详尽的摘录证明了从萨伊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找出具有八种不同解释和内容的“定律”。它们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被普遍认为是萨伊定律的那个东西相联系着。我们必须指出，不同的解释者能给“萨伊教条”、“萨伊等式”、“萨伊恒等”的一系列说法加上第九、第十个解释。

当克洛尔在说预算约束的存在和“萨伊原理”的含义——多少是模糊的——有紧密联系时，他当然是对的。他的术语也并不因此就不能成立。但是，为了取代经济思想史中的用语，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已经被明确定义过的术语“预算约束”。

以公理为基础的起点，那就没有建立对决策过程描述的基点了。这个公理决不意味着对每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行、控制的描述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如果克洛尔的悲观主义只限于试图进行科学描述的范围，那还是相当有道理的。如果不以预算约束的存在作为先决条件，就会动摇现代数理微观经济学和一般均衡论的基础，在这个理论中，事实上任何具有实质性的结果——从有关需求和供给函数特性的命题到瓦尔拉斯定律和均衡价格体系特征的决定——都要涉及到预算约束的假定。

在我们看来，预算约束的存在和作用并不是经济体制一般化的以公理为基础的起点，而却是一个经验的问题。经验可以证明，在既定的经济和历史时期中，一定的经济活动者，被硬预算约束有效地约束住了。经验也可以证明，在同一经济或其他经济中，在同一时期或其他时期中，一些活动者的决策活动却没有被预算约束有效地约束住。后面这一说法并不排除能够从这些相同活动者的行为中找出规律的可能性。大量著述试图揭示这些规律——本书即为其中之一。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得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正是由于预算约束的软(或相当软)的特性——概括一切市场供求相等的瓦尔拉斯定律并不适用。但是，也还存在着控制经济活动的其他规律。

在本章中，我既不接受也不反对预算约束的存在，而只是试图描述它。它的影响可能强烈也可能微弱，换言之，在一个连续的尺度上它是可度量的(见指标 β)。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决策中，预算约束的作用有多强或多弱，是这种体制的一个重要特性。

引证克洛尔的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很清晰地阐述了在一般微观经济理论中预算约束公理的中心作用。他的研究是个分界点，又是上述“非均衡学派”的经典。很奇怪，这个新学派虽然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与旧学派分道扬镳了，但在某些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却严守其正统性。

我认为宏观“非均衡”状态的全部理论——不管是长期失业、

非充分就业、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还是长期“过热”、短缺经济——如果不返回到理论的微观基础就不能予以很好的说明。在体制的宏观状态和活动者的微观行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作用。“宏观理论不能建立在适用于一切条件的微观行为规则上。足以用来描述19世纪中叶在曼彻斯特经营的资本主义纺织厂的规则（几乎是完全硬的预算约束），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再适用了（这是因为它所患的软预算约束的病症），并且它也完全不适用于描述社会主义企业，即使后者也用货币形式记载和计算其收支帐目。微观行为是历史的产物，它的所有重要的组成部分（需求形成、对价格的反应，等等）都取决于经济活动者周围的社会现实：微观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受收入再分配影响的程度、对于价格的影响、买者和卖者间力量对比关系，等等。反过来说，如果微观行为是既定的，它必然对体制的宏观状态有一定的影响。如我们在短缺经济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当事人对于投资的不可满足的饥渴和囤积物资的倾向（微观行为），说明了长期短缺的直接原因之一，以及经济的资源约束型的特性（即宏观状态）。

本书基本上集中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它分析了与这种经济有关的宏观状态和微观状态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想这里已经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例如，预算约束的问题）在研究资本主义体制时也应加以重新考察。

第十四章 企业：对价格的反应

14·1 引 言

社会主义企业和价格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从因果关系的一个方面看，企业并不是消极的价格接受者，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价格制订者。这种关系将在第十五章中进行讨论，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是因果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假设不管企业是否对价格产生过影响，价格已经通过某种途径确定了，那么，提出的问题就是：企业怎样对价格作出反应。

我们希望避免重复，在第一篇中已经谈到过的所有关于社会主义企业行为的内容，下面只是用有关价格的讨论来加以补充。我们的结论是：价格确实具有影响，但它相当微弱或只是次要的。在控制经济过程的机制中，具有首要影响的是那些价格在其中起不了很大作用的机制。

在对价格作出反应的方面，传统的与改革后的企业行为是有区别的。读者将会看到，我们有关对价格反应的大多数命题，将作为预算约束硬度的函数。因此，我们将应用13·7至13·9的成果。对以软预算约束为基础的每一个论述，都是指传统企业。而那些对于具有稍许硬些——但仍然相当软——的预算约束成立的论述，可以被认为适用于在改革后经济管理体制内运营的企业。为了简化我们的讨论，这一点将不再重复指出。作为预算约束硬度的函数与改革前和改革后状态之间的联系，我们留给读者自己去考察。除此之外，在本书的一些地方，我们将分别描述传统和改

革后的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

在不同章节中企业对于价格的反应类型小结

表 14-1

1	2	3	4
瞬时和短期调节		长期调节	
投入方	产出方	投入方	产出方
1. 有关总 量的决 策	初始需 求所有 层次的 决定	产出的 所有层 次的决 定	计划生 产能力 的决定 14·8
	14·2	14·6	
2. 有关产 品构成 的决策	2A. 初始需求 构成的决 定 14·3 和 14·5	产出构成的 瞬时和短期 决定 14·6	工艺的选择 14·9 14·8
	2B. 强制替代 前初始需 求的修正 14·4 和 14·5		
	2C. 投入构成 的瞬时和 短期决定 14·4 和 14·5		

由于这一组问题相当复杂，提前了解一下将要进行的讨论是有益处的，表14-1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

表中第一和第二行区分了两类有关数量和构成的决策。用需求的术语来说，这种区分与人们熟知的一般微观经济学对价格变

化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① 的区分是相似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考察这些效应或这些效应的缺乏。

并不是表中包括的所有问题我们都将予以同样详尽地考察。由项目(第一栏第二行)所限定的情况，将给予最详细的考察。这就是相对价格对于企业瞬时、短期需求以及实际投入构成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主题的重要性使这种详尽的讨论成为必要，而且因为这里要提出的分析工具也将用于考察其他方面。

我们一般不考察那些与进出口价格影响有关的特殊问题。只是在事关投资时，我们才会简单地谈一谈它。

14·2 收入效应

我们从一般消费论中的被称为收入效应的现象开始，在瞬时和短期调节中，价格的变化是怎样影响企业需求数量的呢？我们在这里完全不考虑替代问题，把它留在稍后进行探讨。这样，我们将在极端的形式中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一种投入品的价格，而是全部互为替代品的一组投入品的价格发生了变化，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例如能够用于制造一种产品的所有的原料，它们的价格按照相同的比例同时上涨，而互补性投入品的价格却不变。

按照一般微观经济学，对于一组价格变得更贵的投入品的需求应当降低，因为同量的预算现在只能买进较少数量的投入品了。但这只有在硬预算约束下才是正确的。在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收入效应不会成为事实。如果企业对任何一种正在出售的投入品有需求，它将会不顾较高的价格而把这种投入品买回来。如果增加的成本不能在预算约束的范围内得到补偿，企业就迟早要向买者或国家索回它们。

^① 见希克斯(1930a, b)，或者作为概括性了解，见格林(1976)。

我们不仅是仔细地考察两个极端情况，而且也要仔细地探讨一下在硬与软之间的中间情况。图14-1表明的关系当然是经过高度简化了的。我们要考察购买单一投入品企业中的、作为投入品价格 P 的函数的初始需求 d 的瞬时增长。我们将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在一系列表示预算约束硬度的指标中(即在向量 β 中)，我们将要挑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分量在图中给予说明。它有两个极值，一个是 $\beta_{h.r.d}^* = 0$ ，在此点上预算约束是完全硬的，另一个则是 $\beta_{s.o.f}^* > 0$ ，在此点上预算约束的软化已达到临界值。如果预算约束的软化超过了这个临界值，这个约束对于企业的行为就起不了丝毫的限制作用了。

我们从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入手，这些企业的需求已经在第五章中详尽地讨论过了。我们在那里曾解释说，尽管存在着使需求趋于无限的强烈倾向，瞬时需求却是有限的。我们假设瞬时需求是既定的，并用 \bar{d} 来表示它。

图14-1上部的水平直线是在 $\beta_{s.o.f}^*$ 的条件下的需求曲线，作为其他解释性变量的函数，它虽然也发生变化，但是，它却是完全缺乏价格弹性的。

与硬度 $\beta_{h.r.d}$ 相联系的需求曲线，和在微观理论中所熟知的那样，是向下方倾斜的。这里我们将排除各种替代的可能性，这样就可以不涉及那些低劣商品的特殊情况。在这种假设下，以硬预算约束作为假设条件就足够了。由于收入效应，产生了曲线的向下倾斜。如果价格上涨，同样数量的货币买到的商品将会更少些——这一不很重要的关系保证了这个结果。假定有这样一个价格，在此价格下，体现着价格影响的需求水平，等于与任何价格影响无关而形成的需求 \bar{d} ，则此点就是两条曲线的交点。若价格高于此点，需求就要停留在 \bar{d} 以下。

在两条限定性的曲线中间，有许多其他的曲线，当预算约束被软化时(即当 β 值增加时)，需求函数的形态就要从惯常的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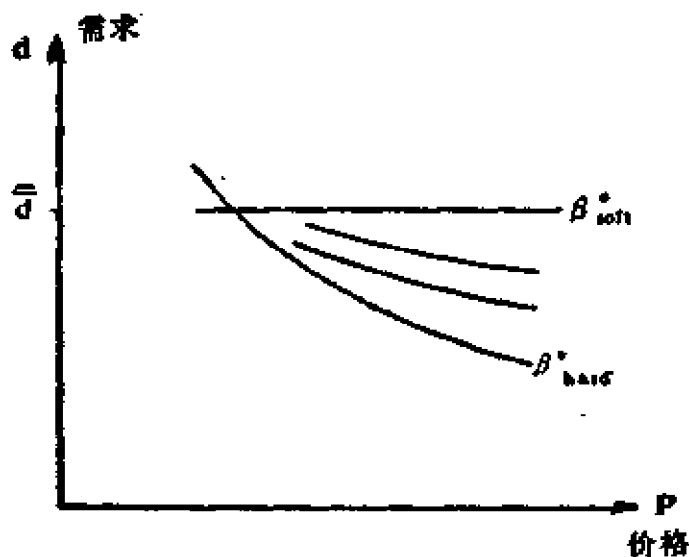


图 14-1 预算约束变软时企业需求函数的位移

倾斜转为水平的缺乏价格弹性的形状了。

如果我们在价格的变化中考虑反应时间的因素，就可以更准确地表达我们的观察成果了。对于价格上涨的瞬时反应，就是在相当软的预算约束情况下，也可能是比较大的。这不仅是由于较高的价格所引起的“第一次冲击”，而且也因为向任何人转嫁增加的成本需要时间。因此，图 14-1 上部的水平直线和靠近它的曲线所描述的不是瞬时调节而是短期调节。^②

这与我们在第五章中关于企业需求函数的说法是一致的，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纯粹的“数量”调节就会发生，并且需求函数 (5·1 至 5·4) 也无需把作为解释性变量的投入品价格包括在内。但是，如果预算约束稍许硬了一些，投入品价格就要被包括在企业投入品需求函数的解释性变量之中了。投入品价格提高的收入效应也有助于说明第五章所描述的趋势，这种趋势对于那种驱使需求趋于无限的力量产生着相反的影响。

^② 在瞬时和短期反应的区分中，抵消趋势也在发挥着作用。习惯和刚性减弱着初步反应，实际调节通常是需要时间的。只有在替代被允许时，这种相互关系才能更加显著，但在这些分析中，我们不考虑替代。

14·3 替代效应：瞬时初始需求

替代效应或相对价格对于投入品选择的影响比收入效应复杂得多。我们从对投入品的瞬时初始需求开始进行分析，然后再探讨对需求进行的修正、实际购买和短期调节。

我们将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我们的论点。我们必须在两种虽然工艺不同但却是直接替代品的A和B间作出选择（在我们先前螺钉厂的例子中，这是10号和11号钢）。在期间0时，它们的价格分别为 p_0^A 和 p_0^B 。在期间1的起点上，A变得相对便宜了： $p_1^A/p_1^B < p_0^A/p_0^B$ 。

我们假定在这个市场中，产品A和B的全部交易量以及生产产品A和B的企业 的产量，在这段时间内都保持不变。这样我们所探讨的是静态的交换和生产过程。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交换的内部构成或在A和B之间变化了的比例。

所有买者（螺钉厂、机械厂，等等）在第t期间的起点，对于投入品A和B的瞬时初始需求表述为 $d_t = [d_t^A, d_t^B]$ 。

我们要区分一下两种初始需求形成的纯粹类型。

有价格反应的需求。^③ 买者的初始需求按照一般需求论来决定，这在图14-2中表明。图14-2解释了对所有买者的投入品A和B之间替代可能性的等产量线。这是替代的工程学方面；它表明了投入品A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替代投入品B。在我们的图中，转换曲线是凸出的，实际上它并不总是这样。但既然教科书通常假定它是凸出的，又因为曲线的形状并不影响我们的推理，我们如果也画一个凸出的曲线，那也很方便。这样将可以更容易地指出我们所描述的关系，在哪些地方与新古典模型相同，又在哪些地

^③ 德文版中用了在字面上译为“价格敏感性”一词，这是因为德文中没有确切等同于“反应”的词汇，从上下文看用“反应”一词较好，因为这里我们所讲的不只是企业对价格的感受，而且也指企业对价格作出的反应。——英译者注

方与它有区别。

预算约束用预算线来表示。象往常一样，我们假设给定一个货币量 M ，它们由所有的企业花费在 A 或 B 上。作为相对价格变化的结果，直线移动了，就同样数量 m 而言，顾客在期间 1 比在期间 0 能买到较多的 A 和较少的 B 。

所有买者的初始需求都处在对企业最有利的点上，即等产量线和预算线的切点上。由于价格比例的变化，这个点从点 d_0 （价格）移到了点 d_1 （价格）。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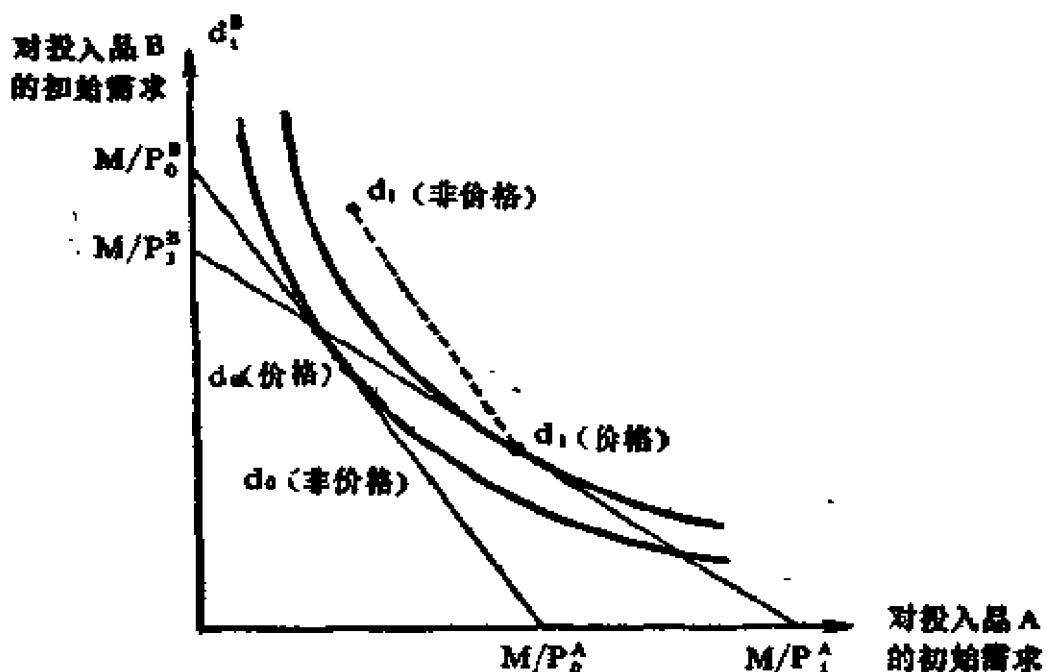


图 14-2 瞬时初始需求的形成

这个模型是以若干假定为基础的，这里我们将不对这些假定进行详尽的描述。但是我们要指出其中的两个来，因为它们要在

④ 在数学附录 A 中， λ ，买者的自愿替代倾向，表示买者基于相对价格，自愿购买产品 G 来替代 H 的比例，那里的变量和这里模型中使用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lambda(p) = dG(p^G, p^H) / (dG(p^G, p^H) + dH(p^G, p^H)) \quad (14-1)$$

我们后面的论证中起特殊作用。

(1) 预算约束是硬的。因此, 点 d_1 (价格) 不能在预算线的上方选择。买者不能把对一种产品的需求提高到他们无力支付的程度。

(2)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 初始需求点 d_1 (价格) 不能处于由预算线所划出的区域内的某一点上。值得做的是沿预算线移动直至等产量线和预算线的切点上。

我们下面讨论瞬时需求的另一种纯粹类型。

无价格反应的需求。完全不考虑价格影响的纯粹形态能够在适用于任何体制一般的意义上给予解释。但我们现在将要在资源约束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狭小的关系内对它进行说明。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们解释过, 虽然企业的初始需求被有力地推向无限, 但它却因相反的趋势而仍然是有限的。在图14-2中, 我们把这看成是既定的, 并顺次用点 d_0 (非价格) 和 d_1 (非价格) 来表示。

作下面的假设只是为了使对比鲜明, 当需求无价格反应时, 它移向与有价格反应情形相反的方向, 于是对投入品 B 的需求提高了, 而对投入品 A 的需求却降低了。

虽然我们在第一篇, 尤其是在第四、五章中已经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些问题, 但我们现在仍要提请读者们注意一些可能引起初始需求产生这种变动的因素。

(1) 上级机关希望企业做出这种变动。这种希望可能是用指示的形式或只是作为特殊的命令而下达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 都可能迫使企业改变其早先的需求。

(2) 投入品 A 和 B 的卖者(我们例子中的冶金厂), 宁可出售 B, 这是因为 B 有大量未出手的存货。短缺经济中的买者为博得卖者的好感, 一般会考虑他的这种偏好的。

(3) 购买用 A 和 B 制造出的产品的买者们, 愿意多买用 B 制造的产品而少买用 A 制造的产品。他们请求并鼓励供应者满足他

们的这一愿望，后者会把这一愿望转达给投入品的供给者。

(4) 使用者在将来会同时需要 A 和 B。但投入品 B 的供应似乎更不稳定，因此必须予以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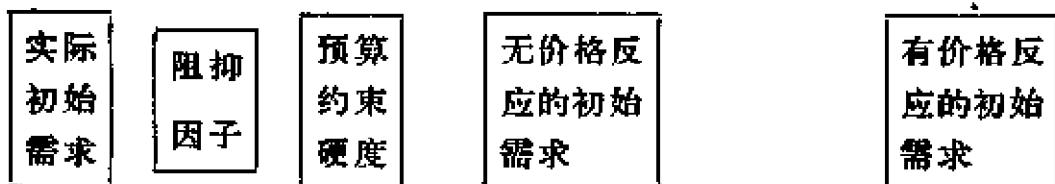
上述四点是很不完全的。任何影响在 A 和 B 间作出选择的因素，除了价格 p_A 和 p_B 以及由等产量线所表示的工程学上的替代可能性之外，都应该包括在内。

图 14-2 并未提及初始需求 d_i (非价格) 是怎样取决于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解释性变量的。它只是假设一种非价格特性的解释性变量决定着需求 d_i (非价格)。

在绘制这个图时，我们假设 d_i (非价格) 是由具有软预算约束的企业以及其目的不能用“利润最大化”进行描述的企业来选择和决定的。因此，点 d_i (非价格) 既可能处于预算线的上方，又可能处于其下方。

实际初始需求的形成是价格和非价格两种作用的共同结果，这可由公式(14-2)表示：

$$d_i = \theta^{1-i\text{-dem}} \quad (\beta) \quad d_i \text{[非价格]} + (1 - \theta^{1-i\text{-dem}}(\beta))d_i \text{[价格]} \quad (14-2)$$



依照(14-2)，实际需求是有价格反应和无价格反应情况下两种需求的加权平均数。 $\theta^{1-i\text{-dem}}$ 是权数，^⑤它的经济含义如下：它是非价格作用的相对权数，它起着抑制价格的作用。这就是把它称为“阻抑作用”的原因。它是预算约束硬度的函数。

我们在前面一章中讲过，对于一个完全硬的预算约束 $\beta=0$ ，它的全部分量是作为预算约束软化的函数而增加的。设 β 为临界

^⑤ 符号上面的指数“i-dem”是英文初始需求 initial demand 的缩写，影响供求修正的阻抑因子将在下面讨论。

值，在此点上预算约束是完全软的，它对决策者的选择无任何约束。

我们规定，若 $\beta = 0$ ，则 $\theta^{i-dem}(\beta) = 0$ 。也就是说，在完全硬的预算约束下，实际需求是纯粹有价格反应的需求。我们进一步规定，若 $\beta = \hat{\beta}$ ，则 $\theta^{i-dem}(\beta) = 1$ 。换言之，若预算约束是完全软的，则实际需求就处在一个对价格完全没有反应的需求情形之中。在中间状态 $0 < \theta^{i-dem}(\beta) < 1$ ，实际需求是作为两种纯粹状态的凸向结合，因此，图14-2中的 d_i 处于连结 d_i (价格) 和 d_i (非价格) 的直线上。

公式(14-2)的建立是以若干任意性的假设为依据的，例如，对区间 $[0, 1]$ 阻抑因子的“标准化”，或实际需求是两个纯粹状态凸向结合的假设，但这只是为了能以最简单、最能说明问题的形式提出我们的看法。但作者至少相信，公式(14-2)所表述的两个主要思想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实际关系的反应。

在实际初始需求的形成中，价格和非价格因素都起着作用。

这两种不同影响的相对强弱，不是完全取决于，而只是主要取决于预算约束的硬度。

对于这个问题瓦尔拉斯式的解答是作为一般的选择问题的特例。在我们简单的形式化模型中，^⑥ 如果预算约束是完全硬的 ($\beta = 0$)，体制是瓦尔拉斯式的，并且价格信号对于初始需求的影响丝毫也未受到抑制，所以 $\theta^{i-dem}(\beta) = 0$ 。

在上面的论证中，阻抑因子在单一的局部市场里，与一个重复出现的选择 (A 或 B) 问题相关联。如果我们要描述全部企业部门对所有投入品需求的初始决定的特点，我们就应该使用一个向量 θ^{i-dem} ，这个向量组成部分即为上述局部指标 θ^{i-dem} 。

指标 θ^{i-dem} 表达了买者行为中的一个特有的侧面。在第四

^⑥ 短缺度的指标和某些系统控制机制的参数，在本书中的定义是相同的。所以，零值表示的是瓦尔拉斯状态或瓦尔拉斯体系，这一惯例现在再次被用来说明函数 θ 。

章中，我们把由买者行为中保持不变的因素所构成的东西称作买者态度，这些指标就是买者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14·4 替代效应：强制替代与短期调节

决定了初始需求仅仅迈出了第一步，继之而来的是购买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实际买进和实际生产来结束的。价格信号是怎样对这些事件产生影响的呢？

我们将从思想实验开始，每个阶段都发生在完全瓦尔拉斯式调节的范围内，我们继续沿用上节的例子，相对于投入品B，投入品A变得更便宜些了。由于价格信号的影响不受任何情况的抑制($\theta^{i-dem} = 0$)，图14-2中的初始需求从点 d_0 （价格）移到 d_1 （价格），下一步就是进入市场了。如果市场是瓦尔拉斯式的，那就不存在短缺。初始需求可以毫不困难地立即得到满足。

企业不仅作为买者，而且也作为生产者在进行着调节。我们回顾一下第八章介绍过的概念和符号：没有延滞($T=0$)，无刚性($\zeta=0$)，一般来说不存在摩擦($w^*=0$)。硬预算约束迫使企业从采用较贵的投入品转向相对便宜些的。投入品适应价格信号的调整是即时发生并且是彻底的。

但是，实际的经济体制在性质上是非瓦尔拉斯式的，调节是不完全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体制作例子来进行分析，但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于资源约束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上。我们要分析图14-3中各个调节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粗线条画的方框表示企业特定的行为特征，那些角是弧形的框表示企业的决策和行动。细线条画的方框表示企业作为买者从外部所得到的信号，以及从外部可得到的供给。

再一次讨论方框A、B、C、D、E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在前一节中已经讨论过了。我们知道，买者的瞬时初始需求与在没有价格信号的相反作用下将会出现的初始需求 d （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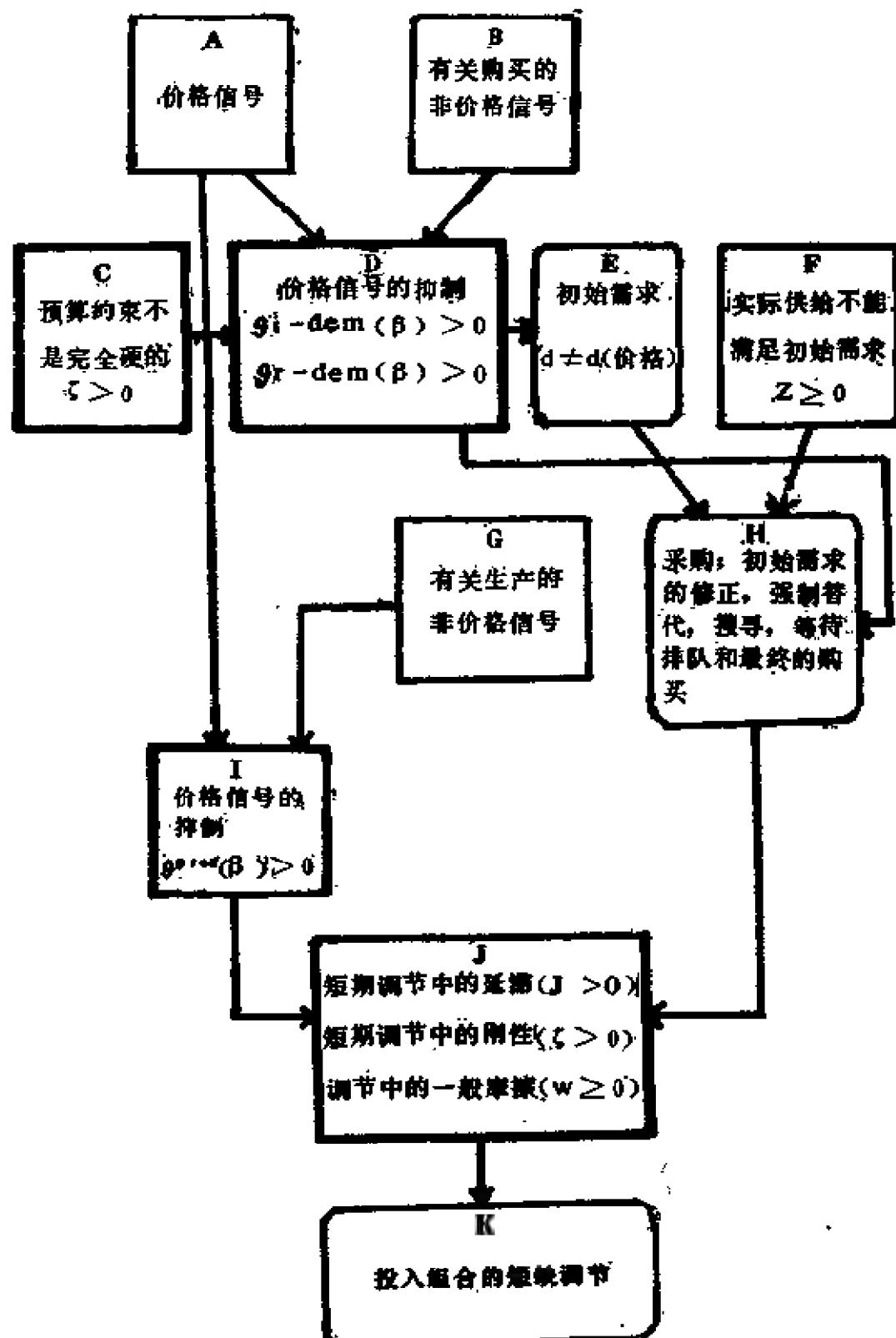


图14-3 价格和非价格信号对投入组合的短期调节的影响

格)并不一致。因此,买者准备购买 $d \neq d$ (价格)的量。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定的实际供给(方框F)。我们处在长期短缺经济中($z > 0$),因此可以预料,初始需求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这样,不仅非价格信号可能抑制价格信号的影响,短缺也阻碍着它发挥作用。短缺愈严重,价格信号就愈难传导。

采购过程开始了(方框H中的事件在第四章已经谈过了),我们假设买者中的一人(例如螺钉厂的采购员),不能得到他想要买的投入品A,但作为强制替代的投入品B可以买到,并且有两个品种B-1和B-2。买者在它们之间作选择时,要考虑 B_1 和 B_2 的相对价格。^⑦与过去形成初始需求时一样,现在在形成由强制替代修正的需求中,并非纯粹是由价格信号在发挥作用。非价格信号和刺激再次抑制了它。图中的方框D里,符号 θ^{r-dem} 就是用来表示这点的。^⑧(上标“r-dem”是指“修正后的需要”。)相对价格对于投入品B-1和B-2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抑制因素有多大,为简洁起见,我们就不再提出一个与(14-2)相类似的关系式了。

在需求经反复修正后,或许在长期搜寻、延滞和排队之后,购买实现了。

与此同时,生产中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和购买前一样,价格信号再次为非价格信号和刺激补充(前者来自方框A,后者来自方框G)。

这些非价格信号和刺激包括上级部门关于投入品、物资分配以及其他投入品配额等等的指令。这两类不同影响的结果取决于遵循价格信号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如何。预算约束愈软,则“成本无所谓”的信条在管理人员中传播的愈广。这一点由阻抑因子 θ^{prod} (β)表示出来。这个因素削弱着价格信号的影响。并加强了非价

⑦ 在数学附录A的模型中,这一点是按照下述假设来进行表述的:强制替代倾向是相对价格的函数。那里我们没有考虑其他非价格因素的影响。

⑧ 指标 g_{1-dem} 和 g_{r-dem} 一样,是买者态度中的因素,它们表示买者行为中的长期特征。

格信号的影响(这两种不同影响的共同结果将由类似于公式(14-2)的关系式得出,我们将不进行详尽地探讨了)。

另外,生产管理人员受到他们在进行购买时得到的经验的影响(这一点由方框H发出的箭头来说明)。放弃使用那些长期供应不足的投入品是值得考虑的,即使这种投入品比那些得之较易、供应又较有保障的替代品更便宜。企业的投入存货和未交付订货是购买和生产过程的综合结果,它们的水平,在第七章讨论过的植物性控制系统中是一种更进一步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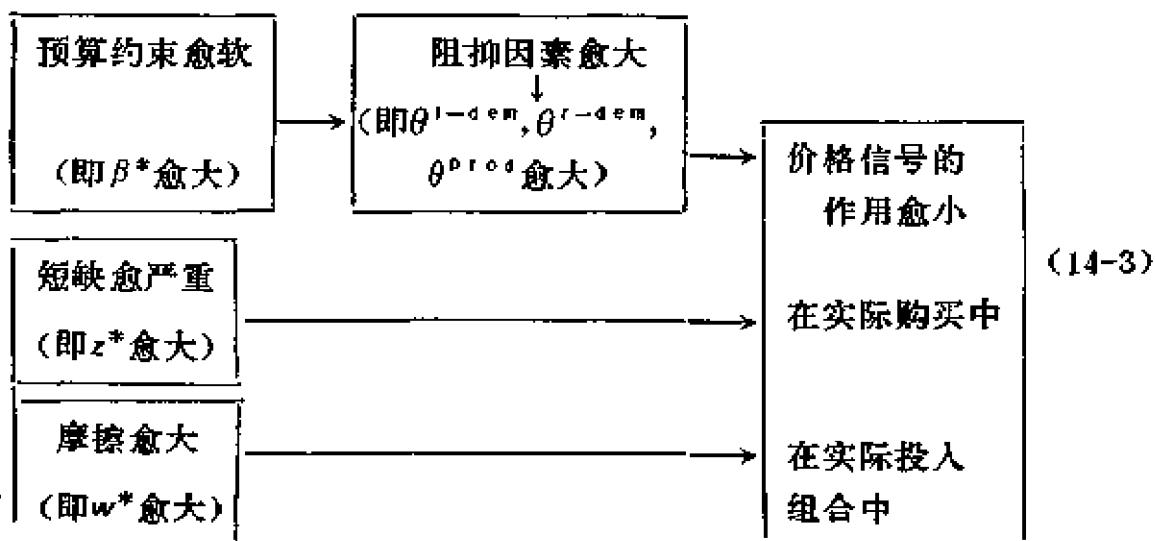
所有这些影响加在一起,形成了管理人员有关投入组合的想法和要求。但这仍然不是现实生产。我们请读者参阅第八章,那里我们解释过调节为摩擦所阻抑,这一点由摩擦指标向量 $w > 0$ 表示,特别是由两种摩擦现象,即调节的延滞($\tau > 0$)和刚性($\xi > 0$)来表示,^⑨摩擦的影响在方框J中表现出来,即使是这样的障碍也必须加以克服才能达到最后步骤,方框K,它表示的是投入组合的实际短期调节。

不幸的是,图14-3是一个包含着11个方框的复杂程序,虽然它在给读者提供更简明一些的图解方面颇具吸引力,但我还是发现必须表示出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来。但为了使问题便于理解,我们将分别强调一下因果关系的主要方向。起点是控制领域的价格信号(方框A),终点是实际领域中所发生的事件,实际购买(方框H的最终结果)以及实际投入组合(方框K),哪些原因可以用来说明起点和终点间相互作用的力量呢?答案概括在公式(14-3)中:^⑩

⑨ 读者应再看一下第一篇的各章,那里详细地叙述了在没有涉及价格影响的情况下数量调节,现在我们寻求的是理解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的运行及其相互关系。

⑩ 我们在这里满足于对因变量、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文字说明。为使之数学化,就要对这种关系了解的更多些才行。

应当把第五章以及公式(14-2)、(14-3)讲的关系看成是适用于资源约束体制下,企业需求函数确切理论的草图。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详尽说明本章标题：企业对价格反应的含义了。这里我们只谈了投入组合的瞬时和短期的调节，但这里的解释可以明显地推广应用于任何层次上的产出调节或投入和产出的调节。反应性是指价格信号和企业反应行为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反应性部分地取决于企业的行为特点，部分地取决于技术和市场状态。

在既定的制度、控制机制和信号系统下，企业正常的价格反应建立了起来。这是个随机现象。同一时间对不同的企业，或同一企业在不同的时间中，反应可能是不同的。在说到正常的价格反应性时，我们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企业行为所表现出的企业间和期间的平均数。

价格反应性是向量，只能用若干指标来共同对它进行说明，这就把我们引向了观察和度量的问题，这些将在下节中进行探讨。

14·5 假说和经验检验的可能性

从14·2至14·4节的分析和关于因果关系本质的考察中，可以得出下述假说。

(1) 在瞬时和短期调节上，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对于投入方面

的正常价格反应是微弱的。经济力量的弱小，转嫁成本提高的负担的可能性（即预算约束的软化），高短缺强度和调节中的摩擦，几乎完全抑制住了相对价格的影响。

（2）经济管理体制改后，社会主义企业对价格的反应，在投入品的瞬时和短期调节方面稍有增强，但这个增强是微小的。由于预算约束相当软这一事实，以及因为短缺严重，摩擦很大，价格的影响仍然被大大地抑制住了。

上述假说不仅为逻辑分析、而且也为不很严格的经验所证实了。它们的正确性需要彻底的经验检验，可以考虑使用三种主要方法。

（I）对价格和实际购买或实际投入组合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方面的考察，这可以采用时间序列和跨部门的数据来进行。这样做可以预计会碰到严重的困难，但还是值得一试的。从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分离出价格变化的影响是个难题。我们假设投入品B相对于投入品A变得更贵些，继之而来的则会是对A的购买和使用的增加。引起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至少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或许可能是B根本买不到？是否是这种情况呢，即当相对价格变化时，对使用B施加了行政的限制？统计方面的考察不能用机械的方式来进行，而必须辅之以全面的因果分析。

（II）案例研究。对于某一实际价格变化造成的影响，用资料和询问受影响者的方法，予以详尽地考察。价格的变化使得采购部门和生产车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价格的变化如果未加以调节并造成了成本的增加，这对国家或买者又强加了多大的额外负担？⑩

（III）进行采访可以揭示出企业管理人员的态度。可以就一些

⑩ 在匈牙利，由于世界市场价格暴涨，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临时或长期给予企业补偿性的拨款——关税和税收减免、补贴等等，这抑制了进口价格剧烈变动的影响。

假设情况提出问题：他们对于不同类型和程度的价格变化将作出什么反应？核对问题可以增加答案的可靠性。

虽然上述三种方法并不能充分保证可以把问题完全搞清楚，但它们仍能使我们对于企业在实践中作出的价格反应有更切近的认识。不幸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充分根据来决定这一问题。有成百本的书，上千篇文章在讨论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应该怎样，与此同时，对投入品相对价格的变化，究竟对企业的实际活动是否产生影响这一问题，还没有一篇研究报告给出了可靠的回答。在上述假说(1)和(2)中所说的假定为经验所驳倒之前，我们将一直保留它们。

14·6 产出的瞬时和短期调节

在对投入方面的瞬时和短期调节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产出方面。首先来看一下产出的总量。我们暂且把企业的产出构成和产品的相对价格看成是既定的。我们用 \hat{x} 表示产出总量， \hat{x}^{perf} 表示企业的最大生产能力。

在图14-4中，我们要回顾为人们所熟知的一般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有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的一些命题^⑫。这里通常分成两个基本类型。一种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作为价格接受者的企业。这种企业的售价 p 是外生的（既然按照我们的假定，产品构成是固定的， p 就是复合产品的价格）。最大利润的产出水平， x^{perf} ，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 $p = c'(x)$ ，它的值取决于 p 以及曲线 $c'(x)$ 的形状。但是，它一般总是被假定小于生产能力充分利用： $x^{\text{perf}} < \hat{x}$ 。

⑫ 见第十三章中的注⑩所提到的微观经济学文献。模型可以被解释为对瞬时或短期调节的描述。

边际成本曲线在企业的标准模型中是U型的（见12·1和12·5节），图12-4也画出了一条U型曲线。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的产出水平由售价来控制，提高的价格可以补偿较高的边际成本。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这会使产出增加。

在一般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另外一种基本类型是有关在不完全竞争下经营的企业。例如，一个制订价格的寡头。它所要求的价格取决于它的顾客的需求函数。这点我们在图中用递减的边际收益函数 $r'(x)$ 表出。最大利润的产出水平 \hat{x}^{imperf} ，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 $r'(x) = C'(x)$ ，它取决于曲线 r' 和 c' 的形状。但可以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它小于在完全竞争和外生价格条件下的最大利润水平： $\hat{x}^{imperf} < \hat{x}^{perf} < x^*$ 。

某种意义上，上述寡头的产出量也受到价格的控制。如果买者准备对一定的量支付更高的价格（换言之即边际收益曲线上移），产出水平 \hat{x}^{imperf} 也将会增加。

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与上述模型中企业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它的产出水平不受价格的控制。与价格无关的强有力的力量驱使着企业趋向于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已经详尽地解释过了，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并不是企业在理想条件下可达到的最大生产量，而是在体制的正常摩擦下可达到的最大量。生产能力并不是一个具有特定值的数字，而却是一个“区域”。企业随时都会碰到投入方面的一定的“瓶颈”，这些资源约束限制了生产能力。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被产出计划、数量追求以及买者排队等候货物的压力驱使，而绷紧生产能力利用的弦（见第二、第四和第六章）。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在靠近生产能力充分利用的地方，价格仍然不能抵偿边际成本。但这并不能阻止企业增加其产出。预算约束是软的。如果因为增加产出而招致亏损，企业可以预料，国家或信贷系统会以某种途径：给予价格支持、补贴或特殊贷款来弥补这种亏损。否则的话，迟早要发生价格上涨。不是调节产量以适应价格，更常见的却是调整价格来适应因高产出而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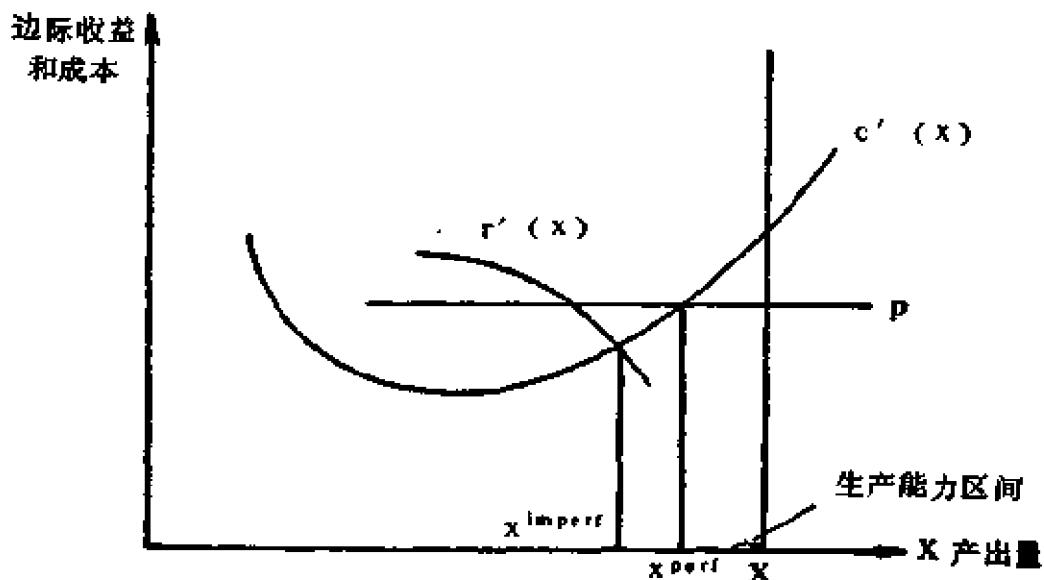


图 14-4 不同类型企业的产出水平

的高成本。

一般微观经济学的规则 ($p = c'$ 或 $r' = c'$)，在实践中绝对不会限制总产出量的增加。如果产量竟然被限制住了，那是由投入方面的“瓶颈”造成的。

看起来在这方面(总产出的控制)，价格的作用就是在改革之后也并未得到加强。企业仍然对任何一种限制都不感兴趣，不仅如此，利润追求的具体形式却在鼓励它增加产量。预算约束仍然相当软，较高的边际成本可以用较高的售价或较高的政府补贴来弥补抵偿。

改革给价格对产出构成在瞬时或短期的影响带来了更多的变化。^⑬ 但我们还是首先看一下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产出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完成计划的努力来决定的，或者中央计划从一开始就规定了企业的详细构成，或者即使企业可以有部分

^⑬ 14·3至14·6节用来描述替代、投入选择、相对投入价格和企业在投入方面的价格反应之间相互关系的公式和方法，可以类似的方式应用于产出方面，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说明它相类似的地方了。

选择权，但它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产出构成最容易完成（或超额完成）总量生产计划。这后一种考虑引起了产出构成的一种特殊的价格反应。如果产品C和D使用同样的实际投入品，而C的售价高于D，则企业就会乐于生产C。它这样做是由于在既定的物资资源下，以价值衡量，生产产品C，企业在总量上能生产更多的产出。就是在买者乐于买产品D时，企业也同样要选择生产C。这种特殊的价格反应——在这个例子中——可能会使D的短缺更严重，而同时C的非生产性存货却堆积起来了。

改革给这方面带来了很大变化。例如在匈牙利，企业不会接到在数量和产出构成上有详细规定的中央计划。这样就使企业在生产中可以选择那些最可获利的产品。企业在产出构成的瞬时和短期调节上，对价格多少有些反应了。^⑩

修饰语“多少”是说这种价格反应性并不很强，因为，如前所述，盈利性对企业来讲并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企业最终没有找到一个有利于盈利的产出构成来，它们仍然可以平安地生存下去并能有所发展。然而，如13·9节解释过的那样，较高的利润总是有一定好处的。因此，如果企业必须对产品进行选择，它就要选利润更大些的那一种。

14·7 不对称性：投入和产出方面的价格反应

在资源约束型体制内运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对产出价格的反应，与在需求约束状况下运营的资本主义企业对产出价格的反应是极不相同的。被需求约束束缚着的企业，被迫按照顾客的需求来决定自己的产出构成。只要把一种产品纳入生产计划可以产生正

^⑩ 公式(6-1)已经概括了社会主义企业的供给函数。除了在那里已经详细考察过的解释性变量之外，也要提到影响着企业供给的“其他影响”。产出的相对价格在这里作为一个解释性的变量因为供给的缘故也应该包括进去，这是因为它们按照上面谈到过的偏好对企业的供给产生着影响。

的边际利润，企业就可能乐于生产这种利润相对较小些的产品。这是因为生产这种产品可以使企业扩大销售并达到产出水平 $x^{P_{eff}}$ 或 $x^{Imp_{eff}}$ 。另一方面，在长期短缺占有主导地位的吸纳经济中，由于卖者不管怎样都可以售出它的产品，它是不用被迫那样做的。因此，他比需求约束的资本主义企业更能基于盈利来选择生产。如果在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产品 G 和 H 中，生产 G 更能获利，生产者企业将会选择 G，尽管顾客想要 H。（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相对价格并不总能反映顾客的偏好）生产者正确地估计到，由于存在着短缺，只要可以作为对 H 的强制替代，买者最终总会接受 G。

在上述情况下，社会主义企业在选择生产什么产品时，比资本主义企业更基于盈利性，这并不是因为它比后者更贪婪，“比资本家还资本家”，而是由于它在短缺经济中经营，而且没有遇到过销售困难。

由于依赖性，作为顾客，企业要屈从于那些依据相对价格进行生产的卖者。顾客甚至无法反对价格的提高。软预算约束可以使买者企业把增加的成本转嫁到国家或它自己的顾客身上去。

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当企业作为顾客时，它不能以投入品的相对价格为依据来选用它们，而在产出方面，它的选择却完全以相对价格为依据。这样一个不对称性是从资源约束型短缺经济中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在卖方市场上，卖者占居着支配地位而买者必须屈从。在确定产出构成时，短缺经济中的企业能比较容易地为利润追求所引导，而在确定投入构成时，它却几乎不能这样做。

我们在第五和第六章中曾经提到过，买者和卖者的态度是不对称的。在吸纳情况下，努力争取另一方的是顾客——在挤压情况下，这样做的则是卖者。这里，我们必须把买者和卖者对于价格的反应合并起来，作为这种态度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的要素之一。

表14-2比较了两种不同情况和不同态度，它只涉及了企业间的交换。左边表示的是以吸纳为特点的市场。企业是资源约束型的。虽然它对增加利润很感兴趣，但它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右边表示的是以挤压为特点的市场。企业是需求约束型的，它不仅对增加利润感兴趣，而且它的预算约束是硬的。这张表使我们回想起第六章讨论过的现象，即在资源约束型和需求约束型的体制中，投入品与产出品的存货水平。因为这张表也部分地说明了体制的价格反应。

市场活动者行为的不对称

表14-2

市场状态	卖方市场：吸纳	买方市场：挤压
约束有效性	资源约束型生产， 软预算约束	需求约束型生产， 硬预算约束
所持有的存货主要是 投入品还是产出品？	投入品	产出品
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 赢得对方？	买者	卖者
在瞬时和短期调节 中，企业在哪一方面更 容易对价格作出反应？	产出品	投入品

我们对于资源约束型和需求约束型体制的比较再补充一点意见。在凯恩斯的启发下，并根据希克斯^⑬的说法，我们已经对比过两种控制机制：“固定价格和灵活价格。”在固定价格的情况下，产生的是“数量调节”。供给量和需求量为适应一个既定价格而被调节，并且彼此相适应。相反，在灵活价格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弥合了供给量和需求量间的差别，是调节价格来适应数量。固定价格的假设构成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一，而灵活价格

^⑬ 见希克斯(1965)和莱荣霍夫德(1968)。

的假设则构成了瓦尔拉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一。

上述这种区别只适用于有着硬预算约束的企业所组成的需求约束型经济，即只适用于挤压经济。因此它可以被用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虽然区分价格是固定的还是灵活的确实紧要，可这毕竟是次要的。在企业中，“数量”调节占统治地位并不是因为价格是固定的或是刚性的，而是因为价格的影响是轻微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把本书第一篇称为“在固定价格下的‘数量调节’”，而是称为“非价格下的数量调节”的原因。第二篇的题目不叫“通过价格灵活性的调节”，而是“价格存在条件下的……”表明：虽然价格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它的影响并不是强有力的因素。

14·8 价格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产出

在第14·2节—14·7节考察了在瞬时和短期调节中价格的作用之后，我们接着讨论长期调节。这次要颠倒一下讨论的顺序，这一节从研究产出方面开始，下节再探讨投入方面。

这个问题的许多不同方面已经研究过了，主要是在第九、十和第十三章中，然而为了全面起见，我们准备简要地重复一下早先的一些看法。

14·8节和14·9节将首先探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情况，改革后的情况只是放在各节的结尾处简要地谈一下。

投资产出决策是指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固定资本投资，以及应该创造出多少新的生产能力的这样一种决策。这个决策，至少在总量上，也可能包括新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品的构成情况。

我们在第九章曾经指出过，提出的投资建议总是比能为经济主管部门和计划者们所采纳的要多。在他们作投资决策时，采用的是什么选择标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并不力求完整，因为这样做将不仅超出本章，而且也要超出全书的范围。

首先要强调的是，任何单一的规则都不能适用于选择，不可能建立决定取舍时赖以根据的唯一标准。在这个否定的说法中，重点是“唯一”这个词，决策的采纳者权衡多重标准，并用“定性的”方法对它们进行比较，最后在它们中间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

在社会主义计划手册中，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国民经济所谓平衡关系的研究，在选择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意味着将来的投入和产出要系统地相互协调。从中期和长期计划的产品平衡中，可以就必须采取的投资决策，以及必须创造出的生产能力生产的非贸易物品和服务，得出毫不含糊的结论来。（但是如果国内生产的扩展受到了日益增长的进口品的竞争，或如果产品可能是用来出口的，那这个决策就与外贸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了。但这是本书讨论范围外的事情了。）

虽然投资具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但投资选择仍然要受当前情况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投资项目的发起人，因为认识到某种产品存在着短缺而受到鼓励。这不仅是一个未说出口的动机，而且也是公开提出的论据，并总能说服投资的分配者。如果提出要求者可以证明他的产品或劳务是严重短缺的，那他得到批准的机会就会增加。虽然人人皆知分配首先应该以有关未来的信息为依据，但却难以摆脱萦绕耳边的抱怨之声以及即刻信号给情绪造成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选择标准，是以非价格信号为基础的。这些信号部分地由数字和资料构成，部分地由分配过程当事人们的“音调”甚至是“喧闹”构成。虽然数学规划的方法已经开始使用，但在投资项目的实际选择上，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从事选择工作的并不是模型和计算机，而是血肉之躯的人。计划者、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有关组织的成员们经常彼此对话：他们争论、讨价还价和“斗争”。这有着集中所有有关方面信息的好处（实际的或扭曲的信息），它使对立的意见和利

益有可能交锋，因而把许多可以预见的问题和困难摆到了表面上。信息的丰富和对立利益的多样化是这里所描述的决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决策是由那些并非摆脱了主观影响的人作出的。这里我们并不是指贪污腐化，在投资选择中不发生这种现象。这里的现象要复杂得多。可能会有这种因素：企业A的头头比企业B的头头更有威信，这时就很难对前者说个不字了。国会议员或市议会主席可能会出面干预支持企业C，而企业D却很少有人支持。一个部门的领导，过去曾在企业E中任过职，因此他倾向于企业E，而不是他所不熟悉的企业F。院外活动集团在管理人员相互支持的各种组织形式中存在着。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投资并未流向最急需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而却流向了那些对计划制订者能施加最大压力的企业或非营利机构。找出这些影响的作用有多大是困难的。它们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却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那种本来仅仅是基于讨论和计算而作出的决策。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新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出品价格和产出的盈利性在投资决策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了。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有希望更多获利的项目能享有多大的优先权呢？

在传统的经济管理结构中，长期以来根本没有作过预期盈利性和投资的核算工作。近年来这种核算勉强算是进行了，其结果必须与投资建议一同提出。它们部分是以国内现行的或预期的价格为基础作出的计算（严格地讲是盈利性计算），部分是以与上述两种价格不同的“影子价格”为基础作出的计算（匈牙利的用语是“效益核算”，它相应的英文术语是“成本一效益分析”）。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使用着多种“影子价格”，用各种方法决定的“世界市场价格”，回扣和汇率，等等。自改革后，在匈牙利盈利性和效益核算的范围已经扩大了。

我们的假说如下：

（1）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用现行或预期的国内价格来计

算的盈利标准，对投资决策没有影响。决策对价格没有反应。投资选择几乎仅仅只是“数量”控制过程。

决策的每一个参与者，从企业到更高层次的计划者都感到，如果投资从非价格标准来看显得重要和有益的话，那么，其盈利性也是没有问题的。投资支出上的预算约束是软的，投资可能增加的产出品的国内价格早晚会进行调节以适应实际成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一项投资完成了，随后又在企业破产的意义上失败了。

用影子价格进行的效益计算，可能会对分配产生某些影响，但是它们比起其它非价格标准的影响要微弱得多。

(2) 作为经济改革的结果，盈利标准的影响有了一些加强，尤其在投资是企业自有资金的时候。但是，这个影响比起与盈利无关的非价格标准的影响来，仍然要微弱得多。

上述假说需要经验的检验。假说(2)在匈牙利经济学家中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盈利标准的影响要比我们上面讲的情况大一些。这个问题只有得到全面的考察才能作出判断。我们提出一些检验这些假说正确性的方法。

(a) 国家在部门、亚部门或各类产出中进行投资再分配的比例，与这些部门、亚部门或各类产出的盈利性之间的关系的紧密程度有多大？（我们在讨论预算约束的松软时已经提到过这一点。）

(b) 在投资建议附件中计算出的盈利与这项投资建议的取舍之间关系密切程度如何？

(c) 事前对盈利性和效益计算的可靠程度有多大？（这可以通过比较事后值而得出）。

14·9 价格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投入

为投资而进行的投入决策，决定了投入构成或由产出决策所

确定的生产活动所选择的技术。我们要列出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进行技术选择的一些很重要的标准。

工程方面的偏好。工程师（以及受自己所从事专业影响的计划者和经济政策制订者），从自己专业本能出发，喜欢“现代化”的东西。与旧机器相比，他更喜欢生产率、可靠性均属上乘，操纵又很灵敏的机器，而不管这两种机器在价格上的差别。只要有可能，他愿意看到工厂里全是最新的机器和设备。

非价格短缺信号。决策者从其日常经验中感到存在着“劳动短缺”、“外汇短缺”和“建筑能力短缺”。他力求省下这些资源并不是因为工资、汇率或建筑成本相对来讲太高，而是由于他预计搞到这些资源有困难。

外汇配额和外贸承诺。上级部门用配额对某些稀缺的资源进行行政分配。例如对于可兑换货币的分配就是这样。这影响了技术选择。另一个例子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府的外贸协定控制了具体的进出口贸易。搭配式的销售并不少见：如果A国想从B国买进某种在世界市场上需求量较大的产品，她就必须接受另一种在世界市场上需求较少、滞销的产品。某些投资品就这样被列入了后一种范畴。这样，B国出口的投资品的供给，事前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A国新项目的投资和技术选择。

这里并没有列出全部影响技术选择的标准。然而就是这些例子也足以说明我们所说的非价格标准了。

上面提到的标准可能会同时起作用，例如工程师对于现代设备的偏好和防止劳动短缺，都会促使决策者采用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但在另外的情况下，这些标准相互间又会产生矛盾。工程师喜好的最新式机器可能只有用特别稀缺的可兑换货币才能买到。选择标准的这种矛盾冲突要经过争论、讨价还价，以及对稀缺的资金进行竞争来达成妥协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盈利性的计算也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

如果最根本的选择在非价格标准的基础上已经作出，或许可

能留下来某些次要的决策而使减少成本的标准显得突出一些。例如，项目使用的外汇额度已经分配好了。然后，是从M公司还是从N公司订购所需要的机器还是值得考虑一下的。或者，如果两个建筑公司准备承建这个项目，要价低些的就一定会被选中。

概括一下我们的假说。

(1) 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投资的投入决策对投入品的相对价格不产生反应。在可替换技术间进行选择时，最小成本标准只起很小的作用。

(2) 改革后在选择技术时，对价格的反应有所增强，但仍然不很强。它对投资资源供应不佳的部门、亚部门和小企业有着较大的影响。

由于篇幅所限，这些假说的经验检验问题就不进行讨论了。但我们却要再提出一个主要是与投资投入决策相关联，同时对产出决策也有影响的问题：利息率的影响。^⑩

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于财政投资资金是要付利息的。各国的核算方法和实际支付方式很不一样，在某些国家中，这几年来所采用的方法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我们不考虑这些差别，而试着把它们一般化。为简化起见，我们用“投资利息率”来表示一切形式的使用财政投资资金和长期贷款所付的“价格”。

有着软预算约束的企业，实际上对投资利息率完全没有反应。

一方面，利息率水平对全部投资需求不产生影响。可以说这个特殊价格的变化，对企业需求不产生收入效应。如果明天投资利息率从8%上升到12%，投资需求一点也不会减少。每个提出要求的人都可以期望这个增加的4%得到补偿：或者通过价格补贴，或者通过税收减免，更可能的则是通过价格提高。

^⑩ 另一个与此类似的问题是由应付给银行的流动信贷的利息的影响，这将在第二十章讨论。

另一方面，投资利息率的变化也不产生替代效应。作出投资决策的企业或其上级部门在进行技术选择时，并不理睬要素的相对价格。把一般微观经济学解释为一种规范理论，企业在决定技术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时，就应该把利息率和工资看成是相对的要素价格。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利息率提高了一倍或减少了一半，这对技术选择不会产生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后者是根据具有非价格特点的其他标准作出选择的。

吸收了潜在的劳动储备之后，在资源约束型经济增长的紧张时期，决策者并没有清楚地觉察到“相对稀缺性”。他从未经历过一种资本比劳动较少稀缺，或反过来，劳动比资本较少稀缺的情况。存在的是二者共同的长期稀缺。他对于投资的饥渴是无法满足的，他认为没有更多的资本，解决任何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都是不可设想的。同时，把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剩余劳动吸收完毕之后，劳动的短缺就成为长期的了。不管企业愿意与否，由于投资资源和劳动有实物限制，它最终必须调节以适应这种相对稀缺性。但是在这个调节中，要素的相对价格不起作用。正如在第一篇解释过的那样，当经济碰到“瓶颈”并反复地撞上资源约束时，它找到了符合当前给定的实物约束的投资水平和要素构成。

改革后，预算约束稍许硬了一些，虽然如此，它看起来仍未硬到足以使投资利息率成为对全部投资需求或对资本——劳动组合进行选择的有效调节器。

14·10 相对价格和短缺

我们考察了企业在投入和产出方面以及所有三个调节阶段上的价格反应之后，就可以对一个广泛为人们所持有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了。按照这个观点，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或至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以在错误的相对价格中找到。对这种观点的驳斥，可清楚地从我们的分析中得出。如果本书讲过的全部情况

——一切制度条件、控制机制行为规则——保持不变，相对价格的变化并不能消除企业部门中的短缺。

企业间进行交换的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对某一单个产品的短缺强度有影响。由于在瞬时和短期调节的情况下，企业在产出方面对相对价格还有一定的反应，不利的价格可能使企业不生产某些种类的产品，从而使它的短缺强度增强。但是，在资源约束型体制下，短缺不是取决于供给方面，而是取决于需求方面。如果需求总是表现为趋向无穷大，供给可以是任意规模的。如果企业预算并不可靠，而且如果又没有经济的力量约束需求的话，就会有这种情况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于流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品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不管投入品的价格如何，存在着并总会存在着许多投入品不能满足需要的现象。

我们的命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的含义，如果价格不能有效地控制企业的需求，那有关投入品相对价格优劣的争论就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了。

14·11 迂回：非营利机构

从第二章至此，我们几乎只是在探讨企业。现在要插进几句话来谈一下非营利机构。

我们先回忆一下第一篇中讲过的问题，非营利机构生产的确实是通常所说的非物质服务，而绝大多数企业在生产产品和所谓的物质服务。因此，即使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非营利机构也不会像企业那样要接受一个生产计划。但是除了这点之外，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行为在很多方面是类似的。

(a) 管理人员的动机类似，他们的基本特征是与自己负责的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b) 有大量这样的机构，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例如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等)。于是形成了申请者的排队，排

队的人们以及上级部门的强烈要求，往往使这些机构趋向于“数量追求”。

(c) 它们活动的增加，通常总是在投入方面碰到“瓶颈”。它们所处的状况表示出资源约束的特征。

(d) 它们的投资饥渴并不亚于企业。它们往往受到延期的痛苦，所以其投资饥渴更为强烈。

非营利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行为差别与它们的财务状况有内在联系，这样，值得我们探讨的就是三种而非两种类型了。

第一种是在硬预算约束下经营的企业，它只能指望自己的销售收入。一旦陷入财务困难，国家不会帮助它解脱，但国家也不干预企业自有资金的运用。

第二种类型是具有软预算约束的企业，它主要依靠自己的收入。然而它如果陷入了财务困境，国家将帮助它渡过难关。但国家确实也要过问企业的资金是怎样开销的。

第三种类型是非营利机构。它没有丝毫的收入，完全依靠国家预算取得资金来抵补开支，国家也控制它的开支。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软预算约束的企业在特定意义上是一种暂时的型态：约束愈软，则企业愈会转变成一个“准非营利机构”。

非营利机构的预算约束是软还是硬是无法确切说明的。在批准预算之前，预算是可以放宽的。非营利机构试图向其上级施加压力以取得尽可能多的资金来支付开支并进行投资。

在实施过程中，预算约束的硬度主要取决于预算的纪律。经验表明，在经常性开支方面，它一般是相当硬的，因此，非营利机构对于经常性投入品的相对价格会作出较强的反应。但是非营利机构的投资预算和企业一样，经常超支，它们对于投资投入品相对价格的反应是很微弱的。

我们作出以上简短的介绍是为了在后面探讨宏观关系时，使我们可以考虑到非营利机构的行为。但对非营利机构的经济作用做更加详尽的分析，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了。

第十五章 企业间的价格形成

15·1 引言

上一章我们讨论了价格怎样影响企业。现在我们考察因果关系的相反的方向，即企业如何影响价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献中，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似乎不常见。大多数文献只论述国家的价格政策，以及中央价格政策的原则和方法。但是我们的意图是要表明，价格形成是中央价格政策和企业努力的共同结果，价格因这两种力量的冲突和妥协而变化或维持不变。

有成千上万本著作和论文论述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问题。虽然我们并不打算概括和评价这些著作的结论，但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丰富的文献。^① 在这个内容广泛的课题范围内，我们只选择少数几个问题加以讨论。

我们打算在本章中紧密地围绕前两章的主题，即企业。（虽然，读者将看到，我们也不得不涉及价格理论的某些一般性问题）。我们在巨大的交换流程中选取一种类型的交换，其中卖者和买者都是生产者。^② 即使是这类交换，我们也不能一一讨论它们

① 以下几本著作是有名的：巴林特(1970)，布罗迪(1967, 1969, 1970)，奇科什-纳吉(1974, 1975b)，霍奇(1972, 1979)，亚沃卡(1973)，迈杰里(1976)，也可见下列文章：纳吉-埃斯泽(1963)，纳吉(1967)和萨科齐伊(1973)。

② “生产者企业之间产品交换所使用的价格”是通常称为“生产者价格”的较大集合中的一个子集。后者还包括其他子集。

由于篇幅所限，本章不可能涉及企业向家庭、或向国营外贸公司销售的产品的价格，或者进口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

的价格。我们不理会农产品，因为本书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分析农业价格的特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我们研究的主题将是非农业生产者购买和销售的中间品的价格。为简短起见，我们将这些价格称为企业间价格，我们请求读者在心中随时加上进一步的限定，即它们只涉及非农业生产者。

即使讨论这类范围狭小的价格仍有可能涉及价格理论的大量一般性问题。我们的命题是否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产品流，是否需要作出修正，这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必须提出一个例外情况：存在着本章尚未论述、但在后面将要分析的另一类产品流。在第十六至十八章论述家庭的地位和行为之后，我们将在第十九章考察家庭面临的消费价格的形成。在那里，我们能够利用本章的某些成果。

我们将对本章主题加以限定：不仅只论述有限范围的某类型价格，而且还是从一种特殊的观点来探讨价格问题。

与后面的第十九章一样，在这里我们将完全用描述性方法来考察价格。在以往的各个时期中，几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过关于价格的讨论。但是，正如上一章已指出的，在许多讨论中，分析的题目都是，价格体系应当是什么样的，应当采用什么样的价格形成原则和方法。尽管不可否认这种探讨的极端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这些文献对完成本书的任务帮助很少。我们希望发现价格在现实中起什么作用，形成价格的机制是什么，以及有哪些经济力量引起它们变动。^⑤这个问题在文献中也得到了论述，尽管这方面的论述比那些偏重实际建议的研究少得多。许多描述性著作主要试图说明官方对价格形成所作的规定。实践可能符合于这些规定，不过也可能背离它们。规定是由人来贯彻的，而人则要受到环境条件、同伴、“社会思潮”，等等的影响。非常需要进行一些透彻的案例研究，以便提供详尽的个

^⑤ 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价格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在上一章，我们发现有关这个问题的描述性文献极少。

别价格的形成历史。

由于我们几乎不可能依赖经验的考察，所以我们的描述性命题完全是假说性的。我们将提出这些命题，并且希望日后通过细致的经验观察检验其有效性。

我们要进一步把自己完全限于与本书主题，即短缺，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之中。为了事先作些提示，我们列出属于本章的一些问题。

在企业有软（或相当软的）预算约束的长期短缺经济中，价格飘浮会出现什么趋势？国家干预是否能消除这些趋势？

仅仅阐明这些问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短缺与开头提到的那些现象密切相关，这就是影响价格的集中化过程（从中央价格政策出发）和分散化过程（从企业出发）。有关短缺的结论将在本章末尾提出。我们的说明从国家对价格的控制，这种控制的可能性及限制开始。④

对于我们的某些命题和假说，我们将着重指出它们是仅仅适用于传统经济管理体制，还是仅仅适用于改革后实行的体制。但是在其他地方，我们将述及的那些现象是无需区别实际管理体制就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观察到的。

15·2 易于或难于管理的价格

社会主义经济中一切或几乎一切价格都受到国家中央机关有意识的控制，这个观点已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一些人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的优点，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造成困难的原因。我们不同任何观点争论，因为我们确信这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中央经济控制决定了许多种价格，国家价格政策对价

④ 15·2至15·4节所说的内容，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正后，对第十九章论述的消费价格也适用。

格的实际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它并不是全能的：它不能（而且也许并不想）“掌握”每一种价格。因此，在讨论国家价格政策的作用之前，我们希望先考察一下国家价格控制所受到的（不以主观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约束，以及国家权力的限度。

让我们从这种情形开始：政府价格部门希望确定一种产品的价格，并保证它得到严格的遵守。为此，它必须首先解决下述问题。

（1）必须对该产品的一切性质属性作出准确、明晰和全面的质量说明。

（2）它必须检查该产品是否实际上按官定价格出售，它的一切属性是否完全符合质量说明规定的参数。如果不是如此，它必须严格地强制实行其规定。

对某些产品来说，上述两条要求比较容易满足。煤炭，石油，汽油，硫酸，水泥，砂糖或牛奶的质量都可以用一两个或至多三四个参数来描述。我们把这类产品称为标准大批量产品。大多数原材料，某些半成品和经过初级加工的大批量生产的传统食品都属于这一类。

然而对其他产品来说，为使质量说明准确、明晰和全面，就必须列出几十个、成百个、甚至可能数千个参数。让我们以便携式收音机为例，它有上千个品种。即使在市场条件相同的同一国家内，最昂贵型号的价格也是最低廉型号价格的数倍，这表明它们的质量可能具有极大差异。当然便携式收音机还是一种相当简单的装置。我们只要想像一下工程和建筑业那些复杂得多的产品就行了。我们将把这类产品称为差别产品。

标准大批量产品与差别产品之间的区别当然只是一种抽象。很明显，存在着大量中间和过渡的情况。然而，对大多数产品来说，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指出它们属于两类中的哪一类。如果只考虑两种“纯粹”类型，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就比较容易了。

标准大批量产品的数目即使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也没有大的增加。它们中间多数是传统产品。只是不时有些新产品加入这个行列(如某些基本的合成纤维产品)。

另一方面，差别产品的数目不断迅速增加。作为技术进步的后果，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过程之一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差别化。^⑤某些产品被淘汰了，但是更多的新产品取而代之，然后这些留下来的产品再不断繁衍细分。差别是个可度量的范畴，例如，用尽可能最细的分类对产品进行区分，我们就可以说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了多少种工业品。可惜我们没有这种数据。然而，这种差别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大大超过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许多人不赞成差别的迅速发展：他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浪费，并认为它主要是对买者的操纵。另一些人尽管对无节制地发展差别持批评态度，但是他们承认这是技术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我们感到没有必要作出价值判断。我们只是强调，这里讨论的历史过程似乎是不可抗拒的。

上面的论述引出了与政府价格控制有关的一些重要结论。

标准大批量产品的价格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控制，而对差别产品则不可能这样做。生产的差别越大，用行政方式决定价格并加以实施就越困难。

对差别产品来说，生产者能够不太困难地进行隐蔽提价。^⑥它有两种形式，虽然这两种形式不是相互排斥的。第一种形式是与引进新产品相联系的隐蔽提价。价格部门一旦确定了一种产品的价格，同时就规定了它的一切质量参数。在成本提高的时候，企业就想提高价格。为此它生产一种新型产品。这种产品可能确

^⑤ 产品差别是不完全竞争理论考虑的中心。见罗宾逊(1933年)和张伯伦(1933年)的最早著作。在这一点，我们的观察符合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发现。在差别极大的情况下，严格统一价格的假定不可能成立。它既不可能由分散化的市场，也不可能由行政部门来保证。

^⑥ 关于隐蔽提价问题，可见奇科什-纳吉(1975a)的文章和拉德诺蒂(1974)的著作。

实具有某种有用的新属性，不过也可能只是为了改变外观。新产品的引进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增加了的成本能在新价格中得到承认。第二种形式是降低老产品成本引起的隐蔽提价。这也许是合法的。当确定价格时，并不会对一切质量细节作出规定。例如，允许使用廉价或质量较差的材料来制造某个零件。或者，质量规定可能被违反，因为企业估计价格部门不可能对产品每个细节都进行检验。生产差别越大，以这两种形式隐蔽提价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关于具有差别的产品，我们所说的是：国家不是不可能，而是很难规定其价格。这主要取决于价格部门的能力。它取决于价格管理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在技术和商业方面的技能。他们使用什么技术来简化价格形成与价格控制这项复杂的工作，也具有极大的关系。总之，虽然管理能力能够提高，但它仍是有限的，而差别化的进程是连续不断和迅速发展的。考虑到这些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只要一国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大多数产品的价格都很容易加以管理。但是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生产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要加以管理就很困难。如果价格管理机构的增长幅度很有限，例如，如果它的增长速度低于国家其他管理部门，那么在全部价格中能够有效管理的部分将不断减少。

对于价格管理机构究竟应当增加还是应当减少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加以肯定或否定。我们只是根据可观察趋势的外推作出预测。

15·3 管理价格、虚假管理价格和契约价格

上节我们谈了用行政手段规定价格的可能性。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概述一下集中和分散定价的主要形式。

一种形式就是所谓管理定价。价格部门实际上规定价格并同

时准确、明晰、全面地确定质量参数。它实际上控制和实行规定的价格与质量。

可以看到，我们在定义的每一项上都加了“实际上”这个词。如果一切东西都仅仅停留在纸上，那是不够的，它必须在现实中出现，我们才能称这种价格为真正的管理价格。

另一种纯粹类型的价格是契约价格。它的主要性质正好相反：它不是由行政命令规定，而是由买卖双方议定的。在本章后面部分，我们将考察哪些因素影响买者和卖者决定价格，以及议价如何依赖于契约双方相对力量的大小。契约价格受到中央经济控制的一般经济政策和措施的影响；它还受到国家价格政策通过利润提取，税收，补贴，关税和其他措施造成的影响，或许还间接受到行政确定的投入或代用品价格的影响。然而根据定义，该产品的管理定价在这里不能算作国家价格政策的组成部分，因为否则它就应该归入第一类价格。

最后，还有一种中间形式，我们将称之为虚假管理定价。从表面上看，这种价格是价格部门制定的，而实际上它是由有关各方形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它由卖者决定并为消费者所接受。如果卖者实际上决定着他在成本之上想要得到的利润量，并提出详细的计算，以便使这个价格符合既定的价格形成原则，从而能为价格部门所接受；如果价格部门对产品不进行详细的工艺成本分析，也不研究市场状况，而只是对生产者建议的价格“盖橡皮图章”，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顺便提及，我们注意到这里讨论的问题不仅与价格决定有关，而且与中央每一项决策都有联系。在中央部门和下级组织存在争执的情况下，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就能够清楚地被区别开来。如果前者说A，后者说B，而通过的决定是A，这肯定是一个集中决策。但是如果中央部门只是单纯批准下级组织根据自己最大利益提出来的建议，情况又会如何呢？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明确地回答，实际上决策是不是集中的。不仅如此，在虚假管理定价情

况下，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正如后面将要详细说明的那样，企业的建议往往与中央价格政策的总目标相抵触，例如，与稳定价格水平的要求相抵触。然而，如果从纸面上看，它没有与价格形成原则和计算方法相抵触，建议将得到中央的批准，从此它就符合“管理价格”的条件。然而，企业却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和它本来公开作为契约价格会得到的东西。实际上，这个价格违背了中央价格部门的真正原则。因此，我们把这种形式称为虚假管理定价。

这三种形式的分类与上节的分类，即产品价格是否易于管理，密切相关。图15-1表示了这种相互关系。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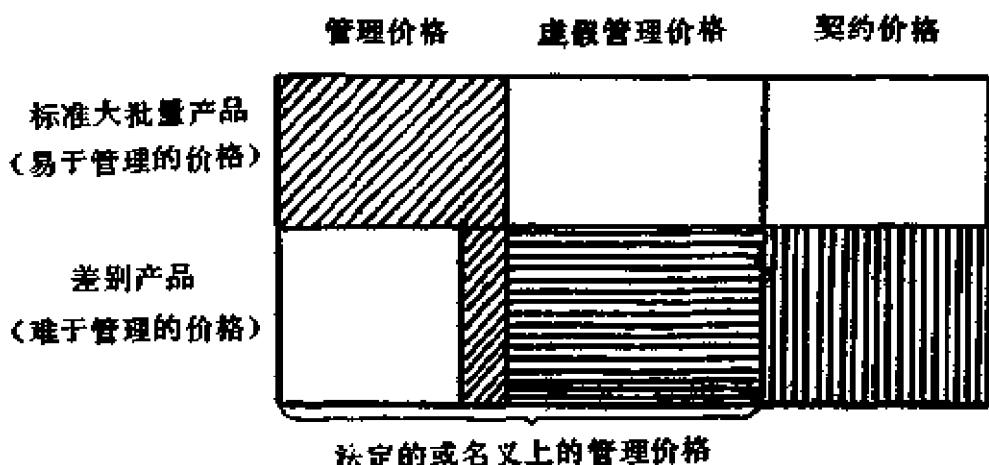


图15-1 价格的管理及其可管理性

我们假定价格部门希望尽可能扩大管理价格的范围。它能够不太困难地为标准大批量产品规定真正的管理价格(第一行，第一栏)。根据管理能力的大小，它也可以为少数差别产品规定真正的管理价格(第二行第一栏的窄的斜线部分)。不容易管理的其他一切差别产品的价格都不是真正的管理价格。价格部门或是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第二行第三栏的竖线部分)，或是自以为规定了

⑦ 该图只表现这种相互关系的逻辑联系。各栏的宽度和各行的高度都不代表数量上的比例。

管理价格，却不能真正实行（第二行第二栏的横线部分）。

产品差别和管理定价日益增长的困难与定价法规无关。但是，是否公开承认这种困难，取决于经济管理的体制；例如，中央是否在国家定价仅是一种幻想的情况下才对有差别的产品规定管理价格。匈牙利1968年的改革放弃了对相当一部分产品的这种幻想，因而较之过去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例如建筑、工程业生产的，以及国营企业间交换的许多产品都属于这种情况。价格部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控制它们的价格。自改革以来，它不再自称这些价格全是中央规定的了。

上述三种定价方式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别，因为经济管理者只能根据他们的考虑规定真正的管理价格。契约价格是由受内部力量和特殊机制控制的多少分散化的过程形成的。虚假管理价格的形成方式与契约价格类似。尽管有“官方批准”，它们主要还是由分散化过程形成的。因此，仅理解价格政策的意图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要看清什么力量影响定价的这种中间形式，我们还必须了解分散定价过程的性质。

15·4 价格水平的度量

在此，我们必须作一个简短的脱离正题的论述，来讨论一下价格水平的度量问题。这方面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⑧主要问题正是上面所讨论的质量指标问题。在商品的组合成分不断变化时，几乎不可能确定价格变化究竟表示质量变化还是真正的价格变化。虽然这是一切制度共有的一般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存在着特有的困难。

在少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计量学的考察已经成功

^⑧ 有关价格指数的理论文献见弗里希(1936, 1974), 克韦什-帕尼茨基(1973), 德雷奇斯勒(1966, 1974), 和蒙德(1970)。马顿(1976)对匈牙利和奥地利消费品物价进行的研究阐明了国际比较的实际问题。

地说明了质量与价格间的相互关系。^⑨不过它只有在买方市场占优势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成功。在那里,如果消费者判断A比B好,他才准备为A支付高价。因此A和B间的价格差额至少近似地表示出消费者对两种产品质量差距的评价。

但是,在长期短缺条件下,如果买者不能进行选择,如果因为没有B,他被迫用A来代替,那么可能出现的任何价格差额都与质量差距无关。因此,根据对买者实际选择的观察来研究价格与质量相互关系的计量经济方法不适用于短缺经济。

况且,这种考察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很少见,而且通常还限于纯科学的研究的范围。官方价格统计未能成功地克服这一困难。它们也未能抓住隐蔽提价的现象。后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罕见,在那里,不少大厂商不愿意宣布不得人心的提价,而宁愿变换产品加以掩饰。尽管如此,我们仍感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度量的困难更大,这不是因为统计数字不够完整或上报材料不够真实,而是因为被观察过程的性质。

我们假定,在一个政府不干预价格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统计记录的只是期间可比的、一切质量参数长期不变的产品的价格运动。这组产品大致与我们所说的标准大批量产品相一致。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就价格运动来说,这些产品可能很好地代表了产品的总体。因为资本能够连续加以再配置,标准大批量产品的利润不可能长久地大大高于或低于其他产品。因此可以假定,如果物价统计根据对期间可比产品价格的观察来确定物价指数,那么所得到的估计将不会偏高或偏低。

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价格统计所包含的期间可比产品种类,大致与价格易于管理的商品种类一致。对这些产品,价格部门能够执行管理价格。反之,对契约价格和虚假管理价格,稳定性就不能得到保证。由于成本推动或需求拉动,

^⑨ 见格利里奇斯(1968)的著作以及他的大量文章(1971)。德雷奇斯·勒(1974)和扎菲尔(1974)用另一种方法也分析了质量与价格的相互关系。

后一类价格可能提高。然而对管理价格来说，国家能够成功地抵消价格漂浮的趋势。可以理解，如果价格统计主要根据对期间可比产品价格变动的观察，那么价格指数将会偏低。

同样的偏低倾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统计中也可能出现，假如那里也是用行政方法确定部分或全部标准大批量产品的价格，并使这些管理价格得到执行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期间可比产品价格的变动也不能如实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

15·5 助长与抵消价格漂浮的力量：

企业兴趣的作用

在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下一个主题，即考察企业间价格的运动之前，我们要利用15·2至15·4节的结果。本章余下部分主要分析15·1节阐述的那类价格，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在“价格”一词前冠以“企业间”（或更确切地说，“非农业生产企业之间”）一词。

首先，我们要作一点抽象的区分：我们把影响价格发展的集中效应与分散效应分开。在现实中，这两组效应可能相互发生作用。但是，为了分析的清晰，我们将在抽象层次上对它们严加区别。开始，我们将只讨论分散效应。因此，在这部分分析中将排除真正的管理价格，而仅仅论述契约价格和虚假管理价格。

当然，国家也能通过税收、对企业的财政支持等方式影响契约和虚假管理价格的绝对量。但是，我们假定，国家和企业的财务关系（税率，财政支持的程度等等）在某一年到下一年之间没有变化。因为在下两节中我们要精确地阐述这种变化的效应，所以暂时略去政府措施的作用是允许的。

分析的第一阶段是讨论企业的兴趣。我们的出发点是下述命题。

社会主义企业，不管作为卖者还是作为买者，都有提高价格

的冲动。无论是成本推动倾向（以提价形式把增加了的成本转嫁给买者）还是需求拉动倾向（得到满足的买者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在企业的行为中都能够被觉察到。^⑩

上述命题与我们前面提出的社会主义企业对价格没有特别反应的论断之间是否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前面我们说过，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甚至改革后也没有变硬。但是如果这是确实的，卖者为什么要努力提高价格？买者为什么要力图通过支付高价来影响卖者？

我认为完全不存在任何逻辑矛盾。不过我们必须避免用粗略和不精确的方式来解释本书前面提出的命题。我们曾经着重指出，软预算约束不仅表现为企业把一切可能提高的成本都转嫁给国家，而且还表现为它通过提价的形式转嫁给自己的买者。我们曾经强调指出，尽管预算约束是软的，但企业对盈利性并不是漠不关心，而且当制定产出构成时，它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产出价格作出反应。^⑪

矛盾并不在于我们的分析，而在于价格形成中企业的地位和卖者与买者的关系。我们在分析中已多次使用过的两个方面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关系。一个是瞬间、短期和长期过程的明确区分，另一个则是买者和卖者间的不对称性。

我们先来考虑作为生产者和卖者的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它对采取那些直接或间接促使价格提高的行动具有双重兴趣。

(1) 企业得到一份紧的短期生产计划。带有最强的物质和精神刺激的最重要的计划指标是总产量计划。(见3·2节)企业如果尽量生产较昂贵的产品就很容易完成既定的短期计划。也可能出现上章所描述的情况：在既定价格下，企业尽可能多地把较昂贵

^⑩ 关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区别，可见马克卢普(1980)，拉德诺蒂(1974)和奇科什-纳吉(1975a)。

^⑪ 关于企业定价对软化预算约束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意义，见13·5节；关于盈利性，见13·9节，至于对产出价格的反应，见14·6节。

的产品编入(日或周的)生产作业计划。产出构成的这种变动会引起平均价格水平的提高。

第二种方法可能与第一种同时并用而且与之相互作用，这就是公开或隐蔽的提价。

(2) 中央规定的短期计划也包括财务、成本和盈利指标。确实，这些指标的作用小于总产量指标，但是它们的完成仍然影响到企业的决策，也许还会影响其财务地位。如果在实施短期计划过程中成本提高了，如果盈利未达到计划的要求，就会使企业处于不利地位。这就促使企业经理至少以隐蔽的形式提高价格(在这里可以看到成本推动的价格漂浮因素)。

这两种因素都不是特别强烈，它们只是在短期内影响企业。经理们很清楚，当制定下一个短期计划时，已经达到的财务指标将作为上级部门制定下一个生产和财务计划的基础。经理们知道，归根结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不取决于财务指标完成的结果。

虽然生产者提价的努力并不太强，但买者的抵制更加微弱。他可能认为，如果向卖者让步，他就能博得后者的好感，以及同这种好感一起得到他所希望的产品(这是一种需求拉动的价格上升)。^⑫企业从完成生产计划或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中所得到的收益可能会超过成本的上升。下面的理由已经足够使它做到这一点，即：因为作为买者的企业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卖者，从而，卖给它投入品的企业的所作所为，它自己也可以如法炮制。

总之，价格漂浮趋势虽然并不十分强烈，但仍然存在。自从

^⑫ 我们回想一下4·7节，在那里我们初次熟悉了买者态度这个概念。我们在那里提到，买者争取卖者的努力是这种态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十四章在论述买者对投入品价格的反应时，我们提到了更多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描述另一个成分，即买者对卖者提价努力进行抵制的力量。各种不同成分共同刻画了买者行为的长期特征(这些成分也彼此影响)。

为简略起见，卖者态度的类似成分将不再赘述。

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企业不再得到既包括生产、成本、盈利，也包括各种财务数量的短期计划指标。因此它也就不再为了完成或超额完成这些计划而提高价格了。但是它对增加利润的兴趣提高了。无论是什么实际形式的物质刺激（按利润支付给企业经理的奖金、工人的利润分成、用企业内部储蓄进行投资的可能性；等等）。企业想赚取更多利润。利润的赚取可以促使它在使用其他手段的同时去选择生产计划表中那些高利润的产品，这就会助长平均价格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它将努力公开或隐蔽地提高价格。

生产者也许是由于成本提高而被迫这样做的（这是成本推动的价格漂浮）。当然，作为最后的手段，企业会试图把较昂贵投入的负担转嫁给国家。然而，如果它无需请求国家的帮助，而是能够以几乎使人觉察不到的方式把负担转嫁给买者，它会感到更加稳妥。当然，即使成本没有增加，仅仅为了更高的利润，努力提价也是值得的。

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提价的冲动并不十分强烈，即使在利润动机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这种努力成功了，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成功，也不会因此带来任何致命的危险。

本身也对利润感兴趣的买者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抵制卖者可能符合他的利益，因为提高成本终究将损害他自己的盈利性。另一方面，由于已讲过的原因，他的抵制将被削弱，他甚至可能去抬高卖者制定的价格（这是需求拉动的价格漂浮）。他生活在短缺经济、数量冲动和扩张冲动的气氛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获得投入品。如果确有必要，他宁愿支付高价。如果这使他自己的成本提高，他也会努力把它转嫁给自己的买者^⑬或国家。

^⑬ 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一点：“企业……不断寻找机会提价。与此同时出现的材料成本的增加使这种企图成为可能。……各主管部门之间达成协议之后，有关各方都大幅度地提高了价格。”见文斯（1977年，第33页）。

我们的假说如下：对利润的兴趣如不与相当硬的预算约束相结合，就会强化价格漂浮倾向。自从改革以来，卖者提价的努力和买者对高价的抵制都加强了，但是前者仍大于后者。

由此可以得出重要的一般性理论结论。如果我们在静态结构中和亚微观层次上寻找价格形成中卖者和买者的关系，他们的兴趣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零-和博弈”。买者失去的与卖者得到的相等，反之亦然。

但是，如果我们在动态结构中和微观层次上观察这些过程，观察许多产品，以及买者卖者间的循环关系和购买销售的不断重复，那情景就会完全不同。这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买者失去的东西不会都被卖者所得到，因为他总能把暂时的损失转嫁出去。

15·6 短缺和成本增加的影响

让我们暂时继续讨论分散化对价格的影响。我们假定在某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管理体制与对企业实行的物质和精神刺激形式是既定的，预算约束的正常硬度等等也是既定的。有哪些其他解释性变量影响着价格漂浮倾向？

尽管我们不企图论述的完整性，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两类现象，即短缺和发生在企业外部的成本增加的影响。上节已多次涉及这两种现象，不过现在我们还要稍微详细地讨论一下。

上节我们考虑了一个因素，即几乎普遍影响着整个企业部门的企业动机。现在我们来考察在特定市场上以不同强度起作用的一些因素。

我们从短缺的影响开始。上节我们说明了买方企业对卖方可能进行的提价很少作出抵制；实际上，它自己可能主动提价。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可能出现于传统企业之中，但是经济管理改革之后，它的势头得以加强。现在我们可以断言，这种现象起作

用的程度取决于有关投入品的短缺强度。在某特定市场上，短缺越强，买者就越是容忍卖者对投入品价格的公开或隐蔽的提高，而且他自己也越是愿意开出高价。长期短缺或吸纳的这种需求拉动效应，在投资品市场和劳务市场能够最明显地感觉到。建筑业价格的持续上升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这是投资市场长期紧张的特有的后果。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已经得到了一个单向的因果关系。高度短缺引起价格上升，但是不存在反向关系：高价格不会导致紧张状态的持续缓解。在亚微观层次上，支付较高价格对买者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他得到了迫切需要的投入品，也许他的处境将会比他的竞争者好一些。他的短缺强度暂时减轻了，但是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对连续进行购买的整个企业部门来说，正常的短缺强度没有减轻。在供给方面，相对价格可能暂时影响到产出构成，但是它们基本上不影响总产量（见第六章和第十四章）。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供给，而是需求。即使在较高的价格下，一切企业的需求也几乎都是不可满足的（见第五、十三和十四章）。因此，实际的短缺强度继续围绕正常水平波动。我们将在本书后面几章中再回头讨论这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即价格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减轻正常的短缺强度。

现在我们转向较高成本的影响。在买者-生产者企业外部起作用的哪些因素会导致成本上升？

（1）进口材料、中间品或机器设备的国外价格的提高。如果国家不进行干预，如果以不变汇率折算为国内价格，国外价格上升就会引起国内成本的增加。

（2）国内生产的材料、中间品或机器设备的价格的提高。至于它为什么会提高，这是另一个问题，上节和本节提到的每一个因素都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价格提高了，就会增加我们企业的成本。

（3）由于企业不能控制的原因，例如因为政府调整工资的措

施等等，名义工资和与工资成本相连的税收可能以高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增长。（工资的决定将在第十六章详细讨论。）

除了上述企业外部因素的作用外，企业内部的因素也可能起作用。

我们回想一下12·5节描述的相互关系。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是U型的。随着生产能力更加充分地得到利用，边际成本越来越急剧地上升。生产日益经常地碰到资源约束并造成一些有害的后果。强制替代更加频繁地发生并增加了成本。加班加点更为经常，浪费更为严重，产品质量更加低劣，机器受到损坏，等等。出现了不断增长的囤积投入品存货的趋势，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保管费用和应付利息。总之，一方面生产能力高度利用和短缺，同另一方面边际成本急剧增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短缺通过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机制这两条因果链促使价格上升。

为了便于我们概述这种因果关系，我们绘制了图15-2。图中每一个框都象征一组现象。各框都由大写字母(M , Z , 等等)表示。字母旁的下标*i*指第*i*个产品组，而那些无下标的字母指整个企业领域。除了最右边的框以外，每个框都代表一个解释性变量。右边的框表示被解释的变量，即由分散因素引起的价格漂浮倾向， $P_i^{\text{decent}}(t)$ 。这是一个国家价格指数，它指的是在($t-1$)年和 t 年之间第*i*个局部市场，在价格只受分散因素影响时的情况。

事实上，图15-2阐明了解释性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概述了一个价格漂浮函数。上面的解释表明了从属的方向及函数的某些特征。但是我们对这种关系的性质和数量特征并没有充分了解，因此不可能精确地加以描述。

图中从左到右的箭头表示因果关系的主要方向。^⑩但是我们

^⑩ 为了简化这幅相当复杂的图形，我们不再说明软预算约束与短缺之间的那些已在前几章广泛讨论过的相互关系。

也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存在着两方面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说，也有从右向左的箭头。

其中之一是“价格，成本，价格”螺旋。框 C_i ， P_i ， C ，然后又是 C_i ，由一个环联在一起。产品组 i 的生产者的成本增加了，这就使价格指数 P_i^{decentr} 提高，使产品组 k, j, \dots 等等的成本增加，并提高了这些产品的价格，这可能再次增加产品组 i 的生产成本，如此等等。这种现象在成本通货膨胀理论中已经众所周知。

另一种相互作用发生在价格漂浮倾向（框 P_i ）与预算约束的软的程度（框 M ）之间。一开始我们就强调过，软预算约束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企业可能把它的损失转嫁给国家，也可能把它转嫁给买者。约束越软，买者就越得忍受这种转嫁（因为它能够把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他自己产品的买者或国家）。预算约束“变软”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一点到处都在起作用。在此意义上，框 P_i 和 M 所指的现象同时既是原因又是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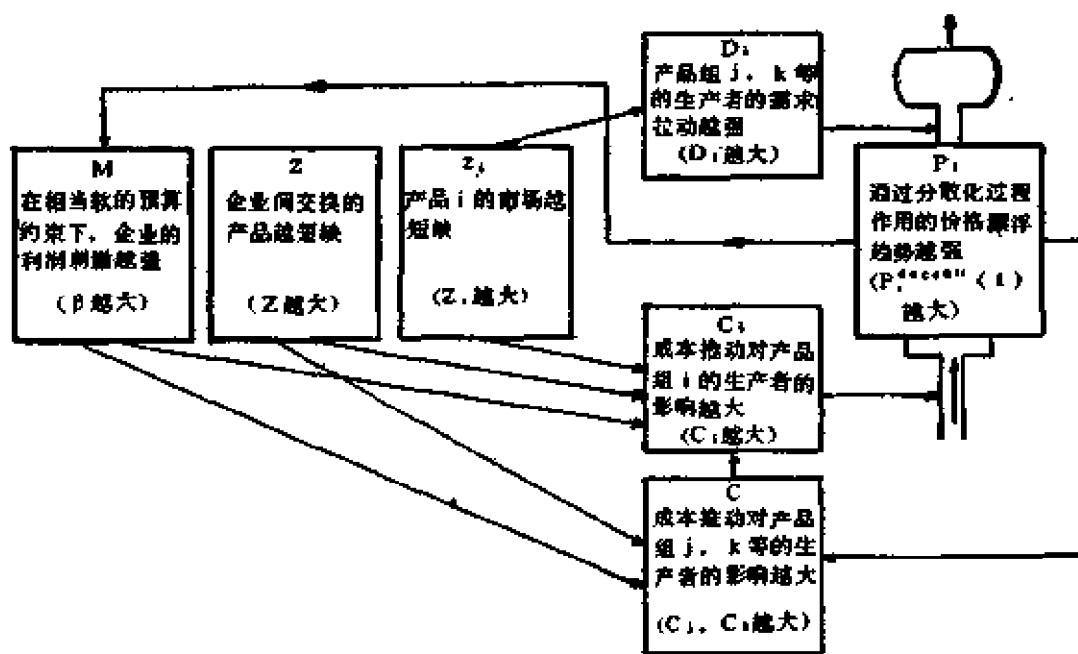


图 15-2 价格漂浮倾向图解

15·7 国家对企业间价格的干预

图15-2介绍了提高生产者所交换产品的价格的分散化过程，我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向对价格的集中控制。不仅官方的声明，而且实践经验也证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价格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价格的稳定。如果国家没有或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它至少要通过努力制定价格提高的上限来有力地抵制价格的螺旋上升，并使价格保持在计划水平之内。价格政策也有其他目的，但是如果不同目的之间发生矛盾，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要优先考虑稳定性。^⑩

我们用 $P_i^{central}(t)$ 表示中央价格部门在 t 时刻期望的价格指数。它表示经济领导者确定的期望水平。实际价格指数 $P_i(t)$ 如下：

$$P_i(t) = \rho_i \cdot P_i^{central}(t) + (1-\rho_i) \cdot P_i^{decentral}(t) \quad (15-1)$$

实际价格指数	抵制参数	中央期望的价格指数	分散化过程形成的价格指数
--------	------	-----------	--------------

左边的价格指数 $P_i(t)$ 是一个事后数量，而指数 $P_i^{central}(t)$ 和 $P_i^{decentral}(t)$ 都是事前数量。

在这个公式中，参数 ρ_i 度量市场 i 中国家抵制价格漂浮的有效程度。如果 $\rho_i = 1$ ，抵制是彻底的；国家期望的价格水平就会实现。如果 $\rho_i = 0$ ，中央部门方面就没有进行任何抵制，价格水平完全是分散化过程引起的结果。在抵制参数取中间值的情况下，存在一些抵制，但分散过程引起的价格漂浮也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这种中间状态 ($0 < \rho_i < 1$) 是企业间价格形成的最大特点。

^⑩ 我们强调上句中的限制词“大多数”。也许有这样的时期，由于各种考虑，经济政策并不把价格稳定放在首位。但是，如果我们纵观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历史，上面所说的时期似乎只是例外，它们并不可能使优先考虑价格稳定这一通例失效。

公式(15-1)与下一章出示的关于工资的关系式(16-11)类似。我们在那里描述了一种自发的工资漂浮倾向，在这里则是一种自发的价格漂浮倾向；与这里一样，那里的参数 ρ_1 也表示国家对这种倾向的抵制。我们希望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那种保证价格或工资稳定的“内在”机制。相反，“内在”机制和企业的动机具有使价格和工资上涨的倾向。如果价格保持稳定，这是积极抵制上涨的结果。^⑯如果抵制放松了(即 ρ_1 减小了)，价格和工资漂浮倾向就会进一步加强。

在第十一章中，我们指出消除失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成就之一，但最终这并不是经济管理或经济政策造成的结果。这种制度运动的内在规律迟早会导致消除失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另一个成就是，尽管在一些发达的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货膨胀加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保持了价格的稳定，或者至少使膨胀不超过相当低的水平。这第二点成就与消除失业相反，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它不受内在运动规律的保证，而只是通过积极的政府措施才获得的。

中央价格政策的工具是什么？

(1) 最明显的干预方法就是规定管理价格。虽然适于使用这种方法的环境确实不太广泛，但它仍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仅需要回想一下最重要的原材料、能源和半成品的价格是能够很容易地得到管理的，固定这些价格对于使用它们来生产的那些产品的成本与价格会起到稳定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上，比较容易通过规定管理价格来保证价格的稳定，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很容易管理。经济越发达，

^⑯ 奇科什-纳吉认为“……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政府不调节价格，价格水平就会更高。换言之，货币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起作用：它们的膨胀效应只能受到价格规定的阻止。……在长时期中，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水平是上升而不是下降，尽管个别产品的价格经常降低。”见奇科什-纳吉(1975b，第146，151页，和1974)。

产品差别就越大，因此，正如15·3节指出的，能够管理的价格的比重就越小。如果价格部门仍企图主要靠固定价格来保持价格稳定，虚假管理价格将更大量地出现，价格漂浮倾向也会以伪装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这样来表达：政府对价格漂浮的抵制，即公式(15-1)中的参数 ρ_i ，是产品差别的递减函数。

(2) 如果成本推动趋势很强，中央有关部门可能会通过国家再分配来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的方法阻止价格上升。它们可能补贴整个企业，或补贴特定产品。或者，如果企业已经在接受这类补贴，那么补贴还可以增加。也许还可以用减免税收或某种其他方式减轻企业负担。犹如从过热的锅炉里释放出一些蒸汽，以减轻内部的压力。

不过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工具。一方面，它可以立即制止问题的蔓延。一笔在适当地点和适当时刻发放的政府补贴，能够打破“成本，价格，成本”螺旋。另一方面，国家对企业的补贴瓦解了士气，企业不再感到有压力去降低成本。预算约束变软了，正如我们反复强调过的，这直接导致短缺的继续存在，而后者又扩大了短期和长期的价格漂浮倾向。(见图15-2所示的相互关系。)

(3) 与上述直接方法一起的还有计算成本的间接方法，即确定哪些项目能计入成本，以及多大的利润可以加在这样计算出来的单位生产成本之上。如果经常进行全面核查，看看规章是否得到遵守，如果违犯必受处罚，那么企业的提价努力将受到抑制。

国家干预可以通过控制舆论的影响，通过报刊和政治组织而得以补充。它可以形成一种谴责公开或隐蔽提价的“社会风气”。

这些间接作用的影响是有限的。它们可以限制价格漂浮倾向，但是不能控制它。

(4) 关键问题在于买者的需求约束是否能够抵制卖者的提价努力。现在我们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在后面考察家庭需求，讨论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掌握的货币总量时再谈。只有在那时，

我们才能着手需求的宏观分析。但是，从企业部门的微观分析已经看得很清楚，企业对当前生产所需的投入品，特别是对投资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预算约束不硬，它们的财务地位不能有效地限制其购买意图。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使没有进行充分的宏观经济说明，也能证明我们提出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主管部门不是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用价格和工资政策来抵抗企业内部产生的价格漂浮倾向。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尽管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暂时回到公式(15-1)。

在价格形成的集中和分散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一方面，导致价格漂浮的分散化的倾向影响了政府措施。在许多场合，管理价格只是单纯“批准”分散过程终归会形成的价格，如图15-2所示。或者，假如一种管理价格大幅度地偏离了企业所希望的水平，企业就可能得到财政支持，否则它就会抵制给它带来损失的管理价格。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国家价格政策期望的价格指数（公式(15-1)中的 P_i^{centr} ）一开始就与企业间契约可能形成的价格指数 $P_i^{decentr}$ 相差无几。

另一方面，中央有关部门和“社会风气”对提价的积极抵制会造成一种抑制性影响。企业做得过分对它并没有好处，因为可能规定严格的管理价格，或用税收征走“超额”利润，提高价格的企业也可能被公开揭露。这种自我约束会使价格指数 P_i^{centr} 和 $P_i^{decentr}$ 彼此靠拢。

15·8 论价格理论的背景

在我们结束对企业间价格的考察之前，我们将就这个问题的理论背景作几点评论。理论喜欢纯粹的情形，如(a)“单位成本加

正常利润的价格”，^⑫ 或者，(b)“使供求平衡的瓦尔拉斯均衡价格”，或者，(c)“完全人为规定的管理价格。”存在着三种纯粹情形的范例。但是，这些模型主要是为了便于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令人满意地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间价格的形成。前面的说明包含了所有这三种纯粹模型的要素，这并不是因为作者特别赞赏某种与纯粹模型相对的折衷理论，甚至也不是因为根据个人价值判断，他愿意得到不同价格模型的某种综合。这只是因为，正如我们所揭示的，实际经验展示的是各种纯粹价格形成原则的一种特殊的混合。

据(a)来看，成本增加推动价格的提高。这就在价格的实际发展和以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形成规则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但是承认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按照“价格=单位成本+正常利润”的原则运行。仅仅由于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正常利润，就可以否定这一原则。^⑬

我们要重申前面强调过的内容，即在我们的体系中，“正常标准”不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平均数。当然，个别利润率确实具有统计

^⑫ 古典经济学家的价格理论，尽管它们相互间有实质性差别，但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根据“成本加正常利润”的价格形成规则运行的，至少这是一般趋势。马克思生产价格模型，新李嘉图学派的价格理论，都详细阐明了这一点。见马克思(1867—1894a, b)。还有不少用数学模型表示这一点的尝试。布罗迪(1964, 1969, 1970)作出的贡献是突出的。此外可见卡莱茨基(1964)，卡尔多(1960a, 1960b)，罗宾逊-伊特维尔(1973)，和斯拉法(1960a, b)。P·埃尔德什(1976)发展了一种类似的方法，P·埃尔德什(1977, 1978)进一步作了阐述。

某些就理论渊源来说不同于李嘉图和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家，以经验观察为基础，也详尽阐明了“成本加成”规则。

但还应当指出，同样依靠经验观察的另一些人否认“成本加成”价格形成规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作用，即使只是作为一种主导的趋势。

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发展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示，“成本加正常利润”的原则确实没有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价格形成的主导规则。

^⑬ 在这里我们不阐述单位产品的利润(用单位价格或单位成本的百分比表示)和利润率(用资本百分比表示)之间的精确关系。讨论这种关系可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命题只是否定的，其中任何一个变量都不存在正常值。

平均数。但是只有当使偏离正常值的个别利润率回到正常值的社会机制起作用的时候，它才成为正常利润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机制的要素在政府干预的形式中可以看到。严重的亏损不能长期忍受，但在普遍修定价格的过程中，迟早要设法消除它们（尽管有相当多的例外）。“超额”利润也迟早要被税收征走。但是这种机制通过“间歇性”干预，在大量摩擦和延滞的条件下运行。无论如何，被重新分配的仅仅是利润。构成该过程基础的资本没有被重新配置；实际资本并不从亏损或盈利较少的地方流到盈利较多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形成任何统一的，社会普遍接受的正常利润标准。

根据(b)，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会促使买者提高价格。这就在实际价格发展与建立供求均衡的瓦尔拉斯价格机制模型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但是需求拉动通货膨胀趋势本身，即使没有政府价格政策对它的抵制，也不能保证持久的瓦尔拉斯市场均衡状态。如果维持短缺的社会经济条件、控制机制、动机和行为规则都已形成，价格上升趋势与保持高短缺强度的非瓦尔拉斯正常状态便可同时共存。^⑩

根据(c)，国家为产品制定管理价格。这种价格可能根本不同于“成本加正常利润”的价格或“瓦尔拉斯均衡价格”。在这一点上，现实有点类似于第三种“纯粹”模型，即“人为规定的”管理定价模型。但是事实上，在具有差别产品的发达经济中，许多价格都不可能加以管理。实际价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分散化过程的影响。

三种“纯粹”价格形式或规则的结合比例是不变的。它们任何时候都取决于经济管理的形式、价格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前的经济形势等因素。但是，三种“纯粹”规则总是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似乎是价格形成的一般性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间交换的产品的价格是由政府价格政策和分散化作用过程共同形成的。

^⑩ 关于货币的第二十章和讨论宏观相互关系的第二十一章将详细论证这个陈述。

第十六章 工 资

16·1 引 言

虽然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指明，全书是以匈牙利经济作为背景展开的，但在论述工资的本章中，还是应该在一开始就强调指出，这里所谈论的主要是匈牙利的经验。^①至于这里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尚有待于探讨。

我们只讨论国营部门，即国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支付的工资，^②不涉及合作社支付给其成员的货币收入。同样地，我们也不考察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以外得到的个人收入。

我们所要分析的主题之一是中央工资政策，大政方针由最高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在与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商议之后决定，而其实施对于整个经济体制来说是强制性的。

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工资政策，不论其是否是强制性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央的工资政策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因此，分析工资必须从中央工资政策开始。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几乎没有任何指标比工资指标完成得更准确，相对偏差更小的了。这是一个可以很容易为资料所证明的经验事实。

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者的预测在这一领域特别准确，虽说这

① 同时，我们避免对匈牙利的现状进行过分详细的描述。我们试图从匈牙利的经验中得出更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

② 匈牙利的经济术语也象其他国家的一样，对蓝领雇员的工资和白领雇员的薪水作了区分。在以下的论述中，“工资”用作表示这两种收入的共同术语。

也是部分原因。政府手中掌握着有效手段来保证强制贯彻其中央工资政策。我们不讨论为什么经济管理部门希望并且能够比计划中的其他许多指标（例如投资支出）更严格地贯彻工资指标的问题。这里我们仅仅陈述事实本身，并注意用于执行工资计划的某些手段。

“工资货币”和“非工资货币”是彼此分隔的。稍微夸张一点可以说，即使是在国内，货币也并非完全是可以通用的。企业或非营利机构打算或实际已用于工资的货币是“贴有标签的”，并与已经或将要用于其他目的的货币明确划分开来。经济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如此。从计划领域开始：在货币流通计划中，用于支付工资的货币是单独一项；与此类似，在生产成本中工资也被单独处理，等等。贷款也是这样，用于工资的贷款与任何其他贷款严格地划分开来。^③无论在经济管理的哪一层次，对于每一个实际支出决策都进行严格的划分。“1福林 = 1福林”的原理不再适用。在每一场合下，都要问：“我们是把这一福林用于工资呢，还是用于某一其他项目？”划分最终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会计核算。工资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帐目中自然是单独处理的；银行系统对用于支付工资的贷款单独记载；在官方统计中，工资也受到特殊对待。

这种全面划分的作法本身就很重要。它不仅使事实清楚地呈现出来，而且使每一个决策者都考虑他的行为是否会直接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但是，除了这种教育和纪律方面的意义而外，划分的作法主要用来加强各种行政设施，以阻止两种货币自由转换。许多情况下，在使用作工资的货币不被用于非工资目的和反向的作法这两个方向上起作用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大多数情况下，它不过是只对一个方向起作用的“阀门”，使非工资货币不被用于工资。这种禁令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不是在所有的部门甚或在所有

^③ 目前，匈牙利的企业利润税制也是把用于投资的利润和用于个人收入的利润严格区分开来。

的历史时期都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在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时期，工资基金用严格的条款规定下来，并且对每一个企业都具有约束力：禁止以任何名义超出严格限定的数额。虽然限制企业开支总额的总预算约束确实很软，但对于开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工资的预算约束却很硬，它有效地限制着企业的行动自由。

经济管理体制改以后，工资基金不再用严格的条款予以规定了，但工资支付仍然以某些方式受到限制。一些基金不能用于工资，或者只是在详细规定的条件下才能用于工资支付。这样，每一个企业都必须积累所谓的“储备基金”。虽然这些基金是来自企业的储蓄，但企业经理无权以增加工资的形式把它们直接分给工人。国家预算不仅规定了非营利机构的开支总额，而且规定了在这一额度之内用于工资的是多少。我们不再举例，这些例子意在说明，各种行政禁令是如何阻止非工资货币转换为工资货币的。

法定的禁令有奖励制度作为补充。给企业管理人员的奖金，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以外，总是与遵守工资纪律密切相联系的；仅仅是这种联系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若干次变化。最初，奖金取决于是否遵守绝对工资基金而定。以后，各种相对指标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例如，按企业全部职工计算的人均工资情况。还出现了一些奖金方案。这些方案在可接受的工资增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建立起一种函数关系，同时排斥生产率没有增长就增加工资的作法。自从经济管理体制改以来，主要以间接的方式（通过金钱刺激）维持工资纪律的方法变得越来越突出。例如使企业利润的累进税成为个人工资收入增加的函数。我们没有篇幅来进行详细的描述，只希望强调这些方案最重要的共同特征。以上所说的以及与此类似的各种奖励形式都使得企业管理者在节约“工资福利”（而不是简单地节约福利）方面有一种经济上的利益。这种经济刺激有许多“精神的”鼓励作为补充。每一个管理人员，从车间主任到政府部长，一定要向他的上级说明工资支付款项。如果超过了预算，他将受到斥责。每一个管理人员都觉得，

无论何时评价和判断他的工作，遵守工资纪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在改革以前的讨论中，这一作法经常遭致尖锐的批评。批评者指出，这种方式很容易导致浪费。决策者倾向于对非工资投入抱随便的态度，如果这样做他能使工资开支保持在所规定的限额以内的话。值得指出的是，相同的现象被许多观察社会主义经济的西方人士所清楚地看到。^④通货膨胀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虽然各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互有分歧，至少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提高工资的压力造成的工资—物价螺旋是主要原因（或者是主要原因之一）。对于沿着这条思路推理的人来说，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人的作法和惯例可以当作样板。他们认为，把“工资开支”和“非工资开支”分开，并在每一级管理层次上（从最小的决策到最大的决策）给予“工资开支”以特别注意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在社会主义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对于工资膨胀的恐惧已经变得比在当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更为根深蒂固。

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央部门拥有贯彻其政策的有效手段，但并不能从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这种政策是主观武断的。中央部门不能因为有决策将会得到贯彻这样一种希望，就作出任何一种决策。政策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很有限。本章以下部分就讨论这些限制。我们特别要证实，在工资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是否存在长期的规律性。“政治家”不是一部机器的外部操纵者，可以随意揿下按钮，转动手柄。“政治家”是系统的组成部分，^⑤他对一定的信号作出一定的反应。在工资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是否存在任何

^④ 例如，见怀尔斯的文章（1974）。一个英国经济学家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这一特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英国经济中存在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⑤ 在林德贝克的论文中（1976），用数学模型构造者的语言谈到“内生的政治家”，并把它与建立模型的标准原则加以比较，这些原则总是把政策看作是系统的外生因素。

“经验法则”或决策程序呢？作为决策起点的信号和反馈又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问题又与另外一组问题密切相关。工资对于就业和劳动分配有何影响？这是最重要的“反馈”要素。如果既定的工资政策使得劳动分配不合于当局者的要求，那么，不是分配计划必须修改，就是工资政策必须修改，或者两者都必须修改。

这两组问题——决定工资政策过程中的行为规则和工资对劳动分配的影响——将是以下讨论的主要问题。本章的后半部分说明了开头的几节如何与本书的主题——短缺和“数量”调节相联系。

16·2 短期工资政策的决定

我们试图描述决定短期工资政策的程序。^⑥ 使用“程序”这一术语是因为我们这里面临的，不是单一的、同时作出的、巨大的决策体系，而是一系列局部决策，其顺序部分来自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部分出自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考虑；只有在一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能作出另一个选择。虽然我们要谈到程序，但我不想造成这种印象，似乎社会主义的计划实践中是用形式化的程序和计算机来决定工资政策的。计划者当然是从数字分析开始工作的，但继而就试图通过各种讨论使他们的预测和计算结果一致起来。争论和讨价还价使最初计算的结果不得不再三加以修改。我们的程序是人们实际协调过程的抽象描述性模型。^⑦

⑥ 在展开论述16·2节时，我利用了科瓦茨的论文（1975）。

⑦ 这个描述极其粗略；它所表明的内容并不比标题所表明的多出多少。大部分公式是定义性恒等式。只在若干地方出现决策规则。

这里的描述带有粗略的特点，原因之一是其中一些相互关系在以后论述家庭消费、消费价格和货币的几章里将予以详尽阐述。这里考察的程序是后面论述的概要。另一个原因则是篇幅所限。我们被迫舍弃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将使我们远远超出本书论述的主题。

制定计划是一反复进行的过程。以下我们描述一个由七个步骤构成的循环过程，如果参数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些步骤可能全部或局部出现若干次重复。例如，计划者获得了新的信息，或者对于联系工资计划和计划其他部分的参数出现了新看法的时候，就是这样。

步骤 1：家庭消费总量。计划者在此是与实物量打交道；货币方面的问题将在后面予以论述。^⑧对家庭消费水平的预测是与计划的其他基本指标（生产、投资、对外贸易的实际差额等等）一起作出的。虽然计划过程的这一部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不能对此加以分析。我们仅仅强调从消费方面限制最高领导部门可接受的计划范围的那些相互关系。

下面两个公式在匈牙利制定实际消费计划的工作中已经使用了十到二十年。^⑨

$$\begin{array}{c|c|c} \text{人均实际消} & & \text{人均实际消费增长} \\ \text{费增长} & \geq & \text{率的容忍下限} \\ \hline \text{人均实际消} & \approx & \text{人均实际消费的正} \\ \text{费增长} & & \text{常增长} \\ \hline \end{array} \quad (16-1)$$
$$\quad (16-2)$$

这两个公式右边的数量是该系统特定的参数，它们视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可以较大，或者较小。在以往的十年至十五年里，许多匈牙利的计划者认为，实际消费水平每年增长3~4%是“正常的”，增长2%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使用“公式”这个词，因为在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意识中，它似乎是一个必要条件或目标，是一种渴望达到的水平。我们所面临的不是硬物质约束，而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约束，这种约束可能会被一定时期特定的决策所突破。然而，不仅如此。无

⑧ 为了宏观计划的目的，生产、消费等等的实际水平是以固定价格按总量计算的。

⑨ 见雷奇(1977)。

论这个问题在计划者的意识中是如何形成的，这里是一种在历史上可观察的趋势在实际发生作用。这个假定可以由经验加以检验。如果关于人均消费水平的时间序列资料显示的趋势是不断增长的，如果各数值的离中趋势不太大，如果几乎在一切场合数值都是单调增加，那么这个假定就被证实了。根据我们的假定，公式(16-1)和公式(16-2)表示的相互关系是按照随机规律运动的。这是该体制的主要成就。(当然，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停滞，甚或下降的情况不能从理论分析的可能性中排除。但是，把这些情况考虑在内，就得研究与本书所考察的极为不同的决策机制)。

至于以前讨论过的正常值，我们在这里也要声明，正常标准不仅仅意味着一个随时间波动的变量具有某种时间趋向。如果在系统偏离正常标准的时候，存在一种控制机制迫使系统趋向正常标准，我们也就有理由谈论“正常标准”，存在着控制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一种机制，虽然分析这种机制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从而进入政治社会学的领域。遏制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使生活水平绝对下降，越过公式(16-1)中的下限，或迟或早要带来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造成局势紧张，甚至震荡，^⑩ 经过或长或短时间以后社会被迫对此加以改正。朝相反方向的偏离则与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发生冲突(也许给外贸和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困难)。如果一个国家的消费增长超过正常速度的话，这个国家的消费就是超出它的能力之外，通常会造成消费增长的迟缓。

尽管公式(16-1)和(16-2)很重要，我们还应当注意这个事实，即它们与以下几种现象是并行不悖的。

(1) 人均消费增长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减速时期和加速时期交替出现。

(2) 增长量在居民的不同阶层中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⑩ 这点早在9·10节联系投资周期予以讨论过。我们在那里强调说，对于生活水平的增长存在最低的“容忍限度”。

(3) 在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短缺可能继续存在，强度甚至增加。实际消费的增长并不必然使短缺严重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消费量可能一年比一年更多，而消费者却继续在排队、等待和实行强制替代。这些将在第十八章中加以论述。

步骤 2：家庭消费的商品总量。应当从家庭消费总量中减去不是由居民购买，而是作为附加福利接受的那些项目。以下几章将对这种差别进行更详细的讨论。计划经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把由家庭购买的物品的消费称作商品消费。

在计划工作的这一阶段，把将要出售给居民的商品列成一张平衡公式。公式中的每一项都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总量：

$$\boxed{\text{家庭可购买的商品期末存货量}} = \boxed{\text{家庭可购买的商品期初存货量}} + \boxed{\text{消费品总产量} + \text{进口} - \text{出口}} - \boxed{\text{家庭购买的商品量}} \quad (16-3)$$

总产量和进出口的数字是从计划的其他部分取得的。如果这些指标在编制计划的过程中经过修改，那么刚刚描述的程序就必须重新进行一次。

在编制年度计划时，对期初存货的预测是相当可靠的，然而决定期末存货应是多少却出现了问题。存货的规模（当然，还有其构成）影响着对居民的物品供应。第五章和第八章中关于这一方面就生产领域所作的论述，在经过必要的细节上的修正之后，也适用于家庭消费。如果存货减少，以下几种现象出现的概率就增大：排队现象更为频繁，队伍更长；等待和搜寻现象更多；强制替代也更多，而且更为痛苦；等等。但是，单单是存货本身增加，而存货构成没有任何改善，可能会使计划者担忧，觉得这是不必要地占用了可以派其他用场的资源。

步骤 3：家庭商品消费的名义价值。只要预期价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计划中已规定的政府干预价格的手段形成的，那

么，消费价格指数很容易预测。这个价格指数现在取代了一开始计算实际变量时采用的固定价格。

$$\boxed{\text{对家庭销售的名义价值}} = \boxed{\text{消费价格指数}} \times \boxed{\text{对家庭销售的实际数量}} \quad (16-4)$$

步骤4：家庭部门的现金平衡表。首先，我们把家庭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描述总量平衡，在后面的步骤5中，描述总量如何在不同居民集团之间分解。实际上，总量和分量预测多多少少是同时进行的：

$$\boxed{\text{家庭部门的现金期末存量}} = \boxed{\text{家庭部门的现金期初存量}} + \boxed{\text{家庭的货币收入}} \\ - \boxed{\text{消费者在物品和服务项目上的开支}} - \boxed{\text{家庭的其他货币开支}} \quad (16-5)$$

这是对平衡表极为粗略的描述。现金存量包括家庭手头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两者在内。由于每个家庭的银行存款都可以立即提取，实际上存款的作用也就相当于现金。家庭货币存量的增加（即家庭的货币储蓄）将在第十八章讨论。

货币收入包括家庭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得到的一切收入。

等式右边的第三项（消费者在物品和服务项目上的开支）必须等于公式(16-4)左边一项，并且又是与商品平衡公式(16-3)相联系着。这里，必须从方法论角度作一理论上的评述。在计划过程中，消费者在物品和服务上的开支金额从两个方面得到，一是(16-3)式和(16-4)式中的卖方，一是(16-5)式中的买方。由于这两个价值额得自于不同的初步计算结果，因此一开始它们并不一定互相吻合。但是计划者可以对他们计算的结果加以修正和改进，直到最终从两个方面得到相同的数字。计划者必须保证使它们相

等，因为这是一个恒等式。即使计划不是准确地完成的，恒等式也成立。对家庭的销售与家庭的购买显然是同一事件。计划工作中的这种等同与消费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否相等毫无关系。即使在所编制的平衡公式中，家庭部门的商品购买额从买卖双方看是相同的，市场上仍然可能存在短缺或者滞存。

步骤 5：现金平衡表的分解。(16-5)式中的家庭货币收入总额必须分解为：

$$\boxed{\text{家庭货币收入总额}} = \boxed{\text{对在国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的劳动所支付的工资总额}} + \boxed{\text{家庭部门的其他货币收入}} \quad (16-6)$$

其他货币收入包括：由合作社支付的货币收入，家庭自留地上的销售收入，个体手工业者和商贩的收入，退休金、病假工资、助学金、家庭补助、产妇补助等等。它们的金额一部分是由各种法规或者政府有计划的措施预先决定的，一部分则是在计划期之内作为生产和流通的函数而形成的。后者如农业工人的收入就是生产的函数。

分解式(16-6)不仅仅要求对个别项目的预期准确。在进行总量分解的过程中，中央经济部门还企图实现其收入分配政策。制定分解式(16-6)要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决策：货币收入应该如何在国营、集体和个体部门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应该如何在制造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分配，如何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在劳动年龄人口和领取退休金的人口之间进行分配，等等。

虽然还可以详细探讨对“其他货币收入”进行计划工作的以下一些阶段，鉴于本章开头所指出的限制，我们在以下两个步骤中将只探讨(16-6)式右边的第一项，即工资。

步骤 6：工资基金中的指定部分和非指定部分。计划者对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工资支出是多少进行估量。

(1) 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按计划增长。

(2) 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早已承诺的工资变动(通常是增加)付诸实行。

(3) 除了(2)条件下的变动以外, 工资率保持不变。

据此, 国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支付的工资可以分为两部分:

$$\boxed{\text{对在国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的劳动所支付的工资总额}} = \boxed{\text{指定的工资部分}} + \boxed{\text{非指定的工资部分}} \quad (16-7)$$

右边第一项是“自动形成的”。确实, 这一项实质上已经受到政治和经济因素考虑的影响, 特别是与消费的普遍增长有关的步骤 1, 以及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步骤 5。但是, 当作出这些早期的决策时, 工资总额中的指定部分就已给定了。只是余下的部分, 即非指定部分, 计划者可以“自由支配”, 用来改变相对工资。^① 非指定部分通常是总额中很小的一个份额, 因此, 改变相对工资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如仅从这点考虑, 以前已确定的相对工资就具有相当的刚性。

步骤 7: 相对工资。首先必须确定一个比率。其分子是(16-7)式中左边的一项, 即国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所支付的工资总额。分母是在这些部门中的雇员人数。结果是每一个雇员的年平均名义工资。习惯上以月为基础进行分析。我们以 $\omega(t)$ 表示国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每个职工在时期 t 内的月平均名义工资。

下一步是按职业分类。我们以 $\omega_i(t)$ 表示其职业是 i 的每个雇员的月名义工资。^② 下面为简便起见把限定词“每个雇员”和“每月”都省略, 但当我们讲到平均名义工资或者是按职业分类的平均名义工资时, 总是指上面所定义的 ω 和 ω_i 。

^① 在计划经济中, “工资政策”这一用语经常是仅仅指制定相对工资的阶段。

^② 当然必须满足下面这个平常的条件:

$$\sum_i \omega_i(t) N_i(t) = \omega(t) \sum_i N_i(t) \quad (16-8)$$

其中, $N_i(t)$ 是在职业 i 中的计划就业人数, $\omega(t)$ 是与程序前面几个步骤相适应的月平均名义工资水平。

计划工作特别注意职业之间的工资比率，亦即相对工资。形成相对工资的因素将在本章稍后部分予以论述。这里只考察两个约束条件。一个是政治和社会的容忍限度：

$$W_i(t) = \omega_i(t) / \omega_i(t-1) \geq 1, \text{ 对于每个 } i \quad (16-9)$$

职业 i 中的 名 义 工 资 指 数	在时期 t 和 $(t-1)$ 之内的名 义 工 资
-----------------------------	---------------------------------

名义工资减少的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即使在计划相对削减工资的职业中也是如此。甚至对这些职业，工资政策也是试图保证名义工资至少有微小的增长。因此，约束条件(16-9)中的不等式几乎对所有职业都成立。这本身就减少了改造承袭下来的相对工资格局的可能性。

正如在步骤 6 所看到的那样，虽然工资的下降呈刚性，预先指定的部分也限制了工资上升的可能性。仅仅是工资总额中的非指定部分可以用来改变相对工资。计划者正是把这部分金额在不同的职业之间进行分配。

我们对程序的考察可以在理论上引出以下的结论。关于工资的极端观点似乎都不能成立。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工资、家庭的实际消费量和预测的“生活水平”是计划工作的主要出发点，一开始就要由政治决策固定下来。只是在此之后的余额可以用于其他一切方面。另一种极端观点则把工资(或家庭的实际消费量)看作是一剩余物：在满足投资、生产性消费、非营利机构的消费和出口的需要之后的剩余才用于家庭消费。家庭消费是用来补偿其他项目特别是投资波动的缓冲器。就是说，如果投资高涨，家庭消费就相应地缩减，反之就增加。

这两种极端观点似乎都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描述。正象上面七个步骤所表明的，实际消费量和名义工资两者都有着自身的运动，有它自己的生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一些变量具有“正常值”，还存在一种在时间过程中贯彻正常标准的控制机

制。还有有效的上限约束和下限约束。因此，实际消费量和名义工资既不是缓冲器，也不是剩余物。

另一方面，与家庭争夺使用资源的其他部门（即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也服从于若干上限约束和下限约束，也是正常标准控制在发生作用。家庭消费和名义工资按照这些实际过程和货币过程的相互调节而变化发展。

计划者试图预先协调这些过程。我们已经看到，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机动余地，但是他们的手脚却被束缚着。

16·3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劳动总供求的影响

在工资和劳动的供求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以下几节就分析这种相互作用。无疑，相对工资和劳动在各部门、各行业、各工种之间的分配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将在16·4节予以考察。但是我们首先论述总量水平上的相互作用，并为以下的问题寻求答案。

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中，^⑬平均名义工资和平均实际工资的关系是什么？劳动的总需求（初始的和修正过的）和总供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两方面的关系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我们不企图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而是提供只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答案。

在实际领域中，这种关系朝一个方向发生作用。生产的增长伴随着就业的增加，直到碰上劳动供给约束。从此以后，充分就业和劳动短缺^⑭一直伴随着生产的扩展。生产的这种增长使得家庭实际消费量，从而实际工资增长。这种因果关系很简单，无需在此作进一步讨论。

^⑬ 在忽略非营利机构，宏观指标仅仅与企业部门相联系的情况下，命题同样有效。

^⑭ 以下我们的论证继续第十一章开始的思路，并且采用在那里引进的概念。

在控制领域中，工资和劳动供求之间的关系就不是这样简单了。在解释我们的命题之前，让我们先看图16-1。这是表示劳动市场的传统的图形，标准的马歇尔供求曲线。假定消费品的价格水平不变。总需求和总供给都以人数计量。需求是“价格”的减函数，而供给是价格的增函数，“价格”在这里就是工资。在宏观水平上，工资和劳动的供求互相依赖，互相决定。^⑤一些宏观经济学的论著认为这一模型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劳动市场的正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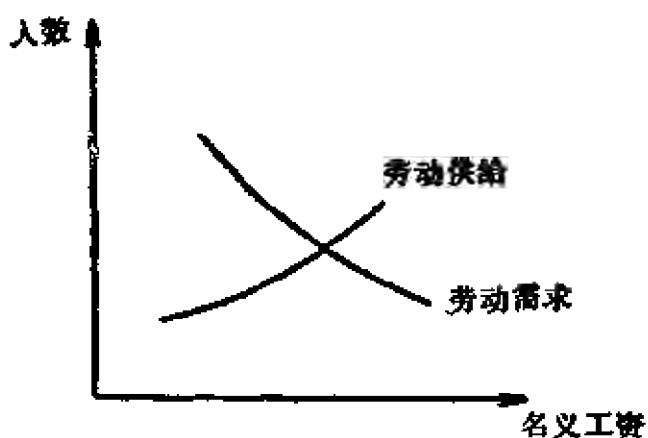


图16-1 劳动市场的传统模型

描述。尽管这一看法似乎令人怀疑，对它进行分析还是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我们愿意联系社会主义经济来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文献中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图16-1的模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劳动市场。^⑥我们试图驳斥这种观点，因为经验已经表明，用马歇尔供求曲线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总量市场的特征是不合适的。

认为工资是“粘性的”或“下向刚性的”著名论点改变了传统模型。即使市场上劳动供给过剩，削减工资的情况也很少见。确实如此，而且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工资计划工作中同样发生作

^⑤ 我们提醒读者，三个未知数由劳动的需求函数、供给函数和均衡条件这三个关系联系在一起。

^⑥ 例如，见巴罗-格罗斯曼(1971)和霍华德(1976)。

用(见程序约束条件公式(16-9))。但是,我们的论点还不限于此。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水平上,劳动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对于工资水平或多或少是缺乏弹性的。这些变量对于平均名义工资和平均实际工资的变化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这一假设可以由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加以检验。一方面,我们有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时间序列资料。虽然它们都是增加的,但增长率不均匀。另一方面,我们有关于就业的时间序列资料,就业是增加的——有时较快,有时较慢——直到劳动储备全部被吸收。在平均就业水平稳定下来以后,就业量继续在平均线附近波动。无论是考察同时关系,还是考察滞后关系,这两个时间序列的变化之间似乎并不存在重大的相关关系。就业的波动并不依赖于工资的波动,而是依赖于其他因素。(这些推测需要仔细加以检验)。

但是,除了在宏观水平检验统计资料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回到微观经济的基础上,回到支配企业和家庭行为的规则上去。让我们首先来看需求方面。在第十四章中已经说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软预算约束),社会主义企业对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反应微弱。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对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决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也许是因为对工资成本的行政约束暂时限制了劳动需求。但是,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最终还是服从于扩张冲动,变为昂贵的劳动根本遏制不住扩张冲动。

现在我们考察供给方面。根据传统理论,这是由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选择所决定。我们简要叙述一下选择理论的背景知识。劳动具有一种“负效用”,而闲暇具有正效用。一个人得到的工资越高,他用工资购买的物品的效用就越能够补偿劳动的“负效用”和他所放弃的闲暇的效用。

首先,让我在方法论上作一评述。以上的推理是否正确描述了对劳动供给的选择,这不是演绎逻辑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问题。依我之见,如果我们想建立描述性模型,我们必须抛弃那

种用单一方案描述劳动供给决策的不同类型的想法。

有一类决策与上述模型相去不远。例如，一个已经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就业的工人，按正常的工作时间拿正常的工资，他也许不得不决定是否要上夜班，或星期天加班。加班肯定不合他的心意，而且会减少他的闲暇时间。但是，如果加班费合适，他的损失也许能够得到补偿。因此，如果是以人时数而不是以雇员的总人数计量劳动的总供给，加班率与正常工作率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就起着重大的作用。

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个人决定在为企业或非营利机构部门的正式工作之外，在“非正式部门”、“第二经济”中的工作量应是多少。例如，他在正式工作以后，应该在自家的农业自留地上付出多少劳动？应该为私人提供多少劳务，比如干多少机械修理工作？等等。显然，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这还取决于“第一经济”支付的名义工资水平和“第二经济”提供的收入可能性。第一章已经指出，对“第二经济”的分析超出了我们的范围，因此我们不讨论劳动市场的这一重要方面。

但是，还存在着其他几种与劳动供给有关的选择情形，它们不是按照上述工作—闲暇方案形成的。如果现在仍然就我们缩小了的论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劳动市场而言，那么可以看到有三种典型的决策情形。

(1) 在潜在的劳动储备被吸收的时期，他们大多数人除了在合作经济部门、国营企业、或非营利机构找一个工作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我们首先考察人数最多的集团。以前的个体农民在所有制改变以后不得不找一个工作，否则的话，他们就没有任何谋生之道。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很大，他们被雇用了。选择的可能性局限于将找一个什么样的实际工作。(这是下一节的论题，下节讨论劳动的分配和相对工资)。简而言之，从个体农民的生活方式向受雇于合作社、国营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工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不依赖于现行的名义工资率和实际工资

率以及两者的增长率状况而发生的。

有相当一批数量人的情况与此类似，比如那些原先的手工业者、零售商贩或他们的雇员，或者以前曾属于靠其财产生活的某一阶层的人们。

(2) 妇女的情况则不同，她们以前只做家务劳动，但后来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找到了工作。与第(1)点描述的情况相反，这些妇女一般具有选择。她们不仅能够决定要在哪儿工作，而且能够就究竟是否要找工作这样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基本的问题作出决定。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在若干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我们要重复第十一章的某些论述，列出其中一些因素。

(a) 最重要的因素是机会本身。当男子找工作都很困难的时候，妇女不会想到去找工作做。妇女更倾向于在劳动需求量很大，特别是当这点变得非常明显的时候去找一个工作做(例如，附近一家新的工厂开工时)。或者信息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传来(例如，她个人被要求接受某一工作等)。在这一领域，需求创造出自己的供给。

(b) 如果妇女在白天照料孩子方面得到某些机构(幼儿园，学校的托儿所等等)的帮助，如果从家里到工作地点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等等，妇女就更倾向于参加工作。在妇女劳动力的供给方面主要的解释变量之一，是减轻工作之外的事务造成实际负担。^⑩

(c) 这里也许要特别强调一个普遍真理，即工作不仅仅具有负效用。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作在许多时候也许是一种负担。但是，除了工资而外，工作还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一个在企业或非营利机构就业的妇女也许发现，新的工作比家务劳动更富刺激

⑩ 一些母亲长期或永远返回家庭的趋势是一异常的抵消因素。这里起作用的因素与(2)所提到的类似。例如，妇女认为，如果她回去工作，她就不能照料她的孩子。

这个决策也受产妇补贴和家庭补贴数额的影响。但这涉及相对工资的问题。

性，更有趣味。她与人们结识，加入某个团体，变得更加自信，更为独立。这一切已是老生常谈，每一个经济学家作为普通人都知道得非常清楚。问题就在于，当他在“工作=负效用，闲暇=效用”这种对应关系的基础上建立阐明劳动供给的学说时，他把它从一般微观经济学理论中遗漏了。妇女就业的这些长期影响也使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准则将会出现。对参加工作犹豫不决的妇女受到这一事实的极大影响，即在她的周围，参加工作现在越来越被看作是正常的。

(d) 对家庭收入的讨论与以上问题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让我们考虑几个彼此熟识的家庭。这些家庭中丈夫的收入大致相等（比如，他们都是熟练工人）。有些家庭的妻子参加工作，其他的没有工作。妻子参加工作的家庭的收入是另外一组家庭收入的一倍半或两倍。随着第一种类型的家庭比例的增加，它们的收入成为其他人对家庭收入的渴望水平。以后，当绝大多数家庭的妻子都参加工作的时候，这就成了正常的家庭收入。没有达到这一收入水平和与此相应的生活水平的人认识到，他们的收入比他们的渴望水平要低，甚至比正常水平还要低，因为他们的妻子没有参加工作。

这里我们确定一下工资的作用。如果妇女参加工作，这会使家庭收入突然增加一倍半或两倍。妇女是否想要收入这样突然增加，取决于刚刚所讨论过的一切因素。但是，如果她在权衡所有因素之后决定要增加收入，那么，对于这一特定的决策来说，现行的名义工资并不起很大作用。上一年工资的增加同样如此，甚至作用更小。因为有理由预期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将来都会稳定下来。

(3) 所有习惯于就业的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包括第(1)点和第(2)点所讨论的那些人），在任何工资率下都在市场上提供劳动。第十一章已经对此作了详细解释，这里就没有必要单独加以论证了。

第(1)点至第(3)点具有共同之点，我们把它总结如下：我们

已经分析了宏观模型的微观经济基础，并证实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宏观水平上的劳动总供给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都不能看作是名义工资或者实际工资的函数。

这个结论是一较长系列推论的最后一环，有必要把这一推论概括一下。

劳动的总需求，劳动的总供给和总就业量（都以人数计量）是彼此互相调节并适应于其他非价格信号和刺激以进行调节的“数量”过程。^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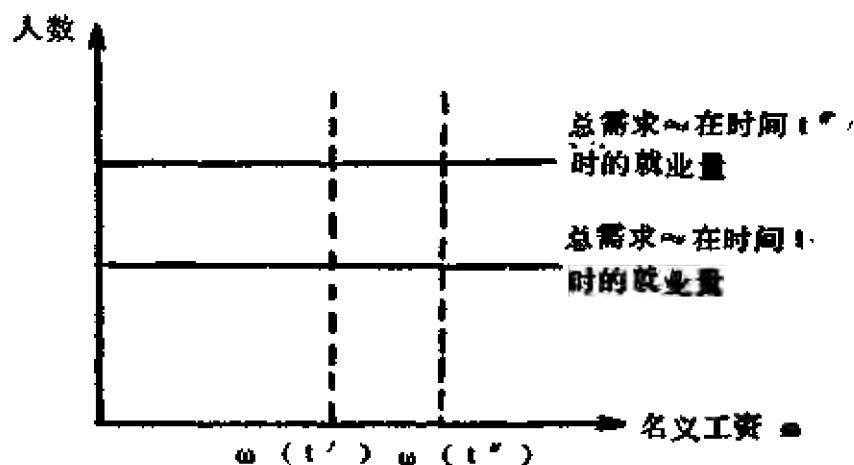


图 16-2 社会主义经济粗放增长时期的劳动总需求和名义工资

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针对传统模式的图16-1提出另外两个图式，我们认为这两个图式更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总量劳动市场的运行状况。图16-2适用于经济从时间 t_0 开始到 t_2 结束。

⑩ 上述关于就业量（以人数计量）和短期、长期调节过程的陈述，与以下关于工作时间（以小时计量）和瞬时调节过程的陈述是一致的。

劳动时数的瞬时供给总量（包括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加班时间以及在“第二经济”中的劳动时间）取决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对正常工作时间内的劳动所支付的名义工资与加班收入以及在“第二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之间的关系。这些是附属的，第二位的解释变量，而劳动时数的宏观供给主要还是由说明宏观劳动供给（以工人人数计量）的“数量”信号和刺激所决定。

这个问题在我们一开始讨论“工作-闲暇”难题的时候就指出过了。

的粗放增长的过渡时期（见11·7）。对潜在劳动储备的吸收发生在这个时期。水平线表示在 $t_0 < t' < t'' < t_2$ 各期间的短期总量需求函数。需求函数随时间变化向上移动，但在任何时候总是水平的，它不依赖于名义工资，需求约束是有效的，并且决定着就业量，与此同时，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两者都随时间增加。

图16-3用来说明经济的集约增长时期： $t_0 < t'' < t'''$ ，潜在的劳动储备已经被吸收，从那时以后，多少是稳定的供给约束（由一条水平线表示）是有效的，并决定着总就业量（以人数计量），可以用若干指标来度量劳动的需求，短期初始需求或者经过强制替代修正后的需求是可观察的，这两种需求都大于供给，尽管劳动供给和就业的平均水平相当稳定，^⑩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却随着时间而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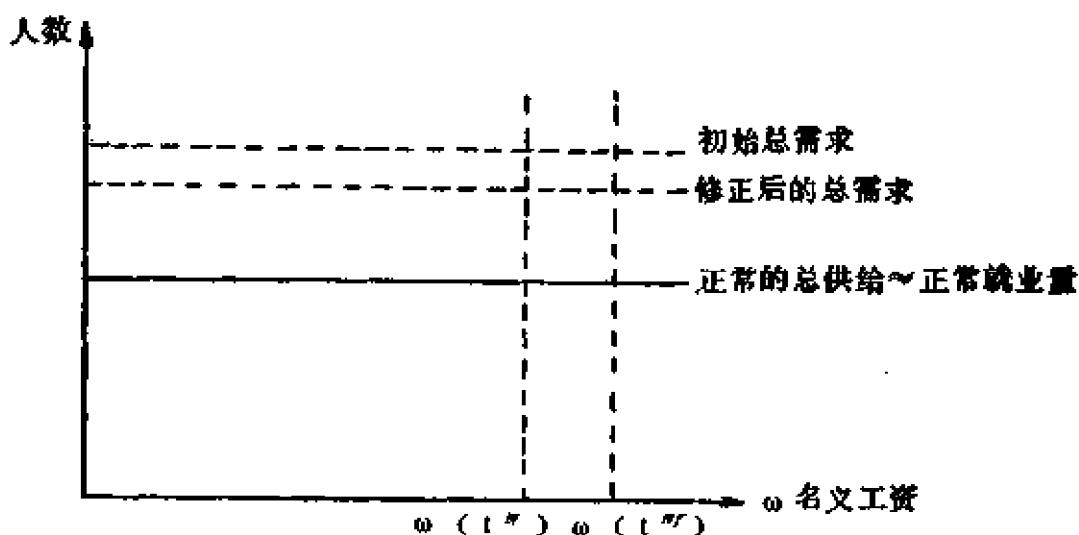


图16-3 社会主义经济集约增长时期的劳动总供求和名义工资

到此为止，对马歇尔供求曲线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适用性，我们仅仅就第一种因果关系提出了异议，这种因果关系是名

^⑩ 为简单起见，上图假定劳动年龄人口不随时间发生变化，同样的思想在劳动资源增加的情况下就得用相对变量或比例数加以说明。这不会使问题有太大的改变。

义工资决定劳动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我们对传统理论在因果关系的另一个方向（即劳动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决定名义工资）的适用性的批判将放在本章的结尾部分。

16·4 相对工资对劳动分配的影响

上面一节考察了国民经济范围内的平均名义工资和平均实际工资对劳动总供求的影响，现在我们讨论相对工资。

（1）相对工资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提醒读者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分析企业行为时已经说过的那些来概述这一影响，那里表明，社会主义企业的预算约束很软，主要由于这个原因，但也由于其他（不依赖于价格的）选择标准，虽然企业对投入的相对价格并不是漠不关心，但是企业对投入相对价格的反应并不是特别敏感。这个命题同样适用于相对工资。

在瞬时调节和短期调节过程中，生产管理者准备一旦有必要就实行强制替代，他们用较贵的劳动力暂时代替较便宜的劳动力。在长期调节过程中，特别是在进行工艺选择的时候，他们几乎不考虑相对工资，其他因素，例如工艺上的倾向性或短缺的直接信号对选择的影响更大。⁴

图16-3中，宏观层次上的劳动需求函数用水平线表示，说明需求缺乏弹性，这点同样适用于微观层次，如果不是完全适用，也是大致适用。只要企业的劳动需求不违反工资纪律，它对于相对工资就几乎没有反应。

（2）相对工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这里影响是强有力的，^②与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相反，家庭预算约束很硬。当然，家庭还得得到一些免费的好处，它们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下一章将对它们进行考察），但是，家庭消费的大部分产品和服务必须用货币购买，

^② 例如见法卢什-西克拉（1978）。

国家对于家庭并不是完全放手不管，在遇到某种困难的场合（例如生病或者遭受自然灾害时），国家就提供帮助，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家庭的物质福利主要取决于其货币收入。

家庭的硬预算约束说明了为什么家庭不得不对相对工资作出反应。相对工资在个人进行长期职业选择方面影响极大。当然，其他因素对决策也发生影响，比如个人的爱好，在学校崭露头角的才能，各种职业的社会声望、“时尚”、模仿，等等。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特别是受到个人能否进入专业培训的教育机构的限制。但是，除了这一切困难之外，最近一个时期直到现在，相对工资表现了显著的吸引力或排斥力。多数人的期望倾向于以最近一个时期以及目前的经验为基础。一些职业受人欢迎或不受人欢迎与其相对工资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用经验予以证实。

短期决策是选择实际工作。劳动长期严重短缺使工人能够在可得到的工作之间进行挑选，而不以最先碰到的就业机会为满足。因此，劳动短缺加强了相对工资对选择实际工作的影响。工资即使是微少的增加常常也会引起一种变化。

对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进行比较分析将表明，它们与14·7节所描述的需求和供给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那里对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看到一种不对称的现象：作为买者的企业比作为卖者的企业对相对价格的反应性要弱。在卖方市场上，对价格有反应的主要是卖者。在劳动市场上，可以看到类似的不对称现象。企业作为“买者”对相对工资的反应性不强，而工人作为“卖者”对相对工资的反应极其敏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的劳动市场也是卖方市场。

(3) 劳动的分配。^② 劳动在各产业、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

^② 劳动分配和劳动市场的运行（包括第十一章和第十六章所描述的许多现象）可以象7·1至7·4节以及数学附录A那样建立形式化的模型，这里没有篇幅来证明这点。

文献中有若干与此有关的模型。例如所谓的“搜寻”模型就被用来分析工人寻找工作的行为。见4·3节中的参考书目。

各种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少数几个领域之一，在这些领域之内，“价格类型的信号”和有关刺激的影响比较强烈（至少从供给方面看是如此）。但是，除相对工资外，对劳动分配影响很大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我们将在下面列出其他的一些过程。

(a) 即使存在着卖方市场，劳动归根到底也只能被分配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已经创造出来的工作上。本书前此所有论述就是试图详尽阐明，各部门的实际结构——它们的固定资本、投入-产出组合，瞬时产出计划——都是在调节过程的框架以内形成的，价格和工资在其中的作用很小。

(b) 已试图调整教育计划以适应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对劳动的预期需求。教育系统的容纳能力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寻求进入特定职业的人数。

(c) 个人决策在供给方面受到非工资信号和刺激的强烈影响。我们已提到，长期决策受职业的社会声望以及其他“非物质”因素的影响；短期决策受工作地点，劳动条件，上级的个性等等“气候”的影响。

(d) 工作地点的选择和居住条件之间的关系密切。虽然这一点与上一点相联系，但由于它极其重要，我们把它单独提出。如果一个企业支付的货币工资较低，但比另一个支付较高工资的企业更有希望帮助个人解决他的住房问题（例如给他一套房子，或者提供长期贷款帮助他盖自己的房子，等等）。那么这个人也许宁可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一旦他接受了一个工作，居住情况也许又成为他决定是否调换工作的影响因素。如果他在另一个村庄或城镇不能得到一所房子，那么无论工资多么具有吸引力，要他迁居到那里去是很困难的。如果迁居，他就会失去他的房子，或者就得立即偿付长期贷款。公寓的长期短缺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了相对工资在劳动分配中的作用。

(e) 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只有程度上的区别，但

行政分配在任何地方几乎总有某种程度的作用，至少有一些行政控制手段在干预市场分配。分配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按职业分类给企业规定强制性的就业限额，要求在调换工作时必须到劳动介绍所登记，在一些部门实行劳动统配，迫使个人从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对调换工作给予行政上的限制，等等。

上述各因素以及这里没有提及的其他因素对劳动分配产生的综合影响似乎和相对工资产生的影响一样强烈。这个命题的正确性需要经验加以证实。

读者也许要问，在16·3节和16·4节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上一节否认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影响，而这一节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相对工资对劳动供求和就业的影响。我们认为这里没有矛盾。这些命题是一致的，这不仅是因为 16·3 节讨论的是总量，16·4节讨论的是分量；而且因为前者是在宏观层次上分析劳动就业的需求的供给，而后者则研究在微观层次上劳动的具体的分配，主要的区别是这两节讨论不同的决策问题。

我们只从供给方面说明这一点。个人的劳动供给决策不是一个单一的同时作出的巨大的决策体系，而是可以被分成为若干不同选择问题的决策。第一步决策的是究竟是否要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部门就业。一些人在这方面没有真正的选择，而另一些人却有。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第二步就是选择什么职业。然后，第三步是实际从事什么工种。^② 16·3节只讨论第一步决策，说明这个决策对工资没有反应。16·4节讨论第二步和第三步决策，证明它们对工资水平有反应。

② 当然，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可能有这样的时刻，即两个或者全部三个决策问题同时出现。例如，一个受完中等教育的已婚女青年可以决定是待在家里还是参加工作。如果她的决定是后者，她就必须同时决定她的实际职业，也许还要决定实际工种。

16·5 工资紧张和工资漂浮

下一步我们转向“反馈”，或者说转入从相反方向发生作用的因素联系。劳动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劳动市场的状况是如何影响工资的？

很显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任何国家的工人对他们的劳动总是愿意得到数额尽可能多的收入。就这点而论，每个人对自己的工资总是感到“不满”。除此而外，还有两种独特的不满。一种与实际工资的动态有关。如果消费物价水平上升，特别是当通货膨胀加速的时候，增加名义工资的要求就更加突出。这种现象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没有必要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如果某一集团（例如一个企业内或者全国同一职业的所有工人，或者整个部门的所有工人）认为他们的工资低得不成比例，就会出现另一种特殊的不满。这个集团通常把它的不满建立在与一个或更多的参照集团相比较的基础之上，“成比例”或者“不成比例”对于它来说就是很明显的了。比如说，如果一个中学教师把自己的薪金与一个工程师相比较，他推想道，他同样必须上这么多年大学，他的工作要求同样大的责任，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于是他问为什么他的工资却低得多。在匈牙利的计划经济中，这种场合下就使用工资紧张这一术语。如果某一集团对自己相对工资级别的位置不满，就出现工资紧张这一现象。

从经济观点或道德标准确定这种相对不满什么时候是正当的，什么时候是不正当的，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仅仅说明，相对工资紧张确实存在，而且继续保持。其强度在就业人员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象本书所讨论的其他许多现象一样，工资紧张的强度不能直接度量。但是可以通过观察和度量其后果予以间接描述。

工资紧张的最重要的后果是迁移现象，这种迁移现象表明在

长期内一种职业，短期内一个工作场所越来越不受欢迎。不仅如此，工资紧张还使怨言和异议频繁发生。这样，按照赫希曼分类法，“退出”和“意见”这两种反馈同时出现。^②

工资紧张通过迁移及其排斥劳动的效应加剧了劳动短缺的严重程度。这又反作用于工资紧张本身。那些留下来的人常常处境更加困难，因为他们不得不承担一些迁移者的工作。而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坚忍和忠诚，使他们愈发觉得工资不成比例和不公平。

让我们回忆16·2节中描述的工资计划程序里决定相对工资的第7步亦即最后一步。那里所谈到的下限保证了任何一个职业的名义工资不致遭到削减。上限是由这个事实确立的：只有工资总额中的非指定部分可以被用于修改相对工资。在上下限之间决定相对工资的主要行为规则首先是，它们必须减缓工资紧张。这一规律主要在中央工资计划工作中发生作用，但是类似的影响也可以在中级和低级管理层次上看到。任何一个拥有非指定的工资基金分配额的组织都把它首先用于减小工资紧张。

上述现象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论述投资的第十章中所说的延期现象，以及后来所说的延期行动的实现。象在投资的场合一样，早就该实行的局部工资增长被延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工资紧张都在积累着。正如投资资源的很大一部分早已被在建和承诺的新投资预先占用，非指定部分相对较小一样，在这里，工资基金总额中的相当一部分也被工资的自动增长和早先的许诺预先占用。留下的部分太小，不能全部消除积蓄起来的工资紧张，某些调整将被延期。留下的部分太小，不仅不能消除过去遗留下来

^② 在短缺经济中，作为消费品买者的个人，负担不起“退出”或“意见”这样的“奢侈品”。如果他一气之下离开了这家服务恶劣的商店，或者与售货员争吵，他会使自己受损失。因为其他地方服务也许更糟，供应更少。但这同一个人在他的工作场所作为“劳动力的卖者”，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使用“退出”或“意见”的武器，风险较小。他敢于和他的上级争吵，正是因为他知道他随时可以“退出”，并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个工作。

的不成比例的现象，而且不能防止预计将来会出现的不成比例。

调整工资经常采用“跳跃式”。第一个集团的工资落后于第二个集团，前者就把后者作为参照集团。落后的情况或迟或早要通过第一个集团向第二个集团跳跃而得到修正，甚至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工资紧张：现在，第二个集团将会认为它的工资与第一个集团不成比例，如此等等。

并不是受到直接影响的工人自己，或者通过工会，与管理人员进行斗争，以调整工资。管理人员在一切层次上也在为改变相对工资而斗争。车间主任希望消除车间一级的不满情绪，企业经理希望消除企业一级的不满，部长或副部长要消除整个部的不满。他们全部直接感受到工资紧张。正是他们受到种种抱怨，同时劳动迁移给他们在履行职责时造成了许多困难。

在纯粹的古典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所有者和工会领导人为工资而斗争，他们的作用有着明确的区别。后者作为工人代表竭力提高名义工资，而前者则抵抗这种努力。从工头到总经理都把自己看作是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代表，他们强烈抵抗增加工资的努力。^②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国家机关的低级和中级领导在与上级进行工资谈判的时候，是作为工会领导而不是作为雇主行事的。上下级之间可能会因许多问题发生冲突。但是，就每一个管理人员都试图为本车间，本部门等等从上级那里索求更高的工资这一点来说，他们都是一致的。

^②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情况决不是这样分明。一方面，雇主对提高名义工资的抵抗不很强烈，因为他认为可以通过抬高价格把较高的成本转移到买者身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货膨胀预期的结果，同时也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这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看见预算约束软化的信号有关。另一方面，根据实际政治局势，工会也可能约束自己提高名义工资的努力，因为它们相信这种行动对通货膨胀有影响，并会有损于实际工资。详尽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回忆“纯粹”资本主义的时期只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管理者的作用更清楚一些。

对这一现象有几种解释。通常是指出这个事实，即社会主义制度早期有许多管理人员先前曾是工会领导，或者说，至少他们参与劳工运动的活动已经形成了“为工人要求更高工资”的倾向。这种说法确实有某种真理的成份，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具有劳工运动经历的领导者。

另外一些人在管理人员的个人品质低劣方面寻找原因，认为原因在于他们软弱无能，哗众取宠。这里也有某些真理的成份。但是还应当看到，管理人员认为享有众望有助于他完成任务，这是很正当的想法。假使他的下属喜欢他，他也许更容易促使他们遵守纪律，更为勤奋和承担困难的任务。他的名望确实首先依赖于他代表其下属的直接利益（特别是在工资方面的利益）到什么程度。我们使用“利益的代表”这个词决不是因为修辞的缘故。这个词表明了这种情况的基本特征。工人当然期望他们的上级代表他们的利益，履行这一职能或好或坏是工人判断他的重要标准。

管理者的行为不是由他的品质好坏决定，而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管理者认为他主要负责解决系统内部由他负责的那一部分的问题。他认为自己不是对整个经济负责，而是对其中一个明确指定的部分负责，并把自己与这一部分结为一体。如果他所在部门的工资紧张得到缓和，那么这些局部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因此，所有因素都鼓励他采取这一政策。与此同时——考虑到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利益——没有任何因素阻止他这样做。提高名义工资率在成本方面造成的后果可以转移出去。

当然，低级和中级管理者很清楚地知道，在不论什么地方总是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赞同在其他地方实行工资约束。但是，他自己内心却相信，在他的部门中提高工资是正当的。他越是把自己与本部门结为一体，这种信念就越加强烈。

低级和中级管理者也许受两个因素制约不能提出高工资的要求。一是他们的经济眼光的健全性，认识到国家工资基金（和在它背后的消费品供应）是有限的。受责任感支配的自我约束得到

策略考虑的补充或支持。过份的要求引起阻力增大，他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斥责。谨慎的要求即使暂时还不能得到满足，也不会招致厌恶。

另外一个约束力量是害怕跳跃。任何一次提高工资都是针对和改善某一集团或职业的相对地位。跳跃太大将产生新的紧张。

即使存在着鼓励自我约束的因素，自下而上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或工资漂浮仍然是基本的趋向。正如第十一章予以详细讨论的，在劳动长期短缺的情况下，对于有关的工人、工会以及低、中级管理人员来说，要求提高工资是很自然的行为。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我们的推论过程与前面的论述相类似。确实，在第九章曾就投资问题对有关现象进行了讨论。那里我们注意到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每一个低中级管理者都认为他自己部门的投资是完全正当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对提高名义工资的几乎不可满足的要求。每一个低中级管理者都认为调整他自己部门的工资是完全正当的。

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观察到的现象是对总需求的两个主要分量——投资和消费的几乎不可满足的饥渴。就消费而言，这种饥渴不仅通过雇员，而且通过雇主即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低中级管理者表现出来。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两种饥渴显然是矛盾的。一个国家投资越多，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留给家庭消费的就越少，反之亦然。体制内资源的物质限制使得这两种总需求不能同时满足。但是，在资源的这两种主要用途之间的冲突，仅仅被最高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内在地体验到。在制定中央计划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时，不能回避这一问题：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分配给投资的越多，留给消费的就越少。但是，经济体制中最高一级以下的其他每一个人，即作出局部决策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只要另一个部门减少投资和压低工资，他的部门就既能得到更多的投资，又能得到更高的工资。因此，投资和消费这个两难问题对于他是外在的。他知道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要进行选择，

但是他本人用不着作那个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最高经济决策者受他们的实际地位和社会角色的驱使起来抵制工资漂浮。正象仅仅是他们被迫起来抵抗投资饥渴一样。其他人只有在受指示和禁令所迫，或者在经济刺激和精神鼓励的条件下才愿意抵制。

无论经济理论还是经济政策都可以从以上所说得出许多重要的结论。分析这些结论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论题，因此我们将集中论述一种观点，即：工资漂浮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导致通货膨胀的内在的因素。由于低中级管理者不是抵制工资漂浮而是支持它（只要他们不受工资纪律约束），这一趋向特别强大有力。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预算约束越软，情况就越是这样。工资漂浮倾向不是导致通货膨胀唯一的内在因素（前面各章已论述了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物价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央工资政策已经制定出来以后，对工资漂浮的抵抗是否足够强有力，如果是的，中央有关部门是否能够实施工资政策，并且保证下面遵守工资纪律。

维持工资纪律的指示以及有关的经济刺激和精神鼓励制度可以说使低中级管理者面临的选择问题内在化了。确实，这种内在化的原因是行政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它是作为从上而来的指示、禁令、奖金等等措施的结果而出现的。^②然而一旦它出现，低中级管理者就不得不面对同样性质的问题，他是加入自下而来推动工资向上的力量，还是加入自上而来试图把名义工资的增长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力量呢？通常，他以两种不同方式行事（这与他在投资情况下的行为又很类似）：对于下属，他总是约束，

② 我们曾在第九章提到，改革以后的匈牙利经济管理体制试图通过联系利润的刺激部分地使这种难题“内在化”。企业至少是在由各种法规决定的结构之内支配留用的那部分利润。它可以决定是把这部分利润用于企业发展，还是用于提高个人收入。因此，这里出现了“投资和消费”的难题，虽然是以较小的规模出现的。

对于上级，他总是提出要求。对于下属，他试图遵守工资纪律，与此同时，则试图从上级那里为他的部门争取更多的工资。微观组织（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与其上级之间关于按照绝对工资基金量来计算的平均工资、与工资有关的政府税收和福利以及其它方面的“讨价还价”如何进行，取决于经济管理体制和工资控制的具体形式。结果总是相同的，管理者愿意在他的企业或非营利机构支付较高的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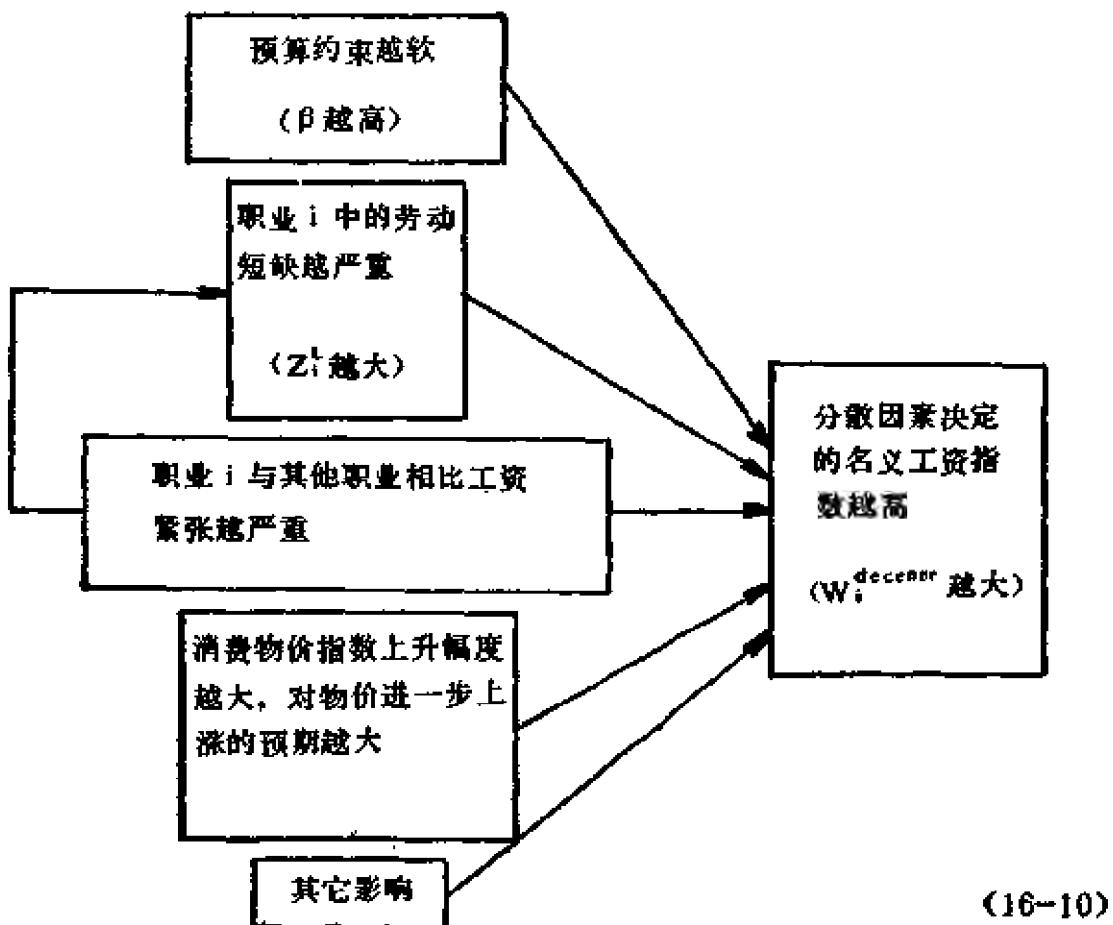
由于工资漂浮和对这种漂浮的抵制，一般就形成了以下的局面。

出现了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经常和大量发生的）：在国民经济的工资计划正式通过以后，各种工资指标仍然被突破了。但对于下属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工资计划和中央工资政策制定完毕之前就施加压力，试图说服他的上级通过提高名义工资减缓工资紧张。这些现象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是不同的。

16·6 工资漂浮的推动力量和抵制力量之间的妥协

让我们以某种方式总结一下对工资漂浮倾向的论述，使它与上一章所讨论的价格漂浮之间形成突出的对比。我们假定，实际实现的名义工资指数是两种假定量（分散因素决定的名义工资指数和集中因素决定的指数）的加权平均数。用 $W_{i, \text{decentr}}(t)$ 表示在职业 i 和 t 年分散因素决定的名义工资指数。它建立在这个假定之上：名义工资已经纯然由工人和具体企业及非营利机构管理者之间的协议所决定。这些管理者受政府税收和信贷政策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工资上的行为不受行政命令的限制。分散因素概括如下：

公式 (16-10) 用语言形式描述了一种工资漂浮函数。但是，由于我们只知道因果关系的方向，对关系的数量性质了解不够，



因此我们不能用公式精确地表示这个函数。

第一个解释变量是软预算约束。如果约束很硬，就会出现强有力地抵抗工资增加的分散力量。预算约束越软，因增加名义工资造成的通货膨胀影响就越能以提高物价的形式转嫁给国家或买者，抵制工资上升的分散力量就会越弱。^②

下面两个解释变量(劳动短缺和工资紧张)的影响应该是很明显的。由于工资紧张也可以加剧劳动短缺，这两个解释变量也互相联系着。(由公式左边的箭头表示)。投入(包括劳动)的短缺由于本书许多地方论述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断得到维持。企业和

^② 我们的命题似乎也可以扩展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我在此只提出这个想法，考察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的形成，将会超出本书的范围。

非营利机构的管理者认为，他们本单位的劳动短缺可以通过提高工资得以缓和，因为这会把人们吸引过来。（也许是的，不过这会把职工从其它地方调离，从而劳动短缺仅仅是改换了地点而已）。因此，联系劳动短缺、工资紧张和工资漂浮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发生作用。

第四个解释变量表示一种大家所熟知的相互关系。消费物价水平的上涨增强了提高名义工资的努力。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引起工资—物价螺旋的那种关系。由于消费品变得更加昂贵，工人们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如果名义工资比生产率增长得更快，单位生产成本就会上升，而这或迟或早会导致物价上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螺旋可以被国家的干预所打破。企业之间价格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消费物价水平的上升。我们在第十九章讨论消费物价的时候再回头论述这一问题。这里我们只强调指出，消费物价的上升加强了分散力量提高名义工资的企图。

列入图表中的解释变量并不完全。标有“其他影响”的方框表明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因变量” $W_i^{decent}(t)$ 是一假定量，因此不能直接予以度量，它表示一种不能充分展开的倾向。但是我们可以对其大小得出间接的结论。在不同层次的工资谈判中，是由下面提出工资要求，工资漂浮倾向甚至可以以数字的形式反映在这个变量中。

现在让我们转向集中因素的影响。我们用 $W_i^{cent}(t)$ 表示短期计划中在时间t内职业i中名义工资的增加。^②它表示中央工资政策的渴望水平。16·2节用七个步骤的决策程序已详尽描述了它的发展过程。

留下的问题是，在计划制定完毕之后，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对自下而来的分散的工资漂浮倾向的抵制或者让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可以通过比较 W_i^{cent} 和 W_i^{decent} 的值估计这种事前抵制

^② 如果国民经济计划没有给职业i单独列出具体指标，与计划中表示的一般工资政策相应的 W_i^{cent} 仍然可以确定下来。

或者事前让步的大小。

我们假定，中央工资政策规定的名义工资增长幅度要比仅仅在分散力量作用下会发生的幅度低得多。实际出现的名义工资指数可以被描述如下：②

$$W_i(t) = \rho_i^{(w)}(t) \cdot W_i^{\text{central}}(t) + (1 - \rho_i^{(w)}(t))W_i^{\text{decentral}}(t).$$

实际出现 的名义工 资指 数	抵制 参数	集中力 量决 定 的指 数	分散力 量决 定 的指 数	(16-11)
-------------------------	----------	---------------------------	---------------------------	---------

不带上标的 W_i 是一可直接观察的事后量值，而带有“central”和“decentral”的 W_i 却是事前量值。参数 $\rho_i^{(w)}(t)$ 表示执行工资计划过程中管理部门对工资漂浮的抵制。如 $\rho_i^{(w)}(t) = 1$ ，表明计划是100%执行的。如 $\rho_i^{(w)}(t) = 0$ ，表明分散力量不受阻碍地发生作用。现实中这两种极端情况都不会发生。每种职业中政府抵制的参数值和抵制程度不一定完全一致。有些部门和职业的压力很容易抵制，而在另一些部门和职业中抵制就比较困难。

抵制参数 $\rho_i^{(w)}(t)$ 的值是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参数值非常接近1。这里我们通过公式(16-11)以符号的形式表述了16·1节中用词语表达的内容。中央经济领导人能够行之有效地贯彻其工资政策。

很值得回头讨论一下16·3节结尾提出但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我们对借助于马歇尔供求曲线描述劳动供求和工资之间关系的劳动市场的简化模型提出了异议。在16·3节，我们讨论了工资决定劳动供求这个方面的因果系列。现在我们准备讨论另一个方向的关系，即劳动供求决定工资。我们认为，劳动的供和求之间的关系作为解释变量对工资确实有着重要影响。实际因果机制要复杂的多。一方面，正象我们在16·2节的程序所表明的，制定中央工资政策是一个由多步骤所组成，包含着若干种相互关系的复杂的决策

② 公式(16-11)与描述抵制价格变动的公式(15-1)相似。

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在公式(16-10)中说明，分散的工资漂浮倾向既是由经济体制中的个人和企业及非营利机构的管理者的行
为规则产生的，也是由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名义工资的
实际水平，正如公式(16-11)用符号所表示的，是这两类主要力量之
间妥协的结果。

最后，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出有关短缺的另一个有普遍意义的
结论(短缺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工资政策在具体水平上影响短缺
现象。某一部门的工资紧张的减少可以阻止劳动流出该部门，甚
至可以把劳动吸引到该部门。也可以设想一种相对工资体制，使
短缺现象更加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的部门、职业、企业和地区之间。
这样一种政策将减少在职失业，即减少不可动用的内部劳动
滞存，这一切都极端重要。然而，一旦持续不断维持劳动短缺的
社会条件形成，没有任何一种工资政策能够消除长期劳动短缺现
象。

第十七章 物品和服务在家庭之间的分配

17·1 引言

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与家庭部门之间是一种双向联系。家庭先向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出卖”劳动力，并因此得到工资。这是论述就业的第十一章和论述工资的第十六章所讨论的主题。第二步是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生产供家庭消费的物品和服务。家庭或者按零售价格支付这些消费品和服务，或者免费享受。这第二步联系就是本章和第十八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两章之间的划分情况是这样的，本章讨论物品和服务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流向家庭的分配机制。下一章描述流向的终点，讨论家庭的行为以及支配家庭消费和储蓄的规律。

第十七章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论虽然意在说明产品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向家庭部门的流动，但是其中有些思想也适用于说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之间产品的流动^①。然而我们只能在此对这种潜在的应用意义提起注意，因为没有篇幅来进行详细说明。

必须首先对所使用的术语作两点说明。为简便起见，“物品”(goods)这个词在本章中经常用以指家庭使用的消费品和服务两者。“家庭”和“消费者”这两个词是互相替代的。

^① 论述企业行为的第四章至第八章以及第十四章应以第十七章作为补充。

17·2 免费分配，名义价格和有效价格

我们从价格开始讨论。假定消费品价格是既定的。其中包含这种可能性，即价格向量中的某些分量为零，从而消费者是免费享有某些物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家庭的行为如何影响消费物价的问题，要到第十九章才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只讨论反向关系，即价格一旦给定以后是如何作用于家庭的。

如16·4节所证实的，家庭预算约束是硬的，消费者对价格的反应确实很强烈。但是这种反应性具有“感觉阈限”，应当首先对它加以分析。

需求价格在一般微观经济学中是经常出现的概念。需求价格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某一消费者愿意为某种产品支付的价格。这个限制条件非常重要。需求价格是局部均衡范畴。所有其他的价格、收入以及家庭预算约束都是既定的。需求价格按其纯粹含义是指，家庭在所有其他项目上的开支都是与其一致的。

观察需求价格极其困难，因为不能确定——正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消费者任何一次实际购买都支付应有的需求价格。也许实际价格比他准备支付的要低。但是，如果我们放弃对消费者行为作直接观察，仅仅考虑消费者说些什么，又可能易于出现他们对采访者的答复不甚准确的情况。一个消费者可能表示愿意就某一产品付多少钱，但到时候，他也许不能够从用于其他物品的开支中动用这笔钱。但是，我们假定观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从抽样调查中获得了令人满意的一般结论^②。我们知道某种产品或者某类产品的潜在消费者的需求价格的分布。

② 使用适当的测验问题可以增加采访调查的可靠性。我们知道有许多旨在发现消费者需求价格的有趣的研究。例如，瑞典曾对于不同类型和不同位置的公寓就家庭的“需求房租”（出价房租）进行了调查。（见古斯塔夫森—哈斯曼—斯尼卡斯（1976）。

这个可以在图17-1中表示出来，该图完全是为了说明问题，并无实际调查资料作为基础。为使说明简单起见，假定我们是讨论幼儿园的名额。我们用纵轴表示某一日期幼儿园可接纳的幼儿数目（我们把服务质量看作是既定的）。横轴是需求价格，用 p_d 表示。图中曲线表示需求是需求价格的函数^③。也就是说， $d(p_d)$ 表示所有愿意支付至少是需求价格 p_d 的一切可能买主的需求总量^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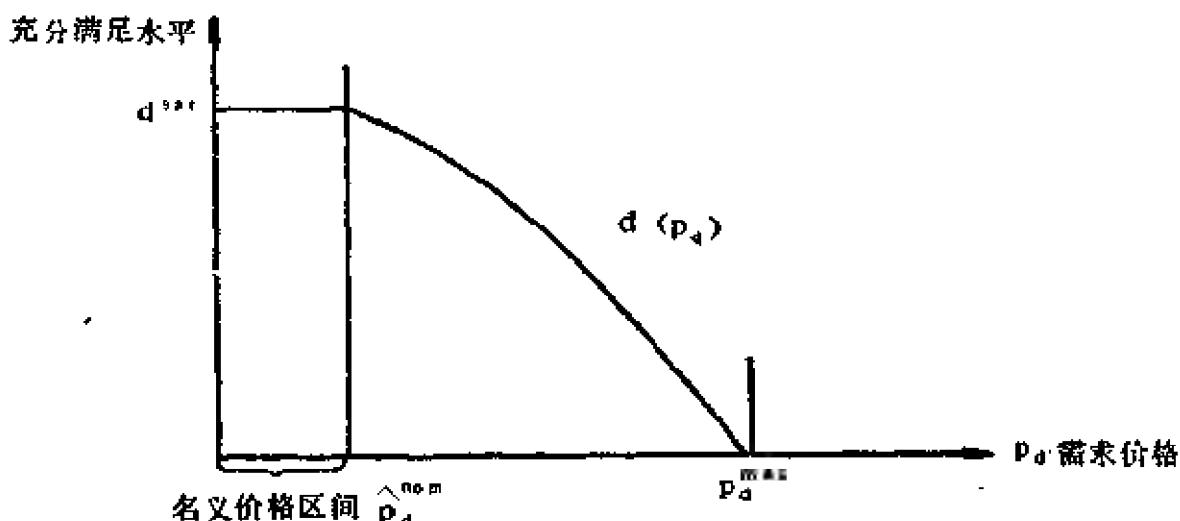


图 17-1 需求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

$p_d = 0$ 相当于充分满足水平 d^{***} 。我们假定需求是有限的。这在目前的例子中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符合入托年龄的幼儿人数也是有限的。但是，可以假定充分满足水平是在全体适龄幼儿这个最大值以下。许多父母即使是在免费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

在需求价格区间 $[0, \hat{p}_d^{nom}]$ 内，函数 $d(p_d)$ 是位于充分满足

③ 我们按照需求论的惯例画出连续的凸形曲线。从所要论正问题的角度看，这并不是本质性的。假使曲线的形状不同，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命题。

④ 标准需求函数（其参数是根据对消费者实际购买的观察估计而来）只能被看作近似于图17-1中的理论曲线，如果一定的条件得到满足的话。而且即使是这样一种近似描述，也只是在实际价格附近才是有效的。

水平上的一条水平线。这些仍然是名义价格*。把孩子送到免费幼儿园去的人在幼儿园每月收费 5 福林或者 10 福林时仍然会把孩子送去。在名义价格区间，价格是无效的；需求完全缺乏价格弹性。只要不达到临界值 $\hat{p}_d^{n.m}$ ，提高价格不会使需求降至充分满足水平以下。（即使名义价格也会减少用于其他花费的收入，但这是另外一回事）。

临界值 $\hat{p}_d^{n.m}$ 是“感觉阈限”。超过这一点，价格在需求方面就是有效的⑤。价格越高，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不能使用幼儿园的服务，一直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愿意支付高于需求价格 p_d^{\max} 的价格。高于这一价格，需求又成为完全缺乏价格弹性的。因此，有效价格区间是 $[\hat{p}_d^{n.m}, p_d^{\max}]$ 。我们暂且把有效区间内是否存在一个“均衡价格”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只说明，低于或者高于这一区间，价格是无效的。

按照家庭免费或以名义价格得到的物品和它支付有效价格得到的物品对家庭消费进行的分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免费或几乎是免费的消费的比重比较大。

17·3 充分满足水平

假使实际供给达到（或者为了保险起见，略为超出）充分满足水平，产品的分配不会引起问题。让我们稍为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假如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说，任何个别需要在短期内都可能被充分满足，其原因如下：

* “名义价格”在本章中用来指对消费者行为影响小到无法觉察的价格，而不是指以货币计算的价格。——英文版编者注

⑤ 本章不讨论价格对供给方面的影响。这在第十四章已经予以讨论。

(1) 有些需要在物理或生物方面或者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有限的，例如：营养和取暖。

(2) 消费需要时间，而个人所有的时间是有限的。例如，即使所有的娱乐活动都是免费的，娱乐所需要的时间也会限制需求。

(3) 消费可能附带有一些负担，避免它们的愿望会抑制需求。例如，即使城市公共汽车交通是免费的，没有人愿意只是为了好玩而乘车闲逛。

(4) 有些物品和服务只能和互补投入一起消费。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可能由于互补投入的取得受约束而受到限制。让我们记住我们是讨论对单个物品的充分满足问题。例如，即使公寓是免费的，或者房租与房间数目完全无关，家庭也不愿意要求太大的房子。他们受到限制，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家俱，打扫卫生的工作量也太大。

各种不同的原因可能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是四个限制中最小的那个决定充分满足水平。

虽然每一种需要都有各自的充分满足水平，然而需要的总体却是不可满足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和文化的变化，需要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有些需要消失了，而新的需要却在不断涌现。互补投入的扩展也可能提高充分满足水平。如果人们能够购买更多的家俱和家用设备，充分满足水平所要求的住房面积就会提高。

社会主义运动传统上把“按需分配”作为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社会分配原则的特征。这就造成一种完全取消货币的分配制度。实际上，社会主义经济公开地或暗中地把这一思想搁置一边，并辩解说我们考虑这个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事实上，最好是客观地分析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忽略不论，——忽略的原因不论是出于虔诚，还是出于混淆是非的动机。

事实上，社会也许能够满足一些人的全部物质需要，但是，这样做它就会剥夺其他人，并使他们只能有相对低的消费水平。

或者说，社会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某些需要，但是，这样做就使他们的其他需要只能停留在比充分满足低得多的水平上。然而，一个使一切公民的一切需要都达到充分满足水平的社会，不仅在今天不可能，将来也是不可能的。无论物质财富如何大量增加，技术和发展总是要使物质需要增加。

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面临着若干彼此相关的决策问题^⑥。首先，有必要使特定的需要达到充分满足水平吗？事实上，仅仅从物质资源和物质上的可行性来看，任何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能够使一些重要的个人需要达到充分满足水平。高度发达国家能够满足的需要面更宽。我们假定在这么一个国家内，决定给每一个家庭免费安装一部电话，并且在此地域内通话也免费。在两三年内建成一个能够充分满足需要的电话系统并不是不可能的。即使免费，大多数人肯定也不会不分白天黑夜地使用电话。

但是，即使从物质方面看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建立这样的电话系统还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并使它们不能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任何制度在增加任何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使它达到充分满足方面都是极端谨慎的。

但是如果物质供应没有达到充分满足水平，并且产品价格也不是有效的，那么就必然存在产品短缺。即使产品价格是有效价格，仍然可能存在短缺（我们下面再谈这一点）。但如果价格不是有效价格，在供给低于充分满足的条件下就一定存在着短缺。在免费分配或近乎免费分配的情况下，短缺肯定比在有效价格的情况下更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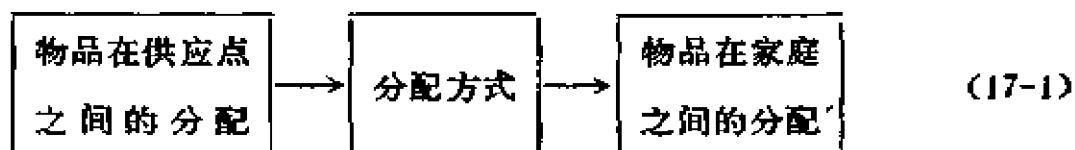
由于我们已经通过简单的演绎推理得出了这一结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任何步骤都不应当违反逻辑。根据以上所述并不能得到任何明确的结论。我们的推理过程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⑥ 我们使用“社会决策”这种说法时，并没有解决这种选择是如何做出的问题。也许是在不知不觉的历史进程的结构之内作出选择，或者是由有意识的计划活动实行选择。社会决策可以在任何政治的、法律的和组织的形式中产生。

即供给处于充分满足水平以下的物品如果免费分配或近乎免费分配究竟是有利于社会，还是有害于社会？社会可能为了其他社会利益而承受短缺的代价。例如，根据特定的标准进行分配。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短缺是一种必须付出的代价。

17·4 分配方式

我们稍后再谈价格。目前我们对价格问题的了解已经足以使我们进行分配方式的研究。我们先看关系式(17-1)。这里我们是讨论对一种产品或一组产品的分配：



在数学意义上，“分配方式”是一个函数，它确定物质供给和产品在家庭之间分配的对应关系。通常这个函数不是由单一的综合决策决定，而是由一系列的决策决定，这些决策根据一定的规则分为若干步骤。因此，分配方式可以看作是一种决策程序。

分配方式通常并不以一种明确无误的决定论方式决定产品的分配，而是按照随机法则进行。

有时，分配形式是经过我们审慎计划过的。例如一种旨在满足一定标准的配给制度。在另外一些时候，分配却是一种自发的，不知不觉的社会过程。

分配方式属于经验范畴。现实中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分配形式，但是从理论分析的目的考虑，只讨论以下三种纯粹的方式。

- (1) 拍卖；
- (2) 配给；
- (3) 排队。

在现实中这些方式或者以其纯粹形式出现，或者，更为经常地，是作为综合方式的构成要素。还有与以上三种形式及其组合

不同的其他方式。强行获取物品就是一例。这些方式在较早的历史时期也许比以上三种形式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但是，在当代一切社会制度中，是以上三种基本方式及其组合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这三种方式不排斥其他分配制度，大部分物品也是借助它们分配给家庭的。

17·5 拍 卖

第一种方式叫作拍卖，简记为A。我们不打算作一般性的描述，只讨论物质供给已定的特殊情况^⑦。

最能说明问题的场合就是一次真实的拍卖，例如出卖一件工艺品。所有可能的买主都同时到场，给出最高需求价格的人将得到商品。

但是，没有必要让所有可能的买主都到同一个地方竞相叫价。与此相同的另一分配方式（至少在理论上是相同的）也在其他若干场合下发生作用。我们借助图17-2来说明拍卖分配模型。图17-2再现了图17-1，并且作了一些补充。因此，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沿用我们早先对这一模型的解释。我们假定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幼儿园的入托名额都是用“拍卖”方式出售给可能的要求者。要求者根据他们给出的需求价格在图中按照自右向左的顺序排列。第一位给出的数额最大，比如每月支付1000福林，第二位出990福林，等等，最后是那些最多只愿付名义价格甚至一分钱也不愿付而仍然要求有一个名额的人们。

幼儿园的名额，或者说物质供给是有限的，它位于充分满足水平以下。在图中它由s和一条水平线表示。从水平线与需求曲

^⑦ 如果仅仅就企业之间物品的流动而言，按需求调整供给已经在第三、六、八、九以及十四各章中讨论过了。但是，经过必要的修改，那些地方说明的观点也可以应用于企业部门向家庭部门提供物品的情况。在第十九和第二十一章将要对以上所述再作一些补充说明。

线的交点引出价格 p ，选择过程开始了。分配方式把所有的要求者分为两组：得到产品的和不能得到产品的。拍卖方式中唯一的选择标准是需求价格。这个标准只有在以下两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以纯粹的形式发生作用。

- (1) 买主严格按照他们的需求价格的顺序排列。
- (2) 实际价格正好位于供给完全分配给愿意支付这一价格的人的水平上。

这就是瓦尔拉斯市场均衡价格。提起瓦尔拉斯有着双重理由。这一价格不仅仅以瓦尔拉斯学派思想体系中的均衡价格而著名。而且正是由于瓦尔拉斯描述了价格形成和分配的拍卖模型^⑧，这样的称呼也是正当的。由于这是按出价高低排列的纯粹情况，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在拍卖方式中，每一个个人需求价格低于实际价格的买者将自愿地抑制购买。通过把这些买者排除出去，市场供求相等。我们已经得到一般微观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定理。不管这一定理多么基本和多么为人熟知，仅仅是为了考察使这一定理有效的特殊条件也应该在此强调说明这一定理。当购买者的预算约束很硬，价格是有效的时候，一些产品购买者将会自愿地抑制购买这种产品。而且，如果这一价格是通过拍卖方式形成，也就是说，如果是瓦尔拉斯均衡价格，那么，可能的买者将自愿限制人数，正好使得供给满足那些没有退出的人的需求。

所有愿意支付比实际价格 p 更高价格的人，都得到消费者剩余^⑨。（借用马歇尔的术语。）图中斜线阴影部分代表消费者剩余的总和，用 G^A 表示。（ A 代表拍卖 auction。）

在实际价格 p 点退出需求市场的人受到了损失。这种损失可以叫作消费者损失或者负消费者剩余。图中垂直线阴影部分代表

⑧ 在瓦尔拉斯的模型中，需求和供给都对拍卖过程中的“叫价”作出反应。

⑨ 早期文献使用“消费者租金”这个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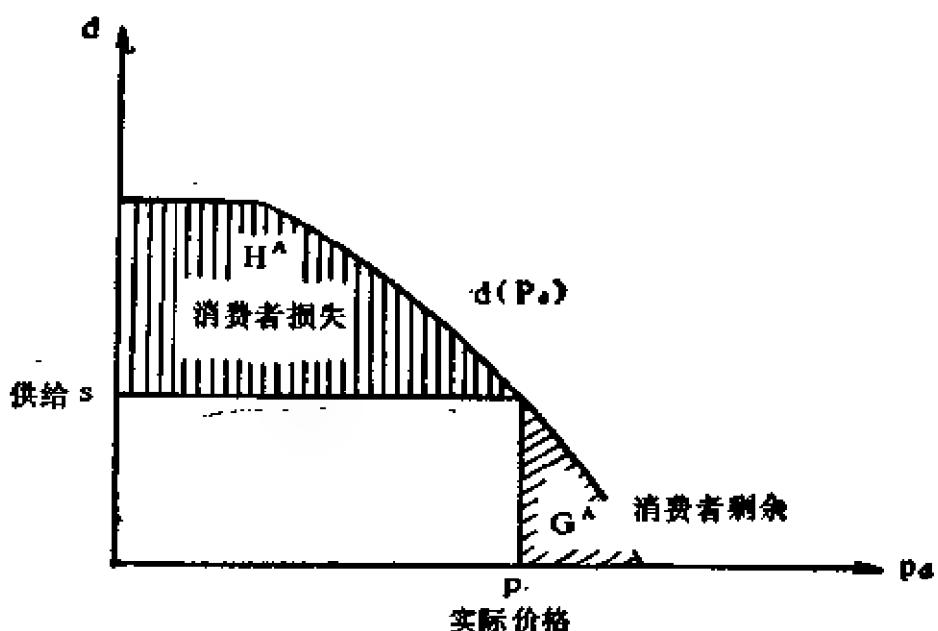


图17-2 拍卖方式中的分配

消费者损失的总和，用 H^A 表示。这是被排除在消费之外的买者为得到产品所愿意支付的数量。

新古典经济学喜欢把产品分配（allocation）和收入分配（distribution）的问题区分开来。前者是关于产品在买者之间的分配，后者是关于货币收入在社会各阶级、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分配。这里我们不讨论收入来源和收入分配如何与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问题。我们仅仅强调，每一种产品分配机制都会有收入分配的后果。在拍卖方案中，是“货币在说话”。愿意支付较多的人占了便宜，他不仅取得产品，而且得到了消费者剩余^⑩。

按照需求价格的顺序排列并不一定与按照财富和收入的排列一致。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对于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牺牲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而在这一项目上给出较高的价格。相反，也许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只愿意支付很小的数额。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而且可以由经验加以检

^⑩ 如果每一个人都必须按出价支付，而不是按统一的瓦尔拉斯均衡价格支付，这种好处就可能由于价格歧视而丧失。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有一个不同的分配方式。

验), 就是在家庭的财富和收入与给出的需求价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正是这一分配方式的这一特性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 他们认为这一分配原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 通过把拍卖方式与其他方式结合起来可以在何种程度上纠正这些后果。)

17·6 配 给

第二种基本的分配方式叫作配给, 用 R 表示^①。我们还是只限于讨论家庭之间分配的供给品是既定的情况。

根据决定配给的人或机构可以区别两种主要的变形。一是生产者配给: 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者自己决定他的产品在可能的使用者之间的分配, 而不根据给出的需求价格。简记为 R^{supplier} 。另一种主要变形是行政配给, 用 R^{adm} 表示。比如, 可能是部里决定企业应当把产品分配给哪个家庭。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者和分配者的角色就由于各自的动机和行为规则不同而分离了^②。

在实际过程中, 配给制在非总量层次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只讨论在最具体问题上也实行配给的纯粹形式(例如一套特定的住房分配给一个特定的家庭)。在按总量进行分配的场合, 补充方案(例如排队)进行非总量的分配。但这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 而是一种组合方式了。

各种配给方式的区别在于家庭在最终分配中的积极或消极程度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事先得到表达了吗? 如果是的, 实际配额的分配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他们的要求?

① 最先给配给建立数学模型的尝试出现于几年以前。例如, 见德雷泽(1975), 乌诺韦(1973), 格兰蒙特(1977)。有些论文讨论了配给与价格体制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例如见托宾(1970, a)和韦茨曼(1977)。

② 可以想象这两种变形结合起来的情况。比如说, 起初是由生产者决定配额, 如果要求者不同意这个决定, 他可以求助于行政部门。

在配给过程中使用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选择标准。根据定义，这些标准不能包括需求价格。配给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根据非价格标准的分配^⑬。如果在实际分配机制中既使用需求价格的标准，也使用了以下所列的一种或若干种标准，就应当认为它是一种组合的分配方式(A+R)。

我们在这里列出实际过程中常用的一些典型选择标准，这些并非就是全部：

- (a) 紧急需要；
- (b) 功绩；
- (c) 家庭背景；
- (d) 社会地位；
- (e) 政治表现；
- (f) 个人与分配者的亲缘关系或友情；
- (g) 对分配者施惠的报答；
- (h) 贿赂。

很少有人会否认标准(a)紧急需要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如果从伦理观点比较拍卖和配给这两种分配方式，这一选择标准断然否定拍卖制，而赞同配给制。如果一家医院的容量有限，是应该接纳从医学观点看需要住院治疗的人（即使他无力支付住院费用），还是接纳也可以在家治疗，但能够支付住院费用的人呢？紧急需要特别是在以下一些情况下作为选择标准出现（这些情况经常是一起发生的）。

(I) 必须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必须保证每一个人有最低水平的食物、衣着、住房、卫生和教育。也就是说，“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至少必须被应用于达到基本需要水平。

^⑬ 我们的定义还有一种否定含义：这些选择标准不包括先来后到的次序在内。后者将在下面一节作为一个独立的纯粹方式——排队——加以描述。另外，在谈到选择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提及第四章和第六章已讨论过的一些问题。

(II) 根据社会正义的原则，必须满足家庭中无收入成员的需要。即使父母的收入是对他们工作表现的合理报酬，为什么孩子们受教育的水平或者居住条件就应该取决于这一点呢？

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配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⑭。但是，基于经验观察，我们认为，在一些国家里正是紧急需要这一标准促使决策者采用配给制。这一动机在卫生、教育和住房一类的部门表现得特别强烈，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强烈表现在食物分配方面。

标准(b)、(c)、(d) 和(e)要比标准(a)成问题得多。没有人根据道德上的理由反对标准(a)，人们只是要求制定紧急需要的精确定义，并提出这种定义下的紧急需要是否应被当作为配给原则的问题。但是，对在分配消费品时究竟是否应该考虑功绩、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政治表现的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人却多得多。

我们只能再一次提出基于经验观察的看法，这些选择标准在物品分配中一点作用不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各种制度之间的差别在于，(1)这些标准是公开地起作用，还是隐蔽地通过非正式机制发生作用；(2)是由行政部门还是由生产者自己决定配给；(3)以这些标准为基础的配给方案应用的范围有多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4)这些特定的标准在实践中是如何规定的。让我们以大学的录取为例。没有一种大学制度是仅仅根据所出的学费或需求价格进行录取的。申请入学者的素质（通过中学的成绩报告单反映出来）起着某种作用。但是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种族、宗教信仰、国籍、父母的职业）和他家庭的社会地位、他的家庭或者他本人的政治表现一样，都可能是一种有利条件或者不利条件。标准(b)、(c)、(d)和(e)如何在配给制度中运用的问题是判断任何社会经济制度性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断定某种配给制与政治因素无关，而仅仅是基于经济或者技术上

^⑭ 可以运用一些组合方式，有些是在实际中运用的，有些是在文献中提出来的。

的考虑是不可能的。接受或者拒绝任何实际的配给方式与作出判断的个人的政治和道义的价值观念是不可分割的。

使用标准(f)、(g) 和(h)受到任何公开宣布以及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的谴责，通常也是法律所禁止的。但是，没有一种制度能够完全摆脱这样一些弊端。问题仅仅在于是经常采用这些标准，还是偶而使用，以及是否在重大的或者关键的决策中采用这些标准^⑯。

配给方式的实际变形无计其数，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提供真实的经验描述。^⑰如上所述，选择标准并不总是公之于众的，这就使描述的任务更加困难。即使选择标准是公开宣布的，实际选择过程也可能偏离宣布的原则。

任何配给方式都影响收入分配^⑱。它总是偏向社会中的某一部分成员。这样，配给就对货币收入实行一种再分配。可以用许多指标描述这种再分配的作用。在这一场合也值得注意的一个指标是消费者剩余或者消费者损失(负消费者剩余)。图17-3和图17-4说明了这点。这两个图是图17-1和图17-2思路的继续。让我们假定行政分配过程已经发生，地方议会已经决定如何分配本地区的幼儿园人托名额，得到这些名额必须支付名义费用 P^{nom} 。

配给方式把所有的要求者分成两组：得到名额和没有得到名额的人。人托名额如果“拍卖”的话，每个组的成员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需求价格分别排列。第一组的情况见图17-3。在价格区间 $P_d > P^{\text{nom}}$ 以上的部分是得到名额那些人的消费者剩余，用 G^R 表示。其中 R 表示配给。这是第一组为了得到名额愿意支付的超出

⑯ 见汉奇斯(1978)关于贿赂问题的出色论文。

⑰ 瑞典学者已研究了住房分配的问题，例如见林德贝克(1967)；美国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医疗服务的配给问题，见库珀-楚耶尔(1973)；匈牙利论述住房分配问题的文献见肯拉德-塞莱尼(1969)和丹尼尔(1978)。

⑱ 关于免费分配和配给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见弗盖(1975a, b)，拉丹伊(1976)和丹尼尔(1978)。

名义价格以上的总额。消费者剩余是既定的配给制在名义价格 p^{nom} 上给他们的社会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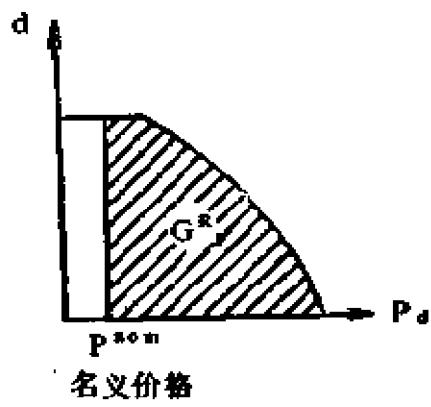


图 17-3 得到配额者的消费者剩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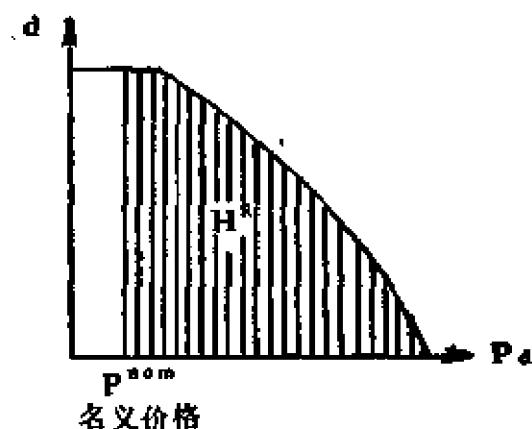


图 17-4 没有得到配额者的消费者损失

图 17-4 表示第二组的情况。在这里，价格区间 $p_d > p^{\text{nom}}$ 以上的部分表示没有分配到名额的那些人的消费者损失，用 H^* 表示。这是被拒绝给予名额的人们在名义价格以上愿意支付的数额。

不能通过比较图 17-2 和图 17-3 及图 17-4 得出一般性结论。结果取决于有关的名义价格 p^{nom} 以及实际配给方式使用的标准。与假设的纯粹拍卖制比较起来，是否已经出现了一种真实的再分配还不一定。也许有较多的能够或者愿意支付高价格的家庭得到了名额。由于他们不仅得到服务的便利，而且是在名义价格下得到的，因此他们的消费者剩余增加了。

消费者损失 H^* 从两方面看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是一个重要的短缺指标，作为这样的指标它可以包括在表示消费品短缺程度的向量 Z 的分量之中。它表示消费者对所受损失的主观评价。除此而外，它以间接的方式反映对消费品市场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被拒绝的要求者为了得到服务将愿意支出款项 H^* 。这就可能成为推动私人幼儿园和婴儿保姆的价格上升的一个因素。

但是，我们得告诫读者，在解释指标 H^k 时必须 谨慎，这不仅仅是因为观察这个指标很困难（如上所述）。即使能够精确度量 H^k ，我们也应该记住它是一个局部指标。我们假定有 m 个产品， n 个家庭。当第一个家庭宣布它对第一件产品愿意支付的需求价格时，它是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假定第二件、第三件……第 m 件产品的价格保持不变，它自己的预算约束也是既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该家庭也许愿意比先前第一件产品的价格多支付 20%。但是，如果第二件，第三件，……第 m 件产品的价格同时增加，该家庭将无力支付增加的数额。因此，所有家庭对所有产品的消费者损失总和 $\sum_{i=1}^n \sum_{j=1}^m H_{ij}^k$ 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而且它肯定不能度量家庭的总量过度需求。

17·7 排 队

第三种基本方式的名称是排队，用 Q 表示。排队问题在第四章和第七章早已提及，而且在数学附录 A 中予以讨论^⑩，但这都是主要从企业作为买者如何对排队作出反应的观点考虑的。现在我们把排队作为一种分配方式加以考察。

如同前面两种纯粹方式的情况一样，我们不试图作一般的描述。我们的论述只限于在家庭之间分配的物质供给是既定的场合。

可以区别出三种主要类型。

(a) 有形排队。等待服务的人确确实实在提供物品或服务的人面前排队。

(b) 按号排队。要求者在得到一个序号之后可以离开，当轮到他的时候再回来。

(c) 按到达次序分配。决不会有两个要求者同时出现在供应

^⑩ 我们早已给出论述排队问题的丰富文献的参考节目。

点，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形成排队。但是，消费者来到供应点之后，他们每一个人要多少产品都可以得到多少，直到东西卖完为止。

这三种类型的共同特征，是以到达供应点的次序（或者以提出要求的次序，这也一样）作为唯一的选择标准。因而先来的人就比后来的人有利。

到达次序可以完全是随机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到达次序可以是一定解释变量的函数。例如，退休的人或者家庭主妇就因为有较多的时间来排队而比上班的人们处于一种更加有利的地位。

近年来发表的关于非均衡理论的论文经常把“配给”这个词用作集合名词，意指R和Q这两种方式。我们认为，最好还是把这两种方式严格区分开来。在方式R中，一个确定的人（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根据各种可能的标准进行选择。与此相反，在方式Q中，选择是由一种非人为过程作出的，仅仅以到达的时间为依据。这个区别极其重要，因为它影响着决定配给方式的人和接受配给品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买者能够得到的信息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如果产品到达供应点的时间间隔不规则，供应者就可以通过告诉要求者什么时候来买产品的方式帮助他。在这种情况下，排队方式只在表面上起作用。实际上已经出现配给的方式：分配者根据他自己的选择标准已经决定谁应该排在最前面。

17·8 思想实验：用纯粹拍卖方式分配的条件

以上几种基本方式的任何一种在现实中都很少以纯粹形式发生作用。它们在正常情况下是以组合的方式发生作用。如果我们先进行一次思想实验，弄清按照纯粹拍卖方式进行产品分配所必需的理论上的条件，这将有助于理解使组合方式成为必然的社会条件。在17·5节我们确定了两个必要条件。但由于我们在那里讨

论的仅仅是物质供给既定的特殊情况，因此它们还不是充分条件。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探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乞求完美无缺或者追求最大限度的普遍性。我们将要研究在某个特殊市场中的一种抽象市场过程。买卖活动有规律地重复进行。市场是分散化的，因为买者和卖者彼此独立地参与市场的活动，没有行政管理部门干预分配的过程^⑩。我们将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描述市场的运转过程。由于构成系列的事件都是不断重复出现的，我们从何处开始关系不大。

(1) 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决定：出价。当事人在交易中出什么价是以他前一次经验为基础的。第十五章和第十九章详细地讨论了价格决定的问题。这里我们只注意到出价以什么样的速度和范围影响市场，要取决于市场的具体特征。论述资本主义经济的描述性的著作在无数的场合强调，价格即使不总是、到处是，起码经常是在许多地方反应迟钝，具有粘性或具有刚性。这个描述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我们用 ξ 代表描述价格刚性的各种指标组成的向量。我们不想详细解说度量带来的困难，而只想证实这样一个通常的观念，即用 $\xi=0$ 描述价格体制摆脱了任何刚性的状态，从而需求价格、供给价格和买卖双方协定的实际价格立刻对市场的实际状况作出完全的反应。价格越具有刚性， ξ 的分量所取的值就越大^⑪。

(2) 对出价的感觉。任何感觉都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于感觉的对象，另一方面取决于感觉者本身。我们举交通为例。一辆汽车已到达十字路口，驾驶员对当时情况的直接感觉取决于什么？取决于那里是否有红绿信号灯，取决于是否能看到一个可能闯红灯的骑自行车者，因为如果当时漆黑一片，骑车人又没有

⑩ 这个特定市场究竟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运行的问题暂不考虑。

⑪ 定义变量 ξ （以及本章后面引入的类似变量）时将沿用本书前面各章使用的惯例。瓦尔拉斯系统将用相应指标的零值描述；对瓦尔拉斯参照点的偏离用指标的正值表示。

车灯，只有当他接近驾驶员的车灯时，他在客观上才是可以看见的。这些是影响感觉的客观条件。汽车驾驶员是否注意信号灯，或者他是否误闯红灯则是主观条件。

指标 Θ 描述感觉的两个方面， $\Theta=0$ 的情况在以下条件成立，如果(a)市场对于所有的买者来说是完全“透明的”，从而所有可能卖者的供给价格可以在客观上被了解到（同样，对卖者来说也必须如此）。(b)每个买者都注意每一个可能卖者的供给价格，因为他这样做完全是有理由的（同样，这对于卖者也是如此）。对价格感觉受客观和主观障碍的阻力越大^②，度量缺乏价格反应的指标 Θ 取的正值就越大。

(3) 实际交易根据价格信号进行的调节。在第八章我们用指标 w 描述调节过程中的摩擦。这个指标在那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范畴。如果根据任何信号或者反馈进行的调节不完全，并且有延滞，这就用某一指标 w_i 的正值表示。现在我们的分析只涉及向量 w 中阻碍根据价格信号进行完全调节的那些分量。我们用 w_p 表示它们。

因此，如果买者（或卖者）能够没有任何摩擦地根据价格信号作出完全调节，那么， $w_p=0$ ，阻碍这一调节的摩擦越强， w_p 取的正值就越大。现在重点在“客观的”摩擦。到现在为止，买者一直从卖者X那里购买，因为卖者X的价格比卖者Y的价格要便宜。现在Y给出更便宜的价格。但是买者并不转向Y，因为使用Y提供的产品所必需的互补投入不能立即得到。因此， w_p 不是度量他愿意根据价格调节的程度，而是他能够适应的程度。

在用公式表示我们的命题之前，我们再引入几个符号。

设 $\alpha(K)$ 为任何方式K（纯粹的或组合的）在分配中的份额。具体地说， $\alpha(A)$ 是纯粹拍卖方式A占有的那部分分配额。它的余数是 $\alpha(\text{non-}A)=1-\alpha(A)$ 。于是余数的份额给出了所有其他

^② 上述价格反应指标 Θ 与第十四章采用的因素 θ 有联系，但不相同。

方式的组合份额。在这些方式中，A不再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与其它方式组合起来出现，或者根本不出现。份额 $\alpha(K)$ 是可观察和可度量的量。它们是该体制的重要特征。了解它们会加深对于经济如何运行的认识。

我们首先用符号表示如下：

$$\begin{array}{ccc}
 \text{若 } \xi = 0 & \text{且 } \theta = 0 & \text{且 } w_0 = 0, \\
 \boxed{\text{没有价格刚性}} & \boxed{\text{完全有价格反应}} & \boxed{\text{对价格信号的}} \\
 & & \text{实际反应无摩擦} \\
 \text{则可能有 } \alpha(\text{non-}A) = 0 & & (17-2) \\
 \boxed{\text{唯一地根据拍卖}} \\
 \boxed{\text{方式进行分配}}
 \end{array}$$

$$\text{若 } \xi \geq 0 \text{ 且/或 } \theta \geq 0 \text{ 且/或 } w_0 \geq 0$$

$$\text{则不可能有 } \alpha(\text{non-}A) = 0 \quad (17-3)$$

现在我们将从一个新的角度描述经济制度。我们可以说出在一个特定市场的总交易额中各种分配方式占多大的比例。这样，对于抽象的瓦尔拉斯参照点 $\alpha(\text{non-}A) = 0$ ，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标准。如果价格完全具有灵活性，如果当事人完全看见价格并据此而进行完全的调节时，瓦尔拉斯拍卖方式才能够独自分配产品。

但即使公式(17-2)和(17-3)也只是说唯一使用拍卖方式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必须予以讨论。如果该方式是准备唯一使用的，那么每个当事人也必须都希望应用这一方案。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买者(或卖者)不顾其价格相对不利而选择一个卖者(或买者)，是因为他有较高的社会威望，或彼此有私交，或者因为接受了贿赂，那么拍卖方式就不再以纯粹的形式发生作用了。

即使条件(17-2)以另外的方式满足，以便使用拍卖方式，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但是，如果公式(17-3)左边表示的任何一个

条件得到满足，起作用的一定不是价格，而是选择标准。发生这种情况或者是因为价格不具备完全的灵活性，或者是因为当事人对价格的感受不完全，或者因为调节不是完全无摩擦的。

在公式(17-2)中我们给出了唯一使用瓦尔拉斯拍卖方式的条件，这种方式以当事人的行为和这种体制的控制机制的特征为基础。但是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从市场的瞬时状态出发考察这个问题。这次我们从静态方面，而不是动态方面观察市场的调节过程，分析调节的一个单一的时刻。我们在时间 t 观察市场 i ，并且考察所有买者和卖者的行为。如果流行的价格 $p_i(t)$ 刚好是瓦尔拉斯均衡价格，总供给一定正好等于总需求。于是，拍卖方式就可以自动进行分配。所有愿意交付价格 $p_i(t)$ 的买者都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愿意交付 $p_i(t)$ 的买者则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所有愿意以价格 $p_i(t)$ 出售的人都能够把商品卖出去，而那些坚持要更高价格的人却被排除在外。

但是，如果在给定的价格 $p_i(t)$ 上，仍然有没有满足的需求或者过量供给，情况就不同了。让我们看发生短缺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愿意支付流行价格的买者也必须排除在外，至少他们的初始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因为价格不能独立胜任这一选择任务，使用其他选择标准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了。在相反的场合情况与此类似。这样我们可以用公式表示以市场状态为出发点的唯一使用瓦尔拉斯方式的条件：

若 $z_i(t) = 0$ 且 $q_i(t) = 0$ ，



可能有 $\alpha(\text{non-}A) = 0$

唯一根据拍卖方式进行分配

(17-4)

若 $z_i(t) \geq 0$ 且/或 $q_i(t) \geq 0$ ，

则不可能有 $\alpha(\text{non-}A) = 0$

(17-5)

公式(17-2)、(17-3)和公式(17-4)、(17-5)之间密切的因果关系在本书若干地方已经予以讨论，现在我们不希望离题太远。我们只在这里强调后两个条件的一个重要启示。

任何市场在任何时刻如果偏离完全的瓦尔拉斯均衡，就必然使用了非瓦尔拉斯方式。这些方式可以是完全排除A的，也可以是涉及到A的组合。我们来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些组合。

17·9 组合方式

表17-1是各种方式组合的概览。表中所列不是全部可能的组合，但这些组合对于我们的论证都是最重要的。

我们先说明表中各列。第Ⅰ列和第Ⅱ列的共同特点是有效价格和拍卖方式A两者都起作用，而在第Ⅲ列和第Ⅳ列它们都不起作用。因此，标准不是货币究竟是否出现在交易过程中。只要是在名义价格的范围内进行交换，也就会在第Ⅲ列和第Ⅳ列发现货币交易。

第一行表示可以在完全调节的情况下执行的分配方式。上面一节我们详细讨论了完全由方式A支配的条件。现在我们可以在类似的抽象层次上补充一点，即在“完全的集中控制”条件下，所有的分配都可以通过R^{adm}(即行政配给)进行^②。因此，表中第一行表示两个抽象的参照点。在现实经济体制中，它们都不以纯粹形式出现，不是在一种长期不变，普遍适用的基础上发生作用。现实中不存在唯一由方式A分配物品的~~真实的~~市场，也不存在完全通过R^{adm}进行分配的~~真实的~~中央计划经济。

第二行包含可以在短缺的情况下进行分配的方式。我们从第Ⅰ列开始。第Ⅰ列中行政配给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

^② 我们早在8·7节就指出，“完全的集中控制”可以成为完全调节的一个抽象的参照点。本表第一行出现行政配给方式是从那里开始的论证过程合乎逻辑的继续。

纯粹分配方式和组合方式

表17-1

		有效价格不存在， 拍卖方式不起作用		有效价格存在， 拍卖方式不起作用	
		I	II	III	IV
无短缺	A				R^{*m}
无滞存	$[A + R^{*m}]$			$[R^{*m}]$	$[R^{*m}]$
短缺	$[A + Q^{*m}]$	$[A + R^{*m}]$	$[Q^{*m}]$	$[R^{*m} + R^{*m}]$	$[R^{*m} + R^{*m}]$
	$[A + R^{*m} + Q^{*m}]$	$[A + R^{*m} + Q^{*m}]$	$[R^{*m} + Q^{*m}]$	$[R^{*m} + Q^{*m}]$	$[R^{*m} + Q^{*m}]$
滞存	$[A + R^{*m}]$	$[A + Q^{*m}]$	$[A + R^{*m} + Q^{*m}]$	$[R^{*m}]$	$[R^{*m}]$
	$[A + R^{*m} + Q^{*m}]$	$[A + R^{*m} + Q^{*m}]$	$[R^{*m} + Q^{*m}]$	$[R^{*m}]$	$[R^{*m}]$

有效价格(比瓦尔拉斯均衡价格要低)通过排除不愿意支付流行价格的人在买者中间进行选择。但需求仍然过高,需要进一步选择。这或者是通过卖者应用17·6节所列的标准(a)－(h)的某种组合进行,或者是按照“先到先接待”的原则向买者提供服务^②。或者,这两种非价格选择过程与价格选择结合起来。

我们继续看这一行的第Ⅱ列。在第Ⅱ列我们看见拍卖方式和行政配给方式的组合。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组合方式用来分配小汽车或者公寓。公寓是国营企业造好后出售给私人的。这两种物品都必须支付有效价格,而短缺仍然存在。小汽车和公寓的供给(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供给)通过行政手段在那些愿意支付这个价格的人们中间进行分配。也许提出要求的日期也起一定的作用;换句话说,方式 Q^{buyer} 参与分配过程。

有时还存在另一种组合($A + R^{adm} + A$)的可能性,有幸得到配给商品的人,因为需要钱用又把它出卖给另一个买者。

再看这一行的第Ⅲ列。这一列包括存在着短缺,但既没有有效价格也没有行政配给情况下的分配方式。在7·8节我们曾提到对生产的植物性控制。这是在没有价格信号而同时又是分散的条件下发生的“数量”调节。第Ⅲ列中的方式在分配领域内与这种制度很相似。它们在没有有效价格信号和行政配给的条件下分配一定的物品和服务。这种情况发生在医院或大学按自己的标准决定接纳谁作为病人或者学生的时候。可以根据配给方式使用各种标准实行配给,或许也可以考虑把申请的次序作为进一步的选择标准。

许多免费或者只有名义价格的服务,完全是由排队进行分配。例如,使用免费的娱乐场所,运动场地、停车场等等。如果免费的海滨或者停车场满了,后来的人就被排除在外。

排队方式的重要性由于下面的事实得到进一步加强:它总是填补其他方式留下的真空地带。一切没有被其他“有组织的”分配

^② 数学附录A中描述的市场,按照分配方式($A + Q^{buyer}$)运行。

方式顾及到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分配。事实上，“先来先接待”的选择标准是相当文明和公平的分配形式，它有赖于所有合格的使用者的自愿约束。在方式A和R不起作用，真空没有被排队方式Q^{user}填补的地方，“各取所能”一类比较粗暴，较富进攻性的选择标准必然占据支配地位。仍用上面的例子来说，小流氓把和平的沐浴者从海滨赶走。

最后，在有关短缺的这一行的最后部分，第IV列中，是同样与行政配给混合在一起的分配方式。在这里当然出现了纯粹的R^{admin}方式，但是这可能与供应者配给结合起来。例如，假如是由中央教育部门分配大学的某些名额，而其他名额由大学自己分配，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进行配给的部门把提出要求的日期以及其他选择标准考虑在内的话，行政配给也可能与排队结合起来。

为简洁起见，我们对表中最下面一行，即滞存的情况不再进行详细评述。

对表17-1应作出三个一般性评论。

(1) 判定这里描述的方式中哪个应该被认为具有市场特征还很成问题。经济学中没有几个概念象“市场”概念这样，可以作许多种不同的，并且有时是彼此矛盾的解释。要特别强调两种解释^②。第一种是广义的，根据这种解释，联系交易过程中买方和卖方的每一种横向关系都应被认为是一个市场，即使其中没有有效价格在起作用也罢。因此，即使买方和卖方都只是对彼此的“数量”信号作出反应，也仍然是市场机制在发生作用。另一种解释是狭义的，它认为市场是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其中有效价格在控制当事人的行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应用广义的解释，第I列和第II列中的方式就可以说是具有市场特征的分配过程。但根据狭义的解释，只有第I列中的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市场方式。

^② 第一篇已经对此作了说明(见第七章的脚注①)。

每一个经济学家大概都同意，第Ⅳ列中的方式是非市场分配过程，第Ⅱ列中则是市场分配方式和非市场分配方式的组合。

(2) 表17-1的分类体系没有把不同方式的法律地位考虑在内。我们看第Ⅰ列，其中列出了有效价格下进行交换的方式。一个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法律允许一些物品和服务用于交换，禁止其他物品和服务的交换^②。在后一种情况下，或者法律条令是严格执行的，从而违反条令就意味着一种“黑市”，或者在实际过程中没有这样严格地执行法律，于是就有一种“灰市”（“灰”的深浅有各种不同的层次）^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看到，“黑市”和“灰市”通过以有效价格向买者提供商品也在进行市场分配^④。因此，它们的作用可以用第Ⅰ列中的方式加以描述。

(3) 有许多物品和服务在同一经济体制下，在同一时期内是通过若干种方式来分配的。这叫作平行分配。平行分配很多时候是双重分配；产品平行地通过两个渠道。也会出现三种，或更多种分配方式并列发生作用的情况。

我们举医疗服务的供给为例。在一些国家里，有普遍的社会保险和全国性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与此相平行地（合法的或者至少存在于“灰市”中）还有私人的医疗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些服务可以由社会部门独家垄断，但其他服务（例如个人去普通开业医生那里去看病）却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分配。每一种分配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组合方式。我们用 E_1 表示第一种方式，它由 $(R^{adm} + R^{supplier} + Q^{user})$ 组成；第二种方式用 E_2 表示，它由 $(A + Q^{buyer})$ 构成。方式 E_1 和 E_2 向使用者提供相同的产品和服务，或者至少是相近的代用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互相竞争。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或价格方面它们彼此不同（免费或名义价格

② 每一种制度下都有被禁止的商品。即使在“自由市场”最发达的国家，象白奴买卖，雇佣刺客谋杀、毒品买卖一类也是被禁止的。

③ 见塔诺伊的论文（1975）“短缺和黑市”。

④ “黑市”和“灰市”是本书其他地方提到的“第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有效价格)；在非货币“成本”，即伴随使用而来的负担方面(排队时间等等)也可能不同。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它们在通行的社会关系方面可能不同，至于这种社会关系是支配关系还是隶属关系，除其他因素而外还取决于使用者是否受供应者的支配。

17·10 各种方式的相对范围：一般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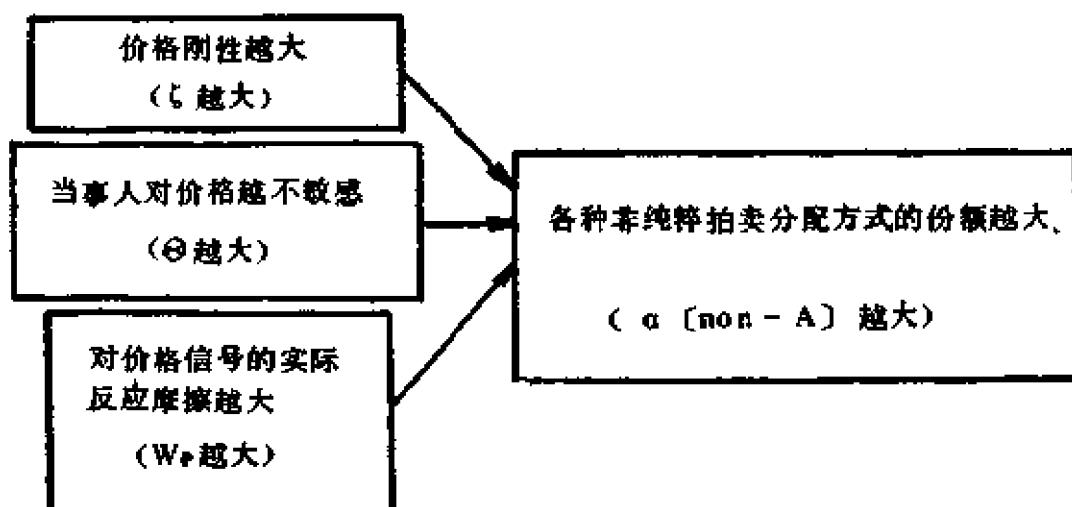
表17-1不是一种我们可以根据口味从中选取最有吸引力的分配方式的菜单。特定社会经济体制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哪些分配方式应该在哪个领域中发生作用，至少，它缩小了决策者可以从中选择可能方式的范围。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是哪些因素影响各种不同方式在分配过程中的相对份额。分析将分两步进行。在本节内我们运用全书特别是本章的结论，抽象地考察影响分配机制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还是讨论一般相互关系，既不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区分它们的不同形式。我们将在 17·11 进行这种区分，因为在那将对经验上可观察的历史趋势作出描述。

在理论分析过程中，我们强调指出四种因素(它们不是全部)的影响。

(I) 价格对买者和卖者行为的影响越小，拍卖方式 A 的分配作用就越小，从而它被其他方式补充或取代的程度就越大。这个命题是17·8节论证的合乎逻辑的推论。从公式(17-2)、(17-3)继续推论，并使用相同的符号，我们有如下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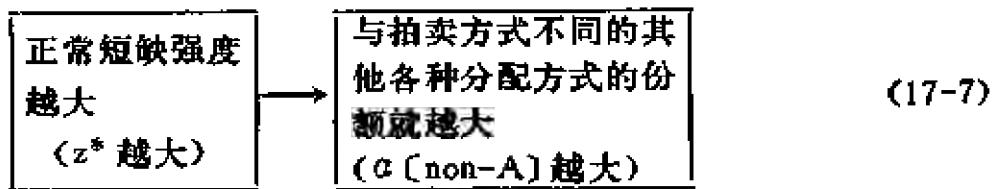
公式(17-6)仅仅大致描述了这一关系。这个公式似乎既能够根据更加精确地公式化的演绎推理予以理论证实，也能够用经验数据对它进行判断，因为所有的变量都是可观察和可度量的。

(II) 正常的短缺越严重，行政配给或供应者配给的分配作用以及买者或使用者排队的分配作用就越大。这里，又可以继续



(17-6)

17.8节中公式(17-4)、(17-5)运用的论证思路:



(17-7)

象公式(17-6)一样, 公式(17-7)仅仅用语言形式表示一种函数关系。但是它似乎也易于在理论上详细说明, 并也可能通过对变量的经验观察予以判断。

注意我们的陈述含有“正常的”这个限制条件。公式(17-4)、(17-5)说明, 对瓦尔拉斯市场均衡的瞬时偏离, 使得非瓦尔拉斯方式不可避免地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但是, 如果市场的正常状态偏离瓦尔拉斯均衡不太远, 其他非拍卖方式($non-A$)就只起补充拍卖方式A的作用。把坚持购买意图和放弃这一意图的买者分开, 以及把坚持出卖意图和放弃这一意图的卖者分开来的, 基本上是有效价格。在这种情况下, 方式 R^{seller} , R^{buyer} , Q^{buyer} , 和 Q^{seller} 只起次要的校正作用。

如果市场正常状态基本上偏离了瓦尔拉斯市场均衡, 情况就不同了。如果长时间存在着严重的短缺, 方式 R 和 Q 就不再起补充或者附属的作用, 而成为起支配作用的形式。

在伴随吸纳状态的资源约束型经济中，有着一种加强配给方式和排队方式作用的内在趋势，而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则有着加强拍卖方式作用的内在趋势。

(Ⅲ)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垄断程度越高，它在分配自己的物品和服务时就越是使用方式 R^{seller} ， $R^{supplier}$ 以及方式 Q^{buyer} ， Q^{***} 。

按照卡莱茨基的看法^②，垄断程度不仅影响企业决定价格的能力，而且影响企业分配它的产品时应用非价格标准的程度。

(Ⅳ)国家的经济作用越大，国家经济政策中家庭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性越大，方式 R^{*} 本身或者它与其他方式的组合的分配作用就越大。

上述各种相互关系都极其重要。各种分配方式的相对份额不能完全由纯粹经济因素来解释，它们也受制度的政权结构的影响，但考察这个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范围。

我们应当在此指出，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念、准则和传统在决定分配方式的范围方面也起重要作用。不存在永恒的界线。在奴隶社会中活人通过拍卖被买卖。曾经有过按“有效价格”购买妻子或丈夫的时期。一些分配问题逐渐被这一方式或那一方式解决，而另一些问题则不能继续被原有的方式解决。但是，这就进入到下一节的论题，即对历史趋势的讨论。

17·11 各种方式的相对范围：历史的趋势

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历史趋势明确指向某种分配方式，或者某些方式的组合。例如，许多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信徒认为市场分配是历史的定论。在历史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作用总是在不断增长，虽然也曾出现过并继续出现停顿和倒退，然而

^② 见卡莱茨基(1964)。

都只是暂时的，因为市场或迟或早总是要占上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及其它左翼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界中却接二连三出现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中央分配即配给方式 R^{adm} ，将会越来越成为支配形式。社会主义国家自从改革以来市场范围的扩大，不管在政治上可取或是不可取，都只是一种暂时的退却，迟早要被行政配给所否定。

至于长期的趋势，未来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将给予真正的证明。仅仅考虑几十年以内的事情，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内都可以观察到彼此矛盾的趋势。如果存在着主导趋势的话，从长期看哪一种是主导趋势呢？不管这一问题多么激动人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更多的属于预言的王国，而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本书中我们只限于确认过去几十年内实际观察到的部分矛盾趋势，而不把任何一种推延至长期趋势。

详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只简单指出几个众所周知的现象。

(a) 即使在分配基本上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地方（经济的较大部分都包括在内），纯粹瓦尔拉斯拍卖方式也很少见，更常见的是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例如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卖者要考虑除需求价格以外的许多选择标准。卖者的垄断或半垄断程度越高，他越能在可能的买者中间对他的产品进行“配给”。

(b) 政府机关和非营利机构（包括军队）通常不是纯粹根据拍卖方式（只比较价格）进行采购，它们也采用许多其他选择标准。在主要政府部门和大公司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个人关系和其他联系。

(c) 国家在许多领域干预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因而出现既有市场因素又有非市场因素的组合方式。例如在很多大城市，公寓就是按这一方式分配的。

(d) 非营利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加。这些领域中出现了行政分配、供应者配给，以及每

种方式的各种不同的组合形式。通常是平行的分配制度在发生作用，市场和非市场过程所占的比例各国不同。

社会主义经济中家庭消费品不同分配方式的作用

表17-2

产品组	I 革命后初期，内战 或对外战争时期	II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 下的相对和平时期	III 经济管理体制 改革以后的时期
食 品	许多产品非市场分 配，某些食品市场 分配（合法市场或 黑市）	市场分配	市场分配
服 装	少数产品非市场分 配，大部分产品市 场分配	市场分配	市场分配
其它工业品	市场分配	市场分配	市场分配
城市住宅	非市场分配	大多数情况是非市 场分配，少数情况 是市场分配（主要 是灰市和黑市）	许多情况是非市场 分配，市场分配的情 况越来越多（主要是 合法市场；也有部分 灰市和黑市）少数情况 是“混合方式”
小 汽 车	—	主要是“混合方式”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	主要是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混合 方式”
娱乐、旅游	—	主要是非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	部分是非市场分配 部分是市场分配
教 育	非市场分配	主要是非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	主要是非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

续上表

产品组	I 革命后初期；内战 或对外战争时期	II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 下的相对和平时期	III 经济管理体制改 革以后的时期
卫生	非市场分配	主要是非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或者是合法市 场或者是灰市）	主要是非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但市场分配的 情况越来越多（合 法市场或灰市）

基本赞同资本主义制度，但批评其现状的经济学流派对于这些现象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者在许多方面同意并支持这些变化；他们最先实行了其中一些变化。自由主义学派却大叫大嚷地表示反对，并且流露出对竞争曾经比较自由的时代的眷恋。他们常常把现状归咎于凯恩斯主义者。事实上，虽说凯恩斯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然而这些变化不是由于受某一思想体系的影响才发生的，它们是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

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主义制度。表17-2试图提供一个概览。我们不想陷入过分详细的论述。因此，我们不想描述各国之间存在的许多差别。我们只按某种一般化的，或典型化的形式区分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紧接着革命以后的年代以及国内战争或者说与国外敌人进行战争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在武装冲突以后，处于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的相对和平时期。第Ⅰ列和第Ⅱ列一般说也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内。第Ⅲ列是改革以后的状况，这里我们主要是指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情况。

表中各行涉及的部门范围很广。一些在家庭消费总量中比例很低的项目，由于其分配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也把它们单列一行。但是各行项目并不囊括全部家庭消费量。

表中条目采用17·9节引人的术语。“市场分配”这一概念只在

狭义上使用，指有效价格在其中发生作用，并且至少有一部分是拍卖方式A的那些方式。在这里，“市场分配”这一名称不是由瓦尔拉斯拍卖方式独享，而是包括A与R和Q的各种不同的组合在内。因此，在我们的表格中可以发现“市场分配”包括出现非常严重的短缺现象的市场，诸如卖者在买者中间进行选择，买者排队等现象；这里假定买者在有效价格下购买有关产品，没有行政部门利用配给方式参与分配。（与此有关的各种组合方式见表17-1第I列。）

术语“非市场分配”指价格不起任何有效的作用，只由行政配给或者它与其他方式的组合进行分配的场合。（这类方式见表17-1的第IV列。）

“混合”制度是指有效价格和行政配给一起出现的场合〔A+R^{adm}+其它可能的方式〕。（见表17-1第II列。）

表格本身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只限于作出三个较为一般的结论。

(1)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内，配给制在对家庭部门供应产品方面都不是唯一起作用的方式，不论它是以纯粹的形式，还是与其它方式组合出现。市场方式在分配中总是起着一定作用（至于市场分配有可能远远偏离瓦尔拉斯参照点则是另一码事，这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2) 当我们从第I列看到第II列，再从第II列看到第III列，我们发现表内栏目中完全的非市场分配过程越来越少，而有市场起作用的栏目越来越多，市场在其中或者是单独发挥分配作用，或者至少是与非市场过程并列出现，打破了后者的垄断地位。

(3) 在以上的陈述中我们只注意一列中栏目的数目，而没有考虑它们的相对比例以及这些比例的变化。在这一方面各种趋势是矛盾的。一方面，象小汽车、旅游特别是住宅这类支出比例不断增加的产品的分配已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另一方面，象教育、卫生这类支出比例也在增加的项目，仍然保持着非市场分配方式

的特征。

这个表格概括了至今为止所发生的事件的进程。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有关分配形式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从本书的主题考虑，我不想卷入这场辩论。我只想在本章分析的基础上作一简单评述。许多参加辩论的人都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他们把实际经验同他们所批评的分配方式相比较，同他们所渴望和提倡的抽象理论模型相比较。市场方式的拥护者正确地指出排队造成的负担以及配给方式带来的许多困难，诸如选择标准任意武断并且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一些掌管配额的官员业务能力低下、道德品质令人怀疑，分配过程拖沓无力、僵硬不灵等等。然后他们就把配给制与具有完全的客观性和始终不断进行着瞬时调节的纯瓦尔拉斯市场进行比较。与此相反，反对市场作用的人正确地指出，市场的运转伴随着摩擦，造成浪费，市场对信号的反应经常有一段时间的延滞；瓦尔拉斯体系如果在其纯粹形式下应用的话，将会导致社会的非正义，偏袒富人，等等。接着他们就拿一种纯粹形式下的配给方案与市场进行比较，在这一纯粹形式下，是由一些头脑敏捷，能力过人、道德品质无可指责的人们仅仅根据社会认可的选择标准来进行分配。

这种讨论不会有任何结果。最有成效的讨论是把一种方式的实际经验与另一种方式的实际经验相对比。我们应当力求对各种分配方式在有关制度的组织结构内，在活生生的人们手中是如何起作用并可能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作出正确评价。

第十八章 家庭：消费者行为

18·1 引 言

本章的主题是消费者行为^①。至此我们已经说明了大部分分析的方法，我们将用这种方法来描述短缺经济中家庭的状况。本章在相当程度上重复了以前讨论过的材料。它可以看作是我们更为一般的研究成果在家庭这一特殊场合下的应用。自然，这种应用需要一些修改和补充。

本章大部分用来讨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同样出现在传统的和改革后的经济管理体制下的现象。什么地方有差别，我们将分别指出。

在论述家庭行为的特征时，我们从下列假定开始。

(1) 家庭的总货币收入是既定的。第十六章讨论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工资。虽然家庭还有其他形式的收入，但本书不予以考虑。

(2) 象我们过去强调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这不是我们为了简化分析而作出的假定，而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事实。我们提醒读者回想一下13·3—13·4节，那里我们指出了一个经济单位的预算约束什么时候是硬的或几乎是硬的。按照那里所定的标准，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① 术语“消费者”和“家庭”意义相同，都是用来描述某一物品或服务的使用者。我们不讨论在同一家庭内的几个成员中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也不讨论物品在这样一个家庭内如何分配。

硬约束。确实，家庭得到的某些产品和服务是免费的。前一章已研究了这些情况，本章也还要再一次谈到。即使是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家庭也将力求得到更多的免费服务，从而增加他们的消费。至于需要支付货币才能得到的产品，家庭的支付能力有多大，它所得到的产品也就只能有多少。在象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寻常困难等情况的严重打击下，家庭可以得到国家补助。但这种例外或正常的国家货币补助的数量一旦确定下来，它就成为家庭收入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这样预算约束仍然是硬的。

这种约束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甚至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更硬，因为提供给家庭的贷款的范围要小得多。给个人的贷款固然存在，也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某些耐用消费品，自建住宅也可得到银行贷款。但即使把这些信用贷款加到一起，也仅构成家庭总支出费用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受到许多约束的限制。贷款的偿还很严格，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允许延期偿还。除很少的例外，家庭也不可能透支。

当我们说家庭预算约束是硬的时候，我们这里的论证和新古典派的家庭理论是一致的^②。

(3) 消费品供给是既定的。我们将考察消费者行为如何受到供给的影响——但不讨论反馈。我们不分析消费者行为如何影响销售者，也不讨论当销售者不是生产者时，生产者如何受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4) 假定家庭接受既定的消费价格。现实中，家庭常常是，但确实并不总是价格接受者。许多消费价格是真正讨价还价的结果。即使价格对个别家庭是既定的，全部家庭总和起来的行为也可以影响价格。所有这些相互关系将在第十九章加以研究。

② 承认这种一致，更便于理解不一致。新古典学派总是从家庭行为的叙述开始，并以这种方式来说明它的概念体系。并且，在(正当地)引进了家庭是硬预算约束的假设之后，这一假设也被毫不犹豫地扩展到企业。但事实上，后者的约束可能是软的。

(5) 最后, 我们把上一章叙述的不同分配方式的范围看作是既定的。家庭可以通过哪种或哪几种方式得到产品已经被决定了。

18·2至18·4节叙述在亚微观层次上买者的瞬时调节。从18·5节开始我们过渡到微观层次, 并且也分析买者的短期和长期的决策与行为。

我们以重温采购过程程序来进行讨论。早在第四章和第七章, 我们已对特殊情况进行类似的描述, 那里买者是企业, 并且采购过程不受价格影响。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这个程序, 但这一次买者是家庭, 影响采购过程的各因素中也包括价格。我们不能忽视价格, 因为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 他们不可能不受价格的影响^③。

在第四章讨论社会主义企业时, 我们证实了企业对价格的反应是微弱的。但是, 在企业对价格有反应的范围内, 本章提出的一些命题也可引伸至企业。这里不打算详细叙述这种引伸过程。

18·2 过程的开始: 解决平行分配方式的两难问题

象第四章一样, 对采购过程的说明将在常被用来描述计算机程序的流程图的帮助下进行。为便于参考, 各框将以大写字母代表。我们暂时描述在单独场合下, 一个买者对某种产品进行的购买。我们描述买者如何进行瞬时调节以适应既定的供给。他的每一个决策和行动都是亚微观层次上的一个基本事件。然后我们将讨论过程重复进行的情况, 并把所有的买者和所有产品都放在一起考虑。

我们完全不讨论那些唯一通过行政配给来分配的产品。在这个问题上要说的话, 我们都已经说过了。^④

③ 数学附录A中对采购过程的描述可以看作是对企业或者家庭购买的描述。

④ 在17·6节中, 我们指出了得到行政配额的人, 可能会想方设法影响分配使之对他有利。

前一章我们已经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若干种产品和服务是平行地通过两种或更多种方式进行分配的。今天，在匈牙利，想得到一套住房的人可以向主管部门提出请求，要求分得一套房租低廉的国有房屋。或者，他可以要求分一套合作公寓，虽然这类房子的大部分建筑成本都是由国家偿付或由国家提供一大笔贷款，他自己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一大笔钱。他也可以用自己的资源盖房，然后申请贷款以作为自己资金不足的补充。或者，他还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以高价购买一套或一幢私人住宅。还有许多种其他形式，但这已经足以说明同时运转着数种平行的分配方式。

在图18-1中，框A只是满意地说明了我们讨论的产品是否将由平行的数种(至少两种)方式进行分配。我们继续用上述例子，在住房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在食物情况下，答案则是否定的。今天在匈牙利，食物已不通过票证配给，而是广泛地通过市场卖给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略过了中间的框，直接跳到框D。但我们还是留在确实存在平行分配方式的情况下。对一件由行政配给的产品来说，提出对它的要求的方式通常是由法定的规则来调节的。我们假定某家庭有权提出要求，它必须决定是否要这样做。这样我们就到了程序中的框B，提出参与哪种分配方式的问题。^⑤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选择，特别是如果涉及到一项重要的消费能否得手时更是如此。事实上，正是对于这样一些重要的项目，特别是在住房，某些医疗服务，托幼机构等等的分配中，非市场和市场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平行出现的。

行政配给方式的吸引力是明显的。家庭可以得到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但如果在市场上购买就贵得多。国有住房的房租几乎是名义上的；由社会保险制度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免费的，国家幼儿

^⑤ 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利用法律中的漏洞，合法或半合法地同时参与数种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新的难题：这个家庭是否愿意立刻同时对几匹马下赌注，支付必要的钱并接受有关的麻烦和风险？

为了简化讨论，这种特殊的选择问题没有被包括进程序的流程图。

园的收费也是名义上的，等等。

和经济上的好处相对，也存在极为不利的一面。某些服务，特别是住房，等待的时间可能会很长。另外，家庭在提出要求时不能肯定知道是否会遭到拒绝。在某些领域，通过配给方式得到的物品和服务比市场方式提供的物品质量要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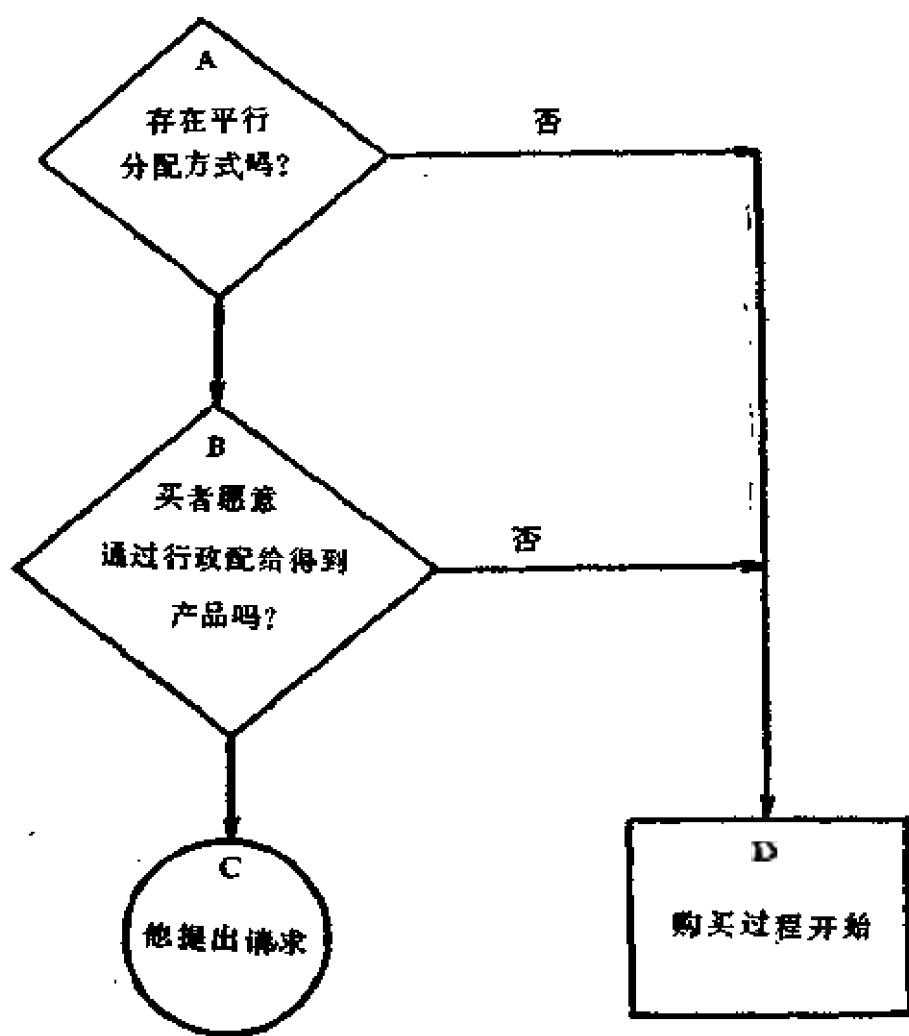


图 18-1 平行分配方式情况的分支

许多家庭并没有真正的选择，因为在他们既定的财富和收入状况下，他们不能求助于费用较高的市场方式。不管伴随而来的条件多么令人讨厌，他们也不得不选择行政配给方式。然而，对其他人来说，问题在起始点并没有决定下来。很明显，这也取决于有关的特定产品和服务。这些项目可能是自由市场上价值达几

十万福林的一套住房，或者只是需要花一二百福林去找私人医生看一次病。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偶尔地支付后者，所以两难问题还是很普遍的。

平行分配方式的出现和增长引起了许多讨论。作为对行政配给方式的补充，出现了市场方式的许多有益的后果。分配变得更灵活了。在通过不同方式分配的产品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可以展开有益的竞争。居民增长的购买力可以部分得到吸收。正正经经挣钱谋生的人有机会按自己真正的愿望花钱。同时，在市场方式之外活动的配给方式日益能够在分配中实行以需要和功绩为标准。然而很不幸，两种方式并不是和谐共存的。平行分配加剧了不平等，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使不平等变得十分引人注目而加强了不平等的感觉。分配原则变得混乱不清。那些等待行政配额已等了数年的人，对能在市场上出钱购买的人忿恨不已。而那些为某种物品或服务付了很多钱的人也怨气十足，因为他为这些东西做出了超乎寻常的牺牲，而另一些人得到它们几乎分文未付，是作为国家的赠予而得到的。

提出实际解决办法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我们只想提出注意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但我们还是回到采购程序上吧。由框 B 表示的选择问题不能借助于一般微观经济学的家庭模型来描述。我们并不是在每一种物品（或每一批物品）都有确定的货币价格的环境中选择替代品。这里我们必须对在现行价格下用货币来计量的成本和效益，以及那些不用货币计量的（或者甚至不能计量的）成本和效益同时进行估量。

在家庭已经作出决策——不管是由于经济状况强制地，还是在自由地权衡了利弊之后——要通过行政配给来得到产品的情况下，它就排除了自己进一步购买的可能。这由以框 C 代表的最后一个圆形表示。到了这一步的家庭已经不再是一个购买者，而是一个等待由配给当局拨给配额的要求者。

在家庭已经选择市场方式的情况下，它必须进入框 D，并开

始实际的采购过程。

18·3 过程的继续：相对价格的影响

图18-2是前图程序的继续。前图中右下角的框 D 在本图再一次出现，它位于左上角。既然从现在起只谈市场分配，我们就以家庭主妇为准备晚餐买肉作例子来说明这件事。这是一个简单的日常活动，不象家庭对住房，选择医生或托幼组织的决策那样具有很大重要性。

框 E 表示第一步：在这里决定初始需求。和企业相反，在那里这种决策极少受到投入品相对价格的影响（见第五章和第十四章），而家庭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很敏感。我们从一种抽象的情况开始讨论，简化的假设以后将逐步撤销。我们假定：家庭主妇期望在打算去的商店里发现她为准备晚饭而要买的一切东西，她也知道价格。这样，决策就只受家庭的口味、家庭的收入和价格的影响（也就是说，受偏好顺序和预算约束的影响）^⑥。

这里我们应该指出：只要家庭处于程序中的框 E，家庭就是以新古典的方式行动^⑦。它在价格信号的基础上，自愿进行选择。既然选择是在替代品中进行（香肠、火腿、意大利香肠，等等），这种决策可以叫做自愿替代。

决策已经作出。假定家庭主妇打算买一定数量的产品 A，比如说是250克火腿。手里拿着采购单——也就是带着初始需求——她出发到经常光顾的商店去了。这样她就到了流程图中的框 F。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她去的商店里有没有产品 A？如

⑥ 数学附录A中叙述的模型包含了框 E 中叙述的决策问题。

⑦ 我们把家庭的行为表示为动态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表示为由许多重复和互相连结的基本过程组成的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用新古典方法解释的事件和不能为它所解释的事件彼此连结，互相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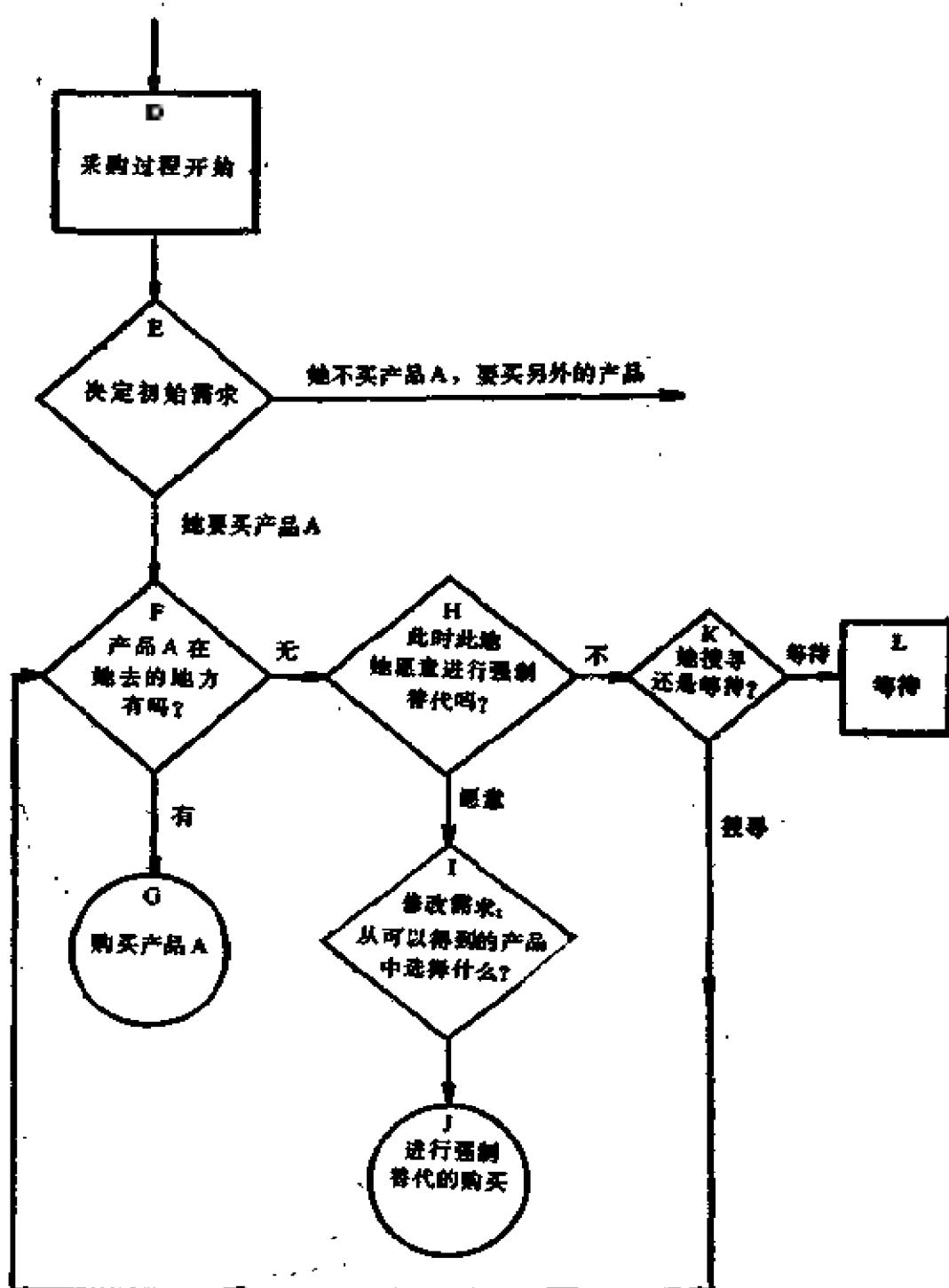


图18-2 初始的和修正后的需要的形成

果答案是有, 主妇就到达了采购过程的终点, 框 G, 这里表示成功的购买。

一般微观经济学模型到此为止，因为它甚至没有提出框 F 所提出的问题，即产品是否存在。它暗中假定产品总是存在的。然而，在现实中，这一点对于任何体制都不是必然的。即使在那些只存在极少短缺的体制中，消费者也不会在他去的第一家商店就找到一切商品，将会发生一些搜寻和强制替代。这种情况更适用于短缺经济。

这里我们回想一下第 5·5 节关于度量需求时所讲过的话。要知道买者是否实际上买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供给和需求正好相等是不够的。只有当产品 A 和 B 的卖者的存货都有存留时，才能证明买者确实在购买 A 和 B 的数量方面作出了自由决策。消费者主权的必要条件是每一种商品都有过度供给。

我们现在来看框 F 中问题的答案是否定时的情况：在第一家商店里找不到产品 A。框 H 是下一个两难题：我们的买者愿意在她所在的商店里立即实行强制替代吗？如果愿意，她就来到框 I，在那里她必须提出修改后的需求。她从可得到的商品中选择什么？她是否放弃最初的选择，产品 A (250 克火腿)，而另外从可得到的产品 B、C、D 等等中作出次优的选择？如果我们不看前一次行为，这个第二次选择似乎又可以成为“新古典的决策情景”，因为从这样范围缩小了的一组替代物中，她再一次根据自己的偏好，考虑相对价格而确定修改过的需求，并在框 J 中实现决策。

如果该主妇不想立即实行强制替代，她就进入了框 K，这时又怎样呢？她可以选择等待。今天下午什么也不买，而是从家中存货里选点什么做晚饭。等待（框 L）将于下一节讨论。或者，她可能有其他选择，例如：搜寻。这可以在程序中以一条循环线来表示。买者返回到框 F，从那里再次开始。如此循环不已，直到主妇找到了她最初需要的商品，或者耗尽了时间，或者失去了耐心而决定修改需求，进行强制替代，或者直到她决定推迟购买。

在反复进行搜寻之后，也可能证明从整体来看某类产品存在

绝对短缺，这类物品也没有替代品。例如，在肉类产品中，不论买者实行什么强制替代，有可能甚至全部肉类供给也不能满足需求。这很明显是一种比可以或多或少由强制替代得到补偿的相对短缺要严重得多的短缺现象。

即使在绝对短缺的情况下，仍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家庭用来买东西的钱干什么？这正是我们下一节的主题。

18·4 过程的货币反映：强制支出或未支出的货币

图18-3是前图的继续，前图中最后的事件又出现在本图左上角。框 L 表示没有任何特定目的的消极等待；买者已经推迟了决策^⑧。也许，在一段时间之后，她再次试图按原来的初始需求行动。她也有可能改变主意。

框 M 说明的问题是：当她等待时，预定用于购买所需商品的货币会怎样？有两种可能性：强制支出的框 N 和代表货币仍未支出状况的框 P。

理论的考虑促使我们区分强制替代和强制支出。我们不接受效用论的下述命题：对消费者具有正边际效用的每一种消费品和服务在广义上都是另一种的替代品。这意味着我们即使消费较少的产品 A，只要我们用其他任何一种具有正边际效用的产品 B 的额外消费来补偿这种损失，效用函数的值就保持不变。我们认为，下述事实比上一命题重要得多：消费品的主要类别组是互补的。如果我们在一组中落后得相当远，就会损害由其他组带来的满足。

假如那些在纯理论层次上主张“普遍可替代性”原则的理论家得知，他们的论证和那些试图掩盖短缺经济中消费品市场上困难的人的推论完全一致的话，他们是会感到羞耻的。那些试图掩饰问题的人的通常理由是：确实，肉类供给存在问题，但每家有

^⑧ 排队是等待的特例。（参见4·5和17·7节）这一点在本流程图中没有表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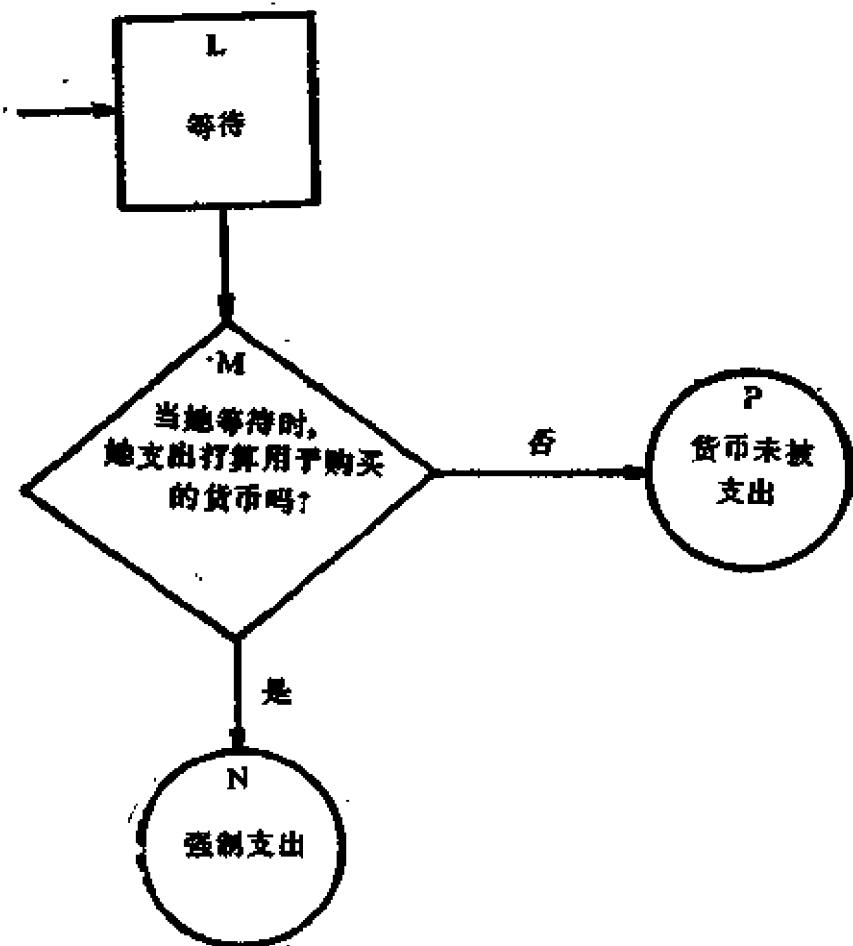


图18-3 强制支出和未支出的货币

一台电视机。住房短缺，但商店中有丰富的衣料出售。而事实上，消除某一产品组的短缺并不能补偿由于缺少其他产品而遭到的损失。

我们不打算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强制替代和强制支出这两个范畴，本身在逻辑上看来是分得很清楚的，许多事情可以毫不含糊地归于这一个或另一个范畴。我们继续用前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家庭主妇买了香肠而不是火腿，这是强制替代。如果她空手离开了商店，并在回家的路上为孩子买了一件玩具而不是用这笔钱买了原定的火腿，这是强制支出。强制替代立即填补了缺口，而强制支出在身后留下了缺口，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个缺口是

对于肉的未满足的需求。也确实有边缘情况，^⑨但在我们的理论分析结构中，不需要研究这些情况。

强制支出是对那些并非初始需求的物品的支付，它正是由于初始意图受到挫折而引起的。我们在初始意图的形成和进行替代活动之间没有规定一个严格的时间单位，因为后者仍被看成是前者的继续。它也许是一小时，一天或者一年，这要根据初始需求产品的性质和价值而定。为准备晚饭的不成功的购买，可立即进行强制支出，但如果因为短缺，某人完全放弃了得到某些比较昂贵的耐用消费品的念头，那么在决定将这些钱用在何处之前，他也许要犹豫一个较长的时间。

关于强制支出，我们强调指出三个原因：

(1) **消费者急躁**。许多消费者觉得，即使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物品，但总买了东西。“随便买点什么，只要能给我们满足和愉快就行。”

(2) **消费者“机动”**。在短缺经济中，机警的消费者并不在他真正需要商品的时候购买，而是能到手就买。他可以提前几个月购买所需的物品。事实上，他甚至可以积累一个保险余额，因为以后可能得不到这种商品。家庭领域中的这一现象同我们在企业部门称之为“囤积”^⑩的现象相对应，但也有区别，家庭进行囤积的财力更加受到限制。

因而，如果主妇在食品店既没有得到最初打算买的东西，也买不到较合适的替代品，她仍然会四处走走看有没有什么好买。如果她发现了什么使她感兴趣的东西，就买下它——即使这种东西与她最初要买的东西完全不相干。

(3) **通货膨胀预期**。消费者越害怕货币贬值，他越是急于把货币花出去。当然，这种动机的力量取决于通货膨胀率（或者，

⑨ 用兰开斯特的消费者行为模型，我们可以给出如下精确的描述：不同的产品怎样在一种或几种属性上彼此成为替代物。见兰开斯特（1957, 1966）。

⑩ 见第5·6节。

更准确一点说，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和银行存款利息率之差）。在物价缓慢上升时，没人急于花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也可以鼓励花钱。

消费者什么时候进入框 P，也就是说，虽然有以上三种原因，什么情况下货币仍然留在手里未被支出？对此我们着重指出四种原因，这四种原因既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同时出现而彼此加强。

(a) 摩擦。买者缓慢地和困难地适应于供给。虽然他明白不能以他所期望的方式支出货币，但在找到一个新的花钱门路之前仍需要有一段时间。购买者的情性削弱了强制支出。

(b) 各种物品和服务的广泛的短缺越严重，越难以找到可买的商品。这和上面的(a)有关，特别是对较保守和情性较大的买者来说，更不愿意进行强制支出。

下一个现象(c)即使不可能从数量观测中加以区分，但至少在理论上可与(a)和(b)的情况区分开。

(c) 当消费品市场上的短缺严重到和普遍到一定程度时，买者可能发现他的货币是不可支出的。如果短缺在许多个别市场上都非常严重，如果，更进一步，短缺或许还有行政规定使储蓄不可能用于昂贵的耐用品，象小汽车、旅游，或者建造合作公寓或私人住宅，那么，一部分在家庭中积蓄起来的货币就在这个词的狭义上成为不可支出的。这是由短缺导致的强制储蓄的极端形式。

在过去十到十五年中，这种现象在匈牙利已很罕见。随着经济管理的改革，因为增长率已经有所节制，市场的正常状态已经改变了。有短缺存在，但它们的强度在若干消费领域中已经减弱。消费品供给更充分了。货币可以用于诸如旅游，建造合作公寓或住房，以及其他事情上。虽然消费品市场上仍然有相当程度的吸纳，也经常发生强制替代和强制支出，但消费者几乎总还是能找到某一种商品作为强制替代品或强制支出的对象。（新闻界经常说这种状态的特点是只有局部短缺而没有普遍短缺。）因此，以不

可支出货币的形式出现的强制储蓄，已不是匈牙利消费品市场现在的特点。

(d) 货币没有支出，也许是——和以上所讲的采购过程无关——因为消费者有储蓄的强烈愿望。因此，他坚决拒绝任何未经计划的支出。如果某一项购买意图未能实现，他就把余下的钱加到他的存折里。这和另一种现象紧密相关。等待和排队通常涉及或甚至要求保持货币的流动性。下一节将详细讨论货币储备的形成。我们只想指出，到此为止，关于家庭如何到达框 P，我们只给出了一半解释。我们突出的是“反面”的原因：它之所以到框 P 是因为它不去框 N 实行强制支出，正面的动机将于下一节解释。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短缺可能导致未支出货币的留存，但并不必然如此。

18·5 家庭储蓄的动机

要解释为什么货币未被支出，必须从阐述概念入手。“储蓄”一词有很多解释。我们使用如下定义：某一时期的储蓄是某经济单位期初和期末所拥有的货币存量之差。^⑪因而，储蓄就是一段时期内货币存量的增加额。^⑫

我们现在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家庭积蓄货币进行储蓄？^⑬我们并不想寻求一个完美的答案，而只想列举几个重要的动机。

^⑪ 我们所说的净“货币存量”，应解释为：现金存量加债权存量减债务存量。我们假定期末存量不小于期初，即，差是非负的。在期末存量小于期初时，就产生了负储蓄。

^⑫ “储蓄”这个词通常有三种解释。(1)某经济单位在某时点的货币总存量。(2)某个时期货币净存量的增加额，(3)某时期在计划开支和实际支出之间的差(正值)。我们用第二种解释，而不涉及关于另两种解释是否正确的概念之争。

^⑬ 在凯恩斯(1936a, b, 第九章)那里可看到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储蓄动机的古典分析。

在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家庭的储蓄时，我使用洛科的研究成果。

(1) 交易动机。货币是间隔性地流入家庭，它到达的时间和应该支付的时间可能不同。为弥补这一缺口，需要货币的储备。就其本身来说，它的意义是有限的，交易动机在任何货币经济中都起作用。但在短缺经济中不同的特点是：因为等待和搜寻而使交易延长。这可能会使货币持有量增加。

(2) 自愿事先储蓄。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贵重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消费变得更重要了。首先要买电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然后花钱买小汽车和到国外旅游。这些都是大笔一次付清的项目，其中极少有实行分期付款的*，绝大部分必须用现金支付。这样，购买用款就不得不提前储蓄。在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总住宅建筑中私人资金的份额在增长。房屋建设成本中银行贷款只占资金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需要用事先储蓄来支付。这里我们不仅仅是指未来住房所有者本人的储蓄，而且也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其他亲戚的储蓄在内。

动机(2)和短缺有关，但只是间接的。在卖者碰到销售困难的体制中，卖者试图通过分期付款和其他的消费信贷形式来方便和刺激购买。短缺经济中消费信贷的低水平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销售在这里不成问题。无论如何，家庭总是愿意做出包括事先储蓄在内的巨大牺牲来得到渴望的产品或服务。对于反映销售的困难和短缺强度来说，消费信贷和总销售额之比，是一个相当可靠的间接指标。

储蓄动机(2)和三个解释性因素相连：恩格尔定律(当总消费额增长时，花在贵重耐用品上的份额增加)；分配中市场方式份额的增长(特别是当人们更多地以自己的资源建造住宅时)；最后，还有短缺。和动机(2)相连系，我们应该也强调指出：家庭用于小汽车或住宅的储蓄，并不是因为这些钱花费不掉而将它们置之一旁，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在长期等待之后，可能会有上述

* 我们应该提醒读者，这里的讨论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储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则不同。——原编者注

极吸引人的花钱机会。

(3) 必须有的事先储蓄。有一些组合的分配方式，它们要求买者提前储蓄部分或全部购买用款后，才能加入排队或提出申请。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排队等候买小汽车时，情况就是这样。

前面关于动机(2)所讲的话，也适用于这种动机。很明显，虽然这一现象同短缺密切相关，但这不是因为货币“不可支出”而变为储蓄的那种情况。刚好是因为存在买短缺物品的排队，买者才被迫提前支付部分购买价格。

(4) 购买者的机警。我们在前面讨论强制支出时讲过：短缺经济中，机警的买者并不是在他要消费一种物品，而是在能得到这种物品时进行购买。大家都说，应该劝告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带一个购物袋，以防万一碰上了什么值得购买的东西。如果他看到排队，仅仅是为了保险起见，也应该排上去，然后他可以再打听正在卖什么。如果有这么多人要这件东西，他也一定要。

但是，以这种机警方式行动的人，不仅需要一个采购袋和一双好眼，而且也需要钱。一旦他加入了排队，轮到他时就必须付钱。对于需要保持“机警状态”的市场的数目，各个家庭之间是不同的。有些人只盯着食品和其他便宜的消费品，他们只需要持有少量的流动货币储备。某些寻找较贵的耐用品——录音机、电唱机或其他家庭设备——的人则必须积蓄一笔大得多的货币储备，以便能利用任何到手的机会。一旦家庭决定买一套需要支付现金的住宅，小块土地或别墅，它就必须拥有非常大的一笔钱，以便不错过有利的机会。

对多数项目来说，供给确实是变幻莫测，时断时续，市场无法预计。当然，这正是短缺的反映。就这方面来说，为动机(4)而进行的储蓄也是由短缺产生的。供给越是变幻莫测，家庭就越是被迫积累货币储备，储备量取决于渴望水平。但即使在这里，钱也不是不可支出的，只是不知道适当的时机而已。

(5) 谨慎动机。每种体制中都有这种动机存在。人们为了防老而攒钱，或者为准备因事故、疾病所引起的无法预料的开支，或不可预见的困难而积蓄。的确，医疗费、养老金等等由国家保证，但它们的量不能和多数人不断提高的愿望或他们希望在生病或退休时保持的生活标准相一致。实际上，也可能得到个人保险，但它们提供的选择方案也许不能足够多样化和吸引人。无论如何，许多人依靠自己实行自我保险，以应付上面所谈的多种意外事件。^⑩

长期以来，家庭以货币储备的形式建立保险储备似乎是无需证明的。然而，当收入普遍增加时，高收入阶层日益增多地用珠宝、工艺品、别墅等实物形式来积蓄保险储备，这样他们就同时达到了多种目的。

(a) 只要这些物品归他们所有，他们就享用这些物品，而货币则没有这种好处。

(b) 在需要的时候，这些物品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可以很容易地卖掉。这意味着它们起到了保险储备的作用。

(c) 这些物品比货币能更好地保值，货币可能受到爬行的或加速的通货膨胀的威胁。我们讲过，通货膨胀预期是花钱的一个动机。现在我们可以补充如下：任何通盘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不会把钱白白花掉，而是将它投资于可以保值或甚至增值的物品。这样，就存在着投机动机——下面将把这种动机作为动机(6)而单独讨论。此外，这种保值和增值的功能是自动完成的。认识到某些实物具有这种性质的人越多，对它们的需求将增长得越快，而且比它们的供给能增长的比率快得多。众所周知，土地，私人所有的家庭住宅，别墅以及工艺品的价格比一般价格指数上涨要快得多。

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进行货币投机的大量机会，没有债券和

^⑩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害怕失业也促使人们建立预防性储备；这一动机不适用于充分就业可以得到保证的社会主义经济。

股票。实际上，家庭预防性储备可采取两种形式：货币储存（现金或储蓄存款），或可以很快卖掉的，其价值甚至可能增加的物质资产。因为后者完全不能流动，即使出卖它们并不特别困难。家庭就根据他们的流动偏好同时用两种方式储蓄。^⑩这两类储备在过去和将来的增长率应该由经验研究来说明。

（6）投机动机。法定的银行利率至多使人们不让钱白白呆在家里，而是去开一个储蓄户头。就我们所知，银行利息并不能作为收入来源而鼓励任何人进行储蓄。

有时我们听说私人以比银行高的利率放款，但这种情况看来极为罕见。

如果投机动机果真影响了储蓄，那么这大部分是以（5）中谈到的形式发生的。任何想使他的钱产生利润的人，都把钱投资于象土地或别墅一类的物质财产。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总的结论。在抽象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把由短缺产生的储蓄和与短缺无关的储蓄区分开。除非短缺极其严重，货币无法支出这一事实在由短缺引起的强制储蓄中只起着相当小的作用。通过动机（2），（3）和（4）而运行的、短缺的间接影响的作用则大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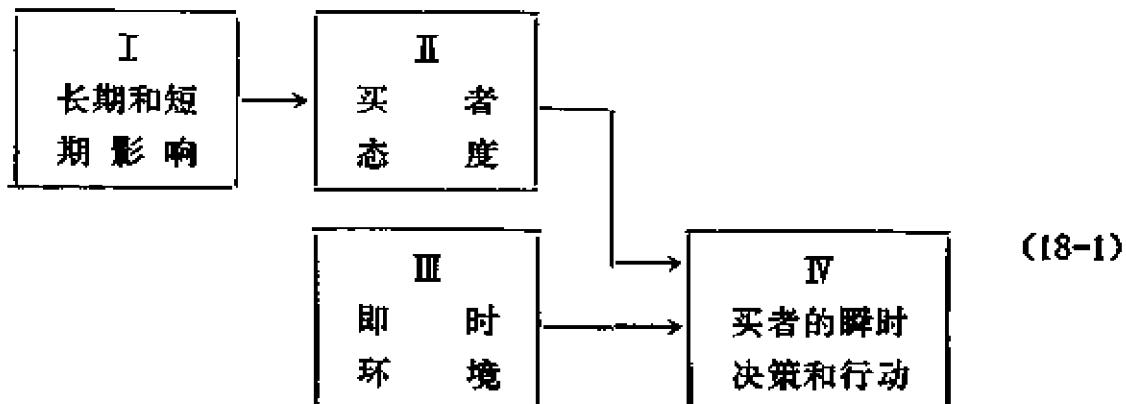
现实中，不可能根据动机而把储蓄的福林贴上标签。此外，各种动机经常是互相联系的。例如，父母可能为防老而存钱（动机（5）：谨慎性储备），但当他们的儿子排队买汽车时，他们可以暂时把钱借给他（动机（3）：条例规定的事先储蓄），两种原因同时起作用。自愿储蓄和由短缺引起的储蓄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抽象，这种抽象使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概括容易一些，但在实践中这种区别能否由数量的观测和度量加以区分，却不能肯定。

^⑩ 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私人储蓄存款的各种形式之间没有重大的区别。活期储蓄利率为2%，一年定期储蓄利率为5%。虽然储蓄户主在一年之内取款就不会得到任何利息，但定期存款也可以不加通知地提取。

18·6 买者态度

当说到家庭储蓄时，我们已经离开了18.2至18.4节的探讨，那里我们叙述了亚微观层次上各种基本事件的顺序，买者在一次采购过程中的瞬时调节。而在储蓄的情况下，我们开始考察家庭行为的连续特征，它的短期和长期调节。让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下面我们考察影响买者需求，或者更一般地说，影响买者态度的长期因素。这个主题在第四、五、七和十四章中，对于企业的情况已经详细分析过了。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能将那里陈述过的思想，经过必要修改后，一项一项地应用于家庭的情况。我们必须满足于只讲几点意见。

公式(18-1)用逻辑关系图的形式解释了家庭行为的相互关系：



箭头表示原因和结果的方向。我们反方向进行讨论。框Ⅳ包括了在采购程序中已经叙述过的那些决策和行动。这些决策和行动是两组因素的结果。一组是即时环境的影响(框Ⅲ→框Ⅳ)。我们举出以下变量作为例子：现行价格；买者对于前不久和即时供给的直接经验和信息；商店里排队的长度；预计排队时间等等。

影响买者瞬时决策和行动的另一组因素包括他的性格，他的行为的长期特征，这些可概括为他的态度(框Ⅱ→框Ⅳ)。其中包括：他的固定的行为方式，正常标准和容忍限度，决策和行动

的惯例，经验方法，以及标志他的行为特点的参数。在这里只列举出构成买者态度全部组成因素中的几个：

- (1) 在平行分配的情况下，使用不同分配方式的倾向；
- (2) 自愿替代倾向和初始需求函数；
- (3) 强制替代倾向和修正过的需求函数；
- (4) 搜寻倾向；
- (5) 等待倾向；
- (6) 排队倾向；
- (7) 强制支出倾向；
- (8) 储蓄倾向；
- (9) 描述他争取卖者所作努力的参数。

读者可在态度的组成成分和采购程序的各步骤之间找出对应关系来。

买者的排队倾向，实行强制替代的倾向以及他的态度的任何其他成分，确实都可能随时波动。然而，如果观察许多买者在不同情况下反复进行的购买，我们就能找出明确的随机行为规律。也许我们能确定决定态度的各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或者至少我们可以陈述在一段长时期内买者的不同人口组的平均行为特征。^⑩

家庭部门所有人员^⑪的平均态度是既在长期又在短期内发生作用的许多因素下形成的。这种影响在图中由框 I 对框 II 的影响表示。我们仍然不求完整无缺，而只粗略谈几个具有长期影响的因素。

⑩ 框 II、Ⅲ和Ⅳ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许多方法来建立模型。我们这里不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对买者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与瞬时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形式化的可能，可以在数学附录A中找到。

⑪ “人员”这个词在这里既可以表示所有的买者，又可以表示它们的某些相对同类的组。在后一种情况下，框 I（长期影响）和框 II（态度）可由不同组（人口组）的分析得到说明。对 I 和 II 之间关系的更细致地考察，自然会得出对这些因素的更详细的解释，这些因素对买者行为长期特点的形成起作用。

(a) 家庭的社会地位，家庭所属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这包括它通常的货币收入，职业、教育水平，性别，家庭成员的年龄，居住地点(大城市或小城镇、村庄)，等等。一般微观经济学强调货币收入。这当然是消费的一个极重要的决定因素，但经验可以证明，具有同样货币收入的两个家庭的消费习惯，可能由于以上所列举的诸因素，以及那些根本没讲到的因素而显著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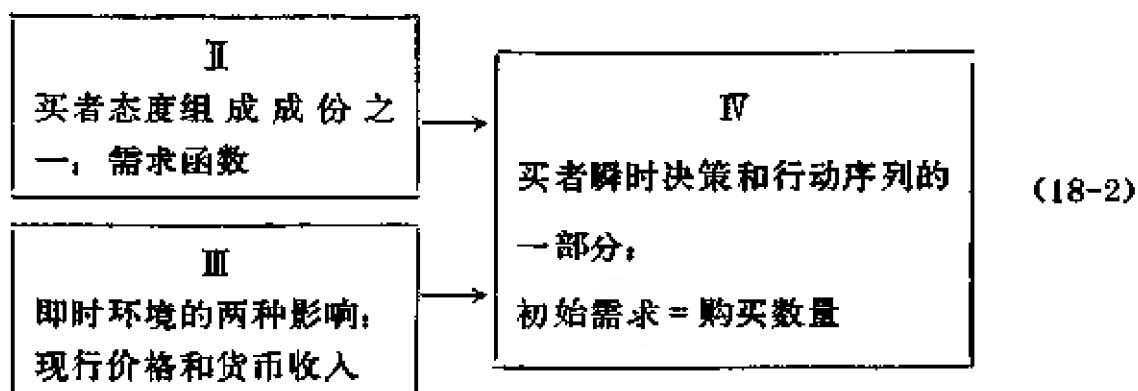
(b) 供给的通常构成。把需求和供给函数看作是彼此独立的，这只有在瞬时调节的模型中才有用。事实上，在长期过程中，需求主要是供给的函数。生产者可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形成了人们的需求。

(c) 市场正常状态。这里我们的讨论限于吸纳式经济。如果偶尔的强制替代频繁地反复出现，它早晚会成为习惯。在(b)中我们说过，在长期过程中，新产品使消费者习惯于新物品，所以我们现在在(c)中要强调指出：短缺使消费者不习惯于旧物品。因此，在这方面，需求在长期过程中也是供给的函数。

(d) 消费品的正常相对价格。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某些物品和服务的消费价格由于政府补贴或免税而固定在低水平上，同时其他物品则由于税率高于平均水平而维持高价。下一章将更详细地讨论消费品价格。这里我们只想着重指出：长期相对价格对消费习惯有着重大影响，即使相对价格瞬间脱离它的长期比例，消费习惯也不会轻易改变。

公式(18-1)和它的解释只勾画出了家庭行为理论的极简单的轮廓。但是它却搞清了这里的探讨和一般微观经济学的家庭模型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点。为了使这种比较更容易进行，我们可以用同(18-1)式类似的方法，将新古典模型形式化。^⑩

⑩ 这种形式化相当武断，这很不幸，但又是不可避免的。一般微观经济学通常并不说明它的概念(需求、价格、收入)在瞬时、短期和长期调节中是否是变量。它不明确说出它的假设，即：在满足需求方面，不存在供给约束，等等。因此，为了使(18-2)式和(18-1)式可比，我们不得不引进了武断的补充假设。



框Ⅳ只选出了我们多步骤采购程序中的框E。那是决定初始需求时的基本事件，在18·3节我们指出，这里买者暂时以新古典方式行动。该模型假定，买者从这里直接转向框G，进行购买，因为供给方面对此没有任何障碍。

只要对于这一事件的这种解释成立，在框Ⅱ中我们就只能发现构成买者态度的许多成份中的一个，即需求函数。同样，在框Ⅲ，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即时环境中，也只是挑出了两个变量：价格和货币收入。

最后，最重要的区别也许是沒有框I，也没有它和框Ⅱ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形成家庭态度的短期和长期因素的影响，被摒弃于模型的范围之外。^⑩

18·7 消费品部门的短缺指标

本书前面提出的观察和度量的原则，也适用于度量消费品部门的短缺现象。这里没有必要再详细复述。我们只希望读者能再次对加总原则引起注意。

要完整地描述某种情况，需要成百万个数字，但汇编资料的

^⑩ 我们这里的思想和《反均衡论》(科尔内, 1971a, b, 第十和十一章)中陈述的偏好次序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尽管术语不同，在某几点上我们也同意其他作者的观点。例如，可参见，霍奇(1962, 1972, 1979)，霍夫曼(1977)，安德森(1978)和沙克尔(1972)。

代价太高，也不能对其结果进行概括。因此，进行度量必须是“浓缩过的”。我们没有必要反对局部的加总。然而，对于那种把相反符号的数值进行相减得出的总量，我们应该警惕。如果双日有短缺，单日有滞存，我们不应该说，一段时期内平均起来存在均衡。

表18-1列出了各种指标，它们可以用来表示消费品部门短缺现象的特点。我们不涉及如何观测和度量的实际问题。表格本身大部分是不言自明的，只需要做很简短的说明。

消费品部门的短缺指标

表18-1

普遍现象	特殊现象	指标的具体内容
1. 行政配给产品的短缺	1-1 行政分配的住房的短缺	排队人数 等待时间长度 强制替代 (所要求的住房和分配的住房之差)
	1-2 托幼组织和教育机构短缺	被拒绝的申请人数 工作人员承受负担的指标 建筑物和房间拥挤的指标
	1-3 医疗服务短缺	在候诊室里花费的时间 排队时间(按顺序排队) 建筑物和房间拥挤的指标
	1-4 电话短缺	等待安装电话的人数和等待时间 线路超负荷指标
2. 市场分配的产品的短缺	2-1 绝对短缺：对不存在替代品的各类产品的未满足需求	短缺范围 短缺频率 短缺的时空分布
	2-2 备件短缺	频率 时空分布 用机器停工时间来度量的损失

续上表

普遍现象	特殊现象	指标的具体内容
	2-3 强制替代 强制替代造成 的消费者损失	按替代品接近的程度分类 频率 分布 可以客观度量的损失 用货币表示的消费者对损失的主 观感受
	2-4 搜 寻	为买到如意的东西去过的商店数 搜寻时间
	2-5 等待、排 队	实际排队时间 实际排队长度 按序号排队时花费的时间 按序号排队的长度 商品不正常的存货、交货间隔时 间
3. 间接表示 短缺的指 标	3-1 行政配给和市 场分配的产品 的相对价格	
	3-2 黑市和“灰” 市	黑市和“灰”市的交易额 合法、半合法和非法交易的相对 价格
	3-3 购买耗费的 全部时间	
	3-4 卖者争取买者 所做的努力	广告 包装 送货上门
	3-5 买者争取卖者 所做努力	小费的增加
	3-6 消 费 信 贷， 分 期 付 款	
	3-7 消 费 品 在 销 售 点 的 存 货	

普遍现象	特殊现象	指标的具体内容
	3-8 家庭储蓄 的增长	根据原因和动机分类
4. 短缺对民 众普遍意见的影 响	4-1 动态观察： 公众意见 随时间的变化 4-2 与渴望和期待 的比较 4-3 根据人们感觉 到的不满足程 度对各种短缺 现象的排列	

1. 行政配给中的服务项目。我们提请读者注意第十二章讲过的思想：当生产能力高度利用时，边际社会成本也在急剧上升，这能够部分地由这里提到的或类似的指标加以定量化。

2-3 强制替代所造成的消费者损失。我们可以用采访的方法，询问用 B 替代了短缺产品 A 的消费者，为了要想得到 A，他愿意比 B 的价格再多花多少钱？如果答案是可靠的，它就表示了强制替代导致的“消费者损失”。^② 虽然对个别答案的可靠性可能会提出疑问，但采访许多人也许有助于搞清强制替代的主观成本。

2-4 和 2-5 搜寻、等待、排队。对买者在进行购买之前必须跑几家商店，以及在等待和排队时花多少时间，可进行许多随机观察。^③

3. 间接指标。这些指标不度量短缺本身而是度量短缺的后果或者伴随着的现象。

② 第十七章中已经解释过消费者损失（负消费者剩余）的概念。

③ 在由搜寻、等待和排队引起的消费者损失方面，可见普约尔的文章（1977）。普约尔文中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是萨洛伊（1972）。

3-2 黑市和“灰”市。这些市场的范围和要价取决于：第一，短缺严重到什么程度，第二，主管部门和社会对这些非法和半合法活动的打击严厉到什么程度。大量发生的活动和高昂的价格能使我们得出短缺严重的结论。高价和相对稀少的事件也许意味着价格由于严厉惩罚的风险而被抬高了。

3-4、3-5和3-6，相对市场力量。这些指标间接显示了是卖者还是买者处于更有力的地位。

3-7 消费品存货。在第六和第八章中我们强调指出：从产成品存货的增长中只能得出有关市场状况的谨慎的结论。非生产性存货的改变并不立即影响消费者。只有生产性存货的增加才直接表示短缺在减弱，反之亦然。

3-8 家庭储蓄。财务资料必须由试图说明储蓄原因和动机的采访加以补充。（见18-4，18-5和18-6。）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储蓄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与短缺强度的变化有关。

4. 公众意见。指标组1—3描述短缺强度。我们用第4组中的指标来表示一定的短缺强度如何影响人们的情绪和意见。^②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民意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若干种方法，来相当可靠地了解人们的主观反应以及他们满意或不满意的程度。

虽然表18-1仅仅是说明性的，但它意味着消费品部门的短缺是可观测和可度量的。^③这一点做起来也许很难，结果肯定也不会准确。然而这样的工作可以阐明一些极为重要的现象。可惜的是：至今还没有普遍地和定期地作出尝试，用统计上可比的方式观测和度量短缺现象。顶多能得到零零散散的数据。这给理论分析造

^② 丹尼尔的文章（1977a）提醒大家注意，需要对不同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方面，作为相互关连的因素，同时平行地进行观察。换句话说，必须同时观察这些现象本身以及它们在人们情绪中的反应。

^③ 对于消费品市场上短缺的度量，请参见帕洛斯—平特（1978）和拉德诺蒂（1978）的文章。

成了极大困难。不仅如此，它使经济政策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柱。这对于我们认识各种社会制度，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来说，是一个严重缺陷。

改革后的上一个十年中，匈牙利报界多次声称“消费品市场上的均衡状况已经改善。”^②这种说法大概是想指出：今天许多短缺现象的程度较轻，有一些甚至已经消失了。根据作者的印象，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不幸的是，在缺少综合的、定期的和可比的观测和度量的情况下，这还只能是一种印象，而不能被严格证明。

18·8 消费品价格和短缺强度：初步探讨

以上关于家庭行为进行的研究，使我们现在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消费。我们已多次接触到了价格的影响，现在我们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当重温采购程序时，我们叙述了亚微观层次上的各个事件，包括在进行框E时，消费者如何权衡相对价格以决定初始需求。现在我们在总量的层次上来考察价格和短缺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的出发点是经常提到的这一事实：家庭面临硬预算约束。因此，它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是以一种对消费论来说熟知的方式进行的，需求是价格的减函数。

虽然这种基本关系成立，并已在文献中得到详细讨论，^③我们对仅有这一个命题并不能感到满意。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各种短缺现象频繁出现的市场。图18-4说明了短缺强度和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画图时，我们从下列假定出发。^④

② 这种表述本身已在第7·9节中进行了讨论。

③ 见希克斯（1939a, b）或萨缪尔逊（1948a, b），亨德森—匡特（1958），格林（1976）的教科书、文献。

④ 与采购程序中使用的假定和18·1节中列举的假定相比，这里的假定稍微有些不同。

(1) 我们考查某一类产品的特殊市场。本类之内的各种产品或多或少可以彼此替代。生肉和各种肉制品的肉类可作为一个例子。

(2) 我们叙述较长时期，比如说一年之内的市场行为，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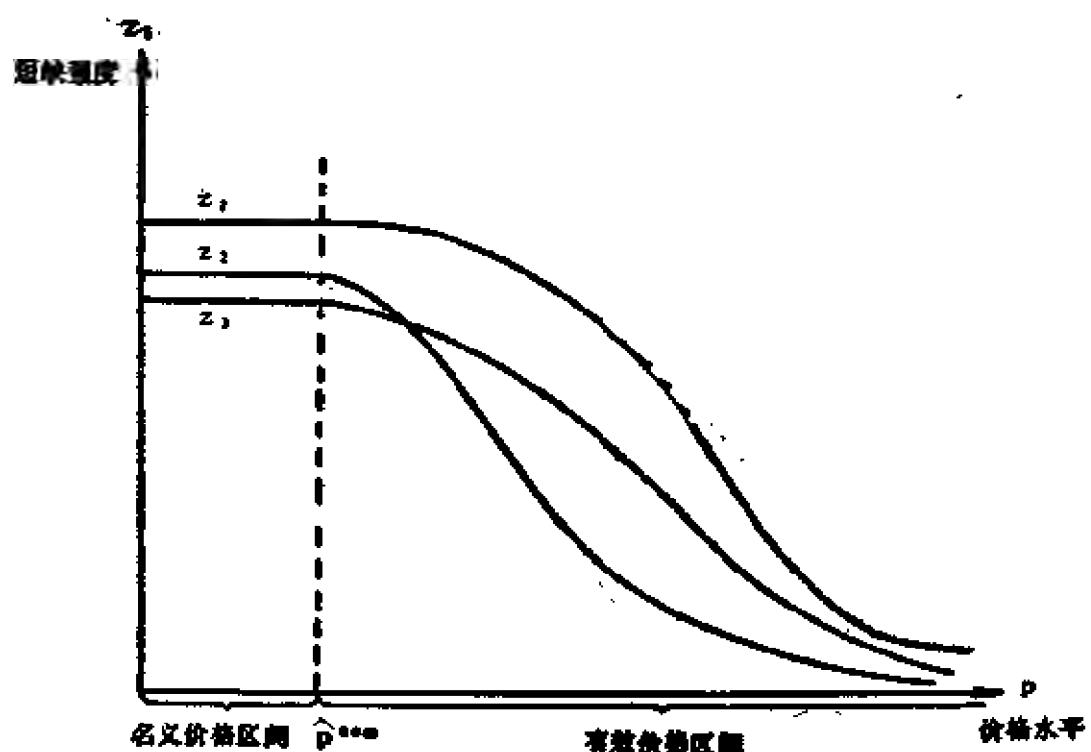


图18-4 消费品价格和短缺间的相互关系

(3) 卖者的初始存货是既定的，同样，在此期间的交货量也是既定的。我们只考察买者对价格如何反应，而不考察卖者的反应。

(4) 供给只供应家庭，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不能购买。

(5) 家庭的预算约束（货币的初始储存和在此期间得到的货币收入）是既定的。他们在所考察的特定市场上打算支出的总货币数也是既定的。

(6) 在既定的价格和名义收入下，家庭的初始需求既定。

(7) 市场上影响调节的摩擦是既定的。^②这是下述情况的结果：买者在制定自己意图时的不确定性，他们缺乏关于供给情况在时空上分布的信息，也缺少卖者对买者打算的信息，等等。

(8) 此市场以外交易的所有其他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是既定的。

(9) 任何一类产品之内的相对价格都是既定的。在一类之中每种产品的价格都要被一个正价格因数 p 相乘。和其他类产品的价格相比， p 的每一升降都提高了本类每一种产品的价格。因此， p 叫做这一类产品的价格水平。

假设(3)一(9)合起来，意味着我们在考察当其他情况不变时，价格水平 p 变化带来的影响。

(10) 短缺用指标集合 z_1, z_2, \dots 描述。前一节对此已详细讨论。在图18-4中出现了其中的三个指标。因为此图仅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我们没有具体指明出现了哪几个指标。

现在我们来考察图中函数 $z_1 = z_1(p)$ 的性质。

价格轴可分成两个区间。17·2节说过，如果价格小于临界值 \hat{p}^{min} ，家庭对价格就无反应。在名义价格区间内，短缺指标取特殊值，图中以水平线表示。它们之所以是水平的，是因为只要价格低于临界值 \hat{p}^{min} ，它们就和价格无关。

然而，如果价格进入了有效价格区间，那么价格的每一次增长就阻止了新的买者进行购买。这里我们讨论一个复杂的随机现象，这种现象我们继续用前述例子来说明。假定在价格 p_1 时，100个主妇中有40人希望买火腿，但只能满足10人的需求。供应的物品以随机方式分布于不同商店，主妇也以随机方式去各商店采购。每人得到火腿的概率是四分之一。我们假定，每一个没采购到火腿的人都进行强制替代。因此，可以预计进行这种替代的比例是0.75。我们把这种比例作为短缺指标之一。现在，在价格 $p_2 (p_2 >$

^② 第八章已讨论了摩擦。在8·7节中我们引进了指标向量 w 来度量它。

p_1)时,如果40人中有10人自愿放弃了买火腿的意图,其他的人进行成功购买的概率就是三分之一。预期要实行强制替代的比例将降到0.67。

如果有排队,排队的长度也就缩短了,等待时间也减少了,等等。^②归根结底,短缺强度是价格水平的减函数。

我们可能会问:图18-4中的函数 z_1 为什么不和横轴相切。难道不能找到一个价格水平,在这点上短缺可以完全消除吗?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画了图18-5。从前图的三个短缺指标中我们选出一个,现在用一个一般的标志,叫它指标 z_1 。但现在我们画出了这个指标的三个函数,而不是一个。

我们必须修改构成图18-4基础的几个假设,也就是假设(3),(6),(7)和(9)。我们希望把下列事实考虑进去:在观察期间,供给、需求和相对价格可以在或多或少摩擦的情况下,彼此调节适应。描述摩擦程度的指标向量 w ,现在不仅包括非价格变量,而且也包括影响相对价格调节的摩擦。除此之外,它的解释和第八章相同。所以, $w=0$ 代表毫无摩擦的调节。

谈到假设(3),我们继续假定:在此期间可得到的总供给量,在按基期价格度量时是既定的。只有总供给中的产品组合可以在调节过程中改变。

图18-5中的横轴继续代表此类产品的价格水平,而纵轴标出第*i*种短缺指标的值。我们看到了三条等摩擦曲线。如果调节是完全的: $w=0$,则最下面一条有效。需求、供给和相对价格彼此进行完全调节,没有滞后。这条曲线和水平轴相切,表示短缺可以完全消除。和此点相应的价格水平用 p^{wall} 表示。这就是这一特殊市场上的瓦尔拉斯均衡价格水平,在这个价格水平上短缺完全消除。

然而,现实中调节永远不能免于摩擦。惰性,决策者的摇摆

^② 更详细的说明请见数学附录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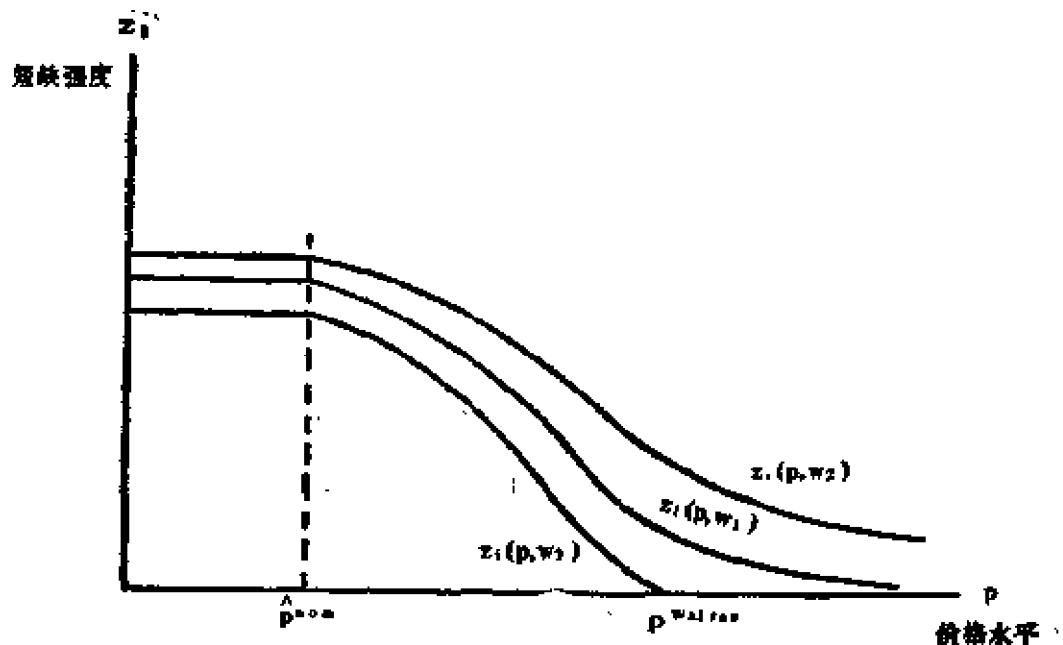


图 18-5 短缺、摩擦和价格水平之间的三重关系

和当事人对彼此决策的不确定性，都导致需求、供给和相对价格的调节有时滞后。因此，任何实际市场上都必然出现短缺现象。指标 w_1 的值代表一个具有较好的但不完全调节的市场， w_2 代表调节较差的市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 p ，在这一点上，这个市场上的每一个买者任何时候都碰不到短缺。这就是为什么函数 $z_i(p, w_1)$ 和 $z_i(p, w_2)$ 不和横轴相切的原因。

在一切其他因素，特别是总供给和家庭名义收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减少短缺？我们借助于图 18-6（它是图 18-5 局部的重现）来回答：图中选择了两条等摩擦曲线，或者更准确地说：各取了它们之中的一段。短缺强度由指标 z_i^I 表达。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由两条途径到达不太严重的短缺 z_i^{II} 的状态。我们可以认为，供求的调节不会改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沿着和摩擦指标 w_2 相应的等摩擦曲线下降。但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水平必须从 $p^{(A)}$ 提高到 $p^{(B)}$ 。或者，我们不改变价格水平 $p^{(A)}$ ，但改善供给、

需求和相对价格彼此间的调节。换句话说，我们要从和 w_2 相应的等摩擦曲线跳到和 w_1 相应的曲线。如果我们同时使二者都发生变化，短缺强度将进一步降到水平 $z_i^{(II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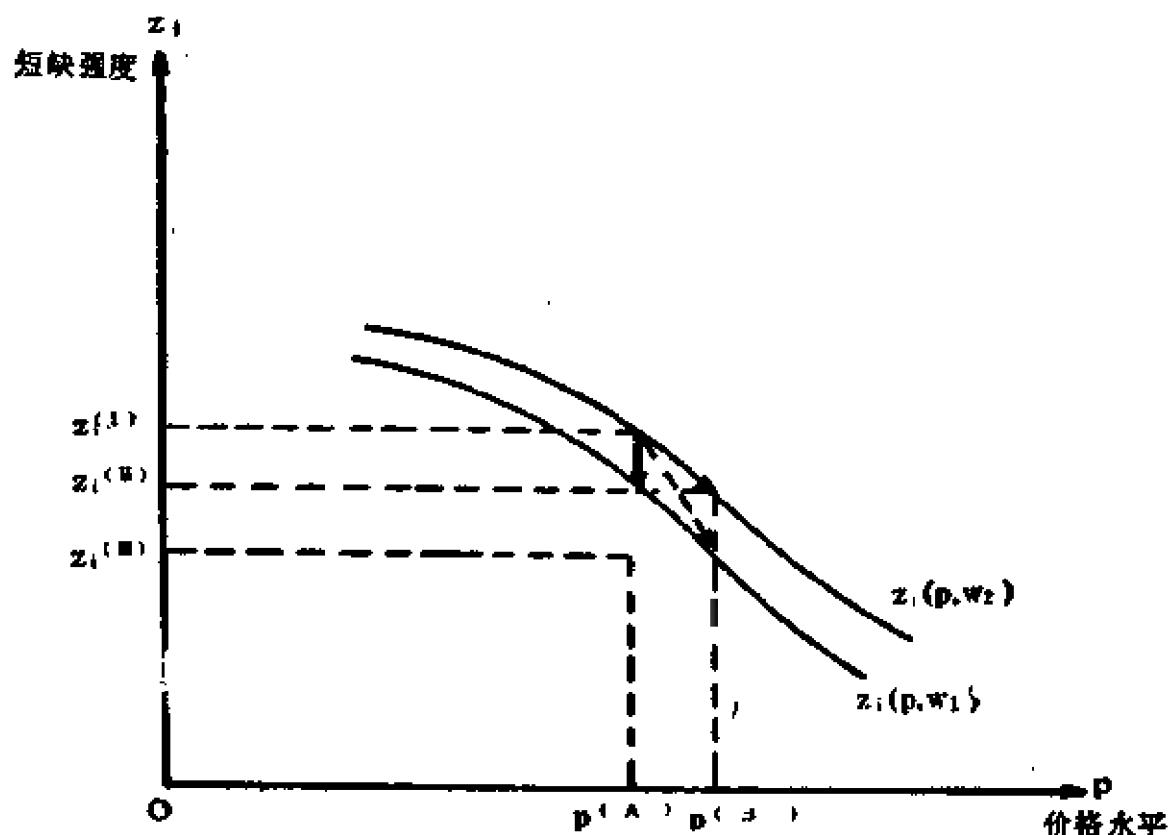


图18-6 减缓短缺的两种可替换方式

假如我们能够成功地从和 w_2 相应的曲线跳到和 w_1 相应的曲线，这对买者来说是一种“净收益”。在价格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他作为消费者的地位有了改善。排队减少，强制替代不太经常，也不太严重。因为不确定性减少了，当事人关于市场的信息就改善了，惰性减少了，调节的时间滞后也缩短了。但不管这一种改善是多么有必要，它却不可能纯然由领导人的决策所致。如果要减弱调节过程中的摩擦，就必须满足若干制度上和组织上的条件。与此相反，提高价格（也就是沿着图中的曲线运动）可单纯由决策来完成。这同样也减少短缺，但是以牺牲为代价，因为它把某些买者从市场上赶走了。

这样，在提高消费价格水平和减少摩擦之间就有一种替代关系。可以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减轻短缺强度，尽管这两种方法确实具有不同的后果。

最后，我们再一次提请注意其它条件不变这一假定。我们所问的问题（“怎样才能减轻短缺强度？”）过于一般和广泛了。而借助于图18-6给出的答案则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正确。它只有在所有假设都适用的情况下才有效。其中以下几个假设特别重要：假设（3），供给是既定的；假设（4），供给只供应家庭；还有假设（5），家庭的名义收入是既定的。如果我们放宽这些严格的假设，相互关系就会复杂得多，以下几章将讨论这些问题。

18·9 消费品部门的一般状况

下面我们提出有关消费品部门一般状况的若干假说。我们不考虑任何东欧国家在任何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而只考虑这种体制一般的抽象形式。正如18·7节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我们关于短缺强度假说的正确性，还没有进行过能够毫不含糊地证明或否定它们的全面和系统的观察。零散的观察似乎是支持我们的假说的。我们首先简单地将它们总结一下，然后对它们进行详细解说。

假说1：从长期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消费有了显著的增长。同时，消费品部门的若干领域长期存在短缺。

假说2：通过行政配给，家庭免费或以名义价格得到某些产品和服务。其中有些产品是满足那些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充分满足的需要。另一些则提供给那些不会被充分满足的需要——这方面不可能消除长期短缺。

假说3：家庭通过市场，以有效价格购买其他产品和服务。这些物品也存在长期短缺。在这些市场上已经形成正常的短缺强度。

与假说1相联系，一般公众，有时甚至连某些没有充分深入

地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都喜欢把两类十分不同的问题混同起来。第一类问题与消费水平有关，即个人或全体人民“富裕”还是“贫穷”？第二类问题是：消费者能否用他的钱买到他想要的东西？如果能买到，很容易买到还是很困难？本书的全部论证都试图证明在这两类问题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短缺不是一国经济落后的结果。短缺经济存在于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和产出水平都高的地方。有这样的国家，那里人均消费水平和产出水平都低，然而基本上是买方市场在运转的需求约束型体制。

不仅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且就后果而言，也不存在替代关系。生活在买方市场的穷人，腰包空空站在摆满商品的商店橱窗前，不会由于“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买”这一想法而得到安慰。反过来也是一样，生活在短缺经济中的消费者，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排队、搜寻、等待，和粗鲁的售货员打交道。还有那些为得到某种配给物品等待了也许好几年的消费者，他们也不会因为认识到实际消费水平已经年复一年地提高而得到安慰。在批评效用论时，我们讨论过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之间的替代以及它们的互补性。那里反复讲过的论点在这里同样成立。一种烦恼、痛苦或损失不可能因为得到了性质不同的快乐和满足而被消除。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只观察实际消费是不够的，生活标准或生活质量应作更广义地理解。家庭如何得到它想要的物品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短缺经济对人类产生的后果，以及它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②它剥夺了人们的许多自由时间，它产生神经紧张和烦恼，它一再使人们感到：被认为是合理的愿望却受到挫折和失败。人们不仅要承受不能得到物品的物质损失，而且还要经常忍受卖者、提供服务者或分配配额者的漫不经心和粗暴无礼。当人们知道那些本应该向他提供服务的人却似乎是在向自己施舍时，他常

^② 社会学家也研究排队和等待的社会影响。例如，见施瓦茨（1975）。

常感到恼怒和耻辱。这是消费品部门短缺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当然，做工作教育卖者，使执行配给的官员更礼貌一些是有益的。但短缺的客观事实却持续不断地维持一种社会关系，其中买者受卖者支配——买者自己也感到是这样。

作为一种后果，短缺不断地减少（虽然不会消除）人们在实际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时感到的满足。

和假说 2 相连系，我们注意到通过行政配给，免费或以名义价格分配的物品和服务应该分属两类范畴。第一类包括那些对它们的要求在不远的将来可充分满足的物品和服务。这类范畴中的短缺只是暂时的，虽然它们也可能会持续一个长时期。

这类范畴的典型例子是教育。在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上，每个国家都能为每个愿接受教育者提供十二年的免费教育。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也可能会给予更长时间的免费教育。

第二类包括下列物品和服务，对它们的需求永远不能充分满足。国有住房是最重要的例子。这方面的短缺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只要这种物品和服务是免费或以名义价格分给要求者，就会存在短缺。

在 17·6 节我们讨论了赞成或反对配给的各种意见，现在没什么再补充的。决策者可能决定：为了取得配给方式被认为是有利的方面，而把短缺作为这一方式的一种社会成本接受下来。这种决策可能受到怀疑，但它并不是不合理的。但必须抛弃这种幻觉，即：可以通过配给来消除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那些物品的短缺。

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上述假说很容易被接受。很明显，如果一种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产品是免费分配的，就会产生短缺。但假说 3 却指出了一种并非不言自明的现象。前面我们看到，家庭预算约束是硬的。第十六章中我们又搞清楚了，家庭能得到的总货币收入是由经济领导牢固控制着的，因而总需求在货币数额上是既定的。此外，我们说明：由市场分配的商品的价格由于限制了需求因而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短缺在这一领域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现呢？如果说是因为短缺商品定价过低，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吗？或者，如果价格是既定的，问题之所以产生，原因不是在于错误地计划了家庭总购买力和消费品总供给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吗？^④

对这些看起来简单的问题给予简单的回答是很诱人的。然而我们必须推迟我们的回答，或者不如说是推迟我们给出答案的念头。在以后几章中，我们首先必须分析价格和货币的作用，以便得到为澄清上述问题所必须的一切局部结果。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记下假说 3，并提出几个不给出答案的问题。

18·10 评克洛尔—巴罗—格罗斯曼学派

我们对消费品市场所陈述的思想，可以作为出发点，向克洛沃—巴罗—格罗斯曼学派在三个问题上提出异议。

第一个问题关系到总量过度需求这个范畴。^⑤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在下面的论证中我们将仅限于家庭，并且只考虑个人消费，而不考虑企业和非营利企业的需求。“总量过度需求”的通常解释是：家庭原打算支出，但在既定供给下却不可能支出的货币。

在我看来，应当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的情况，其中严重的短缺不是典型特征。在正常情况下，短缺只是间断地，暂时地和在温和的程度上出现。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作为思想实验，我们假定联邦德国在某一天里实行了严厉的价格控制并得到严格贯彻。同时，每个工人的

- ④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6·2节描述的计划程序。因此，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既可以是因为16·3，16·4和16·5节中所述各种关系的计划不周，也可以是因为对正确目标的偏离。
- ⑤ 我们在5·4和7·9节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但现在，在分析了消费部门之后，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解释我们的观点。

名义工资立刻提高50%。结果很容易预料，存货很快被抢购一空。许多家庭将不能够支出他们口袋里积存的货币。这种局面可以恰当地叫做总量过度需求，其程度可以用突然在人们口袋里积累起来，以及不管家庭的意图如何仍然没有支出的货币量来度量。我们再补充一点，这大概可以恰当地叫做非均衡，因为该体制已偏离了其正常状态。

另一种是长期短缺经济的情况，它在各个基本方面都不同于前者。这里，频繁的、持久的和严重的短缺已成为该体制的正常状态。买者已经调整他们的态度适应了长期短缺。他们试图满足自己这样的初始需求，这种需求从一开始形成时就已经考虑到了短缺。但如果他们未能成功，那么可能在进行一些搜寻和等待之后，他们就进行强制替代或实行强制支出。他们是否能完全成功取决于短缺的强度，讨论由短缺产生的强制支出的18·4节，已经详细解释了这一点，所以这里我们只提一提。在宏观层次上，什么应该叫做总量过度需求并不清楚。它应该只是那些根本不能支出的货币？但这只是伴随着非常严重的普遍短缺才出现的。（见18·4节中的现象(c)）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许多长期短缺经济中，可以发现大量的强制替代、强制支出和排队，但几乎不存在任何真正的不可支出的货币，这样就不存在总量过度需求。或者我们应该更广义地解释这一概念，把按照初始需求没有支出的所有货币都包括在内。看来，总量过度需求这个词不是一个在具有长期短缺的经济之中可使用的范畴。短缺必须由一个非总量指标向量来表示，象我们在本书前面解释过的一样。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争论的第二个问题：用来表示市场一般状态特点的家庭储蓄的时间序列的使用。有人已经作过尝试，从家庭储蓄的时间过程来得出宏观层次上的消费品市场是处于总量过度需求还是总量过度供给状态的结论。^②上

^② 例如，可参见波蒂斯—温特(1978)。

面所述的克洛尔—巴罗—格罗斯曼的思想提供了这种争论的理论背景。他们认为，家庭储蓄的时间过程部分地由一般的因素，特别是由收入的变化来解释。如果储蓄表现出比这些因素所解释的水平更高，这就是“总量过度需求”的信号，反过来则是总量过度供给。在我看来这个结论并不正确。在短缺和家庭储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事实。但既然它是通过若干条因果链条发生作用的——其中一些互相矛盾——所以根本不能肯定家庭储蓄的增长反映的是短缺的增长还是减弱。例如，如果货币确实不可支出，储蓄因此而增长，那么这表明短缺加强了。然而，如果刚刚有了旅游和私人建房的机会，而这一点阻止了人们的强制支出，并促使他们进行较多的自愿事先储蓄，那么家庭储蓄的增长反映了短缺在减弱。家庭储蓄在不同时间变化的经济内容，只有在对特殊环境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理解。

克洛尔—巴罗—格罗斯曼学派的功绩之一是对凯恩斯理论一般化的尝试。然而，值得担心的是，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过于简单的“对称性”。我们把他们的推理过程稍微简化，可以将这一类对称性的特点归纳如下。

凯恩斯式失业的关键问题是总量需求不足。当总量需求太高时，相反的情况显然也会产生。到此为止，在推理过程中没有特别的错误。但当这种相反情况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状态的理想模型时，就发生了问题。^⑩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极重要特点是：它的运行模式、管理体制和其当事人的行为已经适应于由制度关系被持续保存下来的长期短缺。简单地把这种体制描述为一种改变了符号的凯恩斯模式的对称的“反面”，是完全错误的。

^⑩ 巴罗—格罗斯曼的文章（1971, 1974）明确指出，他们描述的总量过度需求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这一学派的其他追随者，（如波蒂斯，霍华德）则直接将克洛尔—巴罗—格罗斯曼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

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短缺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假如在短缺条件下货币真的不能买任何东西，就不值得为再多得一点货币而工作了。因此，短缺的增长应当总是毫无疑问地导致劳动供给的减少。^④

这一问题基本上是经验性的，只要短缺并没有特别严重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人们得到的货币收入，几乎不可能用于消费，那么它就不会使人们拒绝接受工作。如果它对劳动供给产生了任何影响的话，那也是相反的。某些人甚至追求更多的货币，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有更多的钱，即使在短缺经济中，他们也可以更容易地得到希望买的东西。例如，如果他们必须进行强制替代，他们能更容易地出钱买一个更贵、质量更好的替代品而不是质量较差的便宜货。他们更容易支付“灰”市或黑市上的价格。当然，不管短缺严重或不太严重，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不管是从正向关系还是从反向关系来看，短缺强度都不是说明劳动供给的变量之一。^⑤

^④ 参见巴罗—格罗斯曼(1971, 1974)。霍华德(1976)用苏联的数据“从计量经济学上证明了”巴罗—格罗斯曼理论。在我看来，这种证明没有说服力，因为这种经济计量分析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

霍华德假定：消费品生产的增加或减少，或者它们产量增长率的加速或减速反映了消费品市场上短缺的减少和增加。事实上——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所强调的——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变化可以和短缺强度的变化彼此分离。

我们所考察的时间序列显示了消费品生产和就业同向变动，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消费品在总产出中的比例相当稳定，劳动生产率也不随时间而变化。从消费品产量和就业同向变动这一事实，得不出有关短缺和劳动供给之间关系的任何结论。

^⑤ 关于说明劳动供给的变量，见第十一章和十六章。

第十九章 消费品价格和消费品部门的短缺

19·1 引言

在第十七和十八章中，我们数次接触到了价格对家庭行为的影响，以及对消费品部门市场状况的影响。本章将系统地总结有关消费品价格的问题。

从这个范围极广的各种问题中，我们只讨论同我们的主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紧密相关的少数几个问题。象在前面第十五章研究企业间价格时一样，这里我们将不提出政策建议，我们完全以描述的方法来研究消费品价格。

我们不可能讨论所有消费品的价格。一般来说，我们将不理会那些由合作部门和私人部门生产并直接出售给家庭的产品。除了本章最后一节，我们将只讨论由国营企业提供给家庭的物品的价格。如果为了简明的缘故，我们用了“消费品价格”这个术语而未加详细解释，那么就总是指这类物品的价格。

我们在第十五章关于企业间价格所作的许多论述，包括对于价格漂浮和国家干预的评论，都适用于本章所讨论的产品。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消费品价格的几点特殊性质。

最重要的区别点是显而易见的。与企业间的价格水平相比，消费品价格水平对千百万人的生活的影响要密切得多。前者是经济管理者们的内部事务，并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例如通过利润分成才影响工人的经济状况。因此，消费品价格的运动对一切

体制来说都是一个微妙的政治问题。

在说到企业间价格时我们说过，买者通常不能或不敢抵抗卖者提价的努力。对于买者来说，这也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他的预算约束不是硬的：他可以通过提价而把增加的投入成本转嫁给自己的买者，或者他要求国家预算的支持。对消费品价格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家庭的名义收入是既定的，那么每次价格提高都使他们感到有切肤之痛。因此，买者力图抵制涨价。如没有其他办法，他就用“意见”这样做：发牢骚，提抗议。这正是消费品价格为何成为政治问题的原因。

因此，比起企业间价格来说，在这一领域中国家干预更广泛地得到运用。^① 干预也有更多的可能性，最重要的大宗消费品——特别是基本食品和公共服务——属于我们在 15·2 节所说的“标准大批量生产的产品”的范畴，因此它们的价格很容易管理。但在价格不太容易管理的情况下，价格政策也能够——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成功地抵制价格漂浮的趋势。这个过程可能以企业推动消费品价格开始。消费品的流通税率既可为正又可为负，(负税也就是为维持某些物品价格的补贴)对每一个或每一类产品来说，税率是分别决定的，并且经常修改。正负流通税率的制度可使消费品价格的运动从企业间价格(以及一般来说，生产者价格)的运动中分离出来。生产者价格的上升虽然会对消费品价格施加压力，但不会自动迫使后者上升。

考虑到消费品价格形成中国家干预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把注意力专注于这个方面。不管卖者价格漂浮的趋势有多么强烈，它都可以由于国家干预而在某一点上停下来。^②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① 财政部长 L·福卢韦吉在他的书中(1977, 77页)写道：“我们的总目标是：首先保证消费品价格的相对稳定，同时生产者价格可以允许有更大的灵活性。”

② 在这一点上，我们回想对(15-1)式所做的评论。

是，为什么它正好停在哪一点？为什么各类消费品的价格水平正是如此而不是更低或者更高？

19·2至19·8节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只研究这样的消费品价格：它们是能够充分管理并且在正常情况下容易管理的。在最后一节(19·9)，我们简要地研究不易管理的价格以及生产者价格漂浮的自发趋势。

本章大部分讨论消费品的相对价格。19·4至19·6节例外，因为它们考察市场上从总体来看的消费品平均价格水平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和其他市场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章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消费品价格的短期影响以及需求和供给的短期控制和调节。从19·7节起，再补充以某些长期相互关系的说明。

我们的许多思想既同传统的，也与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变化有关。凡是我们希望区分不同体制时，我们将单独指出这一事实。

19·2 一个说明性的例子

我们用上面18·8节中使用过的特殊市场的简单模型来开始推理。那里详细作出的假定，这里就不重复了。我们只回顾一下其中几个最重要的。我们将运用适当的指标描述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年）的市场行为。我们将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同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例如供给，所有家庭在这个特殊市场上打算支出的水平，市场内的相对价格，所有其它市场的价格，以及调节中的摩擦都是既定的。在所考察的特殊市场上只有家庭进行购买。要研究的问题是：在所讨论的某类产品价格水平变化时，短缺强度在短期内会如何变化。

图19-1和图18-4至18-6相似。横轴表示某类消费品的价格水平，纵轴度量市场状态的两个指标：短缺指标 z ，它是向量 z 的

代表分量，以及滞存指标 q ，它是向量 q 的代表分量。(第二个指标超出了十八章中的图，那里没有表示滞存)。

对每一个价格水平 p ，都有相应的一对向量 $[z(p), q(p)]$ ，也就是短缺和滞存指标值的集合。短缺是价格水平的减函数，而滞存是它的增函数。我们不问这一市场什么时候能处于完全的瓦尔拉斯均衡，这是因为必须考虑调节中的摩擦。我们只考虑如果价格水平从初始价格 $p^{(A)}$ 急剧上升到远为更高的值 $p^{(B)}$ 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用为家庭提供干洗，洗衣以及类似服务的行业作为第一个说明的例子，这在消费中占很大一部分，虽然不是基本的一个成分。

由于价格大幅度上涨，对这种服务的家庭需求会大大减少。因此，短缺强度将大幅度下降，虽然还不会完全消失。在店铺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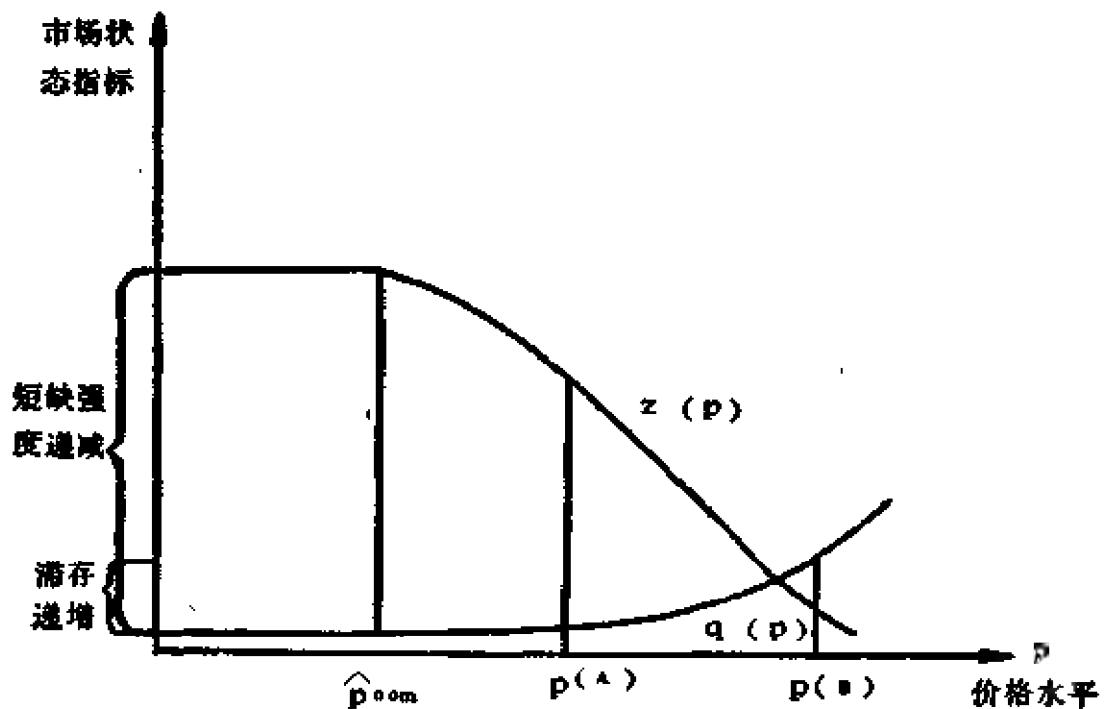


图19-1 价格水平，短缺和滞存之间的相互关系

等待服务所花时间将较少，交货时间将缩短。除了这些可立即感到的变化之外，我们也可以期待长期影响。洗衣店里职工和机器的利用率将减低。如果现在卖者真对扩大销售感兴趣，他就会作出努力，给顾客以较好服务，以便他们继续使用他的服务。洗衣店将靠改善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态度，以及开展新的服务项目在彼此间展开竞争，他们也将同希望吸引消费者购买力的其他部门展开竞争。

这些优点位于天平的一端，但是在另一端也产生了以下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价格上涨这一简单事实。正因为价格高度稳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成就之一，人们就期望价格保持不变，稳定本身对人们就有益。仅仅是价格上涨这一事实就会引起骚动，而且比另一些国家要严重得多，在那些国家中，加速的通货膨胀已使人们习惯于不断的价格上涨，那里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社会感到普通的上涨是“正常的”。

价格上涨导致滞存增加。第一篇中我们详细解释过，在短缺经济中短缺和滞存可以同时出现。原来，因为缺少互补性投入品，洗衣店里可能会有不可动用的滞存：可能某工人未到，也可能一种化工品用完了，也可能一部机器坏了。然而在价格激增的情况下，可能产生可动用滞存：劳动、材料和资本可能立刻全部闲置起来。每一种互补性投入品都会有供给储备。事实上，这可以被看作优点，因为它有利于形成一种更灵活的调节以适应需求方面不可预料的波动。然而，许多人“感到”这是一种缺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众舆论把这种可动用滞存的长期存在视为一种浪费。“脏衣服成堆，但工人和机器却没有事干……”。

作为提价的后果，消费水平立即降低。这种联系是微弱的。在既定时刻，洗衣业产出量和家庭消费的减少量，正好和增加的滞存所能生产的产量一样多。那些即使在涨价之后仍然使用洗衣业服务的人，能更容易和更方便地得到这种服务，但有些顾客却

被排除于这种服务之外。^⑧ 当洗衣店的工作在“买方市场”中改善了，变得更有效率，最终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更多产出之后，那些顾客才能间接得到补偿。然而，这是一种滞后的和不太确定的结果，而可动用滞存的产生所导致的产出品减少却会立刻出现。

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的减少有再分配效应。那些能够并且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人能更容易和更方便地得到服务。那些不能或不愿付高价的人则被剥夺了过去使用的一种服务，即使这种服务只有在等待排队之后或通过强制替代才能得到。

在决定是维持还是改变某类产品的价格水平时，上述优缺点是考虑的主要之点。但我们到此为止，因为这里的思想很容易使我们误入歧途。可能会得到这种印象：一类产品的价格水平本身就决定了市场状况，然而现实中并非如此。在上述模型的简化后的情况下，价格水平是唯一可控制的变量，因为我们是用比较静态方法并且是在非常严格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现在应该越出这个模型的限制了。

19·3 其他部门的虹吸效应

我们首先放宽模型中的假定(4)，即：该市场只许家庭进入。前面讲的例子不是洗衣业的实际情况，洗衣业不仅服务于家庭，也服务于饮食业，理发店，还为工厂的职工洗工作服。同样的价格增长，能使主妇回家洗衣服，但根本不会使旅馆或工厂也这样做。

我们用比洗衣业的例子更为普遍的方式来研究这一问题。

某些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只有家庭。例如，家庭是理发店和

^⑧ 我们将再一次想起罗宾逊—伊特维尔的机智的言论(1973, 269页)：“采购力巨大节约的许诺看来补偿不了货币购买力的即刻损失。”

在戈德曼的书中(1977)也有类似的思想。他指出限制购买力可以增加消费的“效能”。

电影院的唯一用户。这样的例子很少，因为从产出品的实物性质和使用方式来讲，只有少数产品和服务只能由家庭使用，而根本不能用来作为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投入品，也不能用以出口。更常出现的情况是，家庭、企业(包括出口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彼此互相展开竞争。

假如任何人在零售市场上，都可以在没有行政限制的情况下进行购买，就可能对最终产品展开竞争。例如，私人顾客，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都可以在同一家文具店或者家俱店进行购买，也可以使用同样的出租汽车或同一个汽车修理部。

然而，竞争也可能更早就开始了。假定某产业生产砖和水泥。产品应交给建材商店卖给私人顾客，还是应该给一个正在建设工厂的建筑单位？食品工业或轻工业的产出品应交给国内零售商业，还是应该出口？

家庭同其他部门对产品进行竞争，但这是在不平等条件下的竞争。家庭预算的约束是硬的，而企业是软的。^④对出口企业也可以这样说。即使某些出口品用国内通货计算有亏损，但国家可以象补偿生产者一样对它实行补贴。(我们在14·9节已经讲过，从这种观点来看，非营利机构处于中间位置。)家庭对价格变化反应敏感。如果价格上升，家庭需求就下降。与此相反，企业对投入品价格则反应较小。只要企业需要某种能够得到的东西，它就进行购买。^⑤

只要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行为不变，消费品价格水平的提高就只有在这些部门虹吸的数量受行政限制时，^⑥才能减轻短缺强

④ 更准确一点说，软硬度取决于实际的经济管理形式。但是，正如第十三章所解释过的，即使在改革之后，企业的预算约束，在与家庭所受的约束进行的上述比较中，也是足够软的。

⑤ 在匈牙利，由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购买的消费品，与家庭的购买量相比，增长要快得多。参见帕洛斯一平特(1978)。

⑥ 这是必要条件之一，后面我们将看到还有其他条件。

度。换句话说，必须有某种限制，以防止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拿走由家庭需求减少而释放出的可动用滞存。

这样的行政禁令可以在某些领域强制施行。其他领域要这样做困难就大得多。如果生产者虹吸走的不是最终产品而是生产某种产品直接投入，强制施行这种限制将特别困难。例如，如果工业部门从零售部门挖走了劳动力，从而损害了提供给家庭的服务，就会是这种情况。

在15·8节末尾，我们强调指出，在提高企业间价格水平和减缓企业间交换的短缺强度之间，没有自动的替代关系。现在我们补充如下：在提高消费价格水平和减缓消费市场短缺强度之间，不存在自动的替代关系。我们将提出若干论据来支持这一论断，并且已经有了第一个。对投入品价格提高的反应不敏感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可以不顾价格的增长，从对价格上涨很敏感的家庭虹吸走消费品、服务，和可用于生产的投入品。

19·4 中央宏观消费计划初探

我们现在进一步放松本章前面所做的简化的假定。上一节我们指出，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可以用分散的方式取走预定用于消费者的最终产品，或者取走为家庭部门进行生产的工业部门的投入品。但这只是派生现象，我们来考察一下原始问题，也就是，中央计划者给家庭部门分配了多少东西。

本节和下一节的主题是中央的短期宏观消费计划。我们将提供一个抽象模型。它用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过程。这个模型既未被要求，也不适合用做计划工作的实际工具。在这方面，这两节和本书前面某些部分相似，如第三、九、十章以及讨论计划者“条件反射”的12·11节，还有描述中央工资计划程序的16·2节。现在我们同样愿意指出计划者行为的若干规律性。

象在叙述工资政策的情况下一样，我们将详细叙述一个进行

计划决策的程序。我们并不认为在实际计划过程中各个事件是按这种程序前后排列的，这个程序仅仅是表示复杂的决策序列内部逻辑的一种简便方法。

这个程序由五个步骤组成，我们假定程序是可重复的，如果决策者感到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如果可以得到新的信息，他就可能重复全部或某几个步骤。本节中这一程序以最简单的形式出现。下一节在某几个方面的描述将更详细，更完整。

假设我们讨论的计划阶段的目的是：为下一年确定五个宏观指标，并根据它们制定若干非总量的计划指标。我们首先把这五个宏观变量列出来。

(I) 家庭部门可实际购买到的物品和服务总量。用符号 s 代表，简称供给。

这是一个实际的量，是一个总量，它在计划实践中通常用被叫做基期的更早时期中的实际价格来计算。

量 s 既包括物品的供给，也包括服务的供给。就物品来说，它包括计划年年初的初始存货以及在这一年里的总交货量。就服务而言，它是可能提供的最大服务量。因此，变量 s 不是计划者打算卖的东西，没有人认为家庭实际上会买数量为 s 的商品。如果家庭能够并且愿意购买实际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话， s 是家庭可以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最大量。

为了简化推理，我们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家庭部门可免费得到的物品和服务。^⑦ 量 s 只包括要用货币购买的商品的供给。

同样，我们也排除中央计划者预定分给企业(包括出口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的消费品。因此，如果某些消费品部门出现了进一步的虹吸，这将被视为对计划的偏离。^⑧

⑦ 我们也必须扣除那些和免费分配的产品、服务有关的存货和备用能力。

⑧ 我们要注意这一事实：这种“虹吸”效应只在讨论消费计划程序的 19·4 节和 19·5 节才被忽视。而在后面的 19·6 节，它将再次被分析。

(II) 家庭部门购买的商品量。以符号 g 代表，简称消费。这个缩略语虽然被普遍使用，但实际上并不准确。在购买和实际消费之间可以有一个时间滞后；此外，家庭还免费得到某些消费品。

象 s 一样，这是一个实际的量，一个以基期价格计算的宏观总量。

(III) 家庭部门用来购买商品所支付的货币量。以符号 y 代表，简称支出。这是计划年家庭部门的总货币收入，^⑨ 减去预期的储蓄值。（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加上家庭货币储存的减少额，负储蓄。）

(IV) 消费价格指数，以符号 P 代表。它是计划年与基期消费价格水平之比。^⑩

(V) 预定用于家庭部门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的消费品总量。以符号 x 代表，简称产出。至于它是如何计算的，什么产品被包括和排除，则和其它两个指标， s 和 g 相似。

在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两组自我解释的相互关系：

$$g \leq s \quad (19-1)$$

$$\text{消费水平} \quad \text{供给水平}$$

和
$$g = y / P \quad (19-2)$$

$$\text{消费水平} \quad \text{支出} \quad \text{消费价格指数}$$

我们想借助于制定这个程序来找出决定上面所列变量的因素，并确定它们在决策过程中的相对影响和分量。

步骤 1：消费。这一步同工资程序的步骤 1 相应，并且包含

⑨ 我们不考虑一个家庭向另一家庭提供服务而得到的货币。我们的宏观分析的唯一目的是，考察从整体来看的家庭与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

⑩ 确定数量和价格指数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自己已在 15-4 节谈到过后者。然而，既然这些指数的目的只是用来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就不必在这里讨论这些困难。

在内容上也相同的决策。我们回想一下那里说过的话。^①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际消费水平的增长决不能降到既定的社会容忍限度之下，并且应该同实际消费的正常增长率尽可能接近。计划指标 g 的大小由此产生。

步骤 2：消费价格指数。象我们在19·1节中强调指出的那样，政府的价格政策是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宏观计划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消费价格水平的上升。一方面，计划可能屈服于导致价格上涨的分散力量。另一方面，在能够由中央很好管理的消费价格范围内，同样可能有计划地涨价。第十五章接触到了所有这些问题，那里的讨论将由本章其余部分的进一步论述来补充。

这样，在程序的这一步就产生了计划指标 p 。

步骤 3：支出。名义收入的计划过程已经由16·2节详细进行了描述。我们解释过：名义收入不能由中央经济政策按照愿望固定，因为必须服从若干相互关系。象我们在那里指出的那样，有可能准确地计划名义收入，实际执行结果常常和计划指标只有微小的差别。家庭储蓄指标则不确定得多。预测的错误可以造成对计划的偏离——但我们不需要研究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只关心计划过程。

计划指标 y 在程序的这一步上出现。

我们在这里暂时停下来。迄今为止已讨论的三个计划指标 g 、 p 和 y 受到多种独立运转的环境的影响，这里和本书其他地方都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三个数字，当然是紧密相关的。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因为恒等式(19-2)的存在。如果有必要，由步骤 1，2 和 3 组成的循环可以重复多次，直到三个指

^① 变量 y 不包括全部消费，因为我们排除了免费分配的部分。对比之下，在工资程序的步骤 1，后者作为实际消费的一部分被包括在内。(虽然那里使用的是人均消费，而这里是总消费。)为了简明，我们将不指明这一程序中的五个变量和工资程序中的相同的或类似的变量之间的异同。定义清楚地指出了它们的关系。

标互相协调一致。

步骤 4：供给。在这一步骤和下一个步骤中，作为初步近似，我们首先制定了一个刚性规则，以使稍后一点的分析更加准确，更加接近实际。但首先必须阐明一个重要思想。

我们将下面的比率称之为供给的利用度，并以 k 来表示：

$$k = g / s \quad (19-3)$$

利用度	消费	供给
-----	----	----

选择 k 这个标志是为了使大家想起第十二章中介绍过的社会生产能力利用的概念。 $(19-3)$ 式中定义的量是一个与此有关的概念，是那里介绍的范畴在为消费目的而购买的商品上的应用。从实物方面讲有可能 $k=1$ ，家庭买光了最后一件可得到的商品，并把提供服务的机构的生产能力利用到了最大限度。然而，现实中这样的事永远也不会发生： k 总是小于 1。

本书试图从多种角度来提出这样的命题：在每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中，市场正常状态都发展起来并得到确立。因此，存在着正常短缺度、正常滞存度，同时，也有消费品部门供给的正常利用。这些量互相联系。我们用 k^* 来表示 $(19-3)$ 式中定义的正常利用度。因此， $(1-k^*)$ 就是正常滞存和总供给之比。

本书第一篇，主要是在五、六两章中，我们注意到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滞存的区别。前者可以使用，后者则不能使用。正常滞存度 $(1-k^*)$ 既包括生产性滞存，也包括非生产性滞存。我们假设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滞存的正常比例是固定的。

我们也愿意再回想一下第八章说过的话。那里我们说明了在短缺强度和生产性滞存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调节的正常摩擦是既定的情况下，生产性滞存越小，短缺强度越大；反之，生产性滞存越大，短缺强度越小。^⑫

在进行了上述说明之后，我们可以进行程序的步骤 4 了。根

^⑫ 见8·7和8·8节以及那里使用的图。

据我们的假设，下述定理可以成立：

$$s = g / k^* \quad (19-4)$$

供 给	消 费	正常利用度
-----	-----	-------

这个简单的公式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计划过程将正常利用度 k^* ，从而，把正常滞存度和正常短缺强度看作是既定的外生量。换句话说，从事前的角度来看，在宏观层次上消费品市场的正常短缺强度既不是价格水平的函数，也不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是宏观计划过程中一个既定的参数。在决定变量 s 的程序的步骤 4，和决定 p 和 y 的步骤 2 和步骤 3 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由步骤 1 所决定的 g 和外生的 k^* ，就可以直接发现变量 s 。

步骤 5：产出。国内生产和进口量之和的宏观变量 x 分成两部分：

$$x = x^{good} + x^{serv} \quad (19-5)$$

产 出	物品产出	服务产出
-----	------	------

上标“good”(物品)和“serv”(服务)在下面的代号中也使用。

我们首先来看决定物品产量的法则：⑬

$$x^{good} = g^{good} + \left(\frac{1}{k^{good*}} - 1 \right) g^{good} - u^{good} \quad (19-6)$$

物 品	物 品	物 品 正 常	物 品 实 际
产 量	消 费	存 货	初 始 存 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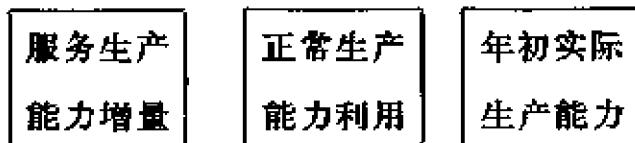
(19-6)式表示了正常标准控制。只要市场偏离了正常状态，计划者就努力用适当决定某些宏观变量的方法来迫使它更靠近正常标准。这和第七章讲过的正常标准控制有关。这里同那里一样，对短缺和滞存正常水平的偏离起着反馈的作用。区别在于，第七章描述的是微观层次上的分散控制机制，而我们现在考察的是宏

⑬ 我们没有尝试把(19-6)式和(19-7)式重新变换成为尽可能简单的数学形式。我们只想将其表示成一种能够最清楚地表达其经济含义的形式。

观层次上的集中控制机制。这两类机制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它们共同迫使滞存和短缺的正常标准对人们成为习以为常的事。

对于服务来说，产量和消费根据定义就是恒等的：^④ $x^{serv} = y^{serv}$ 。正常标准控制在这里起作用以决定生产能力的增加量：

$$\Delta s^{serv} = \frac{1}{k^{serv}} g^{serv} - s^{serv} \quad (10-7)$$



计划程序到此完成。我们已经决定了产出指标 x^{good} 和 x^{serv} 。结果可能是：这些指标和计划中的其他产出和外贸目标不协调，同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投入需求不协调，等等。因此，在对起点进行适当修正之后，过程就会重新开始。正是因为过程具有可重复性，所以就不值得问出发点是消费指标还是生产指标。

这一程序的描述已足够用来对传统的和改革后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计划工作进行总的概括。差别主要表现在贯彻执行计划的方法上。传统体制中，计划的宏观指标被分解到中央各部，然后到中层组织，最后分到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在每一级控制层次上，信息的接受者都得到指示：完成由他们负责的某一部分计划。家庭是个例外，他们在供给约束下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置自己的货币。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计划的命令在决定消费品市场状况方面，很明显有极大的作用。

在改革后的经济管理体制中，企业不接受强制性的指令，这就增强了通过价格或不通过价格的分散过程的作用。然而，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控制机构仍然有办法来保证实行同消费品市场有关的指标。首先，他们对投资分配施加巨大影响（见第九、十和十三章）。如果这一点在短期中不起作用，在长期过程中它则有效地

^④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没有用于家庭消费的劳务进口。

决定了消费品生产能得到多大生产能力。上层和中层组织依靠各种间接手段(答应或拒绝贷款,答应或撤消财政支持,等等)来影响企业的短期计划。他们可以大力传达他们的期望。他们可以有力地控制消费品的进出口以影响国内市场形势。由于这一切原因,我们可以断言:中央宏观消费计划并不只是简单产生一个对分散过程结果的预测。计划是政府实际措施的出发点。中央计划中的消费指标,即使在改革后,也对消费品市场状况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19·5 再论中央宏观消费计划

由程序的步骤4和步骤5所表述的行为规律性,对我们的以下论证是至关重要的,即:利用、滞存和短缺的正常标准在计划过程中是既定的参数。在保持这一思想的实质的同时,我们在进一步的探讨中可以把它说得稍微准确一些。

我们并不认为正常利用度 k^* 和过去讲到的其他正常标准是唯一确定的常数。我们宁可说存在表达消费品市场状态的这些指标数值的某一区间,在既定的历史时期,计划者感到这一区间是正常的。假定它们为常量,只是为了简化公式。

同样,我们也不认为短缺、滞存和利用的正常标准永远有效。如果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方法有重大变化,正常标准也将发生变化。这样一种转化在匈牙利已经发生。象我们在本书前几章指出的那样,短缺强度比起十年或十五年以前要轻得多。在本章所讨论的范围,即消费品市场内特别能感到这种变化。然而,在既定的制度结构,长期经济政策和既定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正常标准是相当稳固的。

我们把程序的步骤4和5所表述的行为规律性叫做假说,因为我们不能严格证明它们。但一些证据至少是间接支持这一假说的有效性。

在本章的开始，作为一个说明性的例子，我们同洗衣店价格上涨会引起什么后果。其中我们指出：由于价格上升，可动用滞存也要增加，这将引起许多人的非难，他们感到这是一种浪费。那里对于微观层次所说的话，在宏观层次上也同样成立。例如，如果家庭实际收入的计划指标（即不考虑储蓄，由程序的前三步决定的变量 $g=y/p$ ）增长 4%，那么计划者将努力使产出增长 4% 来满足收入的增长。他们也许会稍微偏离这个指标。例如，如果计划者认为库存“畸形膨胀”，他们就规定小于 4% 的增长。但没人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应该让实际供给指标 g 比实际需求 g 增长快得多的势头保持更长一段时间，以便使利用度 k 大幅度下降。^⑯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这种思想甚至没有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两难问题公式化，为下面的命题提供了间接证据：正常利用度 k^* ，以及和它并存的正常短缺和滞存水平在宏观消费计划中是既定参数。

政策制定者和计划者们知道，各方面都有对资源的急迫要求。从车间主任到部长，渗透于经济和政府生活每一层中的投资饥渴，一直在要求得到投资资源。那些从事外贸和国际金融事务的人，希望将尽可能多的国内总产品转向出口，同时减少进口。如果面对这样的和类似的要求，宏观计划成功地“捍卫”了实际消费的增长，它就已经取得了主要胜利。比这种作法走得更远的建议，即：在既定的实际消费指标下，仅仅只是为了减缓消费品市场上的短缺而从投资、出口等项目中吸取资源，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人会严肃地提出这样的建议。

⑯ 这里总是听到这种希望：滞存构成应当改善。它的非生产性部分应该减少，而生产性部分应该增加。满足这种希望显然是令人向往的。用第八章介绍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将这种思想表示如下：该体制应向有着较少摩擦的等摩擦曲线运动。但这一点不能简单地达到，因为必须满足有关经济管理和刺激体制等等的若干条件。

19·6 几个一般结论

从前两节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几个更一般的理论结论。为了比较起见，让我们陈述一下关于某一具体市场的新古典式的比较静态模型。一方面是卖者，他们的供给作为价格的函数而增长。另一方则是买者，他们的需求作为价格的函数而递减。如果价格低于瓦尔拉斯均衡价格，就存在短缺。价格提高到瓦尔拉斯均衡水平，短缺就会消除。

我们不打算讨论这种模型是否正确地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而立即转向我们现在的主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消费品市场。它同上述模型所叙述的市场有什么区别呢？

为了更容易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管需求方面的非营利机构，同样，也不管在需求和供给方面都存在的私人小厂和“第二经济”的其他成份。^⑩这样，我们在市场上有三种当事人：作为买者的家庭，作为买者的企业，以及作为卖者的企业。我们讨论由企业部门投放到国内市场上的消费品总量。我们希望阐明这三种当事人如何按照他们自己的动机和行为规律性来行动。

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因此所有家庭对消费品总量的需求是以“新古典方式”行动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只要是因为收入效应，这就是不言自明的。在既定的名义收入和既定的储蓄率下，较高的价格水平明显地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家庭只能买较少量的消费品。

相反，企业不管处于买者还是卖者的地位，都不以新古典方式行动。^⑪虽然企业预算约束的松软度取决于实际的经济管理体制，但即使在改革后它也仍然是相当软的；在传统体制中就更软

^⑩ 如果把我们排除于分析之外的这些领域包括在分析中，只会使说明冗长，但不会改变最终结论。

^⑪ 参见第十四章。

得多。

在需求方面，不存在这样一种自动机制，它能使得企业因为消费品价格水平提高而减少它对可用作投入品的消费品的需求。因此，19·3节描述的虹吸效应可以脱离价格水平而运动。否则，它也不过是具有次等重要性的现象。在消费品市场上企业作为卖者所做的事，在重要性方面使他们作为买者所做的事几乎相形见绌。

在供给方面，我们再重复一次：不存在这样一种自动机制，它能使得企业因为消费价格水平提高而增加供给。相对销售价格的改变可以影响产品构成，但不会影响总产量，因为总产量已经达到了“瓶颈”允许的高度，也就是碰到了资源限制。

因此，就微观组织的自发行为而言，不存在一种行为规律性来保证消费品价格水平的提高消除短缺。只要企业对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都不具有价格弹性，家庭对价格提高的反应（实际需求减少）就其自身来说就不足以消除短缺。^⑩

我们的结论是以微观组织（企业和家庭）的行为规律性为基础的。我们现在要用19·4至19·5节对中央计划者的行为规律性的分析中得来的结论进一步证实它。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宏观计划工作不存在一定的自动机制来保证实际的总供给指标立即对平均消费价格水平的变化作出反应。在短期宏观消费计划过程中出现了“数量”调节，把消费品生产和外贸的指标同实际家庭消费指标以及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供给指标相协调。^⑪所有这些调节都以某一种方式进行，这种方式默认了短缺、滞存和利用的正常水平的存在。

⑩ 我们试图清晰地说明这种关系。因此，结论没有扩展到量的范围。为使其更准确，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点补充说明。例如，实际的供给构成取决于相对价格；如果投入品变得更贵，企业的瞬时需求可能暂时下降，等等，但这些补充并不改变上述论断的实质。

⑪ 用19·4节的思想，实际指标 g 和 x 彼此调节适应。但不存在表示从 p 到 k 的因果关系的宏观供给函数 $k(p)$ 。

消费品市场上的短缺能被维持在正常强度的原因之一是：偏离正常状态，作为一个重要信号，对那些在中央的宏观层次和企业的微观层次上控制供给的人都会产生作用。

在匈牙利的经济讨论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提价（不管是一次性提价还是稳定的通货膨胀型的增长）可能减少甚至消除短缺，并且“可能重新建立供求之间的均衡”。因此，在通货膨胀和短缺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较快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短缺的减少，反之则导致短缺的增加。如果我们上面的论证过程是正确的话，它就驳斥了这种思想。在一个方向存在因果关系：短缺加强了价格漂浮的趋势（见第十五章和本章最后一节）。但相反方向则不存在因果关系。

我的印象是：那些相信从涨价到消除短缺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人，所想到的是作为本节出发点而提出的标准市场模型中的“马歇尔供求曲线”。在那个模型中，因果关系是双向的：短缺提高价格，涨价消除短缺。但正如刚才所说明的，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消费品市场上，不存在这样起作用的自动机制来保证实行第二种因果关系，即：因为价格提高而消除短缺。

价格水平不变、降低和提高同样可以和正常短缺强度的长期维持和谐共存。短缺的正常标准不是永恒的，但不管价格朝哪个方向变化，在长期过程中单凭这一点，并不能改变这些正常标准。

19·7 各类产品之间短缺强度的差别：历史的出发点

19·4至19·6节对整个消费品市场的总量说明是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这种抽象把消费品市场上的不同部分可以处于不同状态的事实忽略不计。本章的以下部分将分析这些差别。我们既讨论相对价格的短期影响，也讨论它们的长期影响。

表19-1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这个表主要建立在匈牙利经验的

基础上，但我们认为它也适用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品部门。这个表没有包括全部消费品，我们只选择了几个例子来证明我们的看法。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第Ⅱ栏的含义。这里我们把价格同产品成本相比较。对某类产品的消费者来说，如果价格包括了生产成本，此外还有平均水平的利润和国家税收，这种价格就叫做“中等”价或“平均”价。如果它大大低于“中等”价，与成本相比，价格就叫做“低”价，如果大大高于中等价，就叫做“高”价。^②用这种方法，几乎立刻就可以给任何产品分类。第三类和第四类产品的价格为国家产生了很高的净收入(流转税、关税，等等)，同时，为了补偿第一类和第二类产品的损失，国家付出了一大笔负流转税或补贴。

如果国内相对价格不是同国内成本相比，而是同任何先进资

按产品类别划分各类产品
在价格水平和短缺强度上的差别

表19-1

产品类别	与成本相比的价格	价格有效吗？	需要充分满足了吗？	短缺强度
1. 面包、牛奶、糖和其他大量消费的大宗食品	低	有效	是	低
2. 国有住房的租用	低	无效	否	高
3. 大量消费的纺织品和其他成衣	高	有效	否	低或中等
4. 私人小汽车	高	有效	否	高

^② 这是一个相当粗糙的定义，因为它没有解决“平均”的准确方法，同样，也没有解决什么叫做对中值的大大偏离。然而，现在的分析不需要更细致地分类。不管我们选择什么定义，第一类和第二类产品的价格都将非常低，而第三类和第四类则非常高。

本主义国家的相对价格相比，我们也能得到表中所作的相同分类。当然，数值要受到我们进行比较的国家的价格体系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比，面包和国有住房的房租看来比较便宜，而小汽车和衣物则似乎比较贵。

虽然第一、二类产品的价格低，第三、四类产品的价格高，但这种分类和表中第V栏所显示的短缺强度并不一致。第一类产品可以消除短缺，然而短缺在第四类中却长期存在。这是一个新的反对下述观点的经验论据：“短缺存在于相对价格太低的地方。”

第十七章研究过需求的充分满足，本章前几节讨论过价格水平、供给和短缺之间的联系。对上述现象的解释逻辑上是以前这些说明的继续，我们用这种观点来考虑一下表中选择的四类产品。

第一类。需求论一个众所周知的成果是：对基本食品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因此，尽管价格低，只要农产品的产量和进口量令人满意地增长，就能消除短缺。

第二类。对住房的需求事实上是不可满足的。如果房租不是有效的，短缺必然成为非常严重和长期的现象。下一节我们将详细讨论房租和住房短缺。

第三类。大量消费的纺织品和成衣的价格很高，这就限制了家庭需求，供给或多或少与之相适应。确实，纺织品的实际构成、质量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离满足要求还差得远，所以，存在通过搜寻、强制替代等等表现出来的短缺，然而短缺强度并不特别高。

第四类。私人小汽车的价格很高，这也限制了家庭需求。然而供给一直赶不上需求。长期的排队和数年的等待是这个市场的特点。供给与年俱增，但增长速度只是达到维持正常短缺强度的水平。私人小汽车作为特殊市场的例子，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前几节我们对整个消费品市场所说的话。一旦正常短缺强度生成并稳

定下来，供给就可以决定——不管价格是高还是低——从而使正常的短缺强度能够得到持续不断的恢复。^②

象我们在前几节关于整个消费品市场的一般价格水平所做的那样，这里我们要作出相似但并不相同的，关于消费市场上相对价格的论断。

在供给的限制下，家庭需求以高度敏感的方式对相对价格发生反应。（第十八章已详细讨论了这一点。）

企业在瞬时或短期内供给的商品构成对相对价格也相当敏感。（见14·6节）

投资分配部分取决于上级主管部门，部分取决于企业，而长期供给通过这种投资分配受到相对价格的间接影响。在决定长期消费需求构成上，相对价格起着部分作用，长期供给计划也把这种需求构成加以考虑。相对价格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受到考虑的，但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企业的层次上，都没有一种自动运行机制来迫使长期供给构成适应于相对价格。表19-1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的供给内部构成和另一方面消费品相对价格，可以长期保持不变。这就造成了短缺强度在不同市场上的极不平均的分布。

表19-1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某类产品会是低价而其他类是高价？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出发点，即确立相对价格的时期。现行匈牙利消费价格体系的主要比例是在1946年，在严重通货膨胀之后稳定物价的过程中决定的，只是在几年之后才全面改动过一次。从那时起进行了若干重要的小变动，但主要比例仍带有1946和1951年价格改革的印记。虽然当时考虑了很多观点，但这里我们只回顾两个主要原则：

(I) 相对价格应该反映相对成本。既然通货膨胀使计算受到干扰，就不得不使用战前(1938年)的相对成本和消费品价格作为依据。

^② 见第六章注⑥，那里我们引用了匈牙利汽车进口公司经理的话。

(II)为了维护某些,特别是有关收入再分配方面的社会偏好,偏离相对成本是允许或必要的。也就是说,满足基本需要的物品应能较便宜地得到。这些物品包括面包、牛奶、糖、电力、中央分配的住房以及医疗保健服务。

我们认为,今天没有必要分析第二个原则是否实现了有利于人口大多数的再分配。^②但强调指出下面一点已经足够了:过去在认真考虑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的价格体系比例,从那时起已成为刚性的了。让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考查一下那时应用的两个原则。

(I)相对成本很明显变化很大。我们只要想一想1938年的成本和价格的比例和我们今天已经相隔四十年就可以了。在本章最后一节将会看到,在价格不容易管理的地方,价格一直不断地调节以适应提高的成本。另一方面,许多容易管理的价格,——因此也受到更严格地控制——被固定在当时所定的水平上。

(II)社会偏好在若干方面也已经改变。现行经济政策不可能被动地和满不在乎地去适应消费需求的自发发展,而是将其驱向特定的方向。^③但是,在今天实际消费的高得多的水平上,这些方向已不同于三十年前了。只举一个例子,在大多数人对食品的基本需要已得到满足的今天,社会并不要求用经济办法来鼓励吃得过多。然而,国家对许多食品的补贴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虽然相对成本同社会偏好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改变,刚性和惰性却阻止了消费品的相对价格适应于新的条件。^④我们愿意把这一点讲清楚。这不是由于未能认识到问题所在,甚至也不是由于制定价格政策者方面的特别僵硬或保守而产生的。价格刚性的原因更为深刻,我们将通过一个实际例子,即房屋租金的

② 至今收集到的经验材料,没有清楚地确定消费品价格政策是实现了原先所定的再分配目的,还是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这方面的争论可见拉丹尼(1975),厄赛克(1976)和弗盖(1975a, b, 1976)的文章。

③ 参见霍奇(1977)和霍奇-约翰-J.蒂马尔(1975)。

④ 参见文斯(1971)。

发展过程来说明为什么消费价格成为刚性的。下一节我们将考察房租和住房短缺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个问题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再一次总结对消费品价格的必要论述，同时对价格为什么成为刚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消费品市场上的所有短缺之中，城市住房的短缺是最严重和最使人苦恼的。以前讨论过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里以集中和非常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

19·8 房租和住房短缺

我们再一次强调，从大量的问题中我们只挑选了少数几个。^① 我们不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建议，而只试图考虑这样的问题：在争论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种政策，贯彻其中某一政策的后果如何？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因为严格词义上的经济后果同社会和政治后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深深地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方式。

许多人期望，能够靠不断增建大量的国有住房来消除住房短缺，同时还把这些房屋的房租保持在名义水平上。在我们看来，任何想在维持名义房租的同时，只从供给方面来直接消除短缺的努力都是毫无希望的。尽管价格低，也可以消除面包的短缺，因为需求是可以充分满足的，相反，对住房的需求是几乎不能满足的。^② 如果每个人的住房至少是两间一套，许多人就会提出至少是三间一套的要求；有一套公寓的人也许要求有一幢别墅；一个人如房间数目已经足够用了，他就想要更大的住所，更好的设备以

^① 最近，匈牙利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若干重要论文和讨论文集。例如，参见利斯卡(1969)，肯拉德-塞莱尼(1969)，布雷特纳(1970)，哈尔莫斯(1977)，米哈伊(1977, 1978)和丹尼尔(1978)。

^② 关于充分满足可参见17·2节。当生产力在几十年间按预期那样发展的同时，一种需求的满足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时，即使免费供应，但消费者将自愿不再要求超过某一定量，这种需求就被认为是不可充分满足的。

及更有益于健康，更美丽的环境。确实也有许多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现有的住所，即使他们能更便宜地得到更大、更好的房子。他们依恋着旧房子，因为他们有病，年迈或者只是不愿意搬家。但大多数人都会对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感到高兴。即使比匈牙利富足得多的国家，它们的住房供给也还远远没有充裕到这种程度，即：不是房租，而仅仅是缺少家俱和整理房间问题，使大多数流动人口自愿限制了自己的需求。^②

其他人相信国有住房房租的大幅度增加能消除住房短缺。虽然房租提高的幅度确实对结果如何有影响，但对我们的思想实验来说，我们只选一种情况，其中新的和较高水平的房租符合下列标准：

(a) 房租对于需求量，也就是住房的数量是有效的。假设那些住在或申请一套独立的、只有名义房租的住房的人，不能或不愿支付有效的房租，为此他们自愿放弃他们的需求，就是这种情况。^③这种房租因此就限制了对住房数量的需求。

(b) 根据住房的质量有效地区分开各类房租。假设某些家庭住在或申请一套面积大、设备好、以及具有其他质量上的优点的住房，如果增加的房租是名义的，但房租中有效的差别使他们放弃了最初的需求，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自愿搬到设备不太好或其他质量缺陷的住房中去。

(c) 作为新房租水平的结果，家庭需求减少到这种程度，以至提供的住房存货有少部分(至少2—3%)不再有人要了。如果空

② 例如，瑞典的经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二次大战后那里的房租被固定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上。大战中未被损坏的，保留下来的公寓积存很多，住宅建设以世界最高人均率进行。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人们要排好几年队。只是当房租水平突然提高，新房租固定下来之后这种现象才停止。这一问题可参见林德贝克(1967)。林德贝克提到早先他同本策尔和斯塔尔合作用瑞典文写成1967年出版的论著。在匈牙利，丹尼尔(1977b)对瑞典住房情况和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进行了概述。

③ 例如，和原来的打算相反，他们搬进一户转租或合租的房子，或者和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等等。

缺没有被其他部门占用，将会形成住房滞存。

以下我们谈到“高”房租时，就是指和标准(a)，(b)和(c)相应的水平。(c)只是仅就对需求的影响方面进行了说明，但我们还没有讨论房租和维修成本或者翻新住房的成本之间的关系。(后面我们还将回过头来论述这一点。)

国有住房采用高房租有四种影响。

(1) 对家庭的短期市场影响。这里我们仅考察家庭作为市场上的买者和经济当事人，对房租增加如何反应。(分析第四种影响时我们将讨论“人的方面的”后果。)

我们不考虑房租提高的收入效应。这很明显取决于是否存在通过名义工资进行的补偿。例如，为了我们的思想实验的目的，我们可以假定：家庭部门的年名义收入总额的增量恰好同房租的年增额相等，换句话说，房租与其他消费品价格的比率已经改变。(不仅如此，再分配也发生了，这也将在第四种影响中考察。)

我们暂时假定：行政禁令阻止了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占据家庭腾出来的住房。(这将和第二种影响一起讨论。)

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短期”可以被看作一或两年。房产部门中的固定资产范围很广，又都是长期使用的；在一、两年内补充的净增额与原有存货之比相对很小。因此，按照以上假设，短期市场调节可以近似地由在既定供给下，家庭需求对新的较高租金的调节来描述。大部分人只是在困难情况下才搬家。然而，高房租是一种经济力量。当我们谈到房租有效性的标准时，我们提到了需求的“自愿”改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行动只所以是自愿的，只是因为租户并不是服从行政命令而搬出原有住房，也不是因为他通过行政配给得到了更小或质量更差的房子，驱动力是家庭的硬预算约束。

或早或晚所有的搬迁都会完成。在按照上述假设进行调节的过渡时期之后，在短期内房屋短缺将不再严重。

当然，将来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某个人找不到他最初想要

的那种住房，并且进行了强制替代。在得到所选择的住房之前他可能也不得不进行搜寻和等待。因此，住房市场上短缺指标向量 z 的分量不可能个个是零。这种情况是因为市场上的调节不能完全免于摩擦。(用第八章的代号： $w>0$ 。)但是，最严重的短缺信号——数年的排队——已经消除。既然有房屋滞存，任何人只要愿意并且能够支付高房租，并且，当空出的住房不能在各种细节上符合他的原意时，愿意进行强制替代，他就都可以没有延滞地租到一套住房。

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并成为市场的新的正常状态吗？

(2) 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虹吸”的影响。上面所做的暂时简化的假设——行政禁令阻止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租用家庭腾出来的公寓——在实践中是否能得到履行并不清楚。如果没有这样的禁令，家庭需求的减少意味着对投入品价格几乎无反应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会立即扑向空房。因为办公室短缺，他们毕竟也承受着压力，他们很容易支付对家庭来讲是很重负担的高房租。

如果存在行政禁令，那么始终如一地强制施行这种禁令并不是那么容易。匈牙利的经验表明：尽管有种种行政禁令，建筑物内办公室的数目一直在增长，而这些房屋原来是打算作为私人住房的。要想“保护”滞存——待出租的空房屋——不被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染指，那会是非常困难的。

(3) 相对比例的长期变化。我们假定国有房屋的房租已经固定在新的高水平上。为了理解长期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忆一下19·4至19·6节中的思想，并加以限制，即：那里的思想现在不是用于整个消费品市场，而只是应用于其中一部分，即住房市场。

长期过程中居民的名义收入增加了，对房屋的需求也同时增加了。^⑩当家庭收入增加时，他们希望租用面积更大和质量更好

^⑩ 房屋需求可能增长得更快。至少，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据建立的需求函数显示了这一点。因为长期住房短缺，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中不可能对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做出明确的估计。

的更多住房。因此，即使租金提高的最初影响是消除严重的短缺，这些事件的后续过程则取决于实际供给的增长。国有住房存货的增长和质量的改善与需求的增长保持同步了吗？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但不存在保证实际发生这种情况的自动机制。我们回想一下表19-1谈到的私人小汽车的例子。虽然汽车很贵，供给也在增加，然而仍然存在着需数年等待的排队，因为供给始终落后于需求的增长。

受实际资源的约束，国有住房存货的增长处于中央计划控制之下。这种供给不是价格的确定函数，也不是房租收费与建筑和维修住房的成本之差所产生的利润或亏损的函数。国家可以改变收入，它可以从高盈利房产部门取走净收入，它也可以对无法盈利的房产部门进行补贴。这就是新的高房租为何同成本不挂钩的原因。

从上面的论证中可得出以下结论。

有效的高房租是消除住房严重短缺的一个条件。然而有效的高房租不能保证严重的住房短缺被永远消除。最终成为住房市场正常状态的是严重短缺，还是短缺的消失，取决于房租水平，同样也取决于国家的供给政策。

计划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制定供给政策。花费在国有住房上的资源，其他部门也要，其中主要是为了经济增长而需要投资。这种其他部门的吸纳效应可以使国有住房供给的增长放慢。但我们的思考到此为止，因为它会使我们远离现在的主题：房租。

让我们从经济的大尺度的长期宏观比例转到房租提高的直接“微观后果”——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4) 再分配影响。在短期过程中，家庭部门实际消费总量减少的数量就是释放出的滞存量。如果这个量达到，比如说2—3%，这并不太多。但不管怎么说，由于长期住房短缺，人们已经如此不习惯于有房待租的观念，仅仅这种现象的存在就会令人惊奇。假设某大城市有100万人口，20万套住房。按上述比例，这将意味

着先前住在单独公寓里的大约4000—6000户家庭，要被迫搬进和他人共用的一套公寓中去。

滞存的发展将使换房更容易，为了能够搬家，已经不需要通过复杂的互相转换住房的过程。社会的空间流动性将会增加，人们将不再因为住房短缺而被“绑在土地上。”然而，这些优点将不能被那些因为房租提高而必须放弃单独住房的人享受，而是由那些希望在将来搬迁，或建立新家庭的人享受。因此，就会产生利益和损失的再分配。

这不是唯一的再分配的影响。前面已经指出，房租的普遍提高以及根据质量而增加的房租差别将导致向各个方向的大批搬迁；有些人搬到较大较好的公寓里，其他人则搬进较小和较差的住房。^⑩现在我们考虑这一事实：住房并不是一种象衣服或电冰箱一样的东西。住房条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家庭生活 and 文化机会。一些人的住房条件随着再分配而改善了，同时其他人的条件恶化了。我们考虑一下后者的处境。许多人对家庭、邻居和已经渐渐习惯的环境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情。他们已经习惯于只和家庭的亲密成员生活在一起，或者自己单独生活，现在他们不得不和他人共用一套公寓。因此，住房的再分配会使许多人深深地苦恼。

但是，将要发生的再分配不仅限于住房，而且包括收入。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匈牙利，住房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私人部门。私有家庭住宅和合作公寓归于这一范畴。其中大多数由所有者自己使用，然而也存在住房的私人出租（例如，转租或把私人所有的住房或套间出租给租户）。用不着进行仔细地比较，我们就可以说，私有住宅或套房的最初建筑者（或者，在住宅是为出售

^⑩ 我们完全没有解决下列问题：为了我们的思想实验，房租提高到什么水平？以及，由质量不同而形成的房租差别达到什么水平？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有多少人准备自愿降低他们的住房条件——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经济力量——以及他们这样做需要多长时间。

而建造的情况下的买者)至少必须支付建筑成本。另一方面,国有住房的租户则只支付维修成本的一小部分,因为房租得到国家补贴。

那些对国有住房支付名义房租的人,一直享受着大量的消费者剩余,他们还从国家那里有效地收到了一份礼物。^①分配给他们的住房可能是根据社会可接受的选择标准,例如按照紧急需要或功绩。但他们也可能通过个人关系或贿赂得到。他们的父母可能曾经因为紧急需要或功绩而得到了一套国有住房,或者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可能只是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时代就搬进了这所房子,后来房屋国有化了,所以他们的子孙就凭出生而获得了这套住宅。国有住房的权利通过象继承封建财产一样的方式世代相传。消费者剩余也同时由父亲传给了儿子,正象过去的封建地租一样。

房租的普遍增长将会剥夺国有住房租户的这种消费者剩余。某些人会觉得他们被剥夺了应得的利益。^②其他人甚至不会想到他们对从前享受的利益所有的权利,但会简单地记住这一事实:他们已经受到了经济损失。

作为再分配的结果,家庭的总财务收入和其住房条件之间的正相关将更为显著。这实际上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但是,在既定社会条件下,货币收入分配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按劳分配原则还是个问题。当然,对下列问题也可进行争论:住房这种物品是不是应该按劳分配?或者它是否是一种应该按照其他分配原则进行分配的基本必需品。例如,人们可以问孩子们的住房条件是否应该只是由其父母的收入决定。

即使还有许多问题尚未接触到,这里我们将不再分析再分配的后果。然而,下面的问题已经应该清楚了:一个最初看来完全

^① 关于伴随配给的消费者剩余,以及配给所用的标准,见17.6节。

^② 当然,房租的普遍增加可以由个人房租补贴的制度加以补充。这种补贴会给予那些被认为是需要得到或者应该得到的人。当然,得到这种补贴的人不能肯定就是今天收到国家低房租“礼物”的那些人。

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房租水平）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任何激进的再分配都会造成群众意见的混乱。那些从中获利的人甚至可能认识不到他们的收益。如果今天的年青人已经习惯于不必为住房排队，以后他们就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利益。但即使那些今天认识到并且享受了由变化而来的利益的人也只是暗中高兴。另一方面，那些遭受损失的人变得愤怒起来，并且可能发泄他们的不满。为什么主管部门不愿意改变房租，以及一般来说，不愿意全面变动消费品价格，就是由于这种可理解的原因：因为有变化的这样一种再分配的影响。

这就使我们能理解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叫做价格稳定性陷阱。为了价格稳定，国家不愿意进行持续的甚至是频繁的小的价格调整。人们已经习惯于稳定，在一段时期之后他们甚至期望政府能保证这一点。任何重大的涨价都会产生不安定。一种体制越是力图证明它能保证价格稳定，它越多地宣传这一意图，人民越是期待它。因此，如果涨价确实发生了，人民就会感到更加神经紧张。

这就是价格成为刚性的公众舆论背景。如前一节所讲过的，由于这种刚性，价格与成本分离了，与最初决定价格时起作用的国家偏好也分离了。多年不进行连续的小调整，现在剧烈的变动已成为必需。但这必然会引起一种震荡，它的再分配的影响几乎无法估量，并会使许多人产生强烈的敌对情绪。因此经济领导者们推迟了变动，但这使问题甚至更严重，因为价格调整现在会产生甚至更大的震荡以及其他后果。国有住房的房租是这类冻结价格或刚性价格的一个典型例子，但决非唯一的一个。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对下一问题答案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某类产品的价格水平正是如此。这是因为它曾经一度被固定在那里，也许是在十年以前，也许是几十年以前。那时有极为正当的理由要把它定在那个水平上。然后价格落入了“价格

稳定性陷阱”。现状一旦确定，就保持其自身。这不意味着剧烈的价格变动在任何条件下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掉进价格稳定性陷阱的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动，涉及一种不仅具有经济后果，而且具有意义深远的政治后果的决策。

19·9 不受管理的消费品价格

本章到此为止，已经分析了政府的价格政策。这是应该的，因为由中央价格部门严格控制的管理价格在消费品中所占比例极高——高于第十五章所讨论的企业间价格的情况。然而，另外两类价格的作用在这里也是很重要的，它们是：由买卖双方自愿协议而决定的契约价格以及虚假管理价格，这种价格表面上由价格部门决定，但事实上由卖者确定。^⑩

在消费品的非管理价格的情况下，类似的价格漂浮趋势也象15·5至15·7节中对企业间价格的描述一样运动。我们不想重复过去已说过的话，所以这里只描述消费品“价格漂浮”的几个特征。“成本推动”在这里也会发生，确实，政府价格政策可以通过改变流转税或补贴的方法进行干预。也可以尝试用阻止消费品价格提高的方法来制止成本提高，但成本推动仍然会使自己或多或少地被人们感到。至于说到“需求拉动”，在一个特殊市场上短缺越严重，买者自己就越推动价格提高，也许比他的买者同伴出的价更高。

我们在15·5和15·6节中指出：在企业间交易的情况下，价格漂浮趋势在需求方面并不会碰到财务约束。在消费品部门情况就大大不同了。这里，在微观层次上，每一个家庭的预算约束都是硬的。对于宏观层次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家庭部门的总名义收入

^⑩ 这种分类的更详细解释可见15·2和15·3节。这一点和15·4节讨论的价格水平的计量有关。那里所说的话，对消费品价格水平的计量也同样有效。

受到中央经济政策的严格控制。(见论工资的一章,特别是16·1节)阻止通货膨胀趋势的,不只是买者的抱怨。舆论的敌视倾向、以及价格部门的干预,主要障碍是家庭部门能用来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数量有限。某些买者也许乐于推动某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但所有家庭对一切商品的瞬时需求却受到手中现金的限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涨价是由其他因素产生的话,只要限制家庭手中的货币量就可以使涨价停止。控制家庭的名义收入,是阻止消费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的价格运动出现和加强的条件之一。但就其本身来说,这一点绝不是充分的,还必须满足其他条件。有一些条件已经讲过了,其它的条件,我们将在本书剩下的部分讨论。

第二十章 货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20·1 引言

我们前面对于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家庭行为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探讨一些关于货币的问题。^① 我们不企求完整；货币理论的若干方面我们甚至不打算涉及。我们将集中于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的积极作用到底有多大？

首先，我们要弄清所谓“货币是积极的”表示什么意思。^② 如果决策者的实际行为取决于他所支配的货币数量，货币就是积极的。

货币并非要么积极、要么消极。货币的积极程度可以用连续的等级来表示。在完全积极和彻底消极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过渡阶段。

预算约束硬度和货币积极程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不是两种独立的现象，而是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的表述。在微观层次上，在预算约束的右边，我们发现可供微观组织使用的

① 在匈牙利有大量关于货币作用的文献。在这些匈牙利作者的著作中，我想指出：奥古斯蒂诺维奇（1963）、福卢韦吉（1976、1977）、胡斯蒂（1971）、里茨（1970）和陶洛什（1975a、b, 1976）的著作。在写作这一章中，我从中吸取了许多东西。

② 布鲁斯（1964）对于我关于货币积极和消极作用的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帮助。

货币，即国家货币供给总量中分配给微观组织并由其支配的部分。如果约束是软的，并且它的值很容易增加（即，如果可供使用的货币可调整到与不等式左边的微观组织对货币的既定需求相适应），那么货币就是消极的。然而，如果约束是硬的，而且在左边，即微观组织对货币的需求，不得不去适应既定的货币供给，那么货币就是积极的。因此，货币的积极程度在宏观水平上反映了微观现象的总体（预算约束硬度的统计分布）。在13·6节，我们采用了指标 β 来度量预算约束的硬度： $\beta = 0$ 表示完全的硬预算。预算约束越软， β 的正值越大。同一尺度也能用来描述货币的积极程度。

我们这里不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国内货币供给和外汇之间的联系；因而，我们也不论及可兑换性问题。但是，即使我们仅仅考察货币在国内经济中的作用，也可以观察到，即使在国内，货币也不是完全“可通用的”。货币是“带标签的”。财政制度明显地将用来支付工资的货币同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用在其他方面的货币分开来。（参见16·1节）同样，当前生产使用的货币与投资使用的货币也被严格分开。时刻监督每个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全部货币交易的集中化的银行系统，能够查明其规定是否被遵守了。当然，在三个主要部门，即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家庭之间有巨额的货币流通，但是，所有这些交易只能通过金融系统指定和控制的渠道进行。即使在规定中存在一些漏洞，也不会根本改变货币不是完全“可通用的”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对于货币的积极程度作出普遍适用的陈述，必须分别论述有货币流通的每个部门或者是可以“被贴上标签的”有限领域。

家庭具有硬预算约束。（参见18·1节）在家庭部门内，货币是完全积极的。（ $\beta = 0$ ，或几乎等于0。）

确实，在制订针对家庭部门的国家经济政策时，出发点不是制定家庭可用的货币供给计划。真正的出发点是家庭实际消费计划，可由家庭购买的商品的供给计划，以及有关名义工资和消

费物价水平的国家经济政策。^③ 计划者首先权衡的是这些变量相互之间以及同经济中的其它过程，即生产、投资和外贸，有什么关系。家庭可得到的信贷只起很小作用，其数额是严格计划的。此外，还有“带标签的”信贷：这些只能用于建筑私人住宅或只能用于一定的耐用消费品，因而，它们能够逐项地与这些产品的实际供给相一致。

从上述变量中，能够推出家庭可用货币的总供给。但是，即使这是在计划制订过程中得出的数量，它仍有“独立生命”，即，它自身的影响经济过程的作用。计划者仔细地考虑全体居民将有多少可支配货币。在为具体贯彻执行经济政策而起草年度计划时，计划者认为解决所谓“购买力”^④与“商品供给”的平衡有极大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能说对家庭部门进行计划时，货币供给要适应需求，反之也不行。但是，计划者要一起作出这些客观估计，使它们互相适应。

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预算约束在这里或多或少是软的 ($\beta \geq 0$)。（参见第十三章和14·11节）预算软的程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所不同。自从经济管理改革以来，与传统体制相比，预算硬度有所硬化。在当前生产和投资的资金来源之间也存在差别。（后者更软。）但是，即使在起实质性作用的时候和地方，货币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中仍然是相当消极的。它们的活动是在与可用货币供给无关的多级决策过程中决定的。这些活动决定了对货币的需求。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中，货币供给被动地调节到适应货币需求的程度。

在上面我们关于家庭部门的陈述中，不必深入研究细节。但是，在下面各节中，有必要更仔细地考察货币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讨论的顺序如下：

③ 参见15·7，16·2，16·5，16·6，和19·4，19·6节。

④ 在计划实践中使用的“居民的购买力”这个概念同这里使用的“家庭可得到的货币总供给”概念有联系。我们不详细论述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技术差别。

20·2节讨论企业短期资金来源，而20·3节和20·4节论述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投资的资金来源，即长期资金来源问题。最后，20·5节讨论国家预算的某些问题。

20·2 企业的短期资金来源

我们从社会主义企业的短期控制过程开始。企业自有的总经营资本比重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不相同，并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多次变化。但是，企业无论何处都不能达到完全资金自给这一点总是确定无疑的。在每个国家和每一时期，企业总要被迫用信贷来支付部分现有开支。因此，必须搞清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企业能获得短期信贷。在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真正的问题不是官方宣布的提供信贷的原则和条件，而是实际的做法。^⑤

在第十三章，当说到企业预算约束硬度时，我们强调了信贷系统是“硬”还是“软”的问题。对实际经验的观察得出下列命题：

拨给企业短期信贷的制度是“软的”。^⑥这些信贷总额不受上述任何严格和有效的约束所限制。实际上，短期信贷的总供给被动地调整以适应企业的信贷需求。

企业对信贷的需求并不是无限的，它显示出某种自我约束。根据我们的看法，原因不在于信贷必须支付利息。作为信贷成本的利息不是有效价格，它不会使企业自愿克制对信贷的需求。象其它成本的增加一样，利息负担可能的增加通常迟早可以被企业转嫁给买者或国家预算。（参见第十三和第十五章。）可以根据

⑤ 根据胡斯蒂（1971，41页）所说：“……信贷的半自动性质和超额货币的创造不是深思熟虑的财政信贷政策的结果。相反，信贷扩大和它的半自动性质不顾财政信贷政策制订者的明确意愿而发生。”

⑥ 里茨（1964）对这种情形作了诙谐的描述：“……银行是货币制造企业，它不能拒绝为‘有配额’的顾客‘服务’，有时它还必须向那些‘没有配额’的顾客供货。”

经验证明，企业对信贷的需求受利息率的影响不大。^①

信贷需求中的“自我约束”只能用这一事实，即信贷必须申请，来进行解释。企业和银行都知道，从企业的观点来看，利息算不了什么。因此，得到信贷不是两个平等当事人间的简单商业交易。双方都不会感到，债务人已用利息偿付了债权人提供的服务。信贷不知怎么成了一种恩赐（即使还必须付利息）。因为对信贷总有大量的需求，银行决不会为如何安排等待出借的货币而发愁，所以情况就更是如此。信贷市场是卖方市场；那些寻求信贷的人在信贷供给者面前排队等候。用第十七章的术语来说，信贷不是通过拍卖而是通过配给来分配的。即使企业相信某一些信贷是它所应得到的，要申请得到那些信贷也并不那么容易。因此，在中央银行和企业之间产生了某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

自经济管理的改革以来，银行的作用增加了。信贷的提供与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存货的变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确实，甚至在改革后的情形下，解释得很漂亮的信贷申请总会被接受。

我们就短期资金供应制度的“软”或消极性质所作的论述，不能仅仅通过逻辑推理来验证。这是一个要求经验检验的假说。通过验证不同的局部论述可以间接地做到这一点。

（1）最重要的是观察企业采购当前生产所需物品时的实际行为。通过调查表、个人采访、案例研究这些最便利的经验检验方法，可以从一个具有令人满意的代表性的样板中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种情况是否曾经发生：企业需要的某种投入既可得到，企业也愿意购买，然而，只因为企业没钱而未买成？如果有此事，发生的频率有多大？这些项目有多大重要性？”

我们的假说是，除了极少数无足轻重的例外，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就信贷需求而言，在长期投入短缺及其交货不确定的情况下

① 参见陶洛什（1976，221页）。

下，甚至热衷盈利的企业也认为：白白放弃购买机会的损失要比支付信贷利息的损失大得多。就信贷而言，具体投入品的供应的实际存在和使用该投入品的企业的购买意图，通常说来，已经构成足够的理由来取得银行的信贷。假如企业不能用自有资金来支付这笔交易的话，在提供信贷前，也许有一些讨价还价。企业可能不得不争辩，并求助于它的关系。但是，最终企业总是成功地得到信贷。

从这一简单的观察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结论。我们回想一下本书的第二章，在那里我们把经济体制划分成两种主要的抽象类型，需求约束型和资源约束型体制。在需求约束型体制中，个别买者手中的货币量对他的总购买设置了有效的约束上限。在资源约束型体制中，买者手中的货币不是有效约束。后者购买他从既定物质供给中所能得到的一切，而不是他的货币所能购买的一切。^⑧如果他能弄到他所需的东西，他总是能够得到必要的资金。这就是在该制度中资源利用达到“瓶颈”设置的上限的原因。^⑨

(2) 短期资金供应制度“软”的另一个间接表现是企业间信贷的激增。^⑩如果企业资金拮据，它将对提供投入品的企业延期支付。

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中，中央银行严格垄断了短期信贷，企业不允许互相贷款。正是银行自己实行一种消极的信贷政策，它总是调节信贷供给去适应由数量冲动引起的信贷需求。改革之后，这种信贷垄断放松了。即使银行要实行限制性政策，坚持信贷的

⑧ 对上述内容应补充一个基本的限制条件。这里所说的一切只与购买国内投入所需的国内通货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有关，而不涉及购买国外投入所需的外汇。控制外汇支出将不在这里讨论。

如同本书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们不在这儿详细讨论外贸的特殊问题。

⑨ 我们不必重复在第一篇详细说明了的思想，即当某体制持续地碰到实际资源“瓶颈”，以及在这个意义上，达到利用上限时，总是会剩下未被利用的互补投入。因此，在这里，短缺与滞存并存。

⑩ 参见陶洛什(1976)。

计划供给，企业也可以通过忍受相互间的负债来自我帮助。正如我们将在第(3)看到的那样，它们最终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冒特别的风险，因为没有任何企业会受到财务灾难的威胁。

企业间信贷的扩大是一个经验上可观察的趋势。它们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使伴随实际投人品流动的货币流动更为灵活，另一方面，它使企业可以增加或限制其负债，而不必被迫求助于银行。

(3) 经验检验的间接方法的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观察企业是否可能发生全面无力偿还债务或破产。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甚至在它明确宣布的原则中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出现，它自动地避免哪怕是局部性的现象。所谓的“强制信贷”曾是一种熟悉的形式。如果企业暂时无偿还能力，它不得不增加贷款以支付其投人品的供给者。借助“强制信贷”，银行防止了破产波及其它企业。

改革后的管理体制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维持“强制信贷”的原则，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实行它。正如我们在第十三章中详细说明的那样，彻底的无力偿还或真正的和最终的破产几乎从未发生过。

20·3 投资资金来源

我们现在转向长期投资资金的来源。^⑩这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第九、十、十三和十四章的某些重复，那些地方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投资。现在为了系统分析与货币有关的问题，投资的几个问题不得不再次提到。

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将在这里一起讨论。当然，这两者之间有差别。除了无关紧要的例外，非营利机构不能使用自己的储蓄来

^⑩ 参见戴阿克(1975, 1978a, b)肖欧什(1975a, b)布克塔(1974)。

进行投资。相反，企业可以使用其储蓄的一部分作为投资资金。企业部门自有资金在总投资中的份额随时期、国家和部门而不同。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这个份额很低；改革之后它有所提高，但即使在改革后的匈牙利，在那里投资决策和资金来源已变得相当分散了，完全用企业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的比重仍然非常小。其它投资或是完全来源于长期信贷以及国家预算拨款，或是企业自有资金通过不同形式的信贷以及国家拨款来补足。因此，两个部门的情形在这方面是相似的，投资的绝大部分（或者几乎全部）是由中央财政提供资金。这种相似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在本节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关于决定和控制投资的多级过程，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如下：企业或非营利机构要求得到货币，它向分配货币的分配者^⑫提出要求。看起来似乎是对货币量讨价还价，企业或非营利机构要求1.5亿，分配者开始只想给1.1亿，最后，他们商定1.25亿或1.4亿。在某一级，起分配者作用的部门，给人以只能分配它所掌握的东西这种现象。

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即一种在决定和控制投资的多级过程中的特殊的“货币幻觉”。揭开货币的面纱，我们发现了实际的“数量”控制过程。^⑬看起来好象分配者在分配货币，然而实际上他同意着手进行的是明确的实际行动。如果实际行动已开始，相应的货币支出也许会远远超过最初允许的成本限制。投资的预算约束是软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在事前做出的最初财务预算和事后的实际投资成本之间没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初步的成本预算给执行者在实施过程中确定了大致方向。但是这些预算至多影响他们

⑫ 对于“分配者”这一概念的说明，参见第九章。

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分配者分配投资额，较高层的部门给中层部门配额，后者再给较低层部门。如此等等，在改革后的体制下，分配者的任务是在决定国家支持或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的较高部门批准总预算时完成的。

⑬ 这一问题在9·3节已提到了。

而不会对支出设置有效和硬的约束。我们上面关于企业短期资金来源所说的话对投资甚至更适用：货币只起消极作用。

通过证明下述几个局部的假说，可以间接地根据经验来检验我们的论述。

(1) 最重要的事情是观察投资的执行。如同上节在第(1)点中提到的局部假说的情况一样，通过采访、调查表和案例研究，我们能够从有适当代表性的样板中找出下列问题的答案：

“在某项国家批准实际已经开工的投资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有无这种情况：一种必需的国产投入品^⑩（例如建筑施工能力，国产机器，劳动等等）在供给方能够提供，在投资者方面也有购买意图，然而只是因为投资者没有货币而使购买没有发生？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有多大？这些投入项目的重要性又如何？”

我们的假说是，这类事件几乎不可能出现，如果它们出现的话，也只影响相对不重要的项目。人们听到一千次抱怨说，钱可以弄到，但没有完成工程所需要的建筑施工能力，或是没有材料，没有机器，没有劳动力。但只要投资的发令枪一响，人们从来不会（或者几乎从来不会）听到相反的抱怨，说什么建筑施工能力、机器、材料和劳动力都是可得到的，就是没有钱，因为钱总是能够设法弄到的。

(2) 投资者如何取得货币，他是否可能在投资过程中遇到资金困难，可以根据经验来观察，尽管方法很多，但三个最重要的方法是应该加以强调的：

(a) 最明显的方法是：重新安排时间表。如果必要的话，原先被认为在稍后的时间中将被花费掉的钱，可以提前使用。

当要向那些不是完全使用企业自有资金的投资项目提供国家

^⑩ 在这里我们想重复一下上节提出的限定。我们只讨论国产投入的购买。投资者自然用国内货币来支付这些投入。外汇支出的预算约束也许硬得多。但是，象上节一样，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

资助或信贷时，当投资计划的预算被批准时，通常都有这些资助或信贷的时间安排。但是，只要投入品（也许以后才需要它）目前可以得到，投资者就能毫无困难地把支出提前。

我们用 $K_i(t), K_i(t+1), \dots, K_i(t+T_i)$ 表示在 t 年开始或在建的第 i 个投资项目的成本估算的事前序列，其中 $(t+T_i)$ 是预计完成日期，这些不是最初的指标，而是扣除到 t 年为止的实际支出以后，根据使用所余货币的最新时间表重新计算的计划数字。

我们用 $I(t)$ 表示 t 年开始或在建的所有投资项目的集合。

根据以年度划分的时间表，在 t 年的投资支出应是

$$\sum_{i \in I(t)} K_i(t)$$

同时，投资者感到（这种感觉由经验进一步证实）他实际上支配的是全部未使用的投资预算。我们用 $K(t)$ 表示估算的国民经济的未使用投资资金总额：

$$K(t) = \sum_{i \in I(t)} \sum_{h=t}^{t+T_i} K_i(h) \quad (20-1)$$

估计的未使用的投资总额	在建投资项目	项目所余年份的总和	估计在 h 年的投资成本
-------------	--------	-----------	----------------

当然，不可能在 t 年用掉全部 $K(t)$ ，只会有一小部分用掉，因为实际产品的供给是有限的。但是，在需求方面未使用货币的总量 $K(t)$ 正在增加。这种现象本身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偿付能力几乎决不会对投入购买或投资品出售设置有效的上限。只要实际供给存在，并且只要它没有被 t 年应有的投资需求

$$\sum_{i \in I(t)} K_i(t)$$

所吸收，那么买者就总能够提前得到原订用于 $(t+1), (t+2)$ ……年的某种信贷或国家资助。

(b) 正如企业短期筹措资金时的情况那样，投资者也许可能

对提供投资品的企业负债从而减轻其即刻支付的困难。

(c) 如果成本确实高于计划，投资者可以要求增加最初允许的信贷限额或国家补贴。这种要求实际上总是受到重视。统计上可验证的观察说明了这一点：绝大多数投资项目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最初的成本预算，其中相当部分投资项目大大超过了预算。

许多投资者把方法(a)和(c)结合起来使用。在开始执行投资时，他们使用方法(a)，也就是说他们“停留”在最初批准的预算之内，但也许会提前使用资源以弥补成本的增加。与此同时，项目继续进行。它越是接近完成，对有关部门来讲，如果因为超过了原成本限度而停止该项目就越显得荒唐。那时，投资者、银行和国家预算已经“被拴在”他们所投入的货币上。因此，银行和国家预算自己承担了弥补最初预算的任务，并且付了这笔账。

在第(1)点，我们曾问到是否会发生仅仅因为投资者没有货币而未能购买某种投入的事，我们给予了否定答复。现在，这个问题可以在经验分析的范围内用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加以补足：是否有过因最初预算被用尽而完全停止的投资项目？根据迄今为止的观察，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它从未发生过。是的，在获取投入过程中的短缺现象和调节摩擦可能使施工进度减慢。在投资周期的限制性阶段，经济控制也许会干预并迫使项目减慢。有时候甚至会使工作暂时中断。然而，项目迟早总会最终完成。

这就是为什么在投资饥渴推动下，想要投资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总是千方百计使项目实际开工得到批准，而不耽心规定的成本限制。他们明白，他们迟早得超越这个限制。

(3) 经验检验的第三个间接方法，是调查通过投资实现的新项目的财务后果。这个问题已在13·8和14·8节中详细讨论过了。我们这里只是回想一下那里的陈述。就财务意义而言，真正的失败投资从未出现，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货币是消极的。

我们并不是说不存在错误的投资决策，也不是说不存在施工过程中组织不当、代价高昂的投资项目。当然，对有些欠成功的

投资项目会提出批评意见。甚至会对作出错误决策或执行不力负有责任的人实行制裁。^⑩但是，投资作为一种经济行动自动地“证明自己正确。”它总是“合算的”，因为，不管以货币表示的成本和财务收益有多大，它们迟早会互相适应，因此，投资最终不会导致无力偿付债务或破产。

这里我们遇到了与货币消极性有关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本书的前一部分，我们说明了，资源约束型体制最深刻和最强烈的内在趋势之一是不停顿的扩张冲动，它导致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限制货币供给从来不能阻止这种扩张。^⑪

这里有必要回想一下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投资决策的宏观分析。投资风险是迫使资本家投资者谨慎从事的主要约束力量。如果投资可能失败，即利润达不到预期水平，或者甚至可能导致投资资本部分损失，那么货币持有者在将货币投入那个项目之前将再三考虑。投资不足也许是总量需求水平不足以保证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个原因，潜在的投资者必须受到鼓励才会进行投资。其中，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以通过旨在增加投资的利息和信贷政策、促进生产的政府投资、发展“乐观的”气氛来做到这一点。在全面高涨中，个别企业家对投资获利的可能性会越来越有信心。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必要创造一种“乐观的气氛”，因为这是自动得到保证的，无风险投资有绝对的保证。因此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阻止投资项目的发起者。

总而言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供给不会限制也不会控

^⑩ 但是，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情况，在等级制度中，较高或较低层的许多机构，既参与了投资决策的准备工作，本身又参与了它的实际决策。具体实施也是如此。一般来说，简直不可能清楚地辨别谁要对一个项目的成功或者失败负责。参与决策和实施的机构和个人对澄清责任并不感兴趣。

^⑪ 有一段引文很好地刻画了这种特性，根据匈牙利投资银行所说，1957年匈牙利投资计划不得不增加：“……因为我们不能把投资活动限制在必要范围内，我们被迫扩大了资金供应。”（由温格瓦斯基引述，1976第122页。）

制实际扩张。毫无阻碍地增长的货币供给满足了实际扩张造成的无限增长的货币需求。

20·4 储蓄和投资

在分析投资资金来源时，我们也应该对投资和储蓄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一些观察。我们并不认为阐明一段时期中的货币储蓄与同一时期中的投资之间事后的会计平衡是我们的任务，如果这两个范畴都得到适当定义的话。^⑫ 虽然我们承认考察这种平衡是国民收入会计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种分析已越出了本书的范围。这里讨论的是两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要回答下面的问题：在一段时期内由储蓄积累起来的货币存量对下一时期的投资意图会产生什么影响？提出这个问题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关心社会主义经济财政问题的经济学家经常问道，已经被积累起来的货币资金中，“允许”信贷系统使用哪一部分发放长期贷款？我们认为回答后一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更不用说这个问题本身问得是否正确尚有疑义。我们用完全描述的方法来探讨这些课题。我们将系统地阐明下述需要检验的假说。

我们首先在微观层次上探讨这个问题。在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下，企业既不可能积累，也不愿意通过积累货币储蓄来筹集自己的投资资金。

这种情形在改革后的管理体制下，有了一点变化。企业有权使用它的来自利润的部分储蓄进行投资。有些投资项目完全是靠企业自有储蓄来进行的，^⑬ 在其它情况下，这些储蓄由银行长期信贷或政府资助来补足。

⑫ 至于匈牙利会计制度的详细情况，参见阿沃伊(1973第235—237页)。

⑬ 即使通过银行系统在其它企业进行这些投资更为有利，企业也要运用其储蓄进行自己的投资，正如已提到的那样，企业并不特别耽心利息费用。并且，相应地企业也并不热心得到银行存款的利息支付。一般认为，即使以较低的收益率扩大自己的工厂，也比贷出储蓄存款赚取利息更为重要。

即使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它也会被相互的作用所影响。由信贷或国家预算提供资金分配的投资项目也可能被分配到一个完全没有积累资金的行业或企业中去。看来这类投资的比重还很大，尽管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经验证实。因此，归根结底，在行业或企业之间的投资分配与这些行业或企业的货币储蓄积累之间似乎没有实质性的正相关。

对于前一时期的储蓄积累和将来的投资意图之间在宏观水平上的时间关系，也能够作出同样的断言。投资意图及其实现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与过去的储蓄积累无关。尽管这两个变量的基本趋势是扩张性的，它们加速和减速，也许还伴随着周期性波动。有几个能够解释波动的变量，我们已在9·10节中作了说明，但是，由可用来投资的储蓄积累引起的货币存量的变化，不属于那些解释性变量之列。如果投资活动增加，而没有足够的货币资金来源，财政制度将创造必须的追加货币。如果投资活动减慢或逐渐停顿，货币的供给可能增加得比较慢。货币存量可能暂时增加。但是，无论增加还是减少都不过是控制领域中投资意图与实际领域实现的波动的被动反映，它们并不是这些波动的原因。

这里将作两个简短的脱离正题的说明。首先是理论评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经济思想史的评论。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文献中，投资、储蓄和利润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性质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卡莱茨基，凯恩斯，卡尔多的观点以及在匈牙利文献中P·埃尔德什的观点，^⑨在主要的解释性变量是投资这一点上彼此接近，正是实际的投资活动起着首要的作用。用于实际投资活动的资金将自动地通过货币因素或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创造。

我不想判别这些理论在什么程度上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对社会主义经济而言，实际投资是首要因素而资金可得性是派生现象，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也

^⑨ 参见卡莱茨基(1964)，凯恩斯(1936a、b)，卡尔多(1960a，1960b)以及埃尔德什(1976)。

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事实：资金起消极作用，必须适应由实际投资活动导致的货币需求。但必须附加一个限制条件。

在正常状态下，资本主义经济是需求约束型，其扩张被投资者的谨慎心理所限制，他们要考虑：投资引起的增加的产出，是否能成功地找到有利可图的市场。该经济制度并没有扩展到它的资源约束的物质限度。除了例外的情况，总有一些可动用的实际滞存，这些滞存又可以为进一步的扩展提供物质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增长率仅仅取决于投资倾向的印象，而且不管这种增长率有多大，它决不是办不到的。事实上，实际投资越大，利润也越高，因而能够保证更多实际投资的资金来源本身就会增加，等等。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情形则不同，它是资源约束型的，投资意图和企业、非营利机构以及中高层部门的增长饥渴几乎是不可满足的，它们总是超过经济制度的物资资源约束。确实，这里也没有财务约束：货币总是可以被创造出来。但是，投资不能够在任何水平进行，因为，在周期波动过程中，它一再碰到经济制度的物质约束和容忍限度。^②

另一个脱离正题的论述关系到家庭部门。尽管我们在20·1节已说过，在20·2至20·5节，根本不论述家庭，但现在作为一个例外，我们短暂地讲述一下家庭部门中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想参与在这一点上什么应该被称之为“投资”的术语争论。不是经济学家的消费者常常把获得耐用消费品称为投资，特别是如果他购买一套公寓房间或建造一幢住宅，或者购买小汽车、家具、冰箱、电视机等等。我们这里将采用这种习惯性用法，而不去精确地定义这个概念。

对于一个孤立的微观组织，相互关系是清楚的：家庭能够把

^② 参见9·10节中的投资周期的叙述，并参见布罗迪(1980)。

通过储蓄^②积累的货币用于家庭投资上，成问题的是储蓄在家庭之间的再分配。家庭储蓄积累的一小部分以观念的形式留在居民手中，大部分则以存款的形式储蓄在国家银行系统之中。银行能够把这个存款量作为短、中、长期贷款借给家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作出下列经验的观察。

不存在自动规则来规定在能够给予或者给予家庭的消费信贷和由家庭创造的存款之间的关系。这种比例是由政府和信贷政策决定的。相当部分家庭储蓄流入其它部门。

20·5 国家预算的盈余或赤字

我们认为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结构不是我们的任务。^③我们只讨论国家预算的平衡、赤字或盈余对产生普遍长期短缺的作用。^④

作为初步近似，我们可以说，在国家预算平衡与资源约束型经济中普遍短缺的强度（即生产投入品、劳动投资资源、消费品和服务的短缺）之间，没有明确的或必然的因果联系。

许多人相信，预算赤字必然增加普遍短缺。但并非如此。在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下，人们努力保证国家预算没有赤字。甚至还要显示出略有盈余。在那个时候，广泛持有的信念是，预算盈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某种内在规律。与此同时，在传统经济管理期间，众所周知，大多数生产和消费领域中短缺很严重。相反的现象也可以观察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预算事先就提出

② 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不能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私人生产部门投资资金的筹措。私人手工业工人可以决定将其储蓄用于“家庭投资”（例如，建一幢住宅）还是“生产性投资”（例如，购买一台新机器）。但是，大多数的家庭没有这种选择。

③ 这种描述可以在本章注①中所列的著作里找到。

④ 博格纳—里茨—施米特的研究包含了对这个论题的卓越思想，也可以参见哈格麦耶（1976）和里茨（1976）。

预算赤字，事后甚至还超出了这个赤字，然而，在这同时，短缺在若干领域却减少了。当然，我们不会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结论说，这个因果关系是负的关系。这只是证明在两组一开始就能确定其方向和符号的观察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联系。

经济活动的扩张伴随着总信贷的扩张。在宏观水平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影响资源利用的一般水平。^②但是，无论是国家债务增加得快而企业债务增加得慢，还是相反，都没有多大关系。在“货币创造”过程中，某一方的负债是不可避免的。实质问题是，由国家预算提供资金的活动和使用预算外资金的其它活动争夺实际资源的程度。用第十二章介绍过的名词来讲，就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社会生产能力？我们把图12-3复制成图20-1，它表明作为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函数的社会边际成本的U型曲线。

如果当前生产，当前公共消费，家庭消费和从各种来源的全部投资，共同地产生了初始需求的水平，而这种需求几乎趋于无限，并只受到形成物质“瓶颈”的实际可得物资源和社会容忍限度的约束，那么该体制就会处于U型曲线陡峭上升的部分。在国家预算盈余或赤字时，这种情形都可能出现。

社会生产能力的高度利用，经济制度的“过热”状态，以及短缺现象的频率和强度，都不依赖于作为最大的货币持有者的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瞬时比例。长期短缺的强度取决于物质投入品的预期使用量和实际上可获量之间的关系。由于在经济的许多领域，这些意图都没有被硬的货币预算约束所限制，它们会任意增加，直到它们碰到真正硬的物质约束，即遭到该制度成员可能的反对为止，他们为生产能力的利用确定了容忍限度。

我们的评论不是有关平衡在任何国家预算中作用的一般叙述，我们这里谈的是这种国家预算，它出现在半货币化的经济体制中，其中包含一个预算约束是硬的、货币化的子系统和一个预

^② 它没有明确控制它，而只是影响它。

算约束是软的虚假货币化的子系统。

问题现在出现了，中央国家预算本身是否受“硬的”或“软的”预算约束的支配。根据我们的意见，它不能被明确地归入这两个范畴中的任何一个。^②一旦国家预算被批准了，对若干项目特别是对政府日常支出，将严格实施财政纪律以避免超过预算。在这个范围内约束是硬的。但是在下列方面它似乎是软的和无效的：

(a) 对于国家预算负担和支持的投资，通常总要支付超出计划水平的增加成本。(参见20·3节)

(b) 国家预算负担某些企业的亏损，通过负担部分成本使某些价格保持低水平，以及补偿某些无利可图的外贸交易等等。如果企业预算约束相当软，中央的约束也不得不变软。

(c) 遵守还是超过预先确立的平衡，要看中央经济领导的“自我约束”或“自我惩戒”，没有内在的法律的或政治的制裁。如果财政状况发展到使实际赤字大于计划赤字，中央银行会为这个超过量提供资金。银行受到对计划预算平衡的遵守或违反进行监督的同一领导部门的管辖。

20·6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争论的回声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匈牙利经济学界关于国家预算中是否许可存在赤字的讨论中听到了回声。^③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谁是谁非本书不作任何评论，我的评论仅仅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

^② 在14·11节讨论由预算提供资金的非营利机构的行为时，我们在微观层次上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论述的是为大部分非营利机构提供资金以及包括许多其它支出的国家预算。

^③ 关于货币主义的观点，特别要参见弗里德曼(1953, 1968, 1975, 1977b)。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参见托宾(1970b, 1972)有关概括性的评论。例如：莱德勒和帕金的文章(1975)。

在匈牙利，参与辩论的某些人很熟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观点以及关于这个论题的文献，其他人只有第二手资料。但是对于匈牙利讨论的某些参加者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或弗里德曼主义者，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他们是采用、剽窃还是独立地“再发现”西方辩论中的各种观点，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只评论辩论的内容。为阐明我们的论点，我们将重新画出图12-3并加以补充，它现在叫作图20-1。详细的解释可以在第十二章中找到，这里就不再重复。

该曲线说明作为社会能力利用函数的社会成本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要素。我们在第十二章已详细解释过，大部分社会成本的一阶导数（不管是否可用货币度量）都能用U型曲线来表示，这就是说，当生产能力利用程度上升时，该曲线开始时减少，然后以递增的比率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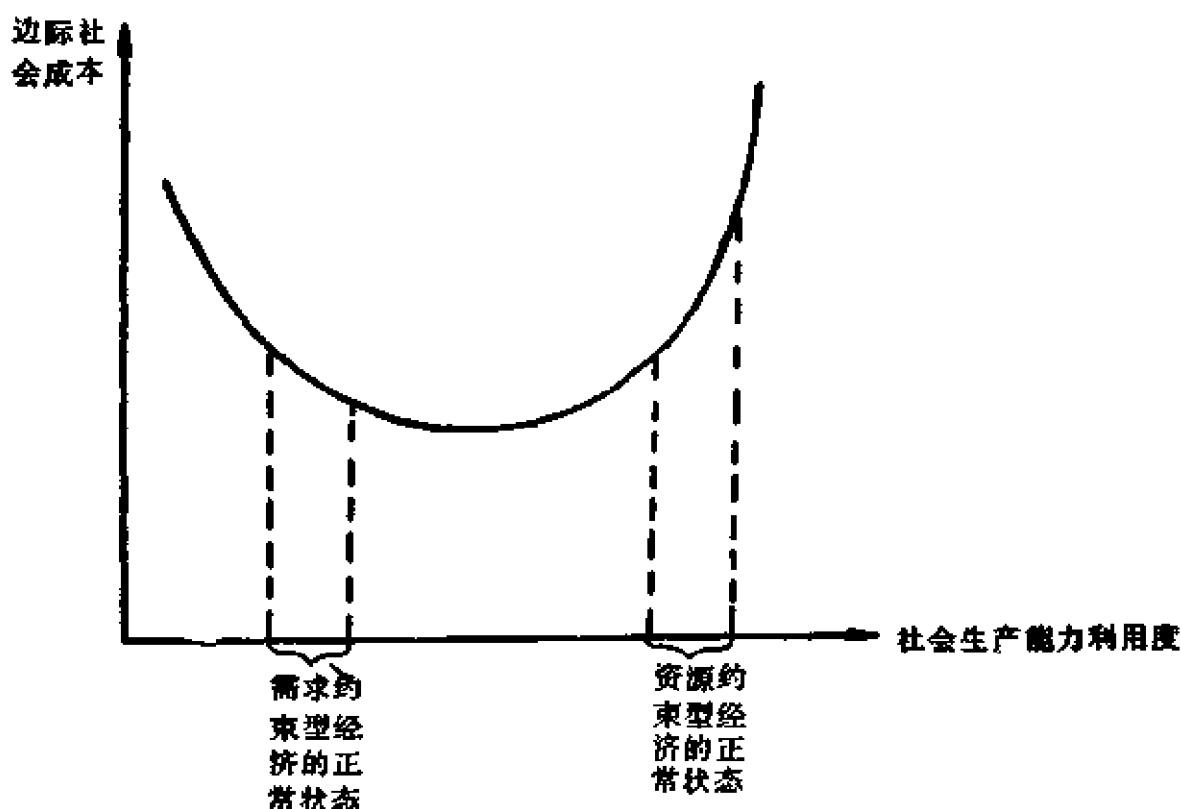


图20-1 社会生产能力与两种正常利用

当凯恩斯主义思想最初出现时，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处

在U型曲线的下降部分。它们的特点是失业，固定资本利用不足和存货不断积累。经济中的可动用滞存大大增加，也就是说，有互补投入品可供利用。凯恩斯与其追随者详细阐述了增加总量需求的建议。增加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同时不采用较高税率来减少总量需求的其它部分。假如能够有利于增加就业和使社会生产能力更好地得到利用，预算赤字就是允许的，甚至是需要的。

在没有失业但有长期劳动短缺的经济中重提这种凯恩斯主义的道理是混淆了时间和地点的荒谬之举。这种经济的特征不是大量可动用的滞存，而是过热和长期短缺现象。这种经济的正常状态，如图所示，是在U型曲线的上升部分。

确实，正如我们在上节强调过的，国家预算中的平衡符号本身并不会决定短缺强度是增加还是减少，或者说不会决定我们在U型曲线上是向左还是向右移动。但是，若其它条件相同，预算盈余或赤字以及它们的大小决非无关紧要。让我们作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下列条件是既定的：(i) 实际资源可获性；(ii) 国家预算外所有其它部门的初始需求水平；(iii) 国家预算的收入；(iv) 价格水平。这样，在经济制度中唯一的自由变量就是国家预算的支出方面。假若这样，由国家预算引起的需求水平确实要紧。按照上述假设，政府支出的增加，将把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进一步推向右边，在那里边际社会成本增加得甚至更迅速。

当然，现实决不会遵守其它条件不变的原则。因此，我们并不是说预算赤字的增加必然意味短缺变得更严重，更频繁地碰到“瓶颈”，边际社会成本增加得更快。我们只能说，把凯恩斯主义关于预算赤字的思想运用于处在U型曲线的上升部分，具有高度的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并面临着劳动短缺问题的过热经济是荒谬的。事实上，短缺经济的正常状态是“超凯恩斯主义”的状态，存在持久的扩张冲动，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以及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这种体制当然不需要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增加需求的注射

剂。

是否由此应当得出“弗里德曼主义者”的结论？在匈牙利的辩论中，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货币太多了”是投资紧张的原因，也许这还是短缺经济产生的原因。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仅仅描述了现象，而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因果说明。正如已强调过的那样，这种体制只是半货币化的。在非常广泛的领域——首先在企业部门——货币只是一种消极的会计手段，而不是行动的积极推动者。在这个部门中预算约束之所以不可能变硬，有着深刻制度上的原因。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货币供给不得不适应从实际活动中随时产生的需求。中央银行不是在能够自由决定是否接受弗里德曼主义者处方的体制之外的机构，而是必须满足货币需求的体制的内在要素。

我们要在第二十二章回过头来再谈这个问题的制度方面。

第二十一章 宏观相互关系： 吸纳模型

21·1 引言

本章是一个局部总结。它不打算对本书所有主要思想作完整的概述，而只是重复和强调我们前面的某些命题。本章第一部分使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资源约束型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的宏观相互关系，而第二部分则用一、两点总的评论来补充由该模型引伸出来的结论。

首先，在21·1至21·6节中，我们用最简单的形式解释这个模型，并且由提出简化假定而开始我们的说明。然后，在21·7至21·8节我们考虑如果改变某一个假定，我们的结论将作何种修改。

- (1) 生产和消费以总量的形式来描述。^①
- (2) 生产被划分成两大类：制造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制造消费品的第Ⅱ部类。^②
- (3) 所有产品都可储存，我们不考虑不可储存的服务。
- (4) 没有初级资源。第Ⅰ和第Ⅱ部类的投入都来自第Ⅰ部类的产出。

① 使用本书前几章所作的假设，可以得出总量。（参见例如12·1节的假设(5)，即总量产出的商品构成不变。）

② 这种划分基本上相当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划分。在这个模型中的定义与马克思的模型有点区别，因为分析的问题不同，并且模型反映的经济制度的特征也不同。

(5) 调节中的摩擦是既定的，它不取决于体制中的其它状态变量。

(6) 模型是动态的。我们考虑一个静止状态中的经济，或简单再生产，时间是连续变量，因此，这些变量描述体制的瞬时控制和调节。

(7) 经济是封闭的，我们不论及外贸。

(8) 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组织中，我们只讨论公有的企业和家庭。我们不考虑非营利机构和私人企业，以及由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组成的正式部门之外的非正式的“第二经济”。

(9) 该经济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结构中运行。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

我们将不介绍该过程的数学模型，而是满足于图解的表示，使用水力学作为类比。用某种液体，例如水的流动来表示产品的“流动”，用该液体的积聚来表示存量。类比不是什么新东西。数十年前，经济学的伦敦学派中，菲利普斯机器^③用实际的液体流动模型论证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④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实际的类比模型(尽管这样做没有什么困难)，而仅仅借助图解来表达这些相互关系。^⑤

21·2 第二蓄水池和水龙头

图21-1是某蓄水池的侧视图。这是第Ⅱ蓄水池。它可以被看

^③ 该机器是由菲利普斯教授作为讲授宏观经济学的形象化教具而制造的，他后来因描述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而闻名。

菲利普斯机器显示——用我们的术语来讲——液体由于挤压而流动，而我们将要讨论的流动是吸纳引起的。

^④ 萨缪尔森(1948a、b)也用水力学类比描述过凯恩斯体系。水力学类比能用来阐明短缺经济的市场这一想法是由J·W·韦布尔提出来的。

^⑤ 在某些方面与我们的“蓄水池问题”相似的这些问题，在水力工程学中详细地用数学语言描述过了。这种研究的先驱者是莫兰(1950)。关于研究工作现状的概述见安尼斯—劳埃德(1975)。

作第Ⅱ部类所有企业积累的产出品；产出品在生产出来、尚未分配给家庭以前流到这里。依照我们的宏观方法，仿佛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全部产品存货以及从事国内贸易的企业贮存的全部商品，都被集中于一间巨大的仓库之中。因此，贮存在这个蓄水池中的液体象征产出品的存量。^⑥流入表示生产，而流出表示家庭部门的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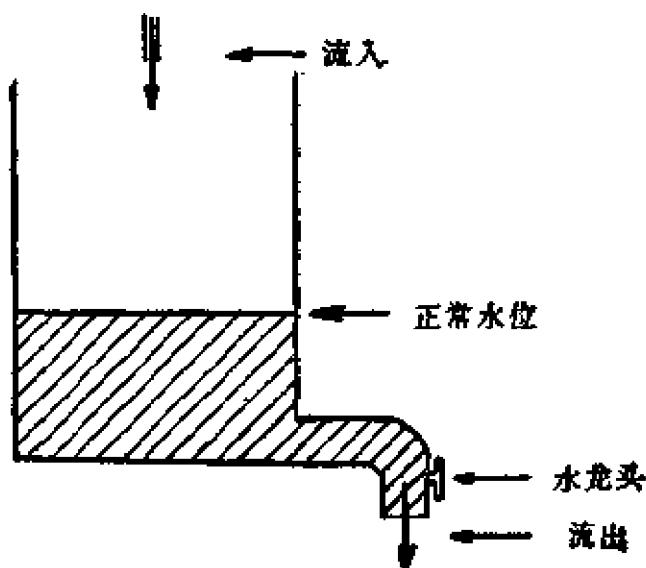


图21-1 第Ⅱ蓄水池

流入量，液体的贮量和流出量都表示实际的数量。^⑦

我们暂时假定第Ⅱ蓄水池与第Ⅰ蓄水池完全隔离，我们稍后将看到第Ⅱ部类的产出品流入第Ⅰ蓄水池。

我们的分析首先从下述假定开始：即在消费品的生产和交换中存在滞存，在该体制中它已经历史地形成并被社会所接受。在目前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它表现为第Ⅱ蓄水池中积累的液体的正常贮量，即正常的产出存货。

⑥ 在抽象的层次上我们的模型将投入存货和产出存货分开。(在本书前面一些章节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第七章的模型中，积蓄在蓄水池中的液体象征产出存货)。

⑦ 我们可以假设，例如，数量变量以某基期的实际价格来总计。

我们假定，在某一初始时刻，实际的产出存货完全等于正常存货。保持正常状态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呢？在图21-1中，大量的液体已积累在第Ⅱ蓄水池中，它是正常水平。在什么条件下，液体的水平既不升又不降呢？

第一个条件是很平常的：如果在每一时刻流入蓄水池的商品量同流出量一样的话，第Ⅱ部类出产品存量就保持不变。

$$\boxed{\text{消费品生产量}} = \boxed{\text{家庭购买量}} \quad \text{在每一时刻} \quad (21-1)$$

公式(21-1)是实际领域中第Ⅱ部类保持正常状态的条件。

现在问题是：如果要在实际领域维持正常状态，在控制领域必须满足什么条件？答案直接根据19·4至19·6节的分析得出，我们这里只需回想一下（并根据现在这个模型的结构重新系统地阐述）。

为保证稳定状态，即出产品存量持续等于正常标准，必须在每一时刻都满足下列条件。

$$\boxed{\text{消费品生产量}} = \boxed{\text{家庭打算在消费品上支出的货币量}} : \boxed{\text{消费物价指数}} \quad \text{在每一时刻} \quad (21-2)$$

公式(21-1)是第Ⅱ部类正常状态的需求条件。在我们的总量模型中，我们可以假设家庭的储蓄完全取决于名义收入。假若那样，控制名义收入和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就象控制蓄水池的水龙头一样，如果水龙头拧紧了（例如在价格水平提高时保持名义收入不变，或者在价格水平不变时降低名义收入^⑧），并且，如果流入的比率保持不变，蓄水池的液面将开始上升，直到溢出池沿为止。这意味着存货在增加；销售危机出现，仓库中再也没有地方存放积累的产品了。

⑧ 这是用固定的产品构成进行宏观总计，并且按固定的相对价格计算的目前价格水平同基期价格水平之商。

⑨ 我们提到这两种纯粹状态只是为了便于解释，实际上如同公式中证明的那样，有关问题是预定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数量和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关系。

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出口处的水龙头开大了（在价格水平降低时保持名义收入不变或者在价格不变时增加名义收入），并且，如果流入的比率不变，液面就要开始下降。产出存货量减少，并最终消失。当然，人所共知的关系还继续有效，即消费的东西不可能比生产的东西更多。因此，如果水龙头总是保持大开的话，一种新的稳定状态迟早会发生，这可以被概括如下：

$$\boxed{\text{消费品生产量}} = \boxed{\text{家庭购买量}} \quad \text{在每一时刻、产出存货为零} \quad (21-3)$$

$$\boxed{\text{消费品生产量}} < \boxed{\text{家庭打算用于消费品支出的货币量}} : \boxed{\text{消费物价水平}} \quad \text{在每一时刻} \quad (21-4)$$

公式(21-3)重复了人所共知的实际条件(21-1)，这只是补充了一点，即生产和购买的一致在存货为零时实现。

条件(21-4)取代了需求条件(21-2)。不等号表明家庭的总量过度的需求，已成为消费品部门的正常状态。在第十八章，我们指出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尽管它确实可能出现。但是，在消费品市场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短缺，而实际并没有出现在(21-3)和(21-4)中表达的极端状态。那种状态实现以前，家庭需求对消费品销售形成有效约束，在那以前，控制第Ⅱ蓄水池流出量的水龙头将实际地起作用。

关于第Ⅱ部类的上述观察对宏观经济学初学者来说是基本指法训练。所有相互关系很容易理解并且是不言自明的。条件(21-2)右边的变量是有名的“需求管理”方法。然而，我们希望稍后使读者相信，为了揭示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在其运行中的重大差别，简要地修正这个材料会是有用的。

我们假定，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滞存之比在宏观层次上是既定的。尽管有些存货卖不掉，但其他则会很快找到买者。我们回想一下本书已经从许多侧面提出的一个观点：在生产性滞存的水平

和短缺强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反比关系。^⑩ 如果商店里摆满了商品，在既定的买者与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既定的信息全面缺乏和既定的调节摩擦下，那么，强制替代将比较罕见，家庭经过短期搜寻，就能够得到他们所要的商品，完全不用等待或只等待很短时间。另一方面，如果商店是空的（同样是在既定的调节摩擦下），强制替代将是频繁的、严重的，长期搜寻出现了，长时间等待和排队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假定之下，名义收入和消费物价水平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即第Ⅱ蓄水池的水龙头，控制着短缺的强度。

当消费部门的正常滞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正常生产性产出存货形成时，消费品市场的正常短缺强度也就被确定了。如果实际的短缺强度离开正常标准，它能够恢复原状。如果(a)消费品的生产既定，以及(b)第Ⅱ部类的产出存货（一般来说，第Ⅱ部类的滞存）与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完全无关。那末，在我们模型的假设之下，名义收入和消费物价水平的适当调整和校准，完全能够控制该系统。我们强调“如果”这个词，因为正是(a)和(b)这些条件引起了这个问题。

21·3 第一蓄水池和抽水

在图21-2中我们表示出了第Ⅰ部类蓄水池。我们暂时还假定它与第Ⅱ部类蓄水池是隔绝的。这两个蓄水池有一个基本的差别：在这里，出口处没有水龙头。

第Ⅱ部类有一个水龙头，因为买者即家庭的购买意图受硬预算约束。如果家庭货币很多，或者价格较低，它可能购买较多商品；如果家庭货币很少，或者价格很高，它就购买较少商品。另一方面，生产品购买者，第Ⅰ和第Ⅱ部类的企业——的购买意图

^⑩ 主要参见8·7节中的图形。对此关系更详细的叙述，参见第八章、十二章和19·4至19·6节。

不受硬预算的约束。它们的意图不取决于它们握有多少货币，因为企业的资金或多或少要被动地调节以适应其财务需要。^①它们并不怎么取决于投入品的价格，企业对这些价格没有什么反应。^②这些购买意图在既定的生产计划和工艺下，实际上取决于所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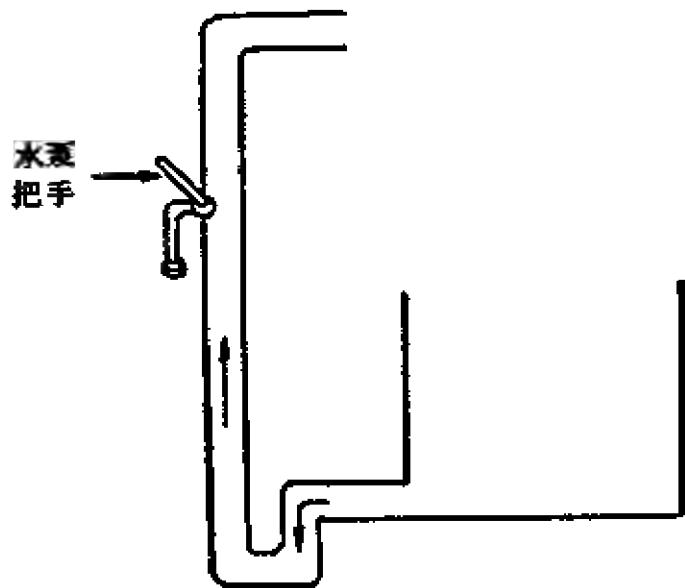


图21-2 第I蓄水池

的投入品是否存在。企业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③这一点在图中以没有龙头的出口来表示。

因此，作为第一步，并根据现在的假设，第I蓄水池是空的，在我们宏观模型的抽象领域中，它标志着第I部类的正常状态，即其产出存货总是为零。在这种正常状态下，企业所购买的投入品数量在任何时候都等于同时间的生产资料的生产量。这是在高度抽象的宏观层次上表示我们于第一篇在亚微观和微观层次上讨论过的现象，即生产不断遇到资源约束。

当然，现实中象我们将要很快说明的那样，在第I部类中也

① 参见20+2节。

② 参见第十三、十四章。

③ 参见第五、九章。

存在着数值为正的产出品存量。然而，有一股要经常不断地耗尽存货的强烈趋势，这是伴随着极度强烈的短缺而来的现象。强制替代频繁发生，它常常带来严重的损失、等待和排队，这几乎必然导致在分配中广泛采用配给方式。

流出量必须与流入量相等，但是，不存在需求有效性的约束条件，维持正常状态的实际条件在这里自然也适用，因为对于买者并没有有效的预算约束。

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液体从蓄水池底部流出。在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指向上方并带有把手的管子，这个把手代表水泵的能量。这个水泵主动地把液体从第Ⅰ蓄水池中吸出来。

是什么驱动力推动了水泵？在本章中我们将描述多种不同的驱动力，但这里我们只指出一种。开动水泵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数量冲动，^⑭ 还有不可分割的伴随物：囤积倾向。^⑮ 企业在固定资本既定的情况下想生产更多的东西，紧计划指令以及消费者的强烈要求，对这一点起了促进作用。为此，它需要越来越多的投入。因为供给不确定，它便力图建立投入储备。因此，企业作为买者急不可待地将卖者的产出存货一扫而空，无论是为立即使用还是把它作为自己的投入存货储备起来。

21·4 漏洞和塞子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将两个蓄水池完全隔开。然而，现实中不会出现绝对的隔离。图21-3表示在一起的两个蓄水池。在隔墙上，有可供液体渗透的漏洞。

我们已经在本书的多处，主要在19·3节论述了这个现象。目前，在现有的模型结构中，我们满足于这种最简单的情况。有些商品的物理性质只适用于消费，或者只能作为生产中的投入品来

^⑭ 参见3·2节。

^⑮ 参见5·6节。

使用。然而，其它商品的用处却并没有事先由其物理性质决定。如果在第Ⅱ部类的贮藏中有这样一种产品，企业的采购员也能购买它。例如，他能够在家庭部门得到之前，把汽油、煤、文具、电灯泡等等全部买完。

由于两个蓄水池是联在一起的，第Ⅱ蓄水池的水位应该一直下降，直到与第Ⅰ蓄水池的水位相同为止。换言之，第Ⅰ部类会从第Ⅱ部类中抽吸出所有的滞存。这种趋势实际上存在，但是，它被相反的趋势所阻抑，后者在我们的水力学类比中用塞子来代表。渗漏被各种堵塞机制所减少或阻止。这些机制中的一部分稍后将讨论，这里我们只提出最明显的一种：中央有关部门力图用行政禁令来阻止这种抽吸，例如，禁止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在向家庭出售商品的商店进行采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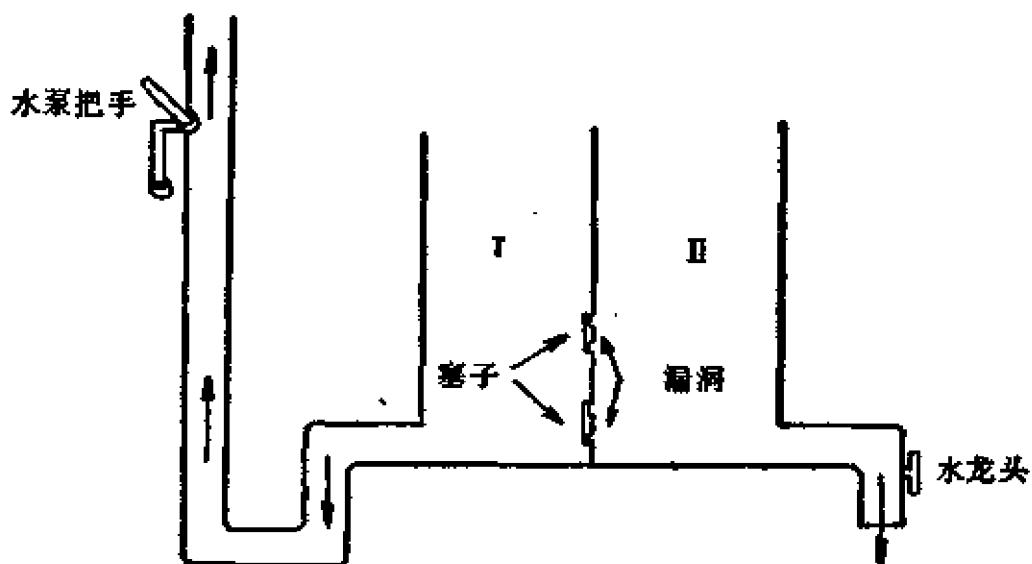


图21-3 两个蓄水池之间的漏洞

水可能通过漏洞流向任何一个方向，在经济中这确实会发生。例如，私人汽车所有者买完了所有的汽车配件，以致企业完全买不到。反过来也一样。但是，尽管朝两个方向的渗漏实际上都有可能，但流动通常是朝一个方向：主要是企业吸走商品供自己使用。

21·5 流入量和闸门

图21-4表明从第Ⅰ蓄水池抽吸出的投入品到什么地方去了。它们通过一根垂直的管道流向分配者。在分配之后，有些经过左边的垂直管道，流入第Ⅰ部类又被用作投入品。我们的宏观模型不涉及生产过程，因此，我们用“黑箱”来表示生产。在此黑箱内，投入被转化成产出，然后通过垂直管道流入第Ⅰ蓄水池。相似的转化在右边也发生，结果消费品流入第Ⅱ蓄水池。

两个流量的相对比例，基本上由两根垂直管道的直径比例来确定。此外，由分配者控制的“微调”闸门也起作用。它能够增加或减少进入消费品生产的投入，因而控制了对第Ⅱ蓄水池液体的供给。根据我们的水力学类比，闸门代表在19·4至19·6节中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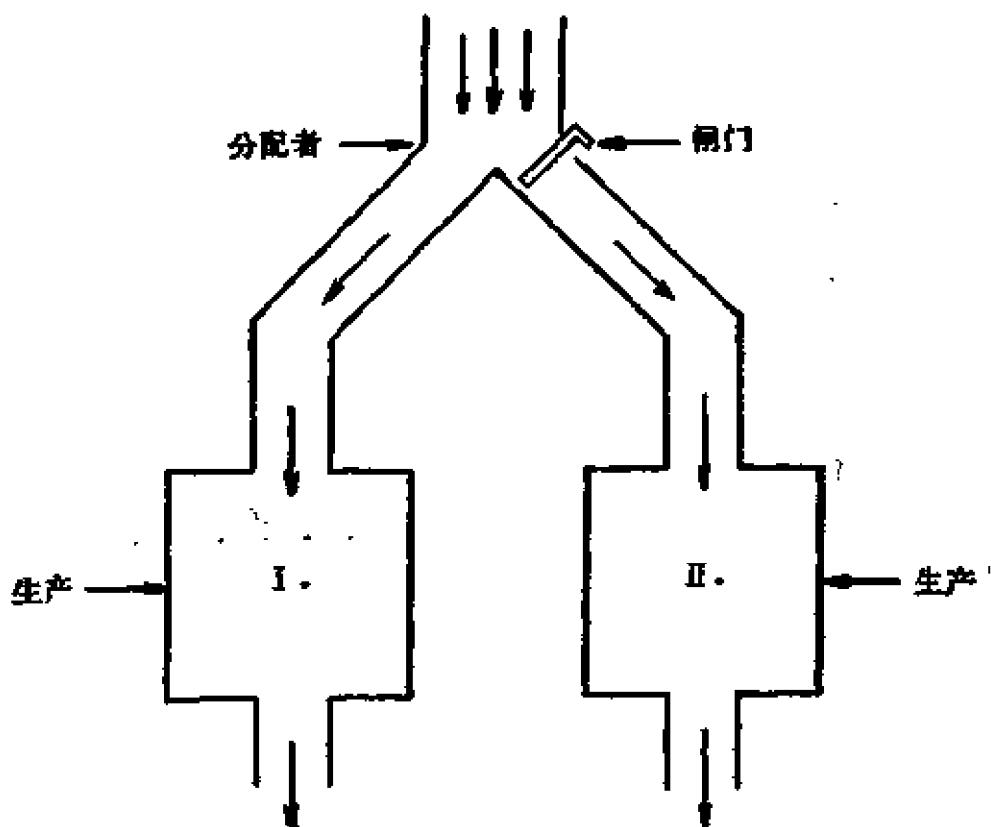


图21-4 流 入

的宏观消费计划。正如我们在那里说明的那样，消费品产出的计划指标是依据各种考虑确定的，而滞存和短缺的正常标准被视为既定。相应地，闸门的控制与对第Ⅱ蓄水池水位的观测相联系。如果液面升高，即如果产出存货提高到消费品生产和销售的正常水平之上，水闸会关小，这样存货水平会降回正常状态。反之亦然。（例如，当湖水来自河水时，在连接河与湖的水闸系统中可以发现类似的反馈。）

21·6 吸纳模型：初步探讨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当作初步探讨和采取简单形式的、被称为吸纳^⑩的复杂社会现象的模型。由于在图21-1至21-4中我们已相继表明了这个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图21-5从整体上来说明该系统。

我们首先考虑水力学类比。流动可以通过迫使液体进入管道和蓄水池网络而开始挤压。然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流动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而是通过不断地从该系统中抽出液体开始吸纳。我们的图中抽吸机制起着核心作用。

从我们的类比回到模型的经济现实来，我们要强调吸纳的下列主要特征。

控制有效需求的古典方法（通过确定名义收入和消费物价水平）本身不能在消费品部门增加滞存数量和减轻短缺强度。它不可能这样，是因为不存在保证消费品供给总是完全满足初始消费需求的必然性。一方面，消费品以一种维持正常滞存水平和正常短缺强度的方式被投放到国内市场上。另一方面，经济中的这个完全货币化的部门不是与仅仅表面货币化的企业部门隔绝开的。

^⑩ 这个范畴是我在《反均衡论》一书中引入的。（科尔内1971a, b。）尽管对这种现象的一般解释仍然相同，但在本书中，我们对它的叙述和对其原因的解释更详细了，并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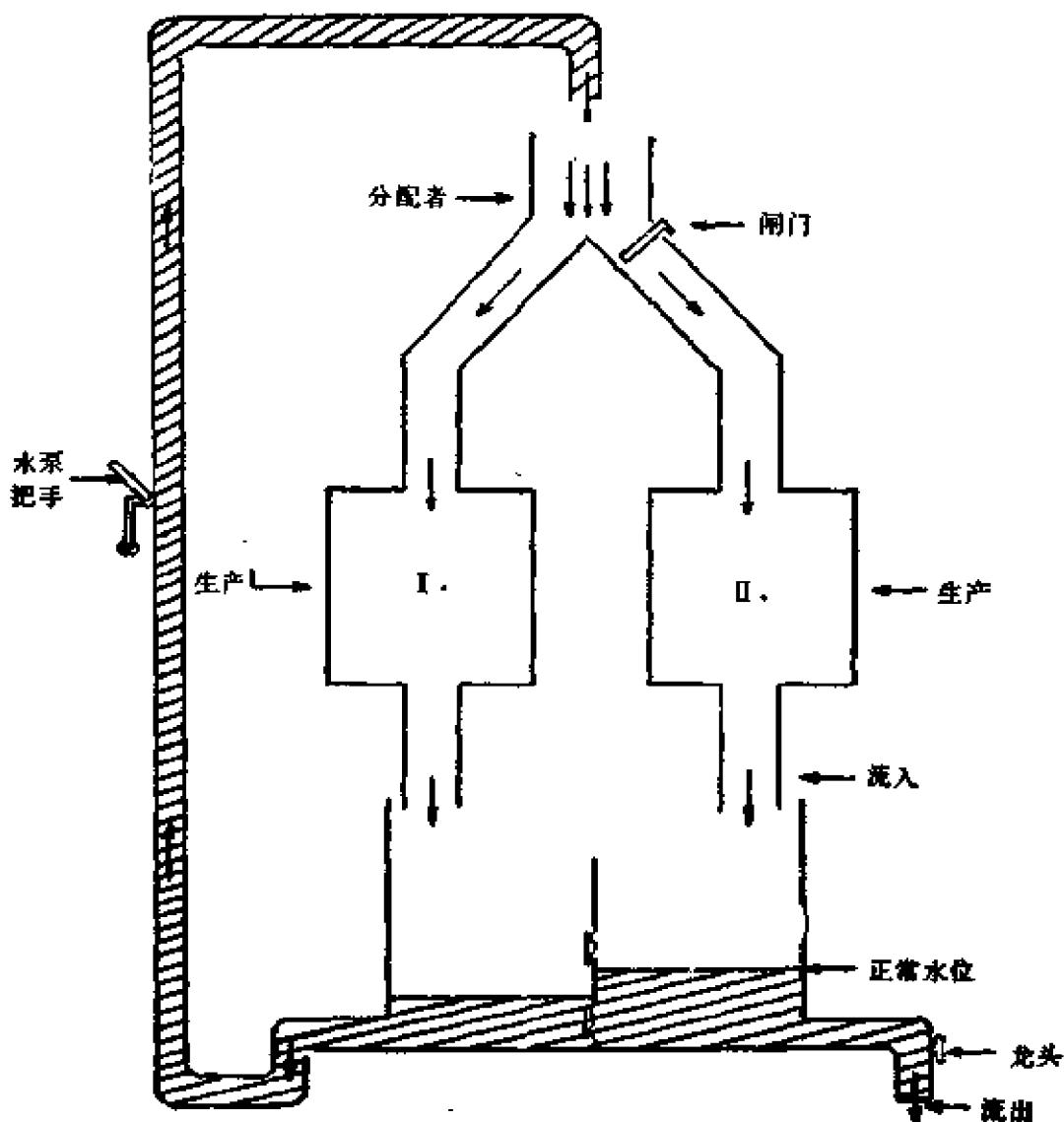


图 21-5 吸纳模型

企业部门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导致持久的吸纳，它引起的强烈短缺不仅出现在严格意义的生产资料市场上，而且间接地，通过拿走一部分消费品，也间接地出现在消费品部门。

我们现在开始考虑，如果放松在 21-1 节中列出的简化假定，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描述将更具体，更现实。但是，我们力图传达给读者的关于吸纳的总的意图将不会改变。

21·7 非总量的探讨

我们来看假定(1)，即模型只论述宏观总量。然而，作者希望告诫读者——也包括他自己——不要忘记本书开始时竭力强调的观点。短缺是由数百万微观或甚至亚微观层次的事件组成的统计现象。每时每刻，不是某种生产投入品就是某种家庭所需的消费品会在某处出现短缺，这些短缺的存在是与其他投入品和其它消费品的瞬时滞存和谐共存的。不仅如此，由于互补性，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某种投入品的短缺必然导致其它互补投入的瞬时滞存。仅由于这个原因，在两个蓄水池中，任何一个的液面水平都不会完全降至零。甚至在极度短缺的情形下，也会继续保持某种滞存。

我希望特别强调以下观点：在我们的宏观模型中，每一个蓄水池中的液体储量，即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产出存货，是代表两个向量的实数，一个是滞存向量，另一个是短缺向量。这两个实数能够表示向量变化的方向，但是，它们都不能当作由滞存和短缺的许多分类指标构成的一个总量来看待。

关于假定(2)，即存在两个部类，从最初模型的宏观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蓄水池。在现实中，有成千上万的小蓄水池——同该体制中的企业一样多——在每个企业内部，还有个别产品的“分蓄水池”。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很快就能很好地理解“渗漏”和“虹吸”现象，不只是第Ⅱ部类的最终产出在家庭得到之前，被采购员(第Ⅰ和第Ⅱ两部类的企业)买完，也许更重要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企业可能挤占了制造消费资料的企业的电力或原材料。我们把第Ⅰ和第Ⅱ部类作为两个庞大的纵向联合企业。这一点由图21-4中的代表生产的两只黑箱来表示。归根到底，第Ⅱ部类的活动被家庭的有效需求约束了。与此相反，第Ⅰ部类的活动没有这种有效需求的约束。因此，如果联合企业

Ⅰ，能够在生产的每一阶段都对联合企业Ⅱ在相应阶段使用的投入发生“虹吸”效应，这是不难理解的。

关于假定(3)，即只生产可储存产品，对于经济现实的非总量描述，不仅应该包括可储存产品，而且也应该包括不可储存的服务。由于后者的显著特征是完全不可储存，因而不能照搬水池和水力学类比的其它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过的全部内容的实质，也能够延伸至服务部门。

在服务中没有独立的流入和流出。滞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作为实物上可以得到而实际没有被使用的能力。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一点，我们模型的一般结论，也能够重新用来表述服务的情况。两大部类都生产服务。象对于产品的需求那样，对第Ⅱ部类提供的服务的需求被买者的有效预算约束所限制。另一方面，对于第Ⅰ部类生产的服务的需求没有被这样限制，在这里也发生“虹吸”。只要有可能，企业将租用本来也适于作住宅的公寓来办公，将利用私人汽车服务站等等。

为了保持原有的图解说明，我们将在本章余下的部分继续使用水力学类比，而不对服务进行单独讨论。

关于假定(4)，即所有的投入都是可以被再生产出来的。当然，在经济中有一些初级的资源，特别是劳动、自然资源等等，这些在一般的生产过程中基本上是不可“再生产的”，因此，不可能在我们的水力学类比结构中阐明。但是模型说明的相互关系对它们也适用。它们也被社会再生产过程所吸收，直到物质资源约束以“瓶颈”形式出现或者直到碰上社会容忍限度为止。(我们可回想一下，分析劳动短缺的第十一章。)

“虹吸”效应在初级资源的使用中也起作用。例如：重工业和建筑业从商业和医疗服务中拉走一些工作者。

关于假定(5)，即不存在摩擦。在体制调节过程中的摩擦只能通过非总量模型，在微观和亚微观层次上来描述。在我们的类比中，我们描述了一种纯液体物质的流动。然而，在现实经济体

制中的投入和产出的流动，更象某种粉状或半液体的粘性物质的运动。两个蓄水池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变为全空的，因为某些在那里储存的物质“粘在里面”。设备更新极少是连续的。存货不得不在各交货期之间积累起来。除了这个不可避免的因素外，在第八章详细讨论过的摩擦现象也会出现。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即使在公式(21-4)指出的经常性总量过度需求的极端情况下，第Ⅱ蓄水池也不会完全倒空。买者不会确切知道何时何地能够找到他们所要的东西。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某些商品由于质量如此低劣或如此不对路，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找到买者。第Ⅰ部类蓄水池的情况也相似。无论水泵运转得多么有力，它不可能将蓄水池彻底抽干。总会有一些材料、半成品以及零部件毫无用处，不论是现在，还是给那些最愿意实行强制替代的企业作为存货而积累。

摩擦也减缓了从第Ⅱ蓄水池向第Ⅰ蓄水池的渗漏。一个生产者可能会在消费品部门采购到一些投入，但是，他不能得到准确的消息，或迅速灵活地做到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在图21-5中，甚至第Ⅰ蓄水池也不是空的。确实，它的液面略低于第Ⅱ蓄水池。我们并不是要用它来表明第Ⅱ蓄水池中滞存的正常水平必然较高，短缺的正常强度较低。我们只是希望表明：不一定出现完全的相等。

21·8 抽吸动力

关于假定(6)，即静止状态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停滞的，而在持续地增长。扩大的再生产不能用管道和蓄水池的“相片”来表示，而应该用“电影”来显示，其中管道直径变粗，蓄水池的容量也在增加。

本书前边^⑯曾解释过，在社会主义经济每一个决策者的行为

^⑯ 参见9·2节。

中，都存在扩张冲动，它导致不可满足的、持续的投资饥渴这种伴随现象。这是在抽吸过程中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如果适于投资的某种资源在某处积累起来，并出现了某种滞存，投资需求立即就会把它吸走。投资需求是几乎不可满足的，因为投资预算约束是软的。

扩张冲动以及投资饥渴在等级的、多级控制系统中的每一层都会出现。^⑩ 在经济史的一定时期，它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领导人的行为之中，中央经济政策推行尽可能最快的增长率。在这种时候，最大和最有力的水泵是中央掌握的。但即使中央经济管理人员比较有节制，每个部门的控制者，每个企业的董事会，甚至每个车间的工长都要求扩张，并要求投资资源。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水泵并力图从公共的大蓄水池中，为本单位吸出尽可能多的投资资源数量。

关于假定(7)，即封闭经济。如果我们想把外贸也纳入分析，那末，即使停留在宏观水平，我们也必须给模型至少再增加一个蓄水池，^⑪ 这在图21-6中表示。在左方开始的液体朝上流动的管道中，与前面一些图中的从第Ⅰ蓄水池出来的管道是相同的。两个水泵中较高的那个在前面的图中也曾经出现过。

新的、第Ⅲ蓄水池是在图上边的中部。该经济体制通过出口和外国信贷而得到的外汇流进这一池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定每一个愿意提供信贷的潜在的债权人，事先把他的货币放进这个蓄水池。该体制不断吸出蓄水池里的东西，几乎一滴不剩。对于为当前生产而进口的投入以及为投资目的而进口的机器设备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因此，对进口品的吸纳——或者是对支付进口的外汇的吸纳——不断地和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只有出口

^⑩ 参见第九章，特别是9·9节，关于持续投资紧张的充分理由。

^⑪ 这仍然是以高度简化的假定为根据的，因为可兑换和不可兑换通货，实际上是不可加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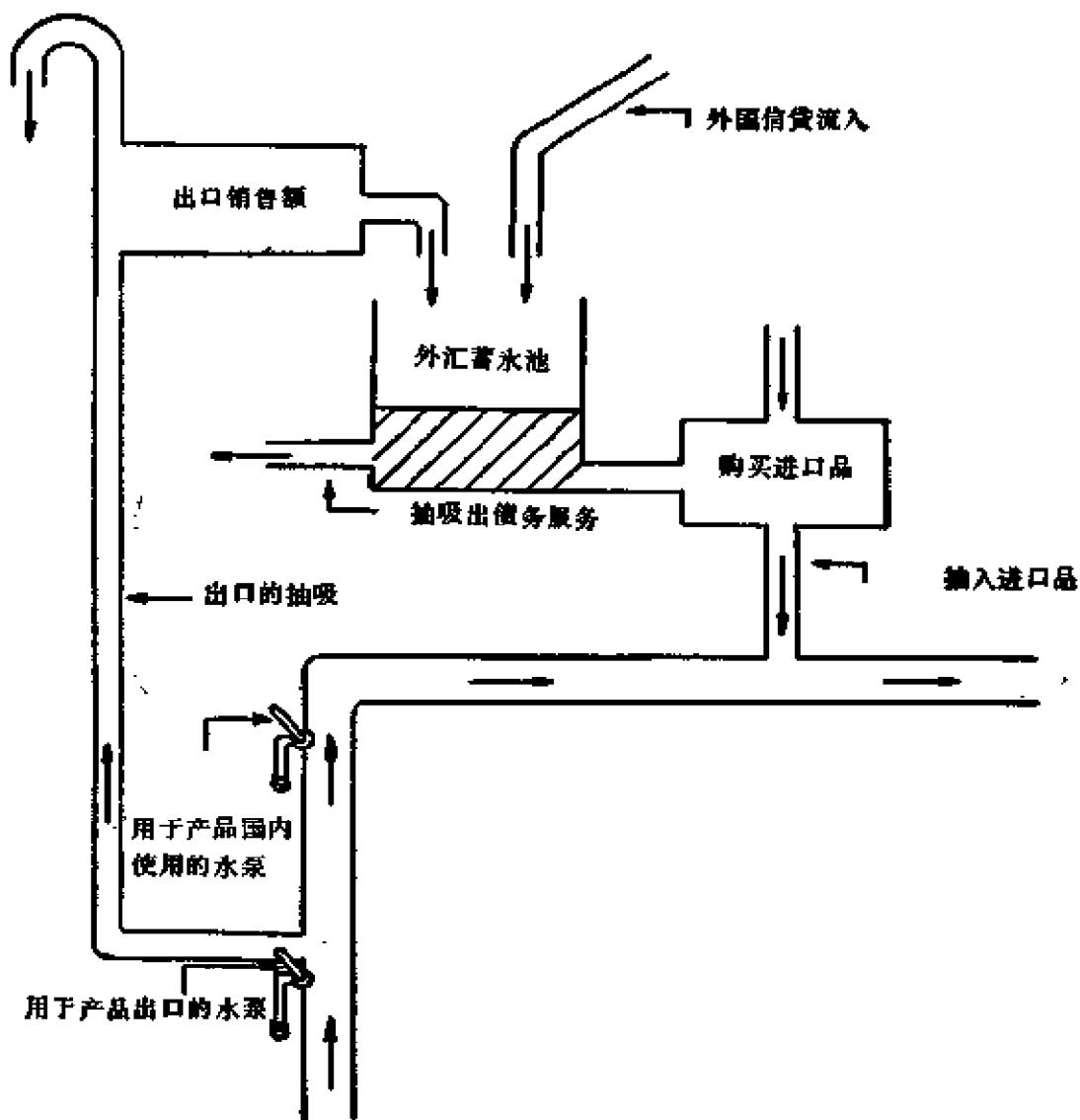


图21-6 第Ⅲ蓄水池：外汇存量

挣取外汇的能力以及负债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容忍限度（也许还有外国当事人提供信贷的意愿）才能约束它。

第三蓄水池始终是空的，所容之物不断地被几乎不可满足的对进口和偿付债务款项的需求所吸走。因此，它必须不断获得补充。在这里我们回到基本的吸纳模型。在抽吸系统中，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是极强有力地的出口冲动。它可能会达到强制出口的地步。事实上，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出售。有些出口市场本身就是短缺

经济，在那里，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②但是，如果出口国供给最有吸引力的产品，或者供给吸引力虽较小，但价格低廉的产品，一个有硬需求约束的国外市场也可能被打入。由于国内生产出口品的企业以及外贸组织有软预算约束，实际出口交易可能的亏损能够毫不困难地得到弥补。企业并不会因下述考虑拒绝出口而实行自愿约束：这种出口如以国内货币计算将导致亏损，因此，控制出口的外贸部门对产出几乎有不可满足的需求。在产品用于家庭消费之前，它能吸走多少就出口多少。

谈到动机，出口冲动不是吸纳背后的基本驱动力。它是由数量冲动和扩张冲动这些基本驱动力派生的次要动力。归根到底，是这两种冲动创造了对进口品的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

把外贸纳入分析之中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虹吸”机制。

实际上，企业采购员直接在私人消费者眼皮底下把商品买尽，这只是次要现象。更重要的现象是家庭所需要的许多商品，甚至根本没有进入商店的仓库，因为它们已经被外贸“虹吸”走了。

关于假定⁽⁸⁾，即只有企业和家庭。我们现在考虑如果除了企业和家庭之外，还有其他当事人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已经阐明，就预算约束而言，非营利机构^③的地位有所不同。如果非营利机构的预算已被确定。它通常具有硬约束。但是所有非营利机构都力图事前得到尽可能多的当前投入，特别是得到尽可能多的投资。在非营利机构中，“数量冲动”（治疗更多的病人，教育更多的学生）和“扩张冲动”也同样起作用。非营利机构也属于“抽水者”之列。它们的能量由于家庭渴望得到它们的服务而倍增，因为这些服务是免费或以名义价格通过行政的配给

^② “长期的过度需求……不仅存在于匈牙利，而且存在于整个经互会市场。社会主义国家直到最近，对于大量的产品几乎一直是不受限制的卖方市场。超过潜在供给的出口可能性，会以和国内过度需求同样的方式影响竞争条件。当一切东西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都能卖掉的情况下，真正的竞争几乎不可能形成，卖方始终占据优势。”见法卢什-西克拉（1975，第219页）。

^③ 参见14·11节。

或排长队分配的。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服务以及实物分配的“虹吸”效应，主要通过非营利部门的吸纳而传递。

由于我们对从左边蓄水池中“虹吸”液体的水泵所作的说明，比在初步探讨中所作的更为完整，所以，我们也应该谈谈右边的蓄水池。如果公式21-3和21-4描述的极端状态出现了，这就是说，如果根本不能花费的货币开始在家庭中积累，右边出口处的水龙头就变得不起作用了。这样，甚至家庭的需求也不再是对销售的有效约束了，这是当家庭也能控制水泵把手时的情形，他们的需求也变得几乎不可满足了。

这里是作出更为一般性的评述的适当场合。在谈到并列的两个蓄水池时，必须强调的并不是左边的一个包含生产品，右边的一个包含消费品，更重要的区别是购买从左边蓄水池流出产品的买者具有软预算约束，而右边蓄水池的产品的买者具有硬预算约束。哪些买者属于哪一类型^② 取决于该体制的实际特征。

在最初描述我们的宏观模型时，我们只提到了一个水泵，这一节我们提出了完整的水泵系统。确实，在经济中有许多力量使吸纳过程能够进行。在本书的不少地方，我们分别提出过短缺经济中的某些局部的自生过程或恶性循环。现在，我们把结果综合如下。这个模型显示了在短缺背后的基本的自生机制。短缺滋生短缺。短缺越严重，经济越感觉到在“虹吸”背后的驱动力——扩张冲动和与此相联的投资饥渴，数量冲动和与此相联的囤积倾向，出口冲动以及几乎不可满足的对免费分配的需求——每个水泵的动力也就越大。然而，抽吸越是有力，短缺就越严重。

在任何历史时期，各种水泵的相对比例构成了特定吸纳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投资水泵看来都是最重要的。

^② 例如，在若干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使用少数雇工的私人小企业，尽管是“企业”但它们肯定有硬的预算约束。

揭示“第二经济”在哪些地方以及如何适应于吸纳的宏观模型，将会超出本书的范围。

当然，它总是与其它水泵联系在一起。不过，为了进行思想实验，可以设想它独自长时间地起作用。那么，对投资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本身就足以使该体制成为资源约束型的吸纳经济。^②

关于假设(9)，即我们描述的是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我们的图只显示了一、两个大水泵。实际上，在经济中的每个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以及多级控制系统中的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水泵，大的或者小的，弱的或者强的。

“大”泵和“小”泵的相对规模，以及操作水泵的决策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管理的改革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使用自己的水泵已不再需要上面的指令和允许。它有权并能够按自己的意见这样做。但是，由于它的预算约束仍然相当软，所以它不会由于经济的因素而被迫约束其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因而，即使是在现在，第Ⅰ部类的蓄水池也没有水龙头。

我们已经在本书的不少地方指出，随着匈牙利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由于经济政策的变化，匈牙利近十年或十五年来短缺强度已减轻。不论这种变化有多重要，用水力学类比说明的那种机制的主要特征继续适用：流动是吸纳维持的。

如果回想一下：我们描绘的整个水泵体系，不同的决策者每人手中都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水泵，我们就会懂得，吸纳现象不会由于告诫领导者要节制和自我约束而消失。我们假设他们中有一个人决定从现在起开始更加节制。他将不再尽力多积累投入品，也不再尽力多吸取投资资源，即使他不停止，至少也将减少他的“虹吸”。其结果将是，在他控制下的单位将得到较少的东西。而其他企业，非营利机构和管理部门则继续抽了又抽，而且把这位自我约束的经理所放弃的东西也抽吸走了。如果这位经理看到这种情况，他将重新启动并以前所未有的更大强度继续抽吸。

^② 在此范围内，它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失业状态。后者也是由几个组合在一起的因素引起的。但是，通过逻辑推论，可以看出，不足的投资需求本身就足以导致这种状态。

21·9 短缺的分配

在进一步作出论述之前，我们要重复和概括一下我们讲的“短缺”是什么意思。在本书中我们已熟悉了它的四种主要形式。

(1) 资源、产品或服务通过行政配给来分配。要求者提出的总量超过可供分配者分配的数量。这是一种出现在分配者和要求者之间纵向关系中的“纵向短缺”。

(2) 资源、产品或服务是由供给者为了换取货币而卖给顾客的。卖者的供给没有满足消费者的初始需求。这是出现在卖者和买者之间横向关系中的“横向短缺”——“卖方市场。”

(3) 生产企业或免费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得不到完成计划所必需的投入品。这是在微观组织内部的短缺，即碰到资源约束。

(4) 在生产中，或者更一般地说，由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能力被高度地加以利用，出现生产能力的短缺，这种活动的持续和扩张导致边际社会成本急剧上升。

这四种现象是短缺的直接表现，还伴有各种间接效应。它们经常重叠和交织在一起。上述全部现象都包括在“短缺”这个集合概念之中。

我们在本章水力学类比中阐明的吸纳机制引起普遍和长期的短缺。当然，我们必须正确地解释形容词“普遍”和“长期”。不可能时时处处一切东西都短缺。我们已经多次强调过，在亚微观层次上，短缺同某些资源和产品的暂时滞存相容，甚至是相伴随的。然而，由于两点原因，使我们有理由谈论普遍和长期的短缺。

首先，因为在许多地方，许多资源和产品存在频繁的，相当严重的短缺，没有一个部门可以避免这种现象。

其次，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出现短缺现象，它们总是能够并且处处可以被归结为同一个初始原因。我们论述的是同一普遍现象的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今天短缺在这里结束了，但明天又在别

处出现，也许更加严重。

经济学中基本的传统论题之一是可获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对此，我们能够加上一个新的课题：不可获资源与产品的分配，换言之，短缺的分配。短缺的分配是指在特定的短缺强度下，不把某物（一种资源或产品）分配给某人（某使用者）。

让我们以比较总量化的形式而不是在亚微观层次上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从考察什么是短缺开始。在资源和产品的主要类别之间，短缺的分配随时间而发生变动，这部分地是由于经济的内部和外部实际条件变化引起的。当然，许多小变化的共同影响也起一定作用。但是，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长期趋势变化的影响。

社会主义制度在最初阶段，从先前的制度中继承了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大量资源的利用率很低。最重要的例子是劳动。我们在第十一章中已经指出过，在经济增长的粗放时期存在容易动用的潜在劳动储备，但是，这种储备在较短或较长时期内，被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所吸收，随后就是以长期的劳动短缺为特征的集约时期。

随着以前未开垦土地的使用，或者，从消费品部门举一个例子，随着对居民住房滞存的吸收，也会发生类似的过程。

这些都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和不对称的过程。它们是不可逆的，因为滞存的吸收和长期短缺的产生，并没有继之以被吸收储备的再现或者短缺的根本消除。它们是不对称的，因为一种资源或产品组短缺的出现不会伴有另一种资源或产品组滞存的产生。劳动仍是最好的例子。当匈牙利在过去处于粗放增长时期时，投资资源严重不足。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它们的上级部门竞相要求得到投资，但是，没有特殊的必要为得到劳动力而去竞争。由于劳动力现在已成为最严重的“瓶颈”，曾经有人认为资本迟早会出现滞存。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亚微观层次上，如果我们观察生产的基本事件，可能会出现“劳动”供给缓和，因为“资本”此刻是一个“瓶颈”；或者反过来，某种“资本”可能过多，因为“劳动”

成了“瓶颈”。(可能是工人无所事事,因为他的机器发生了故障。也可能是机器未开动,因为工人没有来上班。)在亚微观层次和瞬时状态下,一种精确和严格的互补性在起作用,它会导致一个生产要素短缺引起另一个要素滞存这样一种因果关系。^②然而,在长期增长过程中起作用的是其它相互关系。^③当劳动短缺已确立并且变得更加严重时,投资饥渴不会减轻,随之而来的投资紧张也不会减轻。除此之外,在投资理由的武器库中,又增添了一个新论据:需要解放劳动。然而,只有在局部和短时期内才能通过投资来解放劳动,或者反过来,通过追加劳动来节约投资。许多空缺等候着被解放的工人(也许就在进行投资的同一企业之内)。类似地,任何节约下来的投资都会被许多急切的要求者所需要。进入集约阶段的资源约束型经济的增长必然伴随着劳动和资本的长期短缺。^④

不只是上述这种客观可能性的长期变化能够修正短缺分配的方式,经济政策也能够积极地干预这种分配并且能够人为地对短缺实行再分配。尽管在我们的说明中,是长期变化影响着什么东西存在短缺,但我们仍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经济政策的作用,其中短缺的受害者改变了。因此,我们将要讨论短缺在不同使用者中的再分配。

匈牙利经济领导人近年来作出了重大努力,以减少消费部门的短缺强度。对照50年代同70年代的情形,我们可以说,这个努力是成功的,在许多消费品市场,短缺强度已减轻了。19·4至19·6节和图21-5的分析表明怎样才能够取得这种变化。(i)必须在名义收入和消费物价水平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ii)必须防止

^② 参见第二章。

^③ 参见3·3节和14·9节。

^④ 马克思指出,“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口”可以并存。一种对称的现象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短缺伴随的长期资本短缺是一种对称现象。

在近年来的匈牙利文献中,盖奇(1978)讨论了劳动和资本短缺同时出现的问题。

或至少要减少投入品以及最终产品与服务从消费品部门向其它部门的渗漏，最后(iii)必须保证消费品供给的适当增加。在图21-4和21-5中，通过有两个出口的管道，分别向下流入左右蓄水池的数量，是涉及消费品市场当前状态的最重要的因素。

再分配短缺的最灵活的、在短期内也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国内市场的短缺转变为国际收支中的赤字。假使其它情况相同，国内消费者感觉到的短缺，可以通过部分出口产品转内销，或增加进口产品而减少。图21-5和21-6的水力学类比可能便于我们理解这种相互关系，在这里我们的蓄水池是连通的：第Ⅱ蓄水池的液面可以通过降低第Ⅲ蓄水池液面来提高。^②

当然，这不是唯一可能的再分配。如果允许投资品市场的紧张加剧的话，消费市场的短缺强度也可以被减轻，当然，仍需假定其余情况不变。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再分配和对这种再分配的约束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最重要的约束是：只要这种制度关系和行为方式存在，短缺就将持续下去。然而，即使在全面和长期短缺的情形下，短缺什么，以及强度如何，仍然很重要。中央经济政策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保护某些部门不短缺，并把最严重短缺转嫁给其他部门。它也有能力增加或减少由于它自己的活动（例如：增加或减少中央投资或计划较快或较慢的增长率。）所引起的总的吸纳强度。

我感到必须在这里作一点有关个人的说明。自从我从事经济研究以来，下列三组现象的相互依存的性质总是引起我的兴趣：(a)长期短缺；(b)使用一切方法促进较快增长率的经济政策；(c)一定的制度上的关系：高度集中，多级控制，行政配给，以及货币和价格的从属作用。它们如何相互发生作用？哪些是原因，哪些是结果？或者，用不那么尖锐的话讲，哪种因素在体制中起主

^② 这个问题在10·7节提到过。

要作用，哪种只起次要作用？

在我的较早的两部著作《反均衡论》和《突进与和谐的增长》中，我把现象(a)和(b)看作主要的。^②许多人反对这个观点，他们强调说，(c)中的那组现象^③发挥重要的因果作用。

从本书来看，我现在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长期短缺的主要解释在于制度条件以及导致的行为规则。与此相比，经济领导人的增长政策是次要的解释因素，它的作用是加强或削弱主要因素的影响。

21·10 吸纳和通货膨胀

在重温了吸纳机制中的主要宏观相互依赖性，并论述了短缺是如何再分配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就这个问题的金融方面讲几句话。我们把关于通货膨胀所要说明的问题集中在这里讨论。^④我们以历史的观察开始。

长期短缺与稳定或几乎稳定的价格水平和谐共存，但它也与通货膨胀和上升的价格水平和谐共存。

伴随短缺的现象之一(也许还是一个促进因素)可能是抑制型通货膨胀，^⑤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经济的某些部门中存在抑制型通货膨胀。短缺可能与抑制型通货膨胀相联系，但并不必然如此。

历史的考察证实了这种观点，即“长期短缺经济”和“抑制型通货膨胀”不是同义的。它们是两组不同的、清楚可辨的和复杂的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可能部分重叠。我们强调这一点是

^② 参见科尔内(1971a、b, 1972a、b)。

^③ 例如，参见巴乌尔(1973)对《反均衡论》的评论。

^④ 我们这里重复或总结了前面在第十五、十六、十九和二十章中解释过的某些思想。

^⑤ 关于被压抑的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汉森(1951)进行了出色的总结。

因为不少作者在其著作中，将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了。这个混淆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中并且在许多西方作者的著作中大力加以强调，其中包括克洛尔—巴罗—格罗斯曼学派的著作。^② 我们试图针对后一学派提出我们的论据。

假设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出发点。特别是，我们要记住通常被叫作“凯恩斯失业”的状态。资源利用率很低：存在全面的失业和过剩的生产能力。主要原因是总量有效需求不足。如果需求能够扩大——同时维持一定的价格水平——生产将可能增长，就业和资源的利用也将增加。^③ 经济中在既定价格下发生宏观层次上的数量调节：需求的增加由供给的增加来满足。这一个反应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加速数和乘数效应所加强。

由于是思想实验，我们可以以递增的剂量开始施行凯恩斯建议的注射。国家投资项目的开工数不断增加，政府还对私人部门投资给予财政支持。政府在非营利机构投入方面的支出上升。家庭可支配收入通过，例如减税而增加。这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预算赤字，并且赤字将持续地增加。所有这些都伴随着高于产出所需的货币供给。然而，与此同时，通过行政干预把价格固定在其最初水平上。

该过程的最终结果是抑制型通货膨胀。总量需求的增加吸收了失业，刺激了经济并逐渐使之过热。无法支出的货币开始在货币所有者手中积累起来，需求过度和短缺出现了。^④

上面简略描述过的这种“就业过度”，在巴罗、格罗斯曼及其追随者看来，正好是凯恩斯“失业”的对应物。之所以说“正好”，是因为在具有相同制度条件和相同行为规则的同一体制中，一个

② 例如参见巴罗—格罗斯曼(1974、1976)。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经验材料和有价值的分析可以在伦德伯格(1968)写的书中找到。

④ 对一段较长时期来说，这在理论宏观经济模型中才能成立。实际上，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过热”状态不可能在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下长期保持。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不可能被压抑很久，它迟早会爆发。

主要参数(总量需求)从极低值到极高值发生大幅度变化。

当他们把在过度凯恩斯主义刺激下的这种固定价格的资本主义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走入歧途了。因为后者有不同的制度条件，因此行为规则也不同。

由于我们已经用数百页的篇幅解释了这种体制的大量特征。这里只需简要说明巴罗-格罗夫斯曼学派的抑制型通货膨胀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吸纳体制之间的区别。

(i) 前者即使在过热状态下仍是一种货币化的体制，而后者只是半货币化的经济。后者的家庭部门是货币化的，而企业部门只是表面上如此。

(ii)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有硬预算约束。确实，在抑制型通货膨胀条件下，货币持有者有时不能支出他的货币，然而，如果他真打算支出这些货币，他会立即遇到自己的预算约束。正是这种认识形成了他的行为规律，甚至当货币突然变得充裕时，他也不会背弃这些规则。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这种认识在企业的行为中打上了印记。

根据这个推断，在前一种体制中，瓦尔拉斯定律有效。但在后一种体制中，至少在企业部门之内，瓦尔拉斯定律无效。

(iii) 作为进一步的推论，在前一种体制下，价格的高低，对企业至关重要，即使价格是固定的。但在后一体制中，不论价格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企业对它们的反应小得多。

(iv) 在巴罗-格罗夫斯曼的抑制型通货膨胀之下，无法支出的货币，会在货币持有者手中积累起来，因为他们不习惯于短缺。他们的需求函数还没有适应短缺的现象。(顺便说一下，那些作者并没有说明这是一种短缺的不均衡，还是一种新的、持久的正常状态。)但是，我们论述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在那里，相当严重的短缺已成为正常状态，并且买者的行为已适应于它了。或者，买者在确定他们的初始需求时已经把预期的供给考虑在内。或者，即使没有考虑，他们也会通过强制替代和强制支出来适应这种情

形。

这几条尽管不完整，但足以表明我们讨论的是一种具有不同性质的体制，它不能够简单地通过把凯恩斯失业状态颠倒过来以便进行描述和分析。

这个论断得出了与全书相同的结论，即对长期短缺，吸纳和资源约束型体制运行的解释，不是存在于金融领域，也不是存在于价格信息的特征之中，而是存在于较深层次，即存在于制度关系和这些制度关系所形成的决策者的行为规律性之中。虽然我们对此已作过一些论述，但是在最后一章我们还要就这个主题再补充几点想法。

第二十二章 父爱主义的程度

22·1 引　　言

第一章已经强调过，本书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结构不做详细的分析。关于这些方面，前述各章中已经涉及到的只是同本书经济内容紧密相关的少数几点。现在在本书终结之际，我们仅仅论述一下制度结构的一个方面，即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不要求做全面考察。最后一章选择这个论题，是因为它有助于理解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短缺。

我们从一个类比开始，即考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有五种不同的“纯粹”情形要区别开来。

程度 4 ①：实物给予—被动接受。新生儿和几个月的婴儿不能用语言表达他的需要。父母以“实物形式”给予他食品和衣服并担负他的全部物质需要。

程度 3：实物给予—主动表达愿望。孩子仍然住在家里并以“实物形式”从家里得到他所需要的每样东西。但他现在能说话并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不用恳求就会得到很多东西；有时他恳求某样东西，有时提出要求。这取决于父母是坚持自己的意愿还是同孩子做某种妥协，满足他的愿望。父母和子女之间确实存在“讨价还价”。

程度 2：货币津贴。孩子已经长大并离开家，但在生活上还

① 为后面推论的方便，我们把序数按递减的次序排列。

不能自立。比如，他不同父母在一起，而在另一座城市上大学。他的生活费用仍由父母负担，但现在是把维持他生活所需的一定量货币交给他去花销。假使他想多花，他就得多要。恳求、要求、抗争、妥协，讨价还价没有停止，只是转到另一方面：争论的主题变为津贴的多少。

程度1：自立一有助。孩子已经长大并自己谋生。他基本上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他赚钱越多，可花的钱就越多。但他的父母还健在，如果他遇到困难并请求帮助，父母将在经济上给予资助。

程度0：自立一无助。过去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自己养活自己，父母也已经去世。他的经济状况完全取决于他的收入。如果他遇到困难，没人在经济上帮助他。他必须完全依靠自己。

上述五种类型以下将称为父爱主义的程度。在现实中可能出现更多的类型，纯粹类型的组合也很多。但这五种程度将足以表明我们的思想。

22·2 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地位

现在让我们离开类比并转向经济生活的分析。在我们的公式中用国家取代父母，用微观组织（企业、非营利机构、家庭）取代子女。^② 在国家与微观组织^③ 的关系中的父爱主义的程度，是一

② 象对任何比喻一样，不应当从字面上解释这个比喻。很明显，父母给予子女的是自己的所得，而国家是进行再分配。不过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或一般国家理论，而是国家同微观组织之间关系的特征这样一个有限的话题。用父子关系的类比可以有助于理解这些特征。

③ “paternalism”父爱主义一词出现在一些著作中。例如，见格拉夫（1957）和帕潘德里欧（1972）。我们在一种特殊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它多少不同于上述著作中的含义。

种体制重要的本质特征。

我们以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企业为具体的例子，说明父爱主义程度的经济含义。^④我们的主要论点概括在表22-1中。横行表示

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同企业的关系

表22-1

父爱主义	对当前生产的投入品的供给		投资分配	
	改革前	改革后	改革前	改革后
4. 实物给予——被动接受	+		+	
3. 实物给予——主动表示愿望	⊕		⊕	
2. 货币津贴				⊕
1. 自立——有助		⊕		⊕
0. 自立——无助				

五种程度的父爱主义。表中有两栏，一栏表示企业怎样获得当前生产所需投入品，另一栏表示它怎样获得投资品。在每栏中，左边一列代表改革以前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的情况，右边一列代表改革后的状态。从两个右列可以知道 1968 年匈牙利改革以来情况的变化。表中，符号“+”表示投入分配方面父爱主义的程度，符号“⊕”表示占优势的或典型的程度。我们现在来逐行说明上表。

程度 4：实物给予—被动接受和程度 3：实物给予—主动表达愿望。在这两种程度上，中央部门按配给方式在企业之间进行投入品的实物分配。货币实质上在这里不起实质上的中介作用。程度 4 是最极端的情形，表示不考虑或不认真考虑使用者意见的中央命令。在传统的管理体制的运行中，这种程度在每个历史

④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考虑不同程度的父爱主义怎样出现在国家和非营利机构或家庭之间的关系中。

时期，每个国家和部门出现的频率不同。但是，传统时期在分配当前投入品和投资品上，最典型的还是程度3。中央部门作决策，但决策时要考虑有关企业的愿望。如果企业对分配不满，它将要求更多的配额。也许企业会提出随心所欲的要求或进行“院外活动”，以便实现自己的愿望。“对计划讨价还价”的现象在这种经济管理形式中是屡见不鲜的。^⑤ 中央有关部门希望企业投入更少产出更多，而企业则要求投入更多产出更少。讨价还价正是发生在这个问题上。

程度2：货币津贴。^⑥ 这种程度的父爱主义只是改革后才在企业部门的投资分配方面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当投资项目在企业内部进行，甚至项目由企业提出，但其所需资金完全来自中央部门的情况下，国家和企业之间便产生这种关系：进行投资的企业想要更多的货币，而决策部门或者拒绝或者同意企业的要求。^⑦

程度1：自立一有助。这是改革后最广泛的形式^⑧。当前投入品完全或几乎完全在这个基础上分配。依据通常宣布的原则，企业是一个“独立核算”单位。它应当用出售产品的收入来弥补自己的支出，靠自己的收入来维持。但如果企业遇到财务困难，国家将以一种或多种财政资助来帮助它摆脱困境。在分析预算约束的软硬时，我们详细讨论过这种现象。

企业用自有资金投资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⑨ 企业能够用自己的收入弥补成本。但如果出现财务困难（如计划成本被超过），国家将帮助企业摆脱。它将保证投资项目不因财务困难而受阻。

⑤ 见3·2节

⑥ 这种程度通行于中央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的关系中。

⑦ 关于这方面以及投资领域中通行的程度1的父爱主义，见第九章和20·3节。

⑧ 见第十三章，以及巴乌尔（1975a, 1978）和法卢什—西克拉（1975）。

⑨ 投资信贷以及国家预算资金和企业自有资金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存在各种形式的组合（见20·3节）。资金来源的各种形式可以放在细分为更多的父爱主义程度的分类表中。但在这里我们满足于勾画主要的轮廓。

在匈牙利经济生活中已经形成惯例，如果在经济的一定方面（一定部门、一定产品的制造或外贸方面）出现财务困难，国家就会来救援，把负担背在国家预算上。这正是程度 1 的父爱主义的表现。

程度 0：自立一无助。在表中这一行是空白。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没有出现过在企业不能够克服自身困难时真正被扔下不管的情况。

22·3 倾向与反倾向

国家和微观组织间的关系即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父爱主义程度是社会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表22-1对研究社会结构有重要教益。

程度 0 的父爱主义是弗里德曼—哈耶克学派的理想。事实上完全符合程度 0 的情况，即使在基于私有制和独立微观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或许与它相近，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偏离了它。国家用各种形式干预经济。例如，在许多情形下它以父爱主义的方式帮助可能倒闭的亏损企业：给与国家担保、优惠贷款、减税，甚至直接的财政资助。在失业增长的时期，工会也对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支持陷入困境的企业，以维持就业。弗里德曼主义者责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他们应对抑制竞争和随之而来的“自然选择”的国家权力的增长负责。^⑩ 凯恩斯的思想显然影响了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但如果不是社会发展过程已经奠定了基础并使政治家易于接受凯恩斯的主张，一种科学思潮本身是不会发生这样强烈的影响的。把这一切归因于一种思潮是错误的。微观组织放任自流作原子式竞争，在我们的时代已不可能。当代生产已经高度集中，国家官僚机构已

^⑩ 例如，见索引弗里德曼中提到的哈耶克的著作(1974)。

经成长起来并正在变得日益强大。^⑩期望一个依赖选民支持的政府会告诉公众：失业、价格水平、经济增长等等完全是经济内部的事务，政府对其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想法是荒谬的。政府必须对经济状况负责，它只能在不同的目标和经济政策手段方面进行选择。因此在国家和企业之间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或多或少的父爱主义关系。^⑪

如果那是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情形，那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情况必然更是如此。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伴随着国家政权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活动可以被限制或扩展，但始终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对经济形势负责，同时它们需要使用自己武器库中任何被视为有用的工具。^⑫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多级控制机构被发展出来，并按照自身的规律成长和变得更加强大。这个机构的成员把自己同职位结为一体，这就给他们以动力去积极塑造经济生活的模式。所有这些可以说明“自上而下”的父爱主义倾向。这些倾向由“自下而上”对父爱主义的要求所补充。

低层经济管理人员（企业董事会及其直接上级）对父爱主义有一种矛盾心理：他们既需要它，又反对它。我们先解释他们为什么需要它。父爱主义意味着绝对的保护和安全。如果企业遇到灾祸，国家可以减轻其影响，甚至完全补偿企业的损失。这是一种极端令人放心的气氛。国家不仅保证企业的生存，而且保证它能不依赖自己的财源得到发展，假使它能成功地获得国家支持的话。

让我们转向相反倾向。若干因素使这个体制偏离极度的父爱主义。这里只强调其中三种因素。

⑩ 卡尔多在《均衡经济学的离题》(1972)一文中作了有启发的描述。他特别强调收益递增对摧毁完全分散体制的作用，以及国家活动的增长对保证经济增长的作用。

⑪ 马克思主义文献早就认识到这种现象，但最近其它学派也开始承认它。如，加尔布雷思(1973)在这方面讲到：官僚主义共生现象。

⑫ 见塔多斯(1975a,b)

一种是低层管理人员对独立性的要求。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他们的内心是矛盾的。当他们高兴地接受父爱主义提供的保险时，他们内心的另一面却对上级部门不断干涉他们的事务并以恩人自居埋怨不已。对每件东西都得伸手要，使他们感到羞辱。他们宁肯依靠自己的资源。这种愿望是改革背后的推动力之一。正是这一点推动了国家和企业关系趋于成熟，换句话说，朝向较低程度的父爱主义发展。

与此紧密相关的减少父爱主义的另一因素是：公众和高层领导对低层管理人员缺乏主动性经常表示不满。我们暂时做一个类比。众所周知，过分受父母监护的儿童会变得消极和无能。他会习惯于别人为他做决定，替他解决问题。高度父爱主义的“教育作用”也存在于经济生活中。消极被动、抱怨困难，乞求国家帮助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主动性去解决问题，这都是人所共知的普遍现象。对这些现象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使公众舆论赞同实行分散化的改革。

上述两个因素是同经济管理人员的行为相联系的。我们现在提出第三个因素，即组织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经济生活中较高的父爱主义是同用配给方式分配实物和收入相联系的。资源和产品能通过行政机构分配给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家庭，只是因为社会仍然比较贫困；生产和消费差别不大。在这种状况下，实物配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任务。但是随着生产和消费的差别日益增大，通过配给方式来分配全部投入品便日益困难。^④ 或迟或早这种差别会使决策和所需信息相当程度地分散化，从而导致微观组织更大的独立性。

反对极端形式的父爱主义的因素的影响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这一事实是，最高程度的即程度 4 的父爱主义（实物给

^④ 在 15·2 节涉及经济管理的一个特殊方面，即价格形成时，我们遵循的是同一思路。

予—被动接受)在国家与企业关系上不能在较长时期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般的形式。

程度3(实物给予—主动表达愿望)在一个长时期中曾经是国家和企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形式。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试图进一步走向较低程度的父爱主义。从表22-1可知，程度2和1在匈牙利已经成为主要形式。

本节开头已强调指出，在有关父爱主义的问题上，每个方向都有强大的倾向在发挥作用。历史过程将表明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哪种倾向居于支配地位，其支配程度有多大。

22·4 父爱主义和预算约束的软化

我们现在从历史预测转到现实。根据表22-1程度1—3的父爱主义表明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应补充的是它同样也表明了非营利机构的特征。(父爱主义实际程度分布可以因国家和时期不同而不同。)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父爱主义同作为本书主题的短缺的关系是什么。

这两组现象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是软预算约束。程度0的父爱主义意味着完全的硬预算约束。无论企业财务平衡出现什么情况，国家一概不管。国家只管依法征税，仅此而已。国家决不“怜悯”企业或帮它摆脱困境；如果企业破产了，那是它自己的事。

程度1的父爱主义意味着，如果企业遇到财务困难，国家将用减税、优惠贷款、财政拨款、承担亏损或允许涨价等办法帮助企业来解脱。国家也帮助不景气的、甚至经营亏损的企业，使其得到发展。

假使父爱主义的干预极为罕见，企业就不会指望它。但如果这种干预相当频繁，企业的行为准则就会建立在期望干预的基础上。这正是我们在13·5节—13·6节中所说的软预算约束。父爱主义是使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如果这种软化发生，就必然导

致与短缺相联系的若干现象，即：对劳动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和囤积劳动力的倾向，几乎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等等。

我们在第二十一章中说明了吸纳模型。在模型中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都进行“抽吸”。这在两个方面同父爱主义密切相关。一方面刚才已经做过解释，即父爱主义使企业需求的财务约束变软。（水龙头不起作用。）这正是买方企业尽可能从卖方企业抽吸投入品的原因。此外，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一个等级制的多级控制系统在运行着。现在让我们不仅考虑程度 1，而且考虑程度 2 和 3 的父爱主义。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不仅从供给它们生产投入的企业“横向”抽吸，而且也从自己的上级部门“纵向”抽吸。^⑩在匈牙利的语言中，这种说法正是被用在父子关系上：子女抽吸父母。当孩子还小时，他要更多的巧克力和冰淇淋，等他大一点了，就要更多的零花钱，以后他又会要家里更多的资助以便购买第一套房子和第一辆汽车。这种“抽吸”出现在企业及其上级部门的父爱主义的关系中。如果上级在实物形式上分配物资和劳动（程度 3），则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就会抽吸得多一些。如果拨给的是货币（程度 2），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则竭力“抽吸”最大限度的货币量。象在实际父子关系中那样，可以用各种办法“抽吸”：好的情况是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坏的情况则是抱怨或靠“院外活动”。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严格意义上的一组经济现象（软预算约束，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横向和纵向“抽吸”）和一组制度的现象（较高程度的父爱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后者基本上能够说明前者。

^⑩ 按塔多斯（1972）的说法，“……企业经常把国家看成摇钱树，国家尽管许诺要克服企业这种态度，但实际上并无建树。”

22·5 最后的几点意见：有意识行动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我们最后的几点意见不仅涉及最后一章，而且涉及到全书的主题。

本书贯穿通篇的观点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条件产生一定的行为方式、经济规律性和正常标准。这些不可能被国家的决策所取消。政府决策、国家计划并不要求投资紧张、长期劳动短缺和价格漂浮倾向等等。但只要维持这些现象的条件存在，政府决策或国家计划就不可能使它们消除。

愉快地接受这些规律性的有益影响，而完全避开我们视为不利的那些后果，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级当事人都受到扩张冲动的推动，不需要鼓励任何人进行投资，这正是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希望得到后者而同时希望完全消除投资紧张是不可能的。作为持续不断的扩张冲动的结果，潜在劳动储备被吸收，正是这一点导致长期劳动短缺。喜欢消除失业，同时又希望或早或晚劳动市场会恢复均衡，劳动短缺的有害影响会停止，这也是不可能的。同一过程在导致受欢迎的结果的同时，也导致令人不安甚至有害的后果。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计划者和实际经济管理者面对这个制度的规律和内在倾向时是无能为力的。自觉行动的领域是宽广的。我们只提出几种可能性。

某些倾向可能被加强，其它的由于受到抵制可以被削弱。我们上边提到价格漂浮倾向，不能靠命令从经济生活中消除，但它能被抵制。吸纳机制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关重要的是持有最大“水泵”的中央计划者究竟是带头抽吸呢，还是抵制下属组织的抽吸行动。数量冲动产生短缺，短缺加强数量冲动，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中央计划者本身是提出尽可能紧的数量指令，还是发挥起缓和作用的影响，却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还可以影响短缺在不同部门间的分配。

我们还能够在更广阔的领域采取行动，即减少调节中的摩擦。更好的组织生产和交换，更好的协调计划，更好地提供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属于这个领域。例如，如果更好地组织生产可以解脱出几千工人，这并不会消除劳动短缺。有足够的空位在等待他们，并且不可能解脱出比连续不断的扩展所能吸收的还要多的劳动。但解脱他们仍是非常理想的。这有助于保证国民经济以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经济成果。

最后我们得到了最重要之点。产生本书描述的那些现象的制度条件、行为方式和规律性并不是外部强加的或不可改变的。1968年匈牙利改革本身证明了这个命题，即谨慎的人类活动能改变它们。这种性质的更深刻的变化将来还会出现，从而缓和本书所分析的那些现象。

本书没有详细提出消除短缺现象的具体建议。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这部著作的目标仅仅在于提供一种纯粹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分析。但我还是相信，对实际情况作细致认真的分析，并进一步说明因果关系的尝试，可能有助于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附 录

数学附录A：在市场上排队

(合著者：J. W. 韦布尔)

A·1 引 言

本附录是一篇较长的论文的节录。^① 它同本书第四章、7·2—7·5节、7·7节以及第十八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章节中已经说过的，这里尽量不重复。因此，这个附录一般不解释假定和命题的经济含义，只是在补充本书主题的地方才作某些经济方面的评述。

我们的主题是描述一个偏离瓦尔拉斯均衡，然而又不断回复其自身基本特征的静止状态的市场。在评价我们自己的成果方面，尽管我们得出了少数几个定理，但我们还是愿意更多地注意分析的结构，即我们据以考察长期短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那些特殊观点。附录A详细描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以便把我们的理论结构介绍给读者。

这里应当对排队系统的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模型作一点说明。不同于通常是随机的其他排队模型，这里的模型是确定性的。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以长期短缺为特征的情况下，同调节经济制度的各种相互依赖关系和反馈机制相比，随机因素是

^① 这篇较长的论文是作者和J. W. 韦布尔合著的，全文于1977年油印。节译本已经出版。见科尔内—韦布尔(1978a, b)。

次要的。虽然一个一般性的模型也应当包括随机因素，但在确定性结构中某些基本关系是可以得到说明的。^② 我们的模型是用常微分方程组表示的确定性的存量——流量模型。

A·2 市场结构

我们研究一个只交换一种商品 G 的市场。这可以是一种特定的商品或一个不同商品的复合总体。这个商品作为不可分割的单位进行交换；每个买者在一次购买中只能买一个单位。

只有一个卖者（一个垄断者或若干的个别卖者的总体）。

有 n 个买者。买者总体划分为次总体并称为买者组。每组买者有自己独特的市场行为。我们把 i 组的有代表性的成员称为一个 i 类买者。有 k 个组，在 i 组中有 n_i 个成员：

$$\sum_{i=1}^k n_i = n$$

当事人的数目（一个卖者， n₁， n₂， …， n_k 个买者）不随时间变化。

尽管在 A·8 至 A·9 节中这个模型正式定义为确定性的，但可以把它视为由各种随机分量的平均值之间的一些确定性关系组成的“混合”模型。我们特别注意买者采购时所做的一系列决策。在每个这样决策阶段，我们根据流量建立各组买者的总体行为模型，并相应于每种决策选择（在每个决策阶段只有两种选择），建立进入决策阶段的买者流入量和离开决策阶段的买者流出量的模型。但是，由于这些流量被视为选择概率，从而这些确定性的流量可以被当做个别随机选择行为的平均值。为说明这些确定性模型的假设条件，我们经常做这种微观方面的随机性的解释。在随机排队模型的文献中，我们的方法有时被称为“流动近似法”。^③

② 我们感谢 L.G. 马特森，是他最先提出这个观点。

我们暂不考虑这里描述的“买者”是企业，非营利机构，还是家庭的问题。在举例说明时通常把它说成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解释只限于这个范围。

③ 例如，见克雷洛克 (1976)。

A·3 采购程序

多少重复一下第四章和第七章已经说过的內容，并给予进一步规定之后，我们将专注于我们感觉有某些真实生活的成分而分析上又容易处理的特殊程序。在图A-1中我们用框图来说明采购过程。图A-1与图4-1至4-3有关，它把前面这几个图形的特点综合起来。

我们伴随一位*i*类买者去进行采购。他从标有开始的圆框出发。

他的第一个决策问题是：他应该购买我们的市场模型中交易的商品G，还是相反，应该购买另一个市场上交易的（在我们的模型范围之外）替代品H（或一个复合体H）？我们假定影响买者决策的收入和其他因素是给定的，并且不随时间变化。在这个决策阶段，唯一考虑的信号是价格，即相对价格 $P = p_G/p_H$ 。

我们用 $\lambda_i(P)$ 表示买者的初始购买倾向。这是P的一个非递增（通常是递减）函数。给定相对价格P， $\lambda_i(P)$ 是决定搜寻商品G而不是H的*i*类买者的份额。在微观的意义上， $\lambda_i(P)$ 可解释为买者最初选择商品G而不选择商品H的概率。

这个附录中描述的模型在这点上偏离了第四章和第七章给出的公式。这里，不把初始需求看做给定的，而把它作为相对价格的函数。这同本书其他各章的议题相一致。在第十四章中我们已经表明，作为买者的企业可能对投入价格比例做出反应，尽管在短缺经济中这种反应相当偶然并且不很强烈。而在第十八章中我们提出，作为买者的家庭对消费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反应是相当强烈的。由于包括了相对价格某些可能的影响，我们实际上提高了模型的一般性。在没有这种影响的情况下，函数 $\lambda_i(P)$ 是常数，即对于某常数 λ_i ， $\lambda_i(P) = \lambda_i$ 。

注意形容词“初始的”。它表明 $\lambda_i(P)$ 代表买者出发去采购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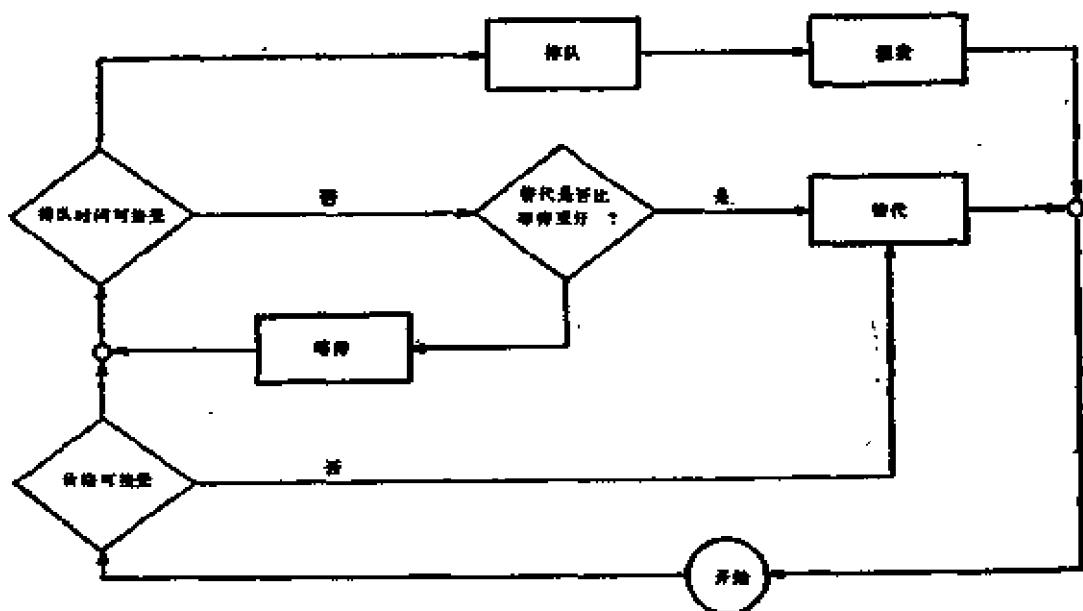


图 A-1 采购程序

最初的购买意图——在碰到短缺现象以后，这个意图会受到修正。

我们的买者来到一个销售点。那里正在排队。这个买者要考虑是否加入排队。我们假定只有预期的排队时间 W 这一个因素影响他的决策。 W 越大，买者越不愿意排队。量 $\varphi_i(W)$ 表示排队倾向。这意味着想购买商品 G 的 i 类买者中的一部分， $\varphi_i(W)$ 将加入排队，而其余部分 $(1 - \varphi_i(W))$ 不愿意排队。

我们暂时假定买者属于第一部分并加入排队。他在队中等待，直到买到东西再回家。假设一段时间过去了，他又要购买一个单位的商品 G 或 H ，整个过程就又重新开始。我们将不讨论需求更新的原因。不管怎样，我们假定在时间 t 由 G 得到满足的买者总数中有 $\gamma_{1,dt}$ 部分在无穷小时距 $(t, t+dt)$ 中，会产生对另一单位 G 或 H 的需求。出于技术上简便的考虑，假定 $\gamma_{1,dt}$ 与时间 t 无关。在微观的意义上，这个假定是指作为随机变量的满足时间，即从买者得到一单位商品 G 到需要更新这个商品的时距，被认为是随机变量。这个随机变量服从平均值为 $1/\gamma_1$ 的指数概率分布。 γ_1 被叫做(得到 G 以后的)需求更新率， $1/\gamma_1$ 则称为平均由 G 得到

满足的时间。

我们现在转到程序的另一分支，转到害怕长时间排队的买者。他有不同的选择。他可能坚持要买商品G，但推迟作出是否加入排队的决定。在确实存在一个“有形”队列的情形下，这可能是合理的行动。^④ 我们用两个属性描述买者行为。第一，存在一个等待倾向，用 σ_i 表示；第二，有一段等待时间。在那段时间过去之后，买者又回过来重新考虑是否加入排队。这里我们作出一个类似于对得到G的买者作出的那种假定，即在无穷小的时距 $(t, t + dt)$ 内，正在等待的*i*组买者总数的一个部分 $\psi_i dt$ 将转而重新考虑参加排队。在用微观的意义上，等待时间是服从指数分布的随机变量，其平均值为 $1/\psi_i$ 。我们称 ψ_i 为重新考虑率。把 $1/\psi_i$ 叫做平均等待时间。

不加入排队又不推迟购买决策的人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用商品H代替商品G。我们称此为强制替代。有一些人(*i*类顾客的一部分 $(1 - \lambda_i(P))$)，他们只是根据G和H的相对价格作出自愿替代。但现在在他们之外，又有了一些不自愿的实行替代的人。我们用 $\mu_i(P)$ 表示强制替代倾向。(象初始购买倾向一样，我们假定强制替代倾向只取决于相对价格。)

第三种选择是既不买G，也不买H，而仅仅持有货币。这可以称为由短缺引起的强制储蓄。^⑤

注意到所有这些选择，我们对目前这个说明性模型作极端简化的处理。我们排除短缺引起强制储蓄的可能性并做出如下假定。如果买者既不愿意马上为购买G而排队，也不愿意推迟作出决定，那么他一定愿意接受强制替代并购买H。商品H是随时可得的。对我们的假定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商品H代表除商品“G以外

^④ 在“名义上”排队的情形下，这不是合理的选择。例如，在买者拿到序号之后就可以回家，等到号再来的情形下，就是这样。

^⑤ 第一种选择，消极等待，即推迟决定是否排队买G，也可以意味着暂时强制储蓄。

的”复合商品。即使在最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商店里也总有某些东西。不管怎样，大多数买者总是愿意买点什么的。在短缺经济中，对买者的大部分决策来说，这是相当现实的假定。^⑥ 我们的假定用关系式 $\sigma_i + \mu_i = 1$ 表示。为简化符号，我们只用 μ_i 表示，而等待倾向用 $(1 - \mu_i)$ 表示。

在购买商品 H (由于自愿的或强制的选择)的情况下，买者同得到商品 G 时一样，会经历一段类似的满足时间。我们特别假定，在无穷小时距 $(t, t + dt)$ 内，所有由 H 得到满足的 i 类买者的一部分 $x_i dt$ ，会产生对另一单位 G 或 H 的需要。我们把 x_i 称为 (得到 H 以后的) 需求更新率，把 $1/x_i$ 称为 平均由 H 得到满足的时间。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循环的终点。

A·4 买者态度

总结一下，我们用下面这些函数和参数来表示买者态度的特征：

$\lambda_i(P)$ = 在相对价格为 P 时的初始购买倾向；

$\varphi_i(W)$ = 在排队时间为 W 时的排队倾向；

$\mu_i(P)$ = 在相对价格为 P 时的强制替代倾向；

$(1 - \mu_i(P))$ = 在相对价格为 P 时的等待倾向；

γ_i, x_i = (取得 G 后和取得 H 后)，各自的需求更新率；

ψ_i = 重新考虑率。

上列函数和参数描述 i 组买者的态度。应当指出，作为向量的态度，只由相对价格 P 和排队时间 W 这两个“信号”所规定。此外，我们已经把买者对这两类信号的考虑，分散在采购程序中先后相继的不同决策点上。这样，一旦接受了价格，买者就只考虑

^⑥ 见18·4至18·5节。

排队时间而不管价格。(我们可以同时考虑价格和排队时间,这种分析并没有技术上的困难。)

我们现在可以把该模型同通常的市场模型做一个简短的比较。象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在这个程序的第一步是按照传统的描述进行的——需求函数取决于相对价格。通常的模型到此为止,它暗中假定这已经充分表示买者的意图。如果他想在卖者要求的价格下购买一定量的商品,他一定能买到。在长期短缺的情况下,同样的假定是站不住脚的,从而对买者行为的描绘不能在这里停止。在第一步,即决定了初始需求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在短缺经济中,因为考虑到最初的决策和以后的修正,在不同可能之间选择等等,购买只能被描述成为一个时间过程。因此,必须把加入排队、等待和接受强制替代这样几个决策点引入模型。

A·5 买者的状态变量

在任何确定的时间 t ,每个买者恰好起着四种作用之一。我们在模型中用以下四个状态变量来表示起着不同作用的买者数:

$y_{1i}(t)$ = t 时正在排队的 i 类买者数,简称排队的买者;

$y_{2i}(t)$ =先前已经得到一单位商品 G ,在 t 时还不准备重新去采购的 i 类买者数,简称由 G 得到满足的买者;

$y_{3i}(t)$ =先前已经得到一单位商品 H ,在 t 时还不准备重新去采购的 i 类买者数,简称由 H 得到满足的买者;

$y_{4i}(t)$ =先前已经推迟了加入排队的决策,在 t 时还不准备重新考虑做出决策的 i 类买者数,简称等待的买者。

$$y_{1i}(t) + y_{2i}(t) + y_{3i}(t) + y_{4i}(t) = n_i, \quad i = 1, \dots, k, \quad t \geq 0.$$

$$y_j(t) = \sum_{i=1}^k y_{ji}(t) \quad j = 1, 2, 3, 4, \quad t \geq 0.$$

在以下分析中所有上述变量不被当作整数而被当作实数。在任何时间 $t \geq 0$,向量 $(y_{11}(t), \dots, y_{1k}(t), y_{21}(t), \dots, y_{2k}(t),$

$y_{11}(t), \dots, y_{1k}(t), y_{21}(t), \dots, y_{2k}(t), \dots, y_{41}(t), \dots, y_{4k}(t)$) 将被称为 t 时买者总体的状态。反之，任何适用于所有 i 的能满足 $y_{11} + y_{21} + y_{31} + y_{41} = n_1$ 的非负实向量 $(y_{11}, y_{21}, \dots, y_{41})$ 被称为买者总体的一个可行状态。

A·6 供给率和实际接待流量

我们现在来描述卖者。在现在这个模型的关系中，我们用供给率代表供给，用实际接待流量代表交换。

我们用 S 来表示卖者的供给率。这是单位时间能够接待的最大买者数。就商店而言， S 取决于期初存货和对商店的供货。就生产企业而言， S 取决于期初存货和生产能力。我们不考虑存货，并假定 S 不随时间变化，由外部给定。

由于排队长度 y_1 在这里看作是连续变量，理所当然可以让实际接待流量，即单位时间接待的实际买者数，当 $y_1 > 0$ 时，等于 S ；当 $y_1 = 0$ 时，等于零。换句话说，只要有排队就有充分的接待，没有排队也就没有接待。（受到接待的人被包括在队列中）。但是，在实际接待流量 (r) 和排队长度 (y_1) 之间的这种“转换规则”，在 $y_1 = 0$ 时具有非连续性。在对买者系统进行动态分析时，这种非连续性会在技术上造成困难。因而我们用连续关系和有限的自变量来代替这种非连续关系。更严格地说，我们首先根据以下方程使实际接待流量 (r) 取决于排队长度 (y_1) ：

$$r(y_1(t)) = sh_\omega(y_1(t)) \quad (A-1)$$

这里 h_ω 是一个连续函数。它在 $[0, \omega]$ 区间由 0 递增到 1，在 $[\omega, +\infty)$ 区间恒等于 1。这里称为“修匀系数”的参数 ω ，被假定为一个很小的正常数。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让 ω 趋于零，从而使连续关系式 (A-1) 接近于最初非连续的“转换规则”。

A.7 排队

所有买者和卖者的活动是彼此独立的，但是有一个例外，排队使经济系统中的彼此独立的当事人发生联系。

在排队倾向 $\varphi_i(W)$ ($i=1, 2, \dots, k$) 中，排队时间 W 作为自变量出现，这并不意味着可能的买者必须恰当地看出 W ，而只表示他们的总合行为是 W 的函数。我们来考虑一下没有特殊照顾情况下的排队，因而大家完全依先后次序受到接待。这形成了下述关系：

$$W(t) = y_i(t)/s \quad (A-2)$$

应当指出，这个方程也可用于排成若干队列购买商品 G 的情形的近似。如果有许多队列的话，新到的买者总是选择排队时间最短的队，于是各队的排队时间将趋于一致，因而方程 (A.2) 适用于排队总体。

队列由各组买者的成员组成。一般地说，这些组可能或多或少在队列中很好地混合在一起。然而，为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它们被均匀的混合在一起。我们用 $r_i(t)$ 表示 t 时已经受到接待的 i 类买者的流出量：

$$r_i(t) = \begin{cases} \frac{y_{i1}(t)}{y_i(t)} r(y_i(t)), & \text{如果 } y_i(t) > 0 \\ 0, & \text{如果 } y_i(t) = 0 \end{cases} \quad (A-3)$$

换句话说，我们假定受到接待的 i 类买者从排队中的流出量，同这类买者在排队的所有买者中所占的份额成比例。对买者总体的初始或过渡状态来说，这大概确实是一个粗略的近似（例如，来自同一组的买者也许排队时站在所有其他买者前面）。不过，在静止状态中，假定个人行为是彼此独立的，上述均匀性假定就是恰

当的。^⑦ r_i 是指对 i 类买者的实际接待流量，($i=1, 2, \dots, k$)， $r=r_1+r_2+\dots+r_k$ 。

有了对排队的讨论，我们就完成了(A·2至A·7)对模型制度因素和微观经济因素的描述。现在我们着手以比较形式化的方式来概述这个模型。

A·8 对模型的概述：外生参数和函数

假定下述参数是外生给定的实数： $S, P, \gamma_i, \chi_i, \psi_i$ ，($i=1, 2, \dots, k$)。 R_+ 表示非负实数集， $[0, 1]$ 表示单位闭区间。函数 $\varphi_i, \lambda_i, \mu_i, h_\omega$ ($i=1, 2, \dots, k$)假定是外生给定的，它们在 R_+ 有定义，在 $[0, 1]$ 区间取值。

有关外生参数和函数的假定如下。(注意这些函数的假定的性质在 R_+ 的整个定义域内成立。)

A1. 参数 S, γ_i, χ_i 和 ψ_i ($i=1, 2, \dots, k$)全部为正。对所有 i ，有 $\psi_i > \chi_i$ 。参数 P 为非负值。

A2. 函数 φ_i ($i=1, 2, \dots, k$)是非递增的，并有 $\varphi_i(0)=1$ 和连续性的一阶导数 φ'_i 。

A3. 函数 λ_i ($i=1, 2, \dots, k$)是非递增和连续的，并有 $\lim_{P \rightarrow \infty} \lambda_i(P)=0$ 。

A4. 函数 μ_i ($i=1, 2, \dots, k$)是非递减和连续的。如果对某个 i 和 P ，有 $\lambda_i(P)=0$ ，那么， $\mu_i(P)>0$ 。

A5. 函数 h_ω ($\omega>0$ 固定)在 $[0, \omega]$ 区间是递增的。此外，对每个 $y \geq \omega$ ， h_ω 有二阶导数并满足 $h_\omega(0)=0, h_\omega(\omega)=1$ 。

⑦ 从逻辑的观点看，假定(A-3)有一点问题，即在多于一组买者的情形下，它可能同(A-2)严格按顺序排队的说明相冲突。可以对(A-2)作另外一种与(A-3)相吻合的解释，即随机地抽出排队者并给以接待。假定被抽出的机会均等并且平均接待一个买者的时间为 $1/s$ ，那末，方程(A-2)给出了预期的排队时间，而方程(A-3)给出不同组买者的平均流量。

需要对这些假定作几点解释。^⑧ 第一，在A1中我们假定由H得到满足的平均时间($1/\chi_i$)大于平均等待时间($1/\psi_i$)。就是说，我们考虑的是等待时间短于消费时间的情况。

第二，在A-4中我们假定，如果相对价格如此之高，以致买者初始购买倾向为零；若此刻这些买者正处在采购程序中“是否替代比等待好”这个决策阶段的话，那么他们必有正的强制替代倾向(见图A-1)。

第三，需要对修匀系数 h_ω 作点说明。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首先对有确定的 $\omega > 0$ 情况下的任意修匀系数 h_ω 得出结果，然后让 ω 向零递减，并求出这种极限情形的结果(这一结果不同于 $\omega = 0$ 的情形)。

A-9 对模型的概述：动态关系

如上所述，我们将用(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组来描述总体状态变量 $y_{1i}(t)$, $y_{2i}(t)$, $y_{3i}(t)$, $y_{4i}(t)$, $i = 1, 2, \dots, k$, 随时间的动态展开，这个方程组如下所列：($i = 1, 2, \dots, k$)

$$\dot{y}_{1i} = \lambda_i \varphi_i(w)(\gamma_i y_{2i} + \chi_i y_{3i}) + \varphi_i(w)\psi_i y_{4i} - r_{1i}, \quad (A-4)$$

$$\dot{y}_{2i} = r_{1i} - \gamma_i y_{2i}, \quad (A-5)$$

$$\dot{y}_{3i} = [1 - \lambda_i + \lambda_i \mu_i (1 - \varphi_i(w))] (\gamma_i y_{2i} + \chi_i y_{3i}) + \mu_i (1 - \varphi_i(w)) \psi_i y_{4i} - x_i y_{3i}, \quad (A-6)$$

$$\dot{y}_{4i} = \lambda_i (1 - \mu_i) (1 - \varphi_i(w)) (\gamma_i y_{2i} + \chi_i y_{3i}) + (1 - \mu_i) (1 - \varphi_i(w)) \psi_i y_{4i} - \varphi_i y_{4i}. \quad (A-7)$$

这里所有状态变量以及实际接待流量和排队时间，都是时间的函数， $y_{1i} = y_{1i}(t)$ ，余此类推。实际接待流量已在方程(A-1)和(A-3)中定义，排队时间W在方程(A-2)中定义。 λ_i 和 μ_i 是

^⑧ 如果 $y_1 < y_2$ ，意味着 $\varphi(y_1) < \varphi(y_2)$ ($\varphi(y_1) \leq \varphi(y_2)$)，那么函数 φ 递增(非递减)；如果 $y_1 > y_2$ 意味着 $\varphi(y_1) > \varphi(y_2)$ ($\varphi(y_1) \geq \varphi(y_2)$)，则说 φ 是递减的(非递增的)。

$\lambda_i(P)$ 和 $\mu_i(P)$ 的缩写, 相对价格 P 是常数。符号“·”表示对时间求导, $\dot{y} = dy(t)/dt$ 。注意时间导数的和为零, 即 $\dot{y}_{1i} + \dot{y}_{2i} + \dot{y}_{3i} + \dot{y}_{4i} = 0$, 这反映每组中买者数都是常数这个假定。此外, 状态变量不能取负值; 对任何可行状态 $y_{j,i}$ (对某个 j 和 i 有 $y_{j,i} = 0$), 根据方程(A-4)和(A-7), 我们有 $\dot{y}_{j,i} \geq 0$ 。因此, 对 $t \geq 0$ 的任何时刻, 微分方程组的解是有界的。假定一阶导数 φ_i' 和 h_i' 连续, 对 $t \geq 0$ 的所有时刻, 微分方程组的解存在并且是唯一的。^⑨

微分方程组(A-4)–(A-7)是对A·3节中个别采购行为描述的总体公式。这种对应可以通过比较说明微分方程组作用的图7-1和说明采购程序的图A-1, 加以研究。

A·10 市场的正常状态: 存在和唯一性

如果买者总体不随时间变化, 即对所有 i 全部时间导数为零: $\dot{y}_{1i} = \dot{y}_{2i} = \dot{y}_{3i} = \dot{y}_{4i} = 0$ (这个微分方程组是自主存在的), 那么, 用状态变量 $y_{1i}, y_{2i}, y_{3i}, y_{4i}$ ($i = 1, 2, \dots, k$) 描述的这个买者总体就被称为处于静止状态。下面首先表明总存在着唯一的静止状态。进而在A·11节用一组买者的特例表明, 在排队倾向函数相当适度的条件下, 这种静止状态也是稳定的。

命题1. 对任何满足假定(A-1)–(A-5)的一组参数和函数, 存在着唯一的静止状态。^⑩

我们现在来细致研究一下, 当修匀系数接近零时, 对静止状态有什么影响。由上述命题可以得出两个推论。它们表明排队接近某一正值还是零, 取决于给定的一组参数和函数。

$$\text{令 } D = \sum_{i=1}^k \frac{\gamma_i \chi_i \lambda_i(P) n_i}{\chi_i \lambda_i(P) + \gamma_i (1 - \lambda_i(P))}, \quad (A-8)$$

⑨ 见黑尔(1969)第三章定理3·1。

⑩ 简要证明见A·17节。详细证明见科尔内一韦布尔(1977)。

$$\begin{aligned}
 A_i(W) = & \frac{1}{\chi_i} (1 - \lambda_i(P)) + \frac{1}{\varphi_i} \lambda_i(P) \\
 & + \left[\frac{\mu_i(P)}{\chi_i} + \frac{\lambda_i(P)}{\varphi_i} (1 - \mu_i(P)) \right] \\
 & \left(\frac{1}{\varphi_i(W)} - 1 \right) (i = 1, 2, \dots, k) \quad (A-9)
 \end{aligned}$$

($0 < A_i(W) < +\infty$)。此外, 令 $y_{1i}^*(\omega)$, $y_{2i}^*(\omega)$, $y_{3i}^*(\omega)$ 和 $y_{4i}^*(\omega)$, $i = 1, 2, \dots, k$, 表示对应于 $\omega > 0$ 的任意固定的修匀系数的静止状态变量值。

推论1·1 如果 $S < D$, 那末, $\lim_{\omega \rightarrow 0} y_i^*(\omega) = y_i^*$, 这里 $y_i^* > 0$ 。此外, y_i^*

是方程

$$\sum_{i=1}^k \frac{\lambda_i(P) n_i}{S A_i(y_i^*/S) + \lambda_i(P) y_i^*} = 1$$

的唯一解。 (A-10)

令 $\varphi_i^* = \varphi_i^*(y_i^*/\lambda_i)$ 。对有 $\lambda_i(P) > 0$ 和 $\varphi_i^* > 0$ 的买者组 i , 有

$$y_{1i}^* = \lim_{\omega \rightarrow 0} y_{1i}^*(\omega) = \frac{\lambda_i(P) y_i^* n_i}{S A_i(y_i^*/S) + \lambda_i(P) y_i^*}, \quad (A-11)$$

$$y_{2i}^* = \lim_{\omega \rightarrow 0} y_{2i}^*(\omega) = \frac{s y_{1i}^*}{y_i^* \gamma_i^*}, \quad (A-12)$$

$$\begin{aligned}
 y_{3i}^* = \lim_{\omega \rightarrow 0} y_{3i}^*(\omega) = & \left[\mu_i(P) \left(\frac{1}{\varphi_i^*} - 1 \right) + 1 - \lambda_i(P) \right] \\
 & \times \frac{S}{\lambda_i(P) \chi_i} \frac{y_{1i}^*}{y_i^*}, \quad (A-13)
 \end{aligned}$$

$$y_{4i}^* = \lim_{\omega \rightarrow 0} y_{4i}^*(\omega) = (1 - \mu_i(P)) \left(\frac{1}{\varphi_i^*} - 1 \right) \frac{S}{\chi_i} \frac{y_{1i}^*}{y_i^*} \quad (A-14)$$

对一组有 $\lambda_i(P) = 0$ 和(或) $\varphi_i^* = 0$ 的买者 i , 我们有 $y_{1i}^* = y_{2i}^* = 0$, 而 y_{3i}^* , y_{4i}^* 可以直接从静止条件中算出。

推论1·2如果 $S \geq D$, 那么, $\lim_{\omega \rightarrow 0} y_i^*(\omega) = 0$, 并且对 $i=1, 2, \dots, k$ 有

$$y_{1i}^* = \lim_{\omega \rightarrow 0} y_{1i}^*(\omega) = 0, \quad (A-15)$$

$$y_{2i}^* = \lim_{\omega \rightarrow 0} y_{2i}^*(\omega) = \frac{\chi_1 \lambda_1(P) n_i}{\chi_1 \lambda_1(P) + \gamma_1 (1 - \lambda_1(P))}, \quad (A-16)$$

$$y_{3i}^* = \lim_{\omega \rightarrow 0} y_{3i}^*(\omega) = \frac{\gamma_1 (1 - \lambda_1(P)) n_i}{\chi_1 \lambda_1(P) + \gamma_1 (1 - \lambda_1(P))}, \quad (A-17)$$

$$y_{4i}^* = \lim_{\omega \rightarrow 0} y_{4i}^*(\omega) = 0 \quad (A-18)$$

这样, 在极限上, 当我们令修匀系数 ω 趋近零时, 我们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静止状态。对满足不等式 $S < D$ 的一组参数和函数, 对应的静止状态逼近一种有排队的状态 ($y_i^* > 0$); 而对满足相反的不等式 $S \geq D$ 的一组参数和函数, 对应的静止状态逼近一种没有排队的状态。这两类极限状态在 A·13 至 A·16 将进一步加以研究。但是, 为使这种研究有意义, 我们必须先证明对较小的正修匀系数值, 静止状态是稳定的。

A·11 市场的正常状态: 稳定性

这里只考虑一组买者的特例, 因而 $k=1$, 下标 i 可以省略。此外, 当在这种情况下讲到稳定性时, 我们指的是渐近稳定性。直观地说, 如果当给系统的状态空间一个小干扰使之偏离静止状态时, 这个系统能够逐渐(就时间而言)返回静止状态, 就说这个静止状态是渐近稳定的。因而, 渐近稳定性是局部特征, 只表明经济系统在静止状态的邻域如何运动。更确切地说, 我们使用了常微分方程渐近稳定性(标准)定义^⑩。

上节已经表明, 如果 $S < D$, 那么, 当修匀系数 ω 趋于零时,

⑩ 例如, 见黑尔(1969)。

$y_1^*(\omega)$ 趋于一个正值；如果 $S \geq D$ ，则 $y_1^*(\omega)$ 趋于零。因此，稳定性分析可划分为两种情形。对 $S < D$ ，稳定性的充分条件是排队倾向函数 φ 对所有正排队时间是“平滑的”。对相反的情形 $S \geq D$ ，在排队时间为零那一点上 φ 是“平坦的”则是充分条件。

命题2. 考虑一个只由一组($k=1$)组成的买者总体，并假定 $\lambda(P) > 0$ 。

(a) 设 $S < D$ 。如果 A_1-A_5 的假设条件成立，并且对每个 $W > 0$ ，排队倾向函数 φ 有二阶导数 φ'' ，那么，就存在一个 $\varepsilon > 0$ ，使静止状态对每个修匀系数 $\omega \in (0, \varepsilon)$ 渐近稳定。

(b) 设 $S \geq D$ 。如果 A_1-A_5 的假设条件成立，并且排队倾向函数 φ 在某个区间 $(0, \delta)$ 上恒等于1。那么，对每个修匀系数 $\omega \in (0, S \delta)$ ，静止状态是渐近稳定的。

上面已经提到，上述命题没有告诉我们经济系统对使之偏离静止状态的大的干扰作何反应。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出有关经济系统总体行为的一般性结果。不过对等待的可能性被排除的特例，可以证明，静止状态确系总体稳定，即在受到任意大的干扰之后，系统能回到静止状态。

命题3. 考虑由没有等待可能性的一组买者组成的总体，即 $k=1$ ， $\lambda(P) > 0$ ， $\mu(P) = 1$ ， $Y_4(0) = 0$ 。如果 A_1-A_5 的假设条件被满足，那么系统就能从任何初始状态逐渐收敛于自己的静止状态。

为补充有关一个买者组($k=1$)特例在分析上的稳定性研究，我们对有两个买者组($k=2$)的情况已经进行了一些数值上的计算机模拟。虽然我们的模拟研究不够广泛，我们还是能够说，所有已经进行的这些模拟，表明该经济系统具有总体稳定性。典型模拟结果表示在图A-2中(见A·18)。在模拟的基础上，我们作出以下推测：

至少对两组买者($k=2$)的情形来说，有相当广泛的一类外生参数和函数能满足假定 A_1-A_5 ，与此对应的静止状态是总体稳

定的。

A·12 对正常状态的解释

当 $y_{1i} = y_{1i}^*$, \dots , $y_{ni} = y_{ni}^*$, $i = 1, 2, \dots, K$ 时, 经济系统处于它的正常状态。有必要对“正常”一词作些解释。(更详细的讨论见7·7节)

在对模型作经验的描述性说明时, 正常值的含义是状态变量的期间平均数。因此我们的模型只适用于描绘静止状态时的市场。但我们的推测是: 这些结果能够一般地推广到供给、交换和消费随时间变化(如递增)的各经济系统。(例如, 可以考虑新的潜在买者“转移到”商品G市场的情形。)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正常状态的概念, 这一概念就变为一个具有相对意义的术语。(对所有 t 和每个 i , j , 有 $y_{ij}(t)/n_i(t) = \text{常数}$)在以后的说明中, 我们就在这个一般化的意义上使用术语“正常状态”。我们的静止状态模型只是它的一个特例。

对一种有意义的解释而言, 两个形式上不同的问题——存在和稳定性——完全是相互联系的。把任何期间平均数叫做“正常值”, 只是同义反复。确实, 正是反馈机制的运行才使期间平均数成为“正常值”, 一旦经济系统偏离正常状态, 反馈机制能保证它“恢复正常”。在我们的简单模型中, 引导反馈机制的信号是排队时间 W 。

除了存在和稳定性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关于静止状态的唯一性命题, 这并不必然包含在正常状态概念的含义中。在其他假定中间, 我们的唯一性命题归因于模型的确定性结构。在随机的环境中, 当前的确定性模型(唯一)静止状态必须用经济系统状态的(唯一)平稳概率分布来取代。

最后, 再做一点说明。如本书其他部分所说, 任何正常状态能够自我再生, 自我维持, 只是因为它被这个经济系统的成员接

受为正常状态。排队，尽管有可利用的财源却推迟购买，强制替代——这些是买者在用货币支付正常价格之外付出的社会成本。所以，加入排队、进行强制替代、等待购买的倾向，即函数 φ_i ， μ_i ， $(1-\mu_i)$ ，分别表示买者为得到期望的产品愿意付出这些非财务成本的程度。它们表示市场上存在的情况已经成为惯例，并且为社会所接受。

A·13 函数和参数的变化

我们现在转向研究在 $\omega \rightarrow 0$ 时的极限情形中的正常状态，这样，状态变量在推论1·1和1·2中就被给定。我们在A·13至A·16节将比较对应于满足假定A₁—A₄的不同组参数和函数的正常状态的各种存量和流量。虽然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动态模型，但对经济系统的不同正常状态的比较会导致类似于通常的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

首先，方程(A·8)中关键的参数值D必须进一步加以说明。根据推论1·1和1·2，这个量是消除排队的最小供给率。这就是说，如果供给率S低于这个数，那么在正常状态下存在排队，如果S等于或超过D，则正常状态下不存在排队。注意，D只取决于相对价格P，初始购买倾向函数 λ_i ，需要更新率 ν_i 和 χ_i ，买者组的规模 n_i ，而同排队倾向 φ_i ，强制替代倾向 μ_i ，重新考虑率 ψ_i 当然还与供给率S无关。因而D反映与价格和需求更新率有关的买者态度。由于D的这种作用，把它同需求概念相联系是自然的。对任何不存在排队的正常状态，(单位时间)进入销售点的买者流量正好是D；参见推论1·2。因而，对描述买者态度和行为的任何给定的一组参数和函数来说，如果经济系统处于没有排队的正常状态，D的数量是在单位时间内这个买者总体对商品G提出的潜在需求。(D的数量一般不同于存在排队的特殊正常状态下的潜在需求流量。由如果不排队，就要求得到G的买者构成的后一个流量，可以由推论1·1中的方程来计算。)

在考虑了 D 的数量含义以后，我们现在回到正常状态对供给率、相对价格和买者态度的某些分量的依赖性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正常状态有许多方面需要考虑。对正常状态的一个自然的描述，不过是买者在“排队”，“由 G 得到满足”，“由 H 得到满足”，“等待”这四种可能状态上的分布，这已经由状态变量的正常值本身加以规定。不过作为对这些数量的补充，还应当考虑如果不排队也愿买商品 G 的买者流量（图 A-1 中，在排队前，我们想到是：进入最后决策点的流量）。这个流量一般分成三个次流量：一个加入排队，另一个进行强制替代，第三个等待。在正常状态下，这些次流量代表以下潜在的 i 类顾客的流量份额 ($i=1, 2, \dots, k$)：

$$\alpha_i^1 = \varphi_i(W^*) \quad (\text{排队}) \quad (A-19)$$

$$\alpha_i^2 = (1 - \varphi_i(W^*))\mu_i(P) \quad (\text{强制替代}) \quad (A-20)$$

$$\alpha_i^3 = (1 - \varphi_i(W^*))(1 - \mu_i(P)) \quad (\text{等待}) \quad (A-21)$$

流量的这种划分可以视为买者面临短缺时，对非财务成本的选择，即是否花时间排队，买较少偏好的商品或不进行购买。在“非短缺情况”下， $S \geq D$ ，我们有 $W^* = 0$ 并且对所有 i ，有 $\alpha_i^1 = 1$ ， $\alpha_i^2 = \alpha_i^3 = 0$ 。但在“短缺情况下”， $S < D$ ，因而 $W^* > 0$ ，并且所有份额都可能是正值。关于强制替代，这样做大概是有益的：不仅了解流量额 α_i^2 ($i=1, 2, \dots, k$)，而且弄清存量额，即在所有进行替代的买者中接受强制替代者的数量。对一个任意正常状态，把第 i 组买者的这个份额表示为 R_i^* ($i=1, 2, \dots, k$)。利用推论 1·1 和 1·2 中的方程，我们得到下述表达式：

$$R_i^* = \frac{\lambda_i(P)\mu_i(P)(1 - \varphi_i(W^*))}{\mu_i(P)(1 - \varphi_i(W^*)) + (1 - \lambda_i(P))\varphi_i(W^*)} \quad i = 1, 2, \dots, k \quad (A-22)$$

如果分子为零，则 R_i^* 定义为零。我们特别看到，在“非短缺情况”下， $W^* = 0$ ，因而，对所有 i ，有 $R_i^* = 0$ 。

对正常状态一切方面作仔细的研究，至少可以说是要占用过多的篇幅。但既然所有状态变量和指标的正常值或多或少都直接

同正常排队时间 W^* 有关，我们在下述分析中就可以集中在这个主要特征上，这并不会在很大的程度有损于对问题的全面分析。

在推论1·1和1·2中，通过恒等式 $W^* = y_i^*/S$ ，决定了正常排队时间 W^* 。为方便起见，我们这里重述这个结果。令函数 $K: \mathbb{R}_+ \rightarrow \mathbb{R}_+$ 由下式定义：

$$K(W) = \sum_{i=1}^k \frac{\lambda_i(P)n_i}{A_i(W) + \lambda_i(P)W}. \quad (A-23)$$

推论1·3. 如果 $S < D$ ，那末， $W^* > 0$ ，并且 W^* 是方程

$K(W) = S$ 的唯一解。如果 $S \geq D$ ，那么 $W^* = 0$ 。

A·14 对供给率的依赖性

接下来，我们研究正常排队时间 W^* 如何依赖于供给率 S ，假定所有其他参数和函数固定不变（特别是 D 为常数）。我们把对应于较低供给率的正常排队时间同对应于较高供给率的正常排队时间加以比较。人们凭直觉就可以预期，在供给率较高的情况下，排队时间较短。实际上正是这种情况，这直接产生于函数 K 的单调性。

结论1. 正常排队时间 W^* 是供给率 S 的连续函数。对 $S \in (0, D)$ ，它的数值为正并且递减；而对 $S \geq D$ ，它恒等于零。

需要对正常排队时间 y_i^* 作一点说明。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以为上述定性分析的结果对正常排队长度也成立，即更高的供给率导致更短的排队。但是，在当前的模型中，我们已经假定是排队时间而不是排队人数，影响潜在顾客的排队倾向。因此，在关于排队倾向函数相当合理的假定下，正常排队长度可以用非单调方式同供给率相联系。例如，假使可接受的排队时间存在有限的上限，或更严格地说，假使存在一个有限的 W_0 ，对所有 i 有 $\varphi_i(W_0) = 0$ ，就会出现上述情况。

结论2. 正常排队长度 y_i^* 是供给率 S 的连续函数。对 $S \in (0,$

D ，它数值为正，而对 $S \geq D$ ，则恒等于零。如果在可接受的排队时间上存在有限的上限，那么， $\lim_{s \rightarrow 0} y_1^* = 0$ 。

因而，由于 y_1^* 是 S 的正数值的和连续的函数，（当 $S \in (0, D)$ 时）它不能在整个 $(0, D)$ 区间单调减少。排队长度对供给率依赖性的典型例子表示在图 A-3 中（见 A-18 节）。

总之，较高的供给率导致较短的排队时间，但未必是更短的队列。

A-15 对价格的依赖性

我们现在研究正常状态如何依赖于相对价格 P ，假定所有其他参数和函数固定不变（特别是 S 为常数）。不过在研究正常状态变量以前，我们应该先考察一下潜在需求 D 。由方程 (A-8) 中的定义不难证明 D 是 P 的连续非递增函数，当 P 趋于无穷大时， D 趋于零。特别是，由于 S 为正，这意味着存在一个有限的 P_0 ，以致对每个 $P < P_0$ 有 $D(P) > S$ ，对每个 $P \geq P_0$ 则有 $D(P) \leq S$ ($P_0 = 0$ 是可能的)。根据推论 1-1 和 1-2，这引出关于正常状态下排队存在或不存在的下述结果。

结论 3. 对任何固定的供给率和描述买者态度的一组参数和函数，存在着一个消除排队的最低价格，即一个有限的相对价格 P_0 ，能满足

$$P < P_0 \Rightarrow Y_1^* > 0,$$

$$P \geq P_0 \Rightarrow Y_1^* = 0.$$

就是说，总是存在一个相对价格，高到使对应的正常状态没有排队。无论这种正常状态看上去多么诱人，应当指出，虽然价格高出 P_0 就不存在排队，但从接待人数上看情况并不更好。由推论 1-1 和 1-2 不难证明，正常实际接待流量 r^* 满足方程 $r^* = \min(S, D)$ 。因而，作为相对价格 P 的函数，在价格区间 $(0, P_0)$ ，正常实际接待流量恒等于 S ，而在价格区间 $(P_0, +\infty)$ ，它随 D 下降

而下降。

由于消除排队的最小价格 P_0 使潜在需求 D 等于供给能力 S ，可以把它视为瓦尔拉斯市场供求相等价格。这个价格在本模型的确定性结构中是唯一的。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低于这个价格总有排队，高于这个价格则没有排队。

我们现在来考虑，如果一个较低的相对价格被提高的话，正常排队时间会有什么变化。人们会直觉地预期，相应于较高价格的正常排队时间不长于相应于较低价格的正常排队时间。根据本模型，这种关系的确成立。

结论4. 正常排队时间 W^* 是相对价格 P 的连续函数。对区间 $(0, P_0)$ 内的价格，它具有正数值并且是非递增的，而对价格 $P \geq P_0$ ，则恒等于零。

总之，较高的相对价格决不引致更长的正常排队时间，并且总存在一个相对价格，高到使对应的正常状态没有排队。

A·16 对排队倾向和强制替代倾向的依赖性

前两节我们研究了正常状态如何依赖于诸如相对价格和供给率之类的“市场控制变量”。我们现在研究正常状态如何依赖于买者态度的几个分量。

我们首先假定所有其他参数和函数不变，来考察正常排队时间对买者排队倾向的依赖。令 $\varphi_1, \varphi_2, \dots, \varphi_k$ 和 $\eta_1, \eta_2, \dots, \eta_k$ 表示两组可供选择的排队倾向函数。如果当所有 $W > 0$ 时，对每个 i 有 $\varphi_i(W) \geq \eta_i(W)$ ，并且对某个 i 有 $\varphi_i(W) > \eta_i(W)$ ，那么就说这组函数 (φ_i) 覆盖另一组函数 (η_i) 。

结论5. 假定 $S < D$ 并且一组排队倾向函数 (φ_i) 覆盖另一组排队倾向函数 (η_i) 。那么，对应于第一组的正常排队时间超过对应于第二组的正常排队时间。

换句话说，较高的排队倾向产生伴有较长排队时间的正常状

态。^⑫

下面我们假定所有其它参数和函数不变（特别是相对价格不变），来考虑正常排队时间对买者强制替代倾向的依赖性。设 $[\mu_i]$ 和 $[\nu_i]$ 是两组可供选择的强制替代倾向函数。

结论6. 假定对所有 $P \geq 0$ 一组强制替代倾向函数 $[\mu_i]$ 都覆盖另一组这样的函数 $[\nu_i]$ ，那么，对任何不变的相对价格 P ，对应于 $[\mu_i]$ 的正常排队时间少于或等于对应于 $[\nu_i]$ 的正常排队时间。

换句话说，较高的强制替代倾向决不会导致较长的正常排队时间。

结论5和6有助于证实A·12节末尾所做的论述。状态变量族依赖于各组买者的态度。在短缺引起的各种非财务成本之间也有某种“对换关系”。我们把排队、等待和强制替代看做这种成本。结论6表明了一种这样的对换关系。买者如果更愿意接受强制替代，他就能缩短排队时间。一般地说，要减少一种非财务成本而不增加其他这类成本，只能靠改变最后的决定因素，即一方面变动消费结构和自愿替代型式和（或）另一方面变动供给率和价格。

作为最后的说明，我们指出在“市场控制变量” S 和 P 以及买者态度方面的变化，一般会对不同组的买者产生不同影响。例如，相对价格的提高会使对价格更敏感的买者组实行强制替代，而其他对价格不敏感的买者组并不改变消费型式，却会缩短排队时间。一个买者组强制替代倾向的提高还会给其它组造成缩短排队时间的有利影响。

这样，除了文献中深入研究过的货币收入的分配问题之外，我们这里指出了另一重要方面：消费的非财务社会成本在不同居

^⑫ 也许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我们还是想提醒读者注意因果关系的方向。排队倾向可以是买者的一个决策变量，而排队时间却是个别决策的综合结果，因此它对每个人是给定的。现实短缺状况取决于买者的容忍性。

民组之间的分配。

A·17 关于命题的证明

脚注^⑩已经提到，详细的证明可以在我们更早的论著中找到。以下对几个命题和结论作些不完整的说明。

命题1。静止状态意味着方程 $F_\omega(Y_1) = 1$ ，这里

$$F_\omega(Y) = \sum_{i=1}^K \frac{\lambda_i h_i}{A_i(y/S) S h_\omega(y) + \lambda_i y}.$$

按照假定 $A_1 = A_K$ ， F_ω 是连续的和(严格)递减的，同时 $F_\omega(0) = +\infty$ 和 $F_\omega(n) < 1$ ，因而方程 $F_\omega(y_1) = 1$ 在区间 $(0, n)$ 有唯一根 $y_1^*(\omega)$ 。

命题2。在静止状态中，微分方程组是被线性化的。^⑪

命题3。可以用 (y_1, y_2) 相位平面的几何分析得出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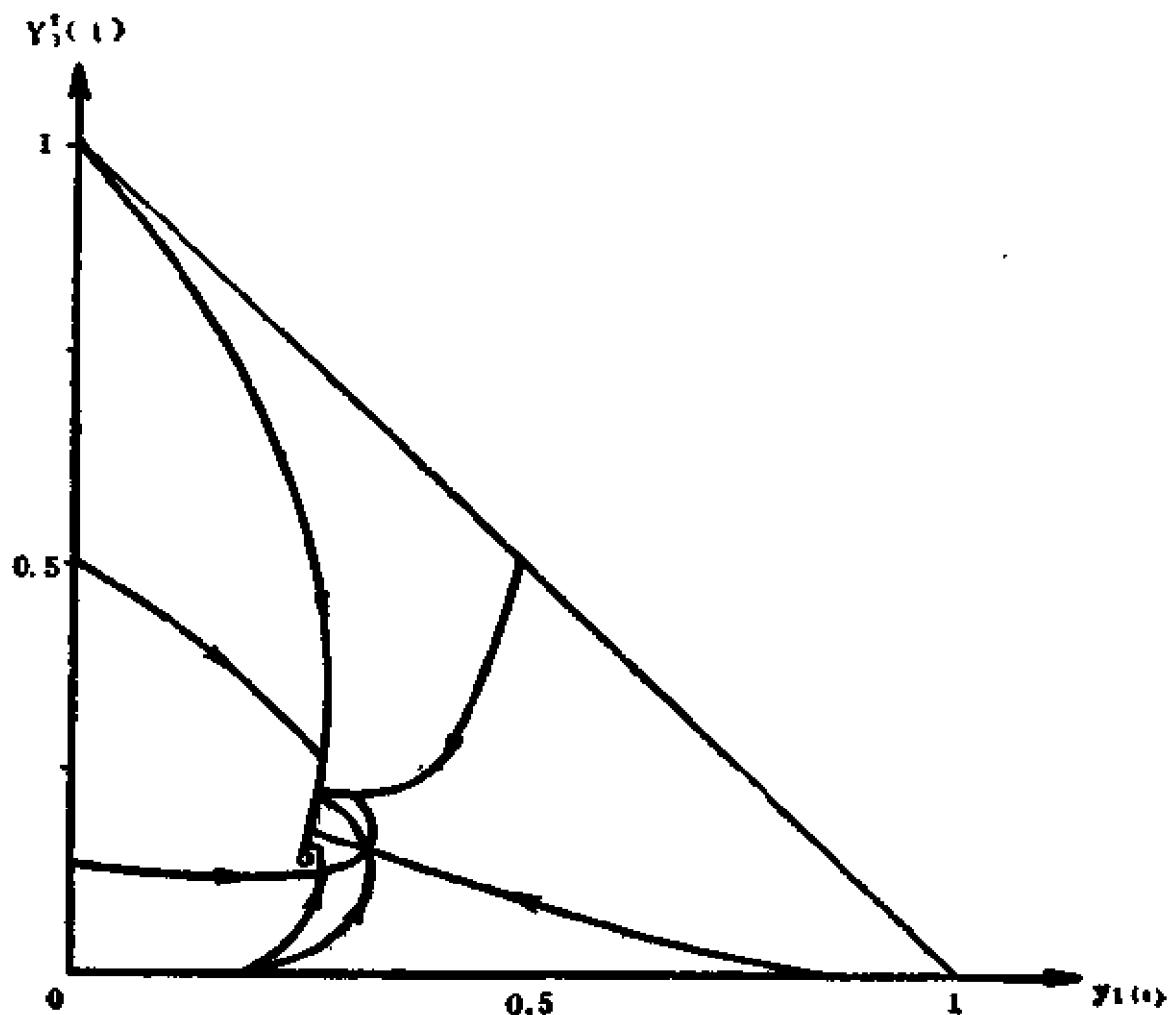
结论2。对 $S < D$ ， y^* 是方程 $H_S(y) = 1$ 的根，这里 $H_S(y_1)$ 表示公式(A·10)的左方。从有限上限 W_0 这一假定，对每个 $y \geq SW_0$ 必然有 $H_S(y) = 0$ ，从而当 $S \rightarrow 0$ 时， $y_1^* \rightarrow 0$ 。

结论4。单调性结果的充分条件是，对每个固定的 $W > 0$ ，数量 $K(W)$ 不随 P 增加。对 $A_i(W) / \lambda_i(P)$ 的价格依赖性的研究给出这个条件。

A·18 计算机模拟说明

在下面的图A-2和图A-3中的模拟中，使用下述参数值和函数： $k = 2$ ； $n_1 = n_2 = 50$ ； $\gamma_1 = 1$ ； $\gamma_2 = 0.5$ ； $\chi_1 = 1.5$ ； $\chi_2 = 1$ ； $\psi_1 = 2$ ； $\psi_2 = 3$ 。

^⑩ 见黑尔(1969)第二章推论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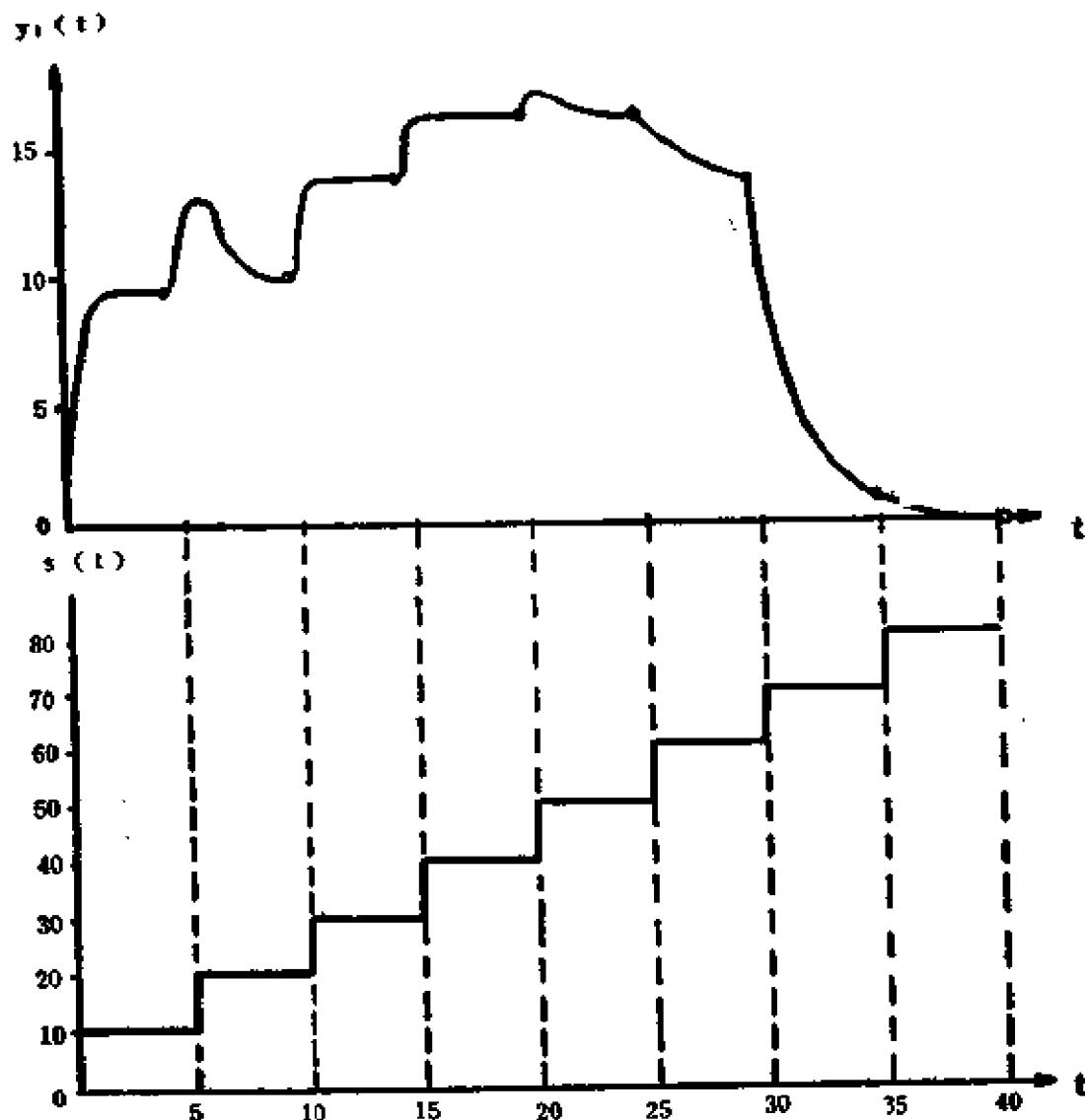
图A-2 (y_1, y_1^t) 相位平面上的典型轨迹

$$h\omega(y_1) = \begin{cases} 1 - (y_1 - \omega)^2 & y_1 < \omega \\ 1 & y_1 \geq \omega \end{cases} \quad (\omega = 1)$$

$$\phi_i(W) = \begin{cases} 1 & W < W_i/2, \\ 2(1 - W/W_i) & W \in (W_i/2, W_i) \\ 0 & W \geq W_i. \end{cases}$$

在图A-2中, y_1 是排队的买者总数, y_1^t 是进行强制替代的买者总数。小圆圈代表静止状态, 所有轨迹收敛于这点。这个模拟的数值规定是

$S=30, \lambda_1=0.95, \lambda_2=0.80, \mu_1=0.5, \mu_2=0.25, W_1=1, W_2=2$ 。



图A-3 由于供给率连续、突然增长所引起
排队长度的典型反应

在图A-3中，我们给出排队长度 $y_1(t)$ 对供给率 $S(t)$ 持续增长反应的典型图示。图中 t 表示时间，小圆圈表示连续的正常排队长度。这个模拟的数值规定是

$\lambda_1=0.95, \lambda_2=0.82, \mu_1=0.40, \mu_2=0.22, W_1=0.5, W_2=1$ 。

数学附录B：强制替代、存货和 摩擦之间的相互关系

（合著者：A·西蒙诺维茨）

B·1 卖者的预测误差

在本附录中将用数学在更一般的条件下探讨8·3和8·4节讨论的模型。我们假设附录B的读者已经熟悉第八章的内容，因而对那里引进的概念我们直接使用，不再给予定义和解释。

我们在本节考察8·3节分析过的问题。

首先简单概述假定。

假定1. 买者初始需求向量 $d = (d_1, \dots, d_m)$ 是既定的。它的各分量的总和是 D 。

假定2. 卖者对买者初始需求 d^{pred} 作出预测并准确了解 D 。预测误差结构向量 b 是常数，但预测误差的大小 ε 可变：

$$d - d^{\text{pred}} = \varepsilon b \quad (\text{B-1})$$

为使说明简化，我们把误差按递减（非增）排序：

$$b_1 \geq b_2 \geq \dots \geq b_k > 0 \geq b_{k+1} \geq \dots \geq b_m \quad (\text{B-2})$$

相应地，卖者低估了对第一组 K 个产品的初始需求，并正确估计或高估了其余的。

为突出经济含义，我们这样选取 b ，以使它的正元素之和等于 1：

$$\sum_{i=1}^k b_i = 1 \quad (B-3)$$

这样 ε 表示低估数值的总和。这个变量将被看作预测误差指标。

假定3。产品*i*的卖者存货同有关的需求预测成比例,但不大于总需求:

$$S_i = \begin{cases} (1+\lambda)d_i^{\text{pred}}, & \lambda > 0 \text{ 如果 } (1+\lambda)d_i^{\text{pred}} < D \\ D, & \text{如果 } (1+\lambda)d_i^{\text{pred}} \geq D. \end{cases} \quad (B-4)$$

假定4。买者愿意接受强制替代。购买变量 y 满足下述条件:

$$y_i = S_i, \text{ 如果 } d_i > S_i \text{ (短缺商品)} \quad (B-5)$$

$$S_i \geq y_i \geq d_i, \text{ 如果 } d_i \leq S_i \text{ (非短缺商品)}$$

$$y = D. \quad (B-6)$$

可以看到,由于假定3,假定4能被满足。以下将说明强制替代率 η ,这里

$$\eta = \frac{\sum (d_i - S_i)}{Y} \quad (B-7)$$

我们把强制替代率表示为低估量的总和和存货参数的函数。对于给定的 d , b , ε 和 λ , d^{pred} 和 s 是唯一的,从而 η 也是唯一的:

$$\eta = \frac{\sum_{i=1}^k (\varepsilon b_i - \lambda d_i^{\text{pred}})_+}{D} \quad (B-8)$$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令 d^{pred} 在允许值的集合内变动。^①由于在 $\varepsilon < D/b_i$, $i = 1, \dots, k$ 为条件, $d_i \leq D$, 所以 d_i^{pred} 的下限是 δ ,上限是 $(D - \varepsilon b_i)$ 。

显然,当且仅当 $b_i > 0$ 和 d_i^{pred} 为最小,即当 $d_i^{\text{pred}} = \delta$ 时, $(\varepsilon b_i -$

^① 注意这里应用了不同3·1节使用的模型。在3·1节, d^{pred} 的每个要素都假定等于 D/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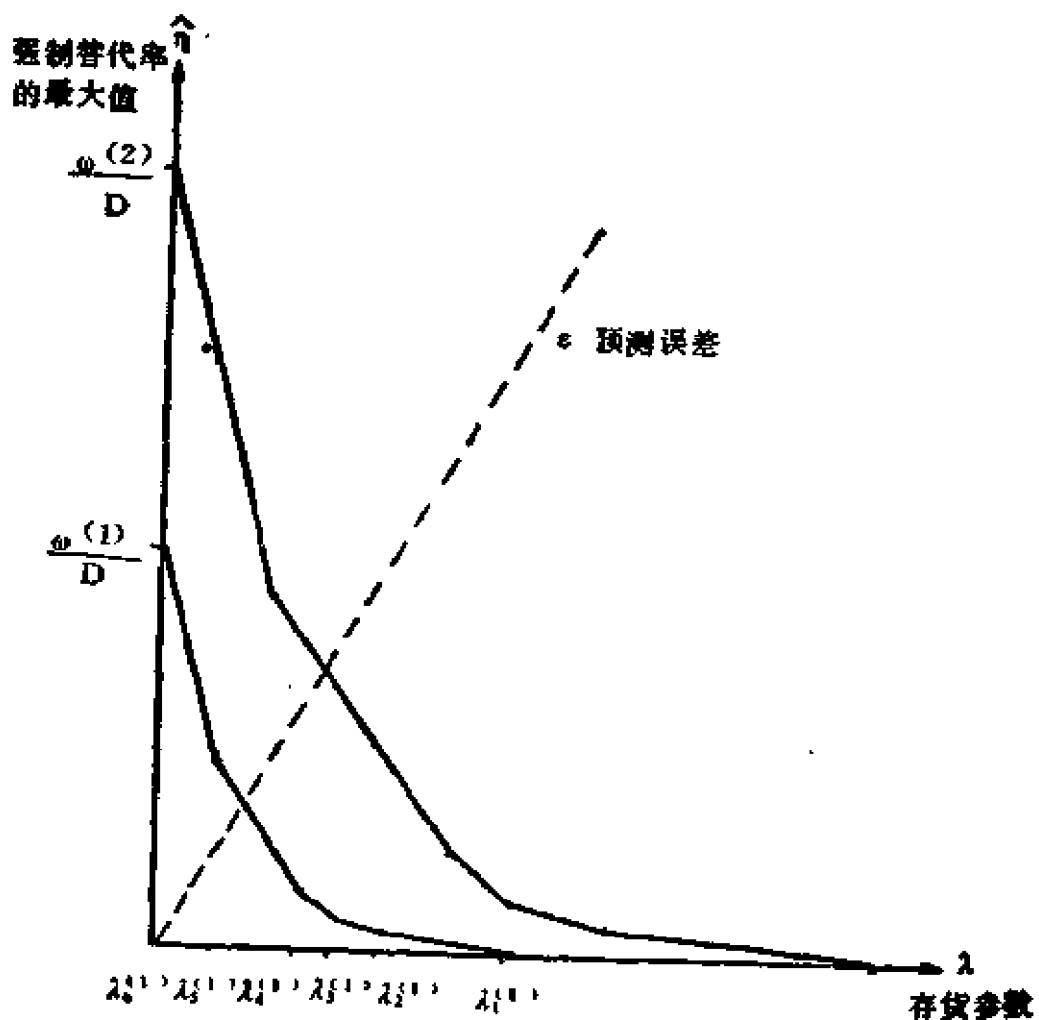


图 B-1 强制替代率、产品存量和卖者预期误差之间的关系

$\lambda_i d_i^{\text{Pred}})_+^{\text{有最大值。因为}} \eta \text{ 是各项 } (\varepsilon b_i - \lambda_i d_i^{\text{Pred}})_+^{\text{之和 (撇开除数 }} \hat{D}) \text{, 所以只有当每一项都为最大值时, } \eta \text{ 才有最大值。我们用 } \hat{\eta} \text{ 表示 } \eta \text{ 的最大值并称之为强制替代率的最大值, } \hat{\eta} \text{ 由以下公式求出:}$

$$\hat{\eta} = \frac{\sum_{i=1}^k (\varepsilon b_i - \lambda_i \delta)_+}{\hat{D}} \quad (B-8)$$

λ_i 是产品 i 存货参数的临界值, 它和最小需求预测 (即 $d_i^{\text{Pred}} = \delta$) 一起正好消除有关产品的短缺:

$$\lambda_i = \frac{\epsilon b_i}{\delta}, i = 1, \dots, K. \quad (B-10)$$

根据先前的假定

$$\lambda_1 \geq \lambda_2 \geq \dots \geq \lambda_K > 0 = \lambda_{K+1} = \dots = \lambda_m \quad (B-11)$$

很明显, 对 $\lambda \in [\lambda_i, \lambda_{i-1}]$, ($\lambda_0 = D/\delta - 1$)

$$\hat{\eta} = \frac{\epsilon \sum_{n=1}^{i-1} b_n - \lambda \delta(i-1)}{D}. \quad (B-12)$$

公式(B-12)在图(B-1)中作了说明, 那里 $k=5$ 。图8-2表明了当有两种产品, 并且卖者对其中一种的需要估计偏低(即 $m=2$, $k=1$)时的特征。

B·2 买者的动摇不定

下述分析同8·4节有关。上一节述及的假定1, 3和4依然有效, 而对假定2将作一点修改。对需求预测不准, 不单纯是卖者的无知, 也同买者的动摇有关。

必须引入两个新假定。

假定5。需求是一个随机变量。为简化分析, 我们假定需求的随机部分(即需求与平均值之差)属于一定的分布族。更准确一说, 令 h 为平均值等于零的随机向量, 那么

$$d = \bar{d} + rh \quad (B-13)$$

就给出需求的数值。标量 $r \geq 0$ 称为动摇参数。

假定6。 h 的分布是连续的。

在假定5和6的基础上我们来修改上节的假定2。

假定2'。卖者准确地知道需求的平均值, 但不知道需求本身, 甚至不知道 h 的分布。 $d_{pred} = \bar{d}$ 。

当分析问题时, 我们知道 h 的分布, 于是也知道强制替代率的分布。我们用分位数 $\eta^{(\pi)}$ 即概率为 π 的强制替代率的可靠值, 来作

为强制替代的指标。由于 η 的分布也是连续的，故 $\eta^{(\pi)}$ 完全可以由方程 $P(\eta < \eta^{(\pi)}) = \pi$ 确定。这一点由以下公式表明

$$\eta = \frac{\sum_{i=1}^n (\gamma h_i - \lambda \bar{d}_i)_+}{D} \quad (B-14)$$

当 $\eta > 0$ 时， η 是 γ 的递增函数和 λ 的递减函数。上述结论对 $\eta^{(\pi)}$ 也成立，只要 $\eta^{(\pi)} > 0$ 。（当然，在 $\eta = 0$ 的情况下， γ 的减少或 λ 的增加，不减少也不可能减少 $\eta^{(\pi)}$ 。）图B-2说明了这种关系。

我们举例来说明推理过程。假设市场上只有两种产品并且需求分布是均匀的。为简单起见，我们还假定两者的平均值相等， $\bar{d}_1 = \bar{d}_2 = D/2$ 。因为 d_1 和 d_2 都是非负的，所以都位于区间 $[0, D]$ 内。令 h_1 为 $[-D/2, 0/2]$ 区间上具有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那么 d_1 和 d_2 都是以下区间上具有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

$$\left[\frac{1-\gamma}{2} D, \frac{1+\gamma}{2} D \right], \quad 0 < \gamma \leq 1.$$

根据给定的假定，就两种产品而言，至多可能有一种产品短缺。由于对称性的假定，短缺的分布对两者等同。因而只要考察第一种产品是短缺品 $h_1 > 0$ 的情况就足够了。

$\eta < X$ 的概率是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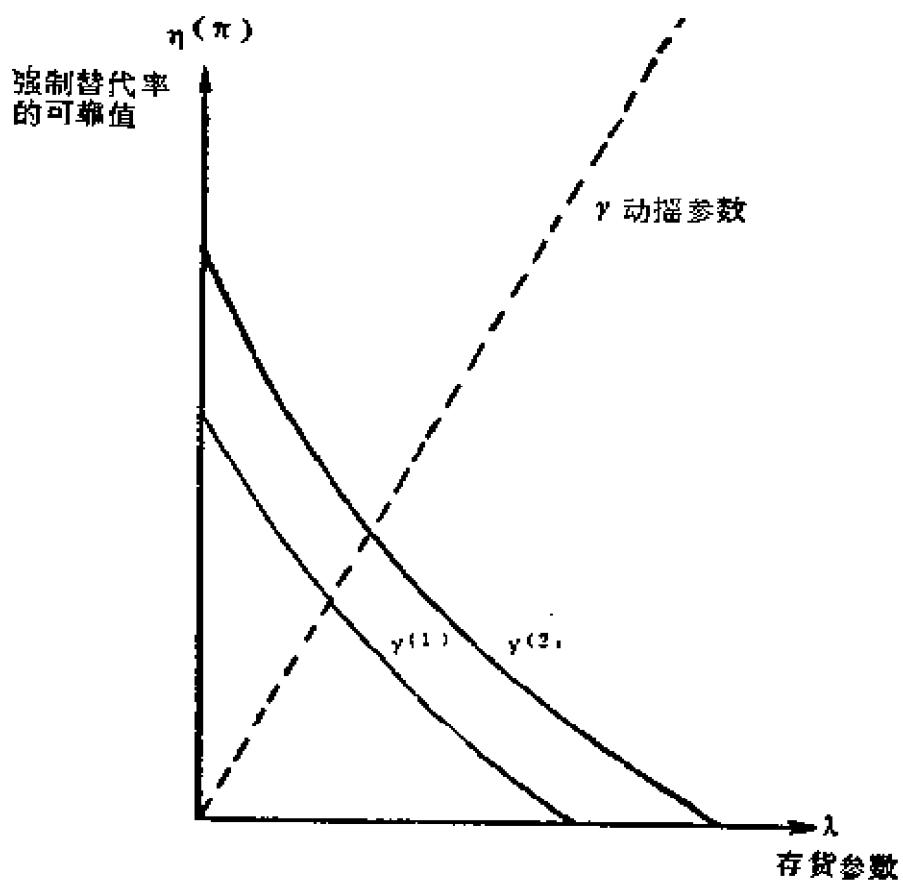
$$\left(xD + \frac{\lambda}{2} D \right) / \frac{\gamma}{2} D.$$

（分子中 xD 与小于 x 的正短缺相关，而 $(\lambda/2)D$ 同零短缺相关。分母 $(\gamma/2)D$ 表示所有 $h_1 > 0$ 的情形。）

由于事件 $\eta \geq x$ 的概率是 $(1 - \pi)$ ，并且这个事件对 $h_1 > 0$ 和 $h_1 < 0$ 可以同等地出现，故

$$\frac{xD + (\lambda/2)D}{(\gamma/2)D} = 1 - \frac{1 - \pi}{2} \quad (B-15)$$

整理我们的方程并用 $\eta^{(\pi)}$ 代替 x ，就得到下述公式：



图B-2 强制替代率、产品存货量和买者动摇不定的关系

$$\eta^{(n)} = \left[\frac{\gamma(1 + \pi)}{4} - \frac{\lambda}{2} \right]_+ \quad (B-16)$$

图8-3表示了公式(B-16)中的关系。

注意，当 $\pi = 1$, $\gamma = 1$ 时，有

$$\hat{\eta} = \left[\frac{1}{2} - \frac{\lambda}{2} \right]_+ \quad (B-17)$$

译名对照表

A

阿勒特 Allardt, E.
 阿罗 Arrow, K. J.
 阿沃伊 Arvay, J.
 艾德姆 Eidem, R.
 埃尔德什 Erdős, P.
 埃尔德什 Erdős, T.
 埃尔曼 Ellman, M. J.
 埃尔利奇 Ehrlich, E.
 埃默里 Emery, F. E.
 埃斯泽 Esze, Zs.
 安德森 Andersson, A. E.
 安多卡 Andorka, R.
 安尼斯 Anis, A. A.
 奥古斯蒂诺维奇 Augusztinovics, M.
 奥肯 Okun, A.
 奥利弗拉 Olivera, H. G.

B

巴卡拉克 Bacharach, M. O. L.
 巴林特 Bélint, J.
 巴罗 Barro, R. J.
 巴乌尔 Bauer, T.
 鲍洛绍 Balassa, A.
 鲍莫尔 Baumol, W. J.
 贝尔斯利 Belsley, D. A.
 贝雪蒂扬 Berettyán, L.
 贝伦德 Berend, T. I.
 贝纳希 Benassy, J. P.

本策尔 Bentzel, R.
 布克塔 Bükta, L.
 布兰森 Branson, W. H.
 布雷奇林 Brechling, F. P. R.
 布雷特纳 Breitner, M.
 布利策尔 Blitzer, C. R.
 布鲁斯 Brus, W.
 布罗迪 Bródy, A.
 博格纳 Bognár, J.

C

楚耶尔 Culver, A. J.

D

戴 Day, R. H.
 戴阿克 Deák, A.
 丹尼尔 Daniel, Zs.
 德雷奇斯勒 Drechsler, L.
 德雷琴 Drecin, J.
 德雷泽 Dréze, J.
 迪布罗 Debrec, G.
 蒂马 Timár, J.
 蒂马尔 Timár, M.
 迪特 Déter.
 多兰 Dolan, E. G.

E

厄赛克 Ersek, T.

F

法布里 Fábris, E.

法卡斯 Farkas, K.
法卢什一西克拉 Palus-Szikra, K.
费尔普斯 Phelps, E. S.
费凯太 Fekete, Gy.
菲利普斯 Phillips, A. W.
弗 盖 Ferge, Zs.
弗里德曼 Friedman, M.
弗里斯 Friss, I.
弗里希 Frisch, R.
福卢韦吉 Faluvesgi, L.
福纳尔 Fonai, S.

G

高 多 Gadó, O.
戈德菲尔德 Goldfeld, S.
戈德曼 Goldmann, J.
戈 登 Gordon, D. P.
格拉夫 Graaf, J. de V.
格拉斯曼 Grassman, S.
格兰蒙特 Grandmont, J. M.
格利里奇斯 Griliches, Z.
格 林 Green, H. A. J.
格罗夫斯 Groves, T.
格罗斯曼 Grossman, H. I.
古斯塔夫森 Gustafson, J. R.

H

哈 恩 Hahn, F. H.
哈尔莫斯 Halmos, B.
哈格麦耶 Hagelmayer, I.
哈罗德 Harrod, R.
哈斯曼 Harsman, B.
哈耶克 Hayek, A. F.
海格迪什 Hegedüs, A.
海格迪什 Hegedüs, Zs.
海坦尼 Hetényi, I.
海因斯 Hynes, A.

汉奇斯 Hankiss, E.
汉 森 Hansen, B.
豪伊特 Howitt, P. W.
赫希曼 Hirschman, A. O.
黑 尔 Hale, J.
黑 尔 Hare, P.
亨德森 Henderson, J. M.
胡 萨 Huszár J.
胡斯蒂 Huszti, E.
怀尔斯 Wiles, P.
霍尔特 Holt, C. C.
霍夫曼 Hoffmann, L.
霍华德 Howard, D.
霍 奇 Hoch, R.

J

杰斯沃尔 Jaiswal, N. K.
加博尔 Gábor, R. I.
加尔布雷思 Galbraith, J. K.
加拉希 Galasi, P.
加 奇 Gács, J.

K

卡尔多 Kaldor, N.
卡尔奎斯特 Karlquist, A.
卡拉卡斯 Karakas, L.
卡莱茨基 Kalecki, M.
卡皮特尼 Kapitány, Zs.
凯恩斯 Keynes, J. M.
凯 夫 Cave, M.
凯 勒 Koehler, W.
考 克斯 Cox, D. R.
考 里 Kouri, P.
科 尔 内 Kornai, J.
克 克拉克 Clark, P. B.
克雷洛克 Kleintrock, L.
克里茨曼 Kritzman, L. N.
克洛沃 Clower, R.

科瓦茨 Korács, J.
克韦什 Köves, P.
肯拉德 Konrad, Gy.
库 巴 Koubá, K.
库 珀 Cooper.
库塔斯 Kutas, J.
匡 特 Quandt, R. E.

L

拉丹尼 Ladanyi, J.
拉德纳 Radner, R.
拉德诺蒂 Radnóti, E.
拉 基 Laki, M.
拉 潘 Lapan, H.
拉斯里特 Laslett, P.
莱德勒 Laidler, R. E. W.
莱荣霍夫德 Leijonhufvud, A.
莱亚德 Layard, R.
兰开斯特 Lancaster, K. J.
朗西曼 Runciman, W. G.
劳埃德 Lloyd, E. H.
里 茨 Riesz, M.
里姆勒 Rimler, J.
李普曼 Lippman, S. A.
利普塔克 Lipták, T.
利 思 Leith, C.
利斯卡 Liska, T.
李特尔 Little, I. M. D.
列昂惕夫 Leontief, W.
列 宁 Lenin, V. I.
林德贝克 Lindbeck, A.
卢森堡 Luxemburg, R.
伦德伯格 Lundberg, E.
伦德奎斯特 Lundquist, L.
罗宾逊 Robinson, J.
罗尔斯 Rawls, J.
洛 科 Lacké, M.
罗 曼 Román, Z.

罗斯柴尔德 Rothschild, M.

M

马 顿 Marton, Á.
马加什 Mátyás, Á.
马克思 Marx, K.
马库什 Márkus, M.
马林沃德 Malinvaud, E.
马诺韦 Manove, M.
马特森 Mattsson, L-G.
马托什 Martos, B.
马谢克 Marschak, J.
麦卡弗蒂 McCafferty, S.
麦考尔 McCau, J. J.
马克卢普 Machlup, F.
迈杰里 Megyeri, E.
曼 契 Manchin, Gy.
曼德尔 Mandel, M.
毛谢奇 Mausecz, Zs.
蒙 德 Mauder, W. P.
米尔莱斯 Mirrless, J. A.
米哈伊 Mihályi, P.
米 香 Mishan, E. J.
莫多万 Moldován, T.
莫 兰 Moran, P. A. P.

N

纳戈尔斯基 Nagorski, A.
纳 吉 Nagy, M.
纳 吉 Nagy, T.
奈迈什 Nemes, F.
内迈特 Németh, L.
内维特 Nevitt, A. A.
尼尔什 Nyers, R.
尼凯多 Nikaido, H.
努 森 Nnudsen, N. C.
诺德豪斯 Nordhaus, W. D.
诺维斯拉夫 Novozhilov, V. V.

P

帕金 Parkin, J. M.
 帕洛斯 Pálos, J.
 帕尼茨基 Párnaczky, G.
 帕潘德里欧 Papandreu, A. G.
 佩特 Péter, Gy.
 佩廷金 Patinkin, D.
 彭格拉奇 Pongrácz, L.
 平特 Pintér, T.
 波蒂斯 Portes, R.
 波兰尼 Polányi, K.
 普雷科帕 Prékopa, A.
 普约尔 Pryor, F. L.

Q

奇干 Chikán, A.
 奇科什-纳吉 Csikós-Nagy, B.

S

萨博 Szabó, B.
 萨博 Szabó, K.
 萨科察伊 Szakolczai, Gy.
 萨洛伊 Szalai, S.
 萨默森 Samuelson, P. A.
 萨默伊 Szamuely, L.
 萨伊 Say, J.-S.
 塞莱尼 Szelenyi, I.
 桑顿 Thornton, J.
 沙克尔 Shackle, G. L. S.
 山德尔 Ysander, B. O.
 施米特 Schmidt, A.
 史密斯 Smith, W. L.
 施瓦茨 Schwartz, B.
 施维达乌尔 Schwödiauer, G.
 斯拉法 Straffa, P.
 斯拉茨基 Slutzky, E. E.
 斯尼卡斯 Snickars, F.

斯塔尔 Stahl, T.
 斯通 Stone, R.
 斯文森 Svensson, L. E. O.

T

塔多斯 Tardos, M.
 塔诺伊 Tarnóyi, G.
 泰勒 Taylor, L.
 陶洛什 Tauós, Gy.
 托宾 Tobin, J.

W

瓦尔拉斯 Walras, L.
 韦布尔 Weibull, J. W.
 韦茨曼 Weitzman, M. L.
 温采 Vincze, I.
 温格瓦斯基 Unvárszki, M.
 文斯 Vince, P.
 温特 Winter, D.

X

希尓 Heal, G. M.
 希尔弗丁 Hilferding, R.
 希克斯 Hicks, J. R.
 西蒙 Simon, H. A.
 西蒙诺维茨 Simonovits, A.
 西托夫斯基 Scitovsky, T.
 西文 Siven, C. H.
 肖 Shaw, J. A.
 肖欧什 Soós, K. A.

Y

亚诺什 Janossy, F.
 亚沃卡 Jávorka, E.
 伊莱什 Iulles, J.
 伊特维尔 Eatwell, J.
 伊万 Iván, A. P.
 尤哈斯 Juhász, A.

约 翰 John, E.

约翰森 Johansen, L.

Z

泽尔内 Zellner, A.

扎菲尔 Zafir, M.

张伯伦 Chamberlin, E. H.

● 考 文 献

The list of references uses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Bp = Budapest, KJK =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Publishing House in Economics and Law), and UP = University Press.

In some cases the first edition of a work has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ater edition used in the present book. In such cases the date of the first edition is shown in parentheses. All other data, i.e.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s name, and finally the second date, refer to the later edition used in the present book.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rticles or books written in Hungarian appears in parenthes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work.

Allardt, E. (1973) *About Dimensions of Welfare*, mimeo.,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Andersson, Å. E. (1978)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Consumer Theory", see Å. Karlquist, L. Lundquist, F. Snickars, J. W. Weibull, eds. (1978), pp. 25-45.

Andersson, Å. E. and A. Holmsberg, eds. (1977)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oston: Ballinger.

Andorka, R. and J. Illés (1974) "A társadalomstatisztikai rendszer kidolgozásának kérdései"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elaboration of a system of social statistics), *Statisztikai Szemle*, 52, 62-77.

Anis, A. A. and E. H. Lloyd (1975) *Stochastic Reservoir Theory: An Outline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as Understood by Applied Probabilists*, mimeo., Laxenburg: IIASA.

Arrow, K. J.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63.

Arrow, K. J. and G. Debreu (1954)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 265-290.

Arrow, K. J. and F. Hahn (1971)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Arrow, K. J. and T. Scitovsky, eds. (1969) *Readings in Welfare Economics*, London: Allen Unwin.

Árvay, J. (1973) *Nemzeti termelés, nemzeti jövedelem, nemzeti vagyon* (National product, national income, national wealth), Bp: KJK.

Augusztinovics, M. (1963) *Pénzügyek a szocializmusban* (Finances under socialism), Bp: KJK.

Augusztinovics, M., ed. (1979) *Népgazdasági modellek a tárolati tervezésben* (Economy-wide models for long-term planning), Bp: KJK.

Balassa, A. (1979) *A magyar népgazdaság tervezésének elvi alapjai*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Hungarian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Bp: KJK.

Bálint, J., ed. (1970) *A népgazdaság irányítási rendszere* (The system of economic management), Bp: KJK.

Barro, R. J. and H. I. Grossman (1971) "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82-93.

Barro, R. J. and H. I. Grossman (1974) "Suppressed Inflation and the Supply Multiplier",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87-104.

Barro, R. J. and H. I. Grossman (1976) *Money,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Bauer, T. (1973) "Kornai, János: *Anti-equilibrium* - A gazdasági rendszerek elméleteiről és a kutatás feladatairól" (Kornai, János: *Anti-equilibrium* - On economic systems theory and the tasks of research - Book review), *Magyar Tudomány*, 18, 129-132.

Bauer, T. (1975a) "A vállalatok ellenállásos helyzete a magyar gazdasági mechanizmusban"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T. Bauer (1978)), *Közgazdasági Szemle*, 22, 725-735.

Bauer, T. (1975b) *Overinvestment, Growth Cycle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some CMEA Countries*, mimeo., Bp: Institute of Economic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auer, T. (1977) *A beruházási szinten a közvetlen tervezőkodásban*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in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mimeo., Bp: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Bauer, T. (1978) "The Contradictory 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under the New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Coexistence*, 13, 65-80.

Baumol, W. J. (1977) "Say's (at Least) Eight Laws, or What Say and James Mill May Really Have Meant", *Economica*, 44, 145-162.

Belsey, D. A. (1969) *Industry Production Behavior: the Order-Stock Distinction*, Amsterdam: North-Holland.

Benassy, J. P. (1974) "Disequilibrium-elmélet" (Disequilibrium theory), *Sigma*, 7, 135-163, 241-270.

Benassy, J. P. (1975) "Neo-Keynesian Disequilibrium Theory in a Monetary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87-104.

Benassy, J. P. (1977) "On Quantity Signal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ffective Demand Theor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147-168.

Benassy, J. P. (1978) "A Neo-Keynesian Model of Price and Quantity Determination in Disequilibrium", see G. Schwödiauer ed. (1978), pp. 511-544.

Berend, T. I. (1974) *A szocialista gazdaság fejlődése Magyarországon 1945-1968*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of Hungary, 1945-1968), Bp: Kossuth-KJK.

Berettyán, L. and J. Tímár (1963) "Magyarország munkaerőhelyzete 1961 és 1971 között" (Labor situation in Hungary between 1961 and 1971), *Közgazdasági Szemle*, 10, 1257-1270.

Blitzer, C. R., P. B. Clark and L. Taylor, eds. (1975) *Economy-Wide Models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London: Oxford UP.

Bognár, J., M. Riesz and Á. Schmidt (1976) *A költségvetés meghitelezésének néhány monetáris összefüggése* (A few monetary interrelations in the financing of the budget), mimeo., Bp: Pénzügykutatási Intézet.

Branson, W. H. (1972) *Macro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Row.

Breitner, M. (1976) "Lakáspolitikánk kérdőjelei" (A few questions of Hungarian housing policy), *Valóság*, 19, no. 12, 31-41.

Bródy, A. (1964) *Az ágazati kapcsolatok modellje* (The input-output model), Bp: Akadémiai Kiadó.

Bródy, A. (1967) "Gazdasági növekedésünk útja 1924-től 1965-ig"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Hungary from 1924 to 1965), *Közgazdasági Szemle*, 14, 417-431.

Bródy, A. (1969) *Érték és váratermelés*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A. Brody (1970)), Bp: KJK.

Bródy, A. (1970) *Proportions, Prices and Plann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Bródy, A. (1980) *Ciklus és szabályozás* (Cycle and control), under publication, Bp: KJK.

Brus, W. (1964) *Ogólne problemy funkcjonowania gospodarki socjalistycznej*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Warszawa: PWN.

Bukta, L. (1974) "A decentralizált szféra beruházási döntései"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the decentralized sector), *Közgazdasági Szemle*, 21, 23-35.

Chamberlin, E. H. (1933)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6.

Chikán, A. (1977) "Vállalati vélemények a tartalékolási magatartásról" (Opinions of firms about behavior regarding reserves), *Sigma*, 10, 167-184.

Chikán, A., E. Fábi and M. Nagy (1978) *Készletek a gazdaságban*, (Stocks in the economy), Bp: KJK.

Clower, R. (1965) "The Keynesian Counter-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see F. H. Hahn, and F. P. R. Brechling, eds. (1966).

Cooper, M. H. and A. J. Culyer, eds. (1973) *Health Econom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Cox, D. R. and W. L. Smith (1961) *Queues*, London: Methuen.

Csikós-Nagy, B. (1974) *Szocialista árelmélet és árpolitika*,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B. Csikós-Nagy, (1975b)), Bp: Kossuth.

Csikós-Nagy, B. (1975a) "Adalekok az inflációelmélethez" (Contributions to inflation theory), *Közgazdasági Szemle*, 22, 564-575.

Csikós-Nagy, B. (1975b) *Socialist Price Theory and Price Policy*, Bp: Akadémiai Kiadó.

Csikós-Nagy, B. (1978a) "Tizéves a magyar gazdasági reform"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B. Csikós-Nagy (1978b)), *Közgazdasági Szemle*, 25, 10-15.

Csikós-Nagy, B. (1978b) "Ten Years of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New Hungarian Quarterly*, 70, 31-37.

Daniel, Zs. (1977a)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and Social Welfare", *Acta Oeconomica*, 19, 149-164.

Daniel, Zs. (1977b) "Lakáspolitika, lakbér, lakáshiány" (Housing policy, rents, and the housing shortage), *Valóság*, 20, no. 12, 93-100.

Daniel, Zs. (1978) *A lakáselosztás elemzése és modelllezése - Első részbeszámoló a kutatás állásáról és néhány problémájáról* (Analysis and modelling of the distribution of dwellings - A first and partial report on the state of research and some of its problems), mimeo., Bp: Tervgazdasági Intézet.

Day, R. H. and T. Groves, eds. (1975) *Adaptive Economic Mode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Deák, A. (1972a) *Állami pénzügyi befolyásolás, preferenciák és diszpreferenciák* (Central financial influence, preferences and dispreferences), mimeo., Bp: Pénzügyminiszterium.

Deák, A. ed. (1972b) *Pénzügyi megkülönboztetések rendszere* (System of financial differentiation), mimeo., Bp: Pénzügyminiszterium.

Deák, A. (1975) "A vállalatok beruházási döntési lehetőségeiről" (The firm's role in investment decisions), *Közgazdasági Szemle*, 22, 97-103.

Deák, A. (1978a) "Vállalati beruházási döntések és a gazdaságosság"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A. Deák, (1978b)), *Gazdaság*, 12, no. 1, 17-36.

Deák, A. (1978b) "Enterprise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in Hungary", *Acta Oeconomica*, 20, 63-82.

Debreu, G. (1959) *Theory of Value*, New York: Wiley.

Dolan, E. G. (1976) "An Experimental Polycentric Model of the Soviet Economy", see J. Thornton, ed. (1976).

Drechsler, L. (1966) *Eriékbeni mutatószámok nemzetközi összehasonlításának módszertana*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value index numbers), Bp: KJK.

Drechsler, L. (1974) *Az életszínvonal mérése és mérhetősége* (The measurement and measurability of living standards), Bp: Statisztikai Kiadó.

Drecin, J. and I. Hetényi (1970) "Growth Rate and Major Proportions of the Fourth Hungarian Five-Year Plan (1971-75)", *Acta Oeconomica*, 5, 173-192.

Dreze, J. (1975) "Existence of an Exchange Equilibrium under Price Rigidit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6, 301-320.

Ehrlich, E. (1967)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by Indicators Expressed in Physical Units and Per Capita National Income", *Acta Oeconomica*, 2, 107-148.

Ehrlich, E. (1968) "Nemzeti jövedelmek dinamikus nemzetközi összehasonlítása naturális mutatókkal"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national income over time using physical indicators), *Közgazdasági Szemle*, 15, 191-212.

Ellman, M. J. (1979) *Full Employment - Lessons from State Socialism*, Leiden-Antwerp: Stenfert Kroese.

Emery, F. E., ed. (1969) *Systems Think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Erdős, P. (1966) *Adalékok a mai tökés pénz, a konjunkturaingadozások és a gazdasági válságok elméletehez*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P. Erdős (1971)), Bp: KJK.

Erdős, P. (1971)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Money, Business Fluctuations and Crises*, Bp: Akadémiai Kiadó.

Erdős, P. (1976) *Bér, profit, adózás* (Wages, profit, taxation), Bp: KJK.

Erdős, T. (1977) "A profit nagyságának meghatározottságáról a 'tiszta kapitalizmusba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level of profit in "pure-capitalism"), *Közgazdasági Szemle*, 24, 1169-1182.

Erdős, T. (1978) "Profitmagyság a mai kapitalizmusban" (The level of profi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özgazdasági Szemle*, 25, 204-217.

Ersek, T. (1976) "Az árrendszer jövedelem- és fogyasztás-szabályozó szerepérol" (The price system as a regulator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Pénzügyi Szemle*, 20, 263-275.

Fábri, E. (1973) "A vállalatok közötti kapcsolatok és erőviszonyok" (Linkages and power relations among firms), *Közgazdasági Szemle*, 20, 1011-1021.

Falus-Szikra, K. (1974a) "A gazdasági versenyrol",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K. Falus-Szikra (1974b)), *Közgazdasági Szemle*, 21, 275-289.

Falus-Szikra, K. (1974b) "On Economic Competition", *Acta Oeconomica*, 13, 49-64.

Falus-Szikra, K. (1975) *A termelékenység és hajtóerői* (Productivity and its driving forces), Bp: Kossuth.

Falus-Szikra, K. (1978) "A bér és a bérén kívüli tényezők szerepe a munkaerő álllokációjában" (Role of wage and nonwage factors in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Közgazdasági Szemle*, 25, 257-274.

Faluvégi, L. (1976)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Regulators and the New Hungarian Five-Year Plan", *Acta Oeconomica*, 16, 19-34.

Faluvégi, L. (1977) *Allami pénzügyek és gazdaságirányítás* (State finances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Bp: KJK.

Farkas, K. (1976) *Készlet és adaptáció - Készletfolyamatok a népgazdaság különböző szintjein* (Stock and adaptation - Stock adjustment processes at various levels of the economy), mimeo., Bp: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Fekete, Gy. (1973) "A távlatilag várható munkaerőhelyzet és a vállalatok magatartása" (The labor situation expected in the long-run and firms' behavior), *Munkaügyi Szemle*, 17, appendix no. 1-2, 1-14.

Ferge, Zs. (1975a) "Társadalompolitika, szociálpolitika és a központositott ujraelosztás típusai"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Zs. Ferge (1975b)), *Közgazdasági Szemle*, 22, 709-724.

Ferge, Zs. (1975b) "Societal Policy, Social Policy and Types of Centralized Redistribution", *Acta Oeconomica*, 15, 55-75.

Ferge, Zs. (1978) "Keresetek, jövedelem, adózás" (Earnings, income, taxation), *Valóság*, 21, no. 3, 27-41.

Fonál, S. (1973) "Építőipari kapacitás és piac" (The capacity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market), *Közgazdasági Szemle*, 20, 183-194.

Friedman, M. (1953)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iedman, M.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1-18.

Friedman, M. (1975) *Unemployment versus Inflation*, London: IEA.

Friedman, M. (1977a) *From Galbraith to Economic Freedom*, London: IEA.

Friedman, M. (1977b) "Nobel Lecture: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451-472.

Friedman, M., F. A. Hayek et al. (1974) *Inflation: Causes, Consequences, Cures*, London: IEA.

Frisch, R. (1936) "Annual Survey of General Economic Theory: The Problem of Index Numbers", *Econometrica*, 4, 1-38.

Frisch, R. (1974) *Kvantitativ és dinamikus közigazdaságtan* (Quantitative and dynamic economics), Bp: KJK.

Friss, I., ed. (1962) *A Magyar Tudományos Akadémi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ének Évkönyve* (Yearbook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III. 1960–1961, Bp: KJK.

Friss, I., ed. (1971)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Bp: Akadémiai Kiadó.

Friss, I., ed. (1976a) *Gazdaságpolitikánk tapasztalatai és tanulságai (1957–1960)*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Hungarian economic policy (1957–1960)), Bp: Kossuth.

Friss, I. (1976b) "Gazdaságpolitikai tanulságok" (Lessons of economic policy), see I. Friss, ed. (1976a).

Gábor, R. I. (1979) "A második (másodlagos) gazdaság" (The second (secondary) economy), *Valóság*, 22, no. 1, 22–36.

Gábor, R. I. and P. Galasi (1978) *A magángazdasági tevékenység a mai szocialista gazdaságban* (Private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present-day socialist economy), mimeo., Bp: Marx Károly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Egyetem.

Gács, J. (1976) "Hiány és támogatott fejlesztés (Tendenciák az építőanyagipar irányításának történetében)" (Shortage and subsidised development: Tendencies in the history of management of the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Közgazdasági Szemle*, 23, 1043–1060.

Gács, J. and M. Lackó (1973) "A Study of Planning Behaviour on the National-Economic Level", *Economics of Planning*, 13, 91–119.

Gács, J. and M. Lackó (1974) "A népgazdasági szintű tervezési magatartás vizsgálata" (Hungarian text of J. Gács and M. Lackó, (1973)), *Közgazdasági Szemle*, 21, 257–274.

Gadó, O., ed. (1972)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Bp: Akadémiai Kiadó.

Gadó, O. (1976a) *Közgazdasági szabályozó rendszerünk 1976-ban*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O. Gadó (1976b)), Bp: Kossuth.

Gadó, O. (1976b)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How it Works in 1976*, Bp-Leyden: Akadémiai Kiadó-Sijthoff.

Galbraith, J. K. (1967)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Mifflin.

Galbraith, J. K. (1970) *Az új ipari állam* (Hungarian translation of J. K. Galbraith (1967)), Bp: KJK.

Galbraith, J. K. (1973)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 Boston: Houghton-Mifflin.

Goldfeld, S. and R. Quandt (1973) "Estimation in a Disequilibrium Model and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3, 325–438.

Goldmann, J. (1977) *A makroökonomiai elemzés és előrejelzés* (Macroeconomic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Bp: KJK.

Goldmann, J. and K. Kouba (1969) *Economic Growth in Czechoslovakia*, Prága: Academia.

Goldmann, J. and K. Kouba (1970) *Bevézetés a szocialista gazdaság növekedési elméletébe* (Hungarian translation of J. Goldmann and K. Kouba (1969)), Bp: KJK.

Gordon, D. F. and A. Hynes (1970) "On the Theory of Price Dynamics", see E. S. Phelps, ed. (1970a).

Graafland, J. de V. (1957) *Theoretical Welfare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Grandmont, J. M. (1977) "The Logic of the Fix-Price Method",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169–186.

Green, H. A. J. (1976) *Consumer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Griliches, Z. (1968) "Hedonic Price Indexes for Automobiles: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Quality Change", see A. Zellner, ed. (1968).

Griliches, Z., ed. (1971) *Price Indexes and Quality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Gustafsson, J. R., B. Härsman and F. Snickars (1977) "Intraregional Migration and the Housing Market", see Å. E. Andersson and A. Holmsberg, eds. (1977), pp. 267–306.

Hagelmayer, I. (1976) "Költségvetési szüffit és deficit a szocialista gazdaságban" (Budget surpluses and deficits in the socialist economy), *Pénzügyi Szemle*, 20, 412–418.

Hahn, F. H. and F. P. R. Brechling, eds. (1966)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London: Macmillan.

Hale, J. (1969)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New York: Wiley.

Halmos, B. (1977) "Több kisebb lakást vagy kevesebb nagy lakást" (More smaller flats, or fewer larger ones), *Valóság*, 20, no. 5, 71-77.

Hankiss, E. (1978) "Változatok a korrupcióra" (Variations on corruption), *Valóság*, 21, no. 6, 56-73.

Hankiss, E. and Gy. Manchin (1976) "Szempontok az élet 'minőségének' szociológiai vizsgálatához" (Points to consider in the soc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Valóság*, 19, no. 6, 20-34.

Hansen, B. (1951) *A Study in the Theory of Infl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Hayek, A. F. (1944) *Der Weg zur Knechtschaft*,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6.

Heal, G. M. (1973)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lann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Hegedűs, A. and M. Márkus (1978) "A kisvállalkozó és a szocializmus" (The small entrepreneur and socialism), *Közgazdasági Szemle*, 23, 1076-1096.

Hegedűs, Zs. and M. Tardos (1974) "A vállalati vezetők helyzetének és motivációjának néhány problémája" (A few problems of the situation and motivation of managers of firms.), *Közgazdasági Szemle*, 21, 162-173.

Henderson, J. M. and R. E. Quandt (1958) *Micro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Hetényi, I. (1976) "Growth and Equilibrium in the Fifth Five-Year Plan of Hungary for the Years 1976-1980", *Acta Oeconomica*, 16, 5-18.

Hicks, J. R. (1937)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5, 147-159.

Hicks, J. R. (1939a) *Value and Capital*, Oxford: Clarendon.

Hicks, J. R. (1939b) *Erték és tőke* (Hungarian translation of J. R. Hicks (1939a)), Bp: KJK, 1978.

Hicks, J. R. (1965) *Capital and Growth*, Oxford: Clarendon.

Hicks, J. R. (1974a) *The Crisis in Keynesian Economics*, Oxford: Blackwell.

Hicks, J. R. (1974b) *A keynesi gazdaság tőlője* (Hungarian translation of J. R. Hicks (1974a)), Bp: KJK, 1978.

Hilferding, R. (1910)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Berlin: Dietz, 1947.

Hirschman, A. O.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P.

Hirschman, A.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Harvard UP.

Hoch, R. (1962) "Az indifferencia felületekről szóló tanítás elméleti alapjainak bírálata" (Criticism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indifference curves) see L. Fria, ed. (1962).

Hoch, R. (1972) *Fogyasztás és ár*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R. Hoch, 1979), Bp: KJK.

Hoch, R. (1977) "Fogyasztáspolitikánk elméleti alapjaihoz" (To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Hungarian consumption policy), *Társadalmi Szemle*, 33, no. 9, 13-27.

Hoch, R. (1978) "További gondolatok a nemzeti vagyon fejlesztéséről és összetételeiről"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osition of national wealth) *Gazdaság*, 12, no. 4, 44-56.

Hoch, R. (1979) *Consumption and Price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Bp-Alphen: Akadémiai Kiadó - Sijthoff and Nordhoff.

Hoch, R., E. John and J. Timár (1975) "Távlati fogyasztáspolitikánk cél- és eszközrendszere" (The aims and means of Hungarian long-term consumption policy), *Gazdaság*, 9, no. 1, 61-72.

Hoffmann, J. (1977) *A magyar háztartások gazdálkodási modellje* (A model of the Hungarian household sector), Bp: KJK.

Holt, C. C. (1970) "Job Search, Phillips' Wage Relation, Union Influence", see E. S. Phelps, ed. (1970a).

Howard, D. (1976) "The Disequilibrium Model in a Controlled Economy: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Barro-Grossman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 871-879.

Howitt, P. W. (1978) "The Qualitative Effects of False Trading" see G. Schwödiauer, ed. (1978), pp. 453-462.

Huszár, J. and M. Mandel (1975) "A beruházási rendszer működésének néhány tapasztalata" (A few experiences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vestment system), *Körgazdasági Szemle*, 22, 1387–1395.

Huszti, E. (1971) *Vállalati és népgazdasági pénzfolyamatok* (Financial processes in the firm and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Bp: KJK.

Iván, A. P. (1975) "Foglalkoztatáspolitikáról" (Hungarian employment policy), *Gazdaság*, 9, no. 2, 37–47.

Jaiswal, N. K. (1968) *Priority Queu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Jánossy, F. (1963) *A gazdasági fejlődés mérhetősége és új mérési módszere* (The measurability of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new method for its measurement), Bp: KJK.

Jánossy, F. (1966) *A gazdasági fejlődés trendvonalai és a helyreállítási periódusok* (The trend l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periods), Bp: KJK.

Jánossy, F. (1969) "Gazdaságunk mai ellentmondásainak eredete és felszámolásuk utja"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F. Jánossy, (1970)), *Körgazdasági Szemle*, 16, 806–829.

Jánossy, F. (1970) "The Origins of Contradictions in Our Economy and the Path to Their Solution",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4, 357–390.

Jávorka, E. (1973) *Arak és jövedelmek* (Prices and incomes), Bp: Kossuth.

Johansen, L. (1977)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 Planning, I. General Aspect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Juhász, A. (1978) "Szervezés és készletgazdálkodás" (Organization and stock control), *Népszabadság*, 36, no. 299, 20 December, 10.

Kaldor, N. (1960a) *Essays on Value and Distribution*, London: Duckworth.

Kaldor, N. (1960b) *Essays on Economic Stability and Growth*, London: Duckworth.

Kaldor, N. (1972) "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82, 1237–1255.

Kalecki, M. (1964)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London: Allen & Unwin.

Kalecki, M. (1970) "Theories of Growth in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Scientia*, 40, 1–6.

Kalecki, M. (1972) *Selecte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cialist and Mixed Econom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Karakas, L. (1976) "Az V. ötéves terv munkaerőgazdálkodási feladatai" (Managing the labor force in the fifth five-year plan), *Társadalmi Szemle*, 31, 15–23.

Karlquist, A., L. Lundquist, F. Snickars and J. W. Weibull, eds. (1978) *Spatial Interaction Theory and Planning Model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Keynes, J. M. (1936a)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61.

Keynes, J. M. (1936b) *A foglalkoztatás, a kamat és a pénz általános elmélete* (Hungarian translation of J. M. Keynes (1936a)), Bp: KJK, 1965.

Kleinrock, L. (1976) *Queueing Systems*, vol. II, New York: Wiley.

Knudsen, N. C. (1972) "Individual and Social Optimization in a Multi-Server Queue with a General Cost-Benefit Structure", *Econometrica*, 40, 515–528.

Koehler, W. (1938) "Closed and Open Systems", see F. E. Emery, ed. (1969).

Konrád, Gy. and I. Szelenyi (1969) "A lakáselosztás szociológiai kérdései" (Soci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dwellings), *Valóság*, 12, no. 8, 28–39.

Kornai, J. (1957) *A Gazdasági vezetés tulzott központosítása*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J. Kornai (1959)), Bp: KJK.

Kornai, J. (1958) "Kell-e korrigálni a nyereségrézszesedést?" (Is profit sharing to be corrected?), *Körgazdasági Szemle*, 5, 720–734.

Kornai, J.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London: Oxford UP.

Kornai, J. (1971a) *Anti-Equilibrium*, Bp: KJK.

Kornai, J. (1971b) *Anti-Equilibriu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Kornai, J. (1972a) *Erőltetett vagy harmonikus növekedés* (Hungarian text of J. Kornai (1972b)), Bp: Akadémiai Kiadó.

Kornai, J. (1972b) *Rush versus Harmonic Growth*, Amsterdam: North-Holland.

Kornai, J. (1973) *A gazdasági szerkezet matematikai tervezése*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J.

Kornai (1975a)), Bp: KJK.

Kornai J. (1974) *Az adaptáció csikorgó gépeire* (The creaking machinery of adaptati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Déák, K. Farkas, M. Lackó and A. Simonovits, mimeo., Bp: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Kornai, J. (1975a) *Mathematical Planning of Structural Decision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Kornai, J. (1975b) "A hiány méréséről"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J. Kornai (1976b)), vol. 53, 1208–1229.

Kornai, J. (1976a) "A gazdasági viselkedés normái és a norma szerinti szabályozás" (Norms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control by norms), *Közgazdasági Szemle*, 23, 1–14.

Kornai, J. (1976b) "The Measurement of Shortage", *Acta Oeconomica*, 16, 321–344.

Kornai, J. and T. Lipták (1962) "Kétszintű tervezés: Játékelméleti model és iteratív számítási eljárást népgazdasági távlati tervezési feladatok megoldására" (Two-level planning: A game theory model and an iterative computational method for the solution of long-term planning problems), *MTA Matematikai Kutató Intézetének Közleményei*, 7, 577–621.

Kornai, J. and T. Lipták (1965) "Two-Level Planning", *Econometrica*, 33, 141–169.

Kornai, J. and B. Martos (1971) "Gazdasági rendszerek vegetatív működése" (Vegetative functioning of economic systems), *Szigma*, 4, 34–50.

Kornai, J. and B. Martos (1973) "Autonomous Functioning of the Economic System", *Econometrica*, 41, 509–528.

Kornai, J. and B. Martos, eds. (1979a) *Szabályozás árjelzések nélkül*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J. Kornai and B. Martos, eds. (1979b)), under publication, Bp: Akadémiai Kiadó.

Kornai, J. and B. Martos, eds. (1979b) *Non-Price Control*, under publication, Bp–Amsterdam: Akadémiai Kiadó–North-Holland.

Kornai, J. and A. Simonovits (1975a) "Szabályozási problémák Neumann-gazdaságokban" (Control problems in Neumann economies), *Szigma*, 8, 81–99.

Kornai, J. and A. Simonovits (1975b) "Rendelés-jelzésen alapuló szabályozás egy Neumann-gazdaságban" (Control based on order signal in a Neumann economy), *Szigma*, 8, 281–289.

Kornai, J. and A. Simonovits (1977a) "Decentralized Control Problems in Neumann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4, 44–67.

Kornai, J. and A. Simonovits (1977b) *Piaci modell* (Model of the market), manuscript, Bp: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Kornai, J. and J. W. Weibull (1977) *The Normal State of the Market in a Shortage Economy: a Queue Model*, mimeo.,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Kornai, J. and J. W. Weibull (1978a) "The Normal State of the Market in a Shortage Economy: A Queue Model",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375–398.

Kornai, J. and J. W. Weibull (1978b) "A piac normál állapota hiánygazdaságban; egy sorbanállási modell" (Hungarian translation of J. Kornai and J. W. Weibull (1978a)), *Szigma*, 11, 1–32.

Kovács, J. (1974) "Teljes foglalkoztatás és munkaerőhiány" (Full employment and labor shortage), *Közgazdasági Szemle*, 21, 796–802.

Kovács, J. (1975) "Az életszínvonal-tervezés konzisztenciafeltételei" (Consistency conditions for planning living standards), *Közgazdasági Szemle*, 22, 60–64.

Kőves, P. and G. Párniczky (1973) *Általános statisztika* (General statistics), Bp: KJK.

Kritsman, L. N. (1925) "Geroichesky Period Velikoy Russkoy Revolyutsiya – Opit Analyza t.n. 'Voyennovo Kommunizma'" (for German translation see L. N. Kritsman (1929)), *Vestnik Kommunisticheskoy Akademii*, no. 9.

Kritsman, L. N. (1929) *Die Heroische Periode der Grossen Russischen Revolution*, Wie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Kutas, J. and Zs. Mausecz (1976) "A nők foglalkoztatottságának és szakképzetségének változása 1970–1990 között" (Change in the employment and qualifications of women, 1970–1990), *Közgazdasági Szemle*, 23, 1153–1162.

Lackó, M. (1975) "Consumer Savings and the Supply Situation", *Acta Oeconomica*, 15, 365-384.

Lackó, M. (1976) "Lakossági megtakarítás és ellátási helyzet" (Hungarian text of M. Lackó (1975)), *Körgazdasági Szemle*, 23, 535-551.

Ladányi, J. (1975) "Fogyasztói árak és szociálpolitika" (Consumer prices and welfare policy), *Valóság*, 18, no. 12, 16-29.

Ladányi, J. (1976) "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változásai, központi és vállalati szociális juttatások, szociálpolitika"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mechanism, central and enterprise fringe benefits, welfare policy), *Valóság*, 19, no. 9, 33-46.

Laidler, R. E. W. and I. M. Parkin (1975) "Inflation - A Survey", *Economic Journal*, 85, 741-809.

Laki, M. (1975) "Versenyhelyzet és vállalati termékszerkezet" (Competitive situation and firms' output structure), *Körgazdasági Szemle*, 22, 382-394.

Laki, M. (1978a) *Év végi hajrá az iparban és a külkereskedelemben*, (The end-of-year rush in industry and foreign trade), mimeo., Bp: Konjunktura és Piackutató Intézet.

Laki, M. (1978b) *Növekedés és rugalmasság* (Growth and flexibility), mimeo., Bp: Szövetkezeti Kutató Intézet.

Lancaster, K. J. (1957) "Revising Demand Theory", *Economica* 24, 354-360.

Lancaster, K. J. (1966) "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132-157.

Lapan, H. (1977a) *Price Changes, Price Uncertaint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n Open Economy*, mimeo.,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Lapan, H. (1977b) *Price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mimeo.,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Laslett, P. and W. G. Runciman, eds. (1967)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Layard, R. ed. (1976) *Cost-Benefit Analysis*, Harmondsworth: Penguin.

Leijonhufvud, A. (1968)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New York: Oxford UP.

Leijonhufvud, A. (1972) *Classnotes on Say's Principle*, mimeo.,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enin, V. I. (1917) "Az imperializmus, mint a kapitalizmus legfelsőbb foka" (Imperialism as the highest form of capitalism), *Lenin Válogatott Művei I. kötet*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 Bp: Kossuth.

Leontief, W. (1953)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919-1939*, New York: Oxford UP.

Leontief, W. (1966) *Input-Output Economics*, New York, Oxford UP.

Leontief, W. (1977) *Tér és gazdaság* (Plan and economy), Bp: KJK.

Lindbeck, A. (1967) "Rent Control and Housing Policy", see A. A. Nevitt, ed. (1967).

Lindbeck, A. (1976)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Open Economies with Endogenous Politici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6,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19.

Lippman, S. A. and J. J. McCall (1976) "The Economics of Job Search", *Economic Inquiry*, 14, 155-189, 347-368.

Liska, T. (1969) "A bérifikáció-kereskedelem koncepciója" (The concept of trade in rented flats), *Valóság*, 12, no. 1, 22-35.

Little, I. M. D. and J. A. Mirrlees (1974) *Project Appraisal and Planning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Heinemann.

Lundberg, E. (1968)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Haven: Yale UP.

Luxemburg, R. (1913)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Berlin: Singer.

Machlup, F. (1960) "Cost Push and Demand Pul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2, 125-139.

Malinvaud, E. (1967) "Decentralized Procedures for Planning" (see E. Malinvaud and M. O. L. Bacharach, eds. (1967)).

Malinvaud, E. (1972) *Lectures on Microeconomic Theor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Malinvaud, E. (1977)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considered*, Oxford: Blackwell.

Malinvaud, E. and M. O. L. Bacharach, eds. (1967) *Activity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d Planning*, London: Macmillan.

Manove, M. (1973) "Non-Price Rationing of Intermediate Good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Econometrica*, 41, 829-852.

Marschak, J. and R. Radner (1972) *Economic Theory of Teams*, New Haven: Yale UP.

Marton, Á. (1976) *Az osztrák és a magyar fogyasztói áropolitika és áralakulása 1945-1972* (Austrian and Hungarian consumer price policy and price movements, 1945-1972), Bp: Akadémiai Kiadó.

Marx, K. (1867-1894a) *A Tőke* (Capital), Bp: Kossuth, 1973-1974.

Marx, K. (1867-1894b) *Capital*,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1-1967.

Mátyás, A. (1973) *A modern polgári közgazdaság tan története* (History of modern bourgeois economics), Bp: KJK.

Maunder, W. F. (1970) *Bibliography of Index Numbers*, London: Athlone.

McCafferty, S. (1977) "Excess Demand, Search, and Price Dyna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228-235.

Megyeri, E. (1976) *Erőforrás-értékelés és jövedelemzabályozás* (Resource evaluation and income regulation), Bp: KJK.

Mihályi, P. (1977) "Történeti szempontok a magyarországi lakáshiány értékeléséhez" (Historical viewpoints for the evaluation of Hungarian housing shortage), *Valóság* 20, no. 5, 48-59.

Mihályi, P. (1978) "Egy tipikus veszteségforrás vagy az ingatlankezelés helyzete Budapesten" (A typical example of waste, or the unsatisfactory maintenance of council houses in Budapest), *Valóság*, 21, no. 2, 87-96.

Mishan, E. J. (1975) *Cost-Benefit Analysis: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Moldován, T. (1977) "Ez a helyzet az autópiac - Interjú Csuri Istvánnal, a Merkur vezérigazgatójaval" (This is the situation of the market of cars - An interview with I. Csuri, general manager of Merkur), BP: Autóselet-Képes Magazin, p. 29.

Moran, P. A. P. (1959) *The Theory of Storage*, London: Methuen.

Nagorski, A. (1978) "Japan vs. the World", *Newsweek*, 42, 17 July, 8-12.

Nagy, T. (1967) "Az ár és a társadalmiag szükséges ráfordítások a szocializmusban" (Price and socially necessary inputs under socialism), *Közgazdasági Szemle*, 14, 141-154.

Nagy, T. and Zs. Esze (1963) "A 'többszatorás' ipari termelői ártípus" (The "multi-channel" type of industrial producer's prices), *Közgazdasági Szemle*, 10, 15-29.

Nemes, F. (1976) *Érdekeltség - magatáras - tartalékok* (Interest - behavior - reserves), Bp: KJK.

Nevitt, A. A., ed. (1967)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Housing*, London: Macmillan.

Nikaido, H. (1975a) "Economic Adjustments under Noncompetitive Pricing", see R. H. Day, and T. Groves, eds. (1975).

Nikaido, H. (1975b)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Effective Dem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P.

Nordhaus, W. D. and J. Tobin (1972) "Is Growth Obsolete?",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vozhilov, V. V. (1926) "Nedostatok Towarow", *Wertnik Finansow*, no. 2.

Nyers, R. (1969a) 25 kérdés és válasz gazdaságpolitikai kérdésekről,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R. Nyers (1969b)), Bp: Kossuth.

Nyers, R. (1969b) *Economic Reform in Hungary: Twenty-five Questions and Answers*, Bp: Pannónia.

Nyers, R. (1978) "Gazdaság és politika kapcsolata a szocialista építésben"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Közgazdasági Szemle*, 25, 27-32.

Okun, A. (1962) "Potential GNP: Its Measurement and Significanc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livera, H. G. (1960) "Cyclical Economic Growth under Collectivism", *Kyklos*, 2, 229–232.

Pálos, I. and T. Pintér (1978) "A kereslet kielégítettségének mérése"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atisfaction of demand), *Kereskedelmi Szemle*, 19, no. 10, 1–5.

Papandreu, A. G. (1972) *Paternalistic Capitalism*, Toronto: Copp Clark.

Patinkin, D. (1965) *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 New York, Harper-Row.

Péter, Gy. (1956) *A gazdaságosság és a jövedelmezőség jelentősége a tervezőgazdálkodásban*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profitability in planned economy), Bp: KJK.

Péter, Gy. (1967) "On the Planned Central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 *Acta Oeconomica*, 2, 23–46.

Phelps, E. S., ed. (1970a)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 New York: Norton.

Phelps, E. S. (1970b) "Money Wage Dynamics and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see E. S. Phelps, ed. (1970a).

Phelps, E. S. ed. (1973) *Economic Justice*, Harmondsworth: Penguin.

Phillips, A. W. (195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Economica*, 25, 283–299.

Polá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inehart.

Polányi, K. (1976) *Az archaikus társadalom és a gazdasági szemlélet* (Archaic society and the economic approach), Bp: Gondolat.

Pongrácz, L. (1976) "Aktuális feladatok a munkaerőgazdálkodásban" (Present tasks in labor force management), *Gazdaság*, 10, no. 3, 62–67.

Portes, R. and D. Winter (1977a) "The Demand for Money and for Consumption Good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0, 8–18.

Portes, R. and D. Winter (1977b) "The Supply of Consumption Good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 351–365.

Portes, R. and D. Winter (1978)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Consumption Goods Market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mime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Prékopa, A., ed. (1965a) *Colloquium on Applications of Mathematics to Economics*, Bp: Akadémiai Kiadó.

Prékopa, A. (1965b) "Reliability Equation for an Inventory Problem and Its Asymptotic Solutions", see A. Prékopa, ed. (1965a), pp. 317–327.

Pryor, F. L. (1977) "Some Costs and Benefits of Markets: An Empirical Stud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1, 81–102.

Radner, R. (1975) "Satisficing",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2, 253–262.

Radner, R. and M. Rothschild (1975) "On the Allocation of Effort",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0, 358–376.

Radnóti, É. (1974) *A kuszo infláció elméleti problémái*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creeping inflation), Bp: KJK.

Radnóti, É. (1978) "Az egyensúlyhiány megfigyelése a fogyasztási cikkek piacán" (The observation of disequilibrium in the market for consumer goods), *Kereskedelmi Szemle*, 19, no. 10, 6–8.

Rawls, J. (1967) "Distributive Justice" (see P. Laslett and W. G. Runciman, eds. (1967)).

Riesz, M. (1964) "A forgalom pénzellátása és a bankhitel" (Money supply and bank credit for trade), *Pénzügyi Szemle*, 8, 457–463.

Riesz, M. (1970) *Pénzforgalom és hitel* (Currency circulation and credit), Bp: Tankönyvkiadó.

Riesz, M. (1976) "A hitel lejáratának elméletéhez" (On the theory of expiration of credit), *Pénzügyi Szemle*, 20, 785–791.

Rimler, J. (1976) *Fejlődéselmezés ökonometriai módszerekkel* (Analysis of growth using econometric methods), Bp: KJK.

Robinson, J. (1933)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61.

Robinson, J. and J. Eatwell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 London: McGraw-Hill.

Román, Z. (1973) *Termelékenységeink az iparban* (Productivity in Hungarian industry), Bp: KJK.

Rothschild, M. (1973) "Models of Market Organization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 Surve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 1283-1308.

Rothschild, M. (1975) "Further Notes on the Allocation of Effort", see R. H. Day and T. Groves, eds. (1975).

Samuelson, P. A. (1945)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5.

Samuelson, P. A. (1948a)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

Samuelson, P. A. (1948b) *Közgazdaságтан* (Hungarian translation of P. A. Samuelson (1948a)), Bp: KJK, 1976.

Schwartz, B. (1975) *Queuing and Wa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wödiauer, G., ed. (1978) *Equilibrium and Disequilibrium in Economic Theory*, Dordrecht: Reidel.

Shackle, G. L. S. (1972)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Shaw, J. A. (1976) "The Theory of Consumer Rationing, Pareto Optimality and the USSR: a Non-Linear Programming Approach", see J. Thornton, ed. (1976).

Simon, H.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99-118.

Simon, H. A. (1959) "Theories of Decision-Making in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9, 253-283.

Siven, C. H. and B. C. Ysander (1973) "Kornai János: Anti-Equilibrium, On Economic Systems Theory and the Tasks of Research" (book review),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75, 315-319.

Shultzky, E. E. (1915) "On the Theory of the Budget of the Consumer",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51, 1-26.

Soós, K. A. (1974) *A beruházási feszültség fennmaradása Magyarországon az új gazdasági mechanizmusban* (Maintaining investment tension in Hungary under the New Economic Mechanism), manuscript, Bp: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Soós, K. A. (1975a) "A beruházások ingadozásának okai a magyar gazdaságban"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K. A. Soós (1975b)), *Közgazdasági Szemle*, 22, 104-111.

Soós, K. A. (1975b) "Causes of Investment Fluctuations in the Hungarian Economy",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14, no. 2, 25-36.

Sraffa, P. (1960a)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3.

Sraffa, P. (1960b) *Áruk termelése áruk révén* (Hungarian translation of P. Sraffa (1960a)), Bp: KJK, 1975.

Stone, R. (1975) *Towards a System of Social and Demographic Statistics*, New York: UN.

Svensson, L. E. O. (1977) *Effective Demand and Stochastic Rationing*, mimeo.,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Szabó, B. (1977) "Vállalati adózatás, nyereségegvonás" (Taxation of firms, deductions from profits), *Valóvág*, 20, no. 8, 91-95.

Szabó, K. (1964) *A szocialista termelés alapjainak* (Basic features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Bp: Kossuth.

Szabó, K., ed. (1975) *A társadalmi tulajdon és a szocialista vállalat* (Social ownership and the socialist firm), Bp: Akadémiai Kiadó.

Szakolczai, Gy. (1973) "Az erőforrások értékelése" (Resource evalua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20, 431-452, 538-554.

Szalai, S., ed. (1972) *The Use of Time*, The Hague: Mouton.

Szamuely, L. (1971) *Az első szocialista gazdasági mechanizmusok*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L. Szamuely (1974)), Bp: KJK.

Szamuely, L. (1974) *First Model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s*, Bp: Akadémiai Kiadó.

Tallós, Gy. (1975a) Bedingungen der Kreditgewährung in der VR Ungarn", *West-Ost-Journal*, 5, 27–28.

Tallós, Gy. (1975b) "A hitelmechanizmus működéséről"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redit mechanism), *Gazdaság*, 9, no. 3, 38–52.

Tallós, Gy. (1976) *A bankhitel szerepe gazdaságirányítási rendszerünkben* (Role of bank credit in the Hungarian system of economic management), Bp: Kossuth.

Tardos, M. (1972) "A gazdasági verseny problémái hazánkban" (Problems of economic competition in Hungary), *Közgazdasági Szemle*, 19, 911–926.

Tardos, M. (1975a) "Vállalati önállóság és központi irányítás"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M. Tardos (1975b)), *Közgazdasági Szemle*, 22, 822–834.

Tardos, M. (1975b) "Enterprise Independence and Central Control", *Acta Oeconomica*, 15, 17–31.

Tarnói, G. (1975) "Hiánycikk és 'feketepiac'" (Shortage goods and the black market), *Valóság*, 18, no. 9, 86–91.

Thornton, J., ed. (1976)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Soviet-Type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Timár, J. (1964) *Munkaerőhelyzetünk jelene és távlatai*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for the Hungarian labor market), Bp: KJK.

Timár, J. (1977a) "Foglalkoztatáspolitikáról és munkaerőgazdálkodásunkról"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J. Timár (1977b)), *Közgazdasági Szemle*, 24, 129–150.

Timár, J. (1977b) "Employment Policy and Labour Economy in Hungary", *Acta Oeconomica*, 17, 123–144.

Timár, M. (1975a) *Gazdaságpolitika Magyarországon 1967–1973*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M. Timár (1975b)), Bp: KJK.

Timár, M. (1975b) *Reflection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ungary 1967–1973*, Bp: KJK.

Tobin, J. (1970a) "On Limiting the Domain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3, 263–277.

Tobin, J. (1970b) "Money and Income: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5, 301–317.

Tobin, J. (1972) "Friedman's Theore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0, 852–863.

Unvárszki, M. (1976) "Felhalmozási és fejlesztési politikánk néhány kérdése 1956–1960-ban" (A few questions on Hungarian accu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in 1957–1960), see I. Friss, ed. (1976a), pp. 95–150.

Vince, P. (1977) "Gazdálkodás és fejlesztés (A Ganz Villamossági Művek példája)"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 Example of the Ganz Electrical Works), *Valóság*, 20, no. 5, 29–36.

Vincze, I. (1971) *Árak, adók, támogatások a gazdaságirányítás reformja után* (Prices, taxes and subsidies after the reform of economic management), Bp: KJK.

Weitzman, M. L. (1977) "Is the Price System or Rationing More Effective in Getting a Commodity to Those who Need it Most?",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8, 517–524.

Wiles, P. (1974) "The Control of Inflation in Hungary, Jan. 1968–June 1973", *Economie Appliquée*, 27, 119–147.

Zafir, M. (1974) A mennyiség és a minőség szerepe a fogyasztás növekedésében" (Role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the growth of consumption), *Statisztikai Szemle*, 52, 115–126.

Zellner, A., ed. (1968) *Readings in Economic Statistics and Econometrics*, Boston: Little, Brown.

术语对照表

Acceptance Constraint 可接受的约束	Hard budget constraint 硬预算约束
Adjustment 调节	Hardness of budget constraint 预算约束硬度
Instantaneous adjustment 瞬时调节	Soft budget constraint 软预算约束
Long-term adjustment 长期调节	Softness of budget constraint 预算约束软度
Short-term adjustment 短期调节	
Administrative price 管理价格	Buyer's market 买方市场
Aggregate excess demand 总量过度需求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Aggregation, aggregates 总量, 总计	Capitalist economy 资本主义经济
Allocation schemes 分配方式	Capitalist system 资本主义制度
Allocation by auction, Walrasian auction scheme 用拍卖方式分配 瓦尔拉斯拍卖方式	Capitalist firm 资本主义企业
Almost-insatiable demand 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	Modern capitalism 现代资本主义
Aspiration level 渴望水平	Post-keynesian Capitalism 后凯恩斯资本主义
Asymmetry 不对称	Classical capitalism 古典资本主义
Attitude 态度	Clower-Barro-Grossman school 克洛尔-巴罗-格罗斯曼学派
Buyer's attitude 买者态度	Complementarity 互补性
Seller's attitude 卖者态度	Consumer surplus, consumer loss 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损失
Bankruptcy, loss, failure 破产、亏损、倒闭	Consumpti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消费、家庭消费
Behavioral regularity, behavioral rules 行为规律性, 行为规则	Contract price 契约价格
Black market, grey market 黑市, 灰市	Control 控制
Budget constraint 预算约束	Control-according to tolerance limit 容忍限度控制
Effectivity of budget constraint 预算约束的有效性	Control-by norms 正常标准控制
	Control-by shortage signals 根据短缺信号控制
	Multilevel control 多级控制

Nonprice control 非价格控制	Expansion drive 扩张冲动
Order-signal control 订货信号控制	Expectation 预期
Stock-signal control 存货信号控制	Export 出口
Vegetative control 植物性控制	External slack 外部滞存
Control by norms 正常标准控制	Failure 倒闭
Control sphere 控制领域	Friedman-Hayek school 弗里德曼-哈耶克学派
Corruption 腐化	Forced adjustment 强制调节, 强制调整
Credit, borrowing 信贷, 借入	Forced saving 强制储蓄
Cycles, cyclical fluctuations, business cycle 周期、周期性波动、商业周期	Forced spending 强制支出
Decision algorithm 决策程序	Forced substitution 强制替代
Delay 延滞	Forced substitution propensity 强制替代倾向
Demand 需求	Foreign trade, Export, Import 对外贸易, 出口, 进口
Aggregate demand 总量需求	Friction 摩擦
Aggregate excess demand 总量过度需求	Friction indicator 摩擦指标
Almost-insatiable demand 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	Friction function, Triple relationship of shortage, slack, and friction 摩擦函数, 短缺、滞存和摩擦间的三者关系
Fictitious demand 虚假需求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一般均衡理论
Notional demand 想象的需求	Hard budget constraint 硬预算约束
Initial demand 初始需求	Hardness of constraints 约束硬度
Revised demand 修正过的需求	Hoarding tendency 囤积倾向
Demand constrained market, 需求约束型市场	Horizontal 横向的、水平的
Demand constrained system 需求约束型体制	Horizontal flow of information, Horizontal relations,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信息横向交流, 横向关系, 横向交流
Demand constraint 需求约束	Import 进口
Demand function 需求函数	Inertia 惯性
Effective price 有效价格	Inflation 通货膨胀
Effectiveness of constraints 约束的有效性	Repressed inflation, Suppressed inflation 被抑制的通货膨胀, 抑制型通货膨胀
Efforts to win over the seller, Corruption 争取卖者所作的努力, 腐化	
Employment 就业	

Initial demand 初始需求	tes 货币主义, 新自由主义, 弗里德曼-哈耶克学派, 弗里德曼主义者
Input stock 投入存货	
Input combination, Choice of technology 投入组合, 工艺选择	
Input-output combination, Input-output structure 投入-产出组合, 投入-产出结构	
Instantaneous adjustment 瞬时调节	
Intensity 强度	
Internal slack 内部滞存	
Investment 投资	
Investment cycles 投资周期	
Investment hunger 投资饥渴	
Investment tension 投资紧张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Keynesian theory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理论	
Keynesian unemployment 凯恩斯式失业	
Keynesians, Keynesianism 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主义	
Labor 劳动	
Labor-reserve 劳动储备	
Labor-shortage 劳动短缺	
Labor-slack 劳动滞存	
Lag, Delay 滞后, 延滞	
Leontief economy 列昂惕夫经济	
Long-term adjustment 长期调节	
Marshallian 马歇尔式	
Marshallian-cross 马歇尔供求表(供求曲线)	
Marxists, Marxism, Marxian 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	
Measurement, Observation 度量、观察	
Mobilizable slack 可动用滞存	
Monetarism, Neoliberalism, Friedman-Hayek school, Friedmani-	
	tes 货币主义, 新自由主义, 弗里德曼-哈耶克学派, 弗里德曼主义者
Money 货币	
Money incentives, Incentives 货币刺激, 刺激	
Moral incentive 精神刺激	
Motivation, Motives, Incentives 动力, 动机刺激	
Multilevel control 多级控制	
Neoclassical theory, standard microeconomics 新古典理论, 一般微观经济学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Nominal wage 名义工资	
Nonmobilizable slack 不可动用滞存	
Nonprice control, Nonprice adjustment 非价格控制, 非价格调节	
Nonprofit institutions 非营利机构	
Norm 正常标准	
Normal 正常的	
Normal friction 正常摩擦	
Normal shortage 正常短缺	
Normal slack 正常滞存	
Normal state, Normal value 正常状态, 正常值	
Notional, Nominal 象征性的, 名义的	
Notional price, Nominal price 象征性价格, 名义价格	
Nominal 名义工资	
Observation 观察	
Order signal, Order signal-control, Backlog of unfilled orders 订货信号, 订货信号控制, 未交付订货	
Output combination, Output composition 产出组合, 产出构成	
Output stock 产出存货	

Participation rate 参加率, 参与率	Queuing propensity 排队倾向
Paternalism 父子关系主义, 父爱主义	Queuing time 排队时间
Plan, planning 计划, 制订计划	Rationing 分配, 配给
Plan bargaining 对计划讨价还价	Real sphere 实际领域
Post-Keynesian capitalism 后凯恩斯资本主义	Real wage 实际工资
Postponement 延期	Reform, Postreform socialist economy 改革, 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
Potential labor reserve 潜在劳动储备	Regularity 规律性
Pressure 挤压	Repressed inflation 被抑制的通货膨胀, 抑制型通货膨胀
Price 价格	Resource-constrained market, Resource-constrained system 资源约束型市场, 资源约束型体制
Price drift 价格漂浮	Resource constraint 资源约束
Price responsiveness 价格反应	Revised demand 修正的需求
Price rises 价格提高	Rigidity, Inertia 刚性, 惯性
Price signal 价格信号	Role of money, Activity of role of money, Passivity of role of money 货币作用, 积极的货币作用, 消极的货币作用
Administrative price 管理价格	Rush 突进
Contract price 契约价格	Satiation level 满足水平
Effective price 有效价格	Saving 储蓄
Pseudoadministrative price 虚假管理价格	Saving of firm's 企业储蓄
Walrasian equilibrium price 瓦尔拉斯均衡价格	Household saving 家庭储蓄
Productive slack 生产性滞存	Say's principle 萨伊原则
Profit, profitability 盈利, 盈利性	Search 搜索
Pseudoadministrative price 虚假管理价格	Search propensity 搜索倾向
Pumping, Leaking 抽吸, 渗漏	Second economy 第二经济
Purchasing process 购买过程	Seller's market 卖方市场
“Putting out the fire” “灭火”	Siphoning-off effect, Leaking, Pumping 虹吸效应, 渗漏, 抽吸
Quality 质量	Shopping algorithm, Shopping process 采购程序, 采购过程
Quantity adjustment, Quantity signals, Control by quantity signals 数量调节, 数量信号, 数量信号控制	Shortage 短缺
Quantity drive, Quantity attitude 数量冲动, 数量态度	Horizontal shortage 横向短缺
Queuing, queue 排队	Shortage indicators 短缺指标

Shortage intensity 短缺强度	短缺强度
Shortage signals 短缺信号	短缺信号
Simultaneous appearance of shortage and slack 短缺和滞存同时出现	短缺和滞存同时出现
Triple relationship of shortage, slack and friction 短缺、滞存和摩擦间的三者关系	短缺、滞存和摩擦间的三者关系
Vertical shortage 纵向短缺	纵向短缺
Short-term adjustment 短期调节	短期调节
Slack 滞存	滞存
Slack indicator 滞存指标	滞存指标
Internal and external-slack 内部和外部滞存	内部和外部滞存
Labour slack 劳动滞存	劳动滞存
Mobilizable and nonmobilizable-slack 可动用和不可动用劳动滞存	可动用和不可动用劳动滞存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slack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滞存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滞存
Simultaneous appearance of shortage and slack 短缺和滞存同时出现	短缺和滞存同时出现
Social 社会的	社会的
Social benefit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Social capacity 社会生产能力	社会生产能力
Social cost 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
Social relationship, social condition 社会关系, 社会条件	社会关系, 社会条件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m and state 企业和国家间的社会关系	企业和国家间的社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hip of buyer and seller 买者和卖者的社会关系	买者和卖者的社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hip of claimant and allocator 要求者与分配者间的关系	要求者与分配者间的关系
Socialist economy, Socialist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 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Post-reform socialist economy, post-reform socialist economy management system 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 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 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Tradi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Tradi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management system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Soft budget constraint 软预算约束	软预算约束
Softness of constraints 约束的软度	约束的软度
Standard microeconomics 一般微观经济学	一般微观经济学
State 国家	国家
State budget 国家预算	国家预算
State subsidy subvention, government subsidy, state grants 国家补助, 政府补贴, 国家拨款	国家补助, 政府补贴, 国家拨款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stochastic description 统计描述, 随机描述	统计描述, 随机描述
Stock 存货	存货
Input stock 投入存货	投入存货
Output-stock 产出存货	产出存货
Stock signals, stock-signal control 存货信号, 存货信号控制	存货信号, 存货信号控制
Submicro-level 亚微观层次	亚微观层次
Substitution 替代	替代
Subvention, subsidy 补贴, 补助金	补贴, 补助金
Suction 吸纳	吸纳
Supply function 供给函数	供给函数
Tautness, Taut planning, Taut utilization 紧度, 紧计划, 紧利用	紧度, 紧计划, 紧利用
Technology 工艺	工艺
Tolerance limit, Acceptance constraint, Control according to tolerance limits 容忍限度, 可接受的	容忍限度, 可接受的

约束, 根据容忍限度的控制	Wage 工资
Tradi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Wage drift 工资浮动, 工资漂浮
Unemployment 失业	Nominal Wage 名义工资
Unemployment on the job 在职失业	Real Wage 实际工资
Keynesian Unemployment 凯恩斯失业	Waiting 等待
Unproductive slack 非生产性滞存	Waiting propensity 等待倾向
Unspent money 未支出货币	Waiting time 等待时间
Utility theory, Utility function 效用论, 效用函数	Walras's law 瓦尔拉斯规律
Vectoral measurement 向量度量	Walrasian 瓦尔拉斯式(的)
Vegetative control 植物性控制	Walrasian auction 瓦尔拉斯式拍卖
Vertical 纵向	Walrasian equilibrium, Walrasian normal state 瓦尔拉斯均衡, 瓦尔拉斯正常状态
Vertical communication, Vertical flow of information, Vertical relationships 纵向交流, 信息的纵向流动, 纵向关系	Walrasian price 瓦尔拉斯价格
Vertical shortage 纵向短缺	Walrasian theory, microeconomics, Walrasian model,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瓦尔拉斯理论, 微观经济学, 瓦尔拉斯模型, 一般均衡理论
“Voice”as signal 作为信号的“意见”	Welfare function 福利函数
Voluntary substitution 自愿替代	